

消失的帝国

X

西夏帝国

党项民族的发源、崛起、壮大，西夏王朝的建国、兴盛、衰落到灭亡，
西夏角度的五代历史素描全景图

唐荣尧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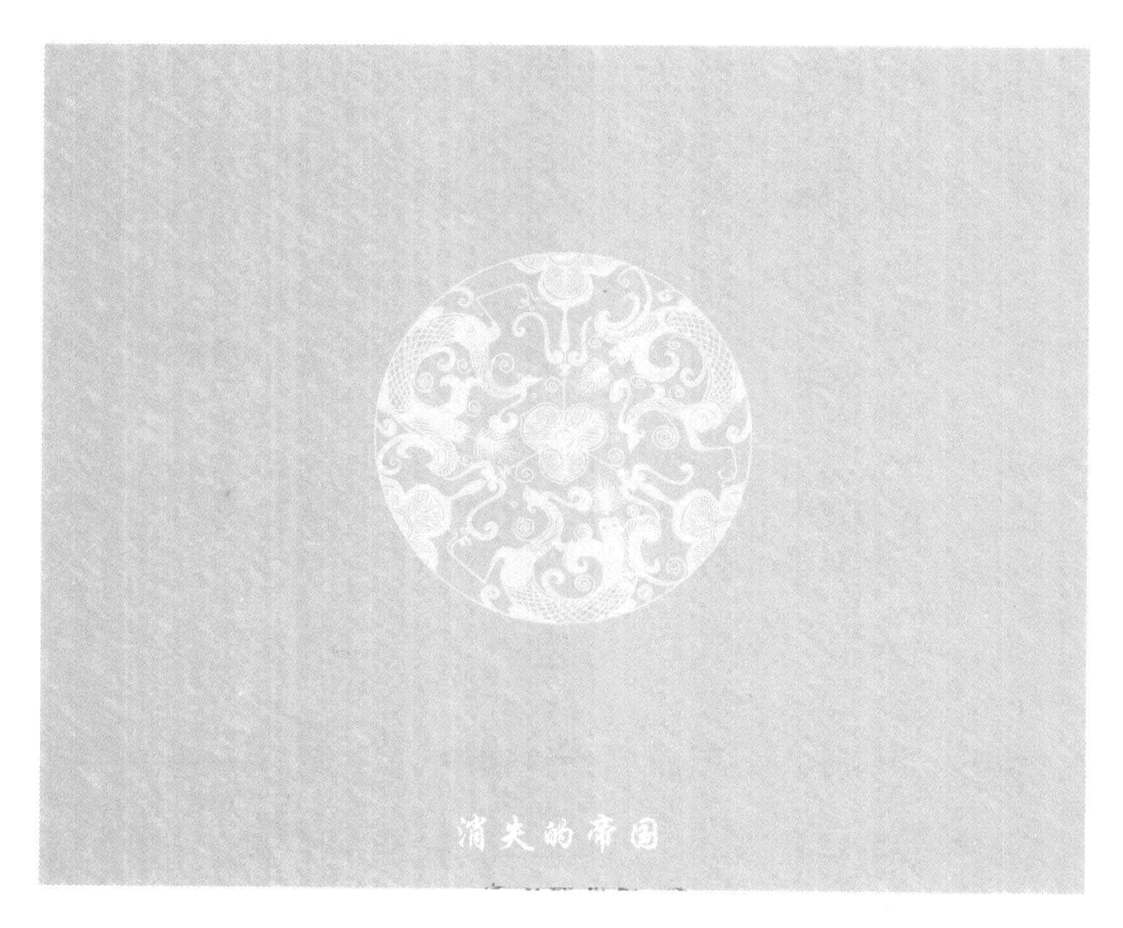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建议上架：历史读物

ISBN 978-7-5078-3600-4

9 787507 836004 >

定价：29.80元



XI XIA DI GUO

西夏帝国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帝国 / 唐荣尧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3
（消失的帝国）
ISBN 978-7-5078-3600-4

Ⅰ.①西… Ⅱ.①唐… Ⅲ.①中国历史—西夏—通俗读物
Ⅳ.①K24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4809号

西夏帝国

著　　者	唐荣尧
责任编辑	孙兴冉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3 年 3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600-4 / K · 226
定　　价	29.80 元

CRI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目 录

第一章　走进鲜卑牧帐的美女：党项羌的千载奇缘 / 1

4000多年前，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到隐身于《山海经》里的崟山，从昆仑山到阿尼玛卿雪山环绕的青海高原，驰骋、嬉戏着骁勇的崟人。他们将牦牛和藏系羊驯化，他们在山湖中留下了神秘的岩画，他们的不断扩张给高原带来血雨腥风，给安居中原的周王朝送去恐惧和不安。

因为三个美女丢掉江山，又因为一见钟情和移民融合。出人意料的是，3000年后，神秘的崟人竟在一个“新生”民族身上“复活”。

第二章　黄土战歌：360年的长期“潜伏”　/ 19

规规矩矩生活在新乐土上的党项人被胖子安禄山重新吊起了“复国”的胃口，一场福战，让他们重新回到逐鹿中原的大舞台。

因为助阵唐朝有功，曾显赫于青藏高原的拓跋氏、穿越青藏高原之绿和黄土高原之黄的拓跋氏消失了，这个诞生于青草之间的强大部落开始以李姓皇族出现在世人面前。

第三章　亮剑：大白高国的巨舰起航 / 45

公元1004年，一个让契丹人备感快慰的年份。富得流油的宋朝人谦恭地奉上了澶渊盟约，西边那个对自己阳奉阴违的李继迁也在他梦魂萦绕的高原故土死掉了，灵州城里生出的小娃娃，想必也是未来顺从的奴仆。没有敌人的日子，会不会太寂寞了？

强悍而孤傲的元昊死掉了，儿子也上了西天，巨大的政治空白留给了曾被他抛弃的老婆，于是，外戚成了帝国的主宰。或许是为了发泄怨气，或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许……反正这些女人都把鲜血和长刀当成了至爱。倒是几位正牌的皇帝怀着仁爱之心不懈地谋求和平。于是，一对奇怪的政治组合出现在党项帝国的高堂。

一个看似文弱的皇帝，骨子里却充满杀机。游刃于宋、辽、金、吐

蕃四方势力之间，乾顺皇帝把西夏帝国带到了巅峰。白色帝国在青藏高原和蒙古戈壁之间，在贺兰山、祁连山和六盘山三座山脉之间，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地理单元。

西夏，一个游牧起家的帝国，难免被理解为一个尚武、剽悍、粗犷的王朝。其实，她在诞生之前就执著地向东，向中原，向汉文化靠拢。仁孝皇帝，一个不折不扣的孔圣人的粉丝，把西夏引上了全面汉化之路。一个文官政治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泯灭了党项人的血性，也掘掉了帝国的灵魂。

第七章　帝国黄昏：北方升起黑煞星 / 132

如果说西夏王朝是一辆由李继迁、李德明精心打造的战车，那么，这辆战车就是由元昊隆重推到历史前台的。此后的百余年，这辆战车在三国演义中走向辉煌，走向巅峰。铸就巅峰的是刀剑，成就辉煌的是汉化。一对矛盾的组合，注定帝国内部波澜迭起。为了恢复祖先的血性，纯佑皇帝的生母咬牙拿下温良恭俭的儿子。可来自北方的黑煞星会给他们留下多少时间呢？

第八章　丧钟为西夏而鸣：一对幻想家的最后挣扎 / 144

嵬名安全在皇位上坐得并不舒服，刚当上皇帝，就碰到了帝国成立以来最凶悍的对手。他在皇位上最后的感触可能就是两个字：报应！

就在嵬名安全被来自北方的噩梦困扰时，来自皇宫的内乱更加深了恐怖的梦魇。1211年，一个幻想家，嵬名遵顼，仿效当年的自己登上了帝位，开始中兴的梦想之旅。等待他的，却是噩梦中的死亡。

第九章　传奇之后的传奇：王朝后裔的一地迷影 / 171

传奇帝国在亡身后依然续写着传奇，这个续写者就是党项的遗民。

中国已无西夏朝，世上已无党项人。和其他逝去的王朝不一样的是，这个神秘的王朝还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数百万模糊的背影，以及无尽的猜测和揣摩。这个习惯了流徙的民族，再次唱着悲怆的歌谣，负载着一个民族的沉重希望，在一个个浓重的夜色里，一批批仓皇地离开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帝都。面临着铁桶般的包围圈，他们能逃向哪里？

西夏王朝虽然带着一身秘密消失在历史的关注之外，但这种神秘就像一坛陈年老酒，时光越老，香气越浓，那些裹在其中的谜团也就越大。十年间，我孤身一人走在寻找西夏后裔的路上，这种追寻遍及中国18个省市的都市街巷和田野丛林，终于完成了一个人文学者对一个消失王朝遗定的使命。

第一章
走进鲜卑牧帐的美女：党项羌的千载奇缘

4000多年前，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到隐身于《山海经》里的崟山，从昆仑山到阿尼玛卿雪山环绕的青海高原，驰骋、嬉戏着骁勇的崟人。他们将牦牛和藏系羊驯化，他们在山湖中留下了神秘的岩画，他们的不断扩张给高原带来血雨腥风，给安居中原的周王朝送去恐惧和不安。

因为三个美女丢掉江山，又因为一见钟情和移民融合。出人意料的是，3000年后，神秘的崟人竟在一个“新生”民族身上“复活”。

崟山、崟人：《山海经》里的秘地和它的神秘主人

距今4000多年前的一天，统领岗格尔肖合力山一带的古羌族部落首领阙的领地里，突然来了一批勇猛的不速之客。这些语言与自己相差不多、但装备明显先进许多的客人自称“崟”，据说是受他们的首领差使前来传话，让岗格尔肖合力山一带的羌人归属他们。

这个要求显然让阙无法接受，他下令将这些不懂规矩的“崟”人的耳朵割下来，并当场生吃了，随后对“崟”人使者们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崟’头领，他的话我连同这只耳朵一起吃下去了。”阙此刻没有

想到，自己的一时之快在不远的将来会招来岗格尔肖合力山乃至整个青海湖一带多大的喧哗和不安。

崟人到底是一批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占领岗格尔肖合力山一带呢？

我从《山海经》卷二《西次三经》中的记载中寻找到崟人生活的地方——“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崟山”。也就是说，崟山在积石山西边、今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拉脊山一带。生活在这一带的人就是《山海经》中被称为“生活在崟山的人”——崟人。早在4000多年前，古羌人中的一支——崟人就在高原上率先完成了对野牦牛的驯化，今天散布在高原上的藏系羊和藏马，也是他们驯化的成果。随着放牧范围的扩大，崟人的足迹逐渐踏进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地区。领地的扩张总避免不了血腥的争夺和厮杀。他们带着戈形状的武器，反复给对方讲述自己居住在如堂的山里。于是，甲骨文中也称他们为“崟”：表示堂内堆放着戈一类的武器。从中原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些人带有明显的武力色彩。不过到了千余年后编纂的《尔雅》里，“崟”的意思已经温和了许多。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康静”——他们是生活在宁静之地的人；二是指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形如堂”的山。

生活在辽阔高原上的崟人的扩张，呈现出一种放射状，靠近青藏高原东部的一支将扩张的足迹延伸到夏朝的疆土边缘，甚至有一支曾经占领了今天的甘肃中部、宁夏南部的大片地区，建立了被夏朝称为“密须国”的政权，甘肃省灵台县白草坡乡曾经出土过一个青铜尊，上面有“子崟做母辛尊彝”的铭文字样，其中的“崟”字的字形正如《说文解字》中说“山如堂者从山，宓声”。这里的“山如堂者”恰

好是垒字的原意。[①]

夏商时期，垒人将驯化的羊作为友好的礼物送给夏人、商人，夏人、商人根据羊的形状称他们为“羌人”，并形象地创造了以羊为原型的“羌”字，将他们生活的地方称为“羌方”。甲骨文中也出现了“王于宗门逆羌”、“王于南门逆羌”等关于羌的记录。

笔者曾经多次沿着蜿蜒的黄河上游，在龙羊峡、松巴峡、积石峡等峡谷间散落的村寨中，调查有关古老的垒人、羌人在这里的生活讯息，并一再翻过积石山进入甘南藏族草原。我试图顺着几千年前能体现垒人向羌人转变过程的线路，在草场和积雪盛装的高原上，在凌厉的高原风响中，孤独地穿越这条被历史学家忽略的神秘而古老的文化古道，聆听它的声响与它卷走或沉淀的文明与智音，在众多被时代与人们遗忘的文化遗存、哪怕一丁点儿的文化信息里，静静地感受这个创造中国古文明中最辉煌的文明与文化中一部分的民族的初热。

公元前1291年，商朝第23任帝王武丁就发动了对“羌人”的战争。甲骨文中有大量诸如“师伐羌”、“众人伐羌”、“北吏伐羌”的记载。战争的大多数结局是羌人战败，并成了商朝奴隶的一个重要来源。被俘获的羌人除了当奴隶之外，也不时被商朝上层人士用来祭祀鬼神和宗庙。当然，也有一些羌人在商朝担任官吏，甲骨文中武丁祭祀时的祭祀官名单中，就有羌立和羌可两个羌人。

商朝武丁三十二年，垒人再一次对商朝发起进攻，武丁率军迎战，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最后以垒人的撤退宣告结束。殷商晚期的纣王十六年，周文王带兵攻打垒人建立的密须国，遭到垒人的强烈抵抗而多

---

①“垒”字在战国以后逐渐也被“密”字代替，因此《说文》、《尔雅》等书籍中称“垒山”为“密山”。垒人在汉文献中逐渐也被“密人”代替，垒人逐渐退隐到《山海经》的记载中去了。

次败北。殷纣王于是追赐给周文王大批弓矢、斧钺，作为进攻垄人的战争专项武器。文王大军从今甘肃泾川县内的阮国、泾川县北的共国穿过，面对先进的武器和如潮的军队，垄人将他们的首领自缚而降，密须国这才得以免遭灭亡的命运。

不过好运并不会永远相伴。公元前944年的夏天，周共王姬伊扈前往泾水一带游玩，密须国的君主康公迎接并陪同共王游玩。姬伊扈身边的三个美女被康公英俊、帅气的外形、气质及勇猛打动了，于是出现了甲骨文中“三美女奔康公，康公未献于姬伊扈，姬伊扈乃灭密国”的记载。

三个美女投进了康公的怀抱，引得姬伊扈大怒。康公的母亲极力劝阻儿子不要为美女而丢了江山，康公依旧执迷不悟。恼羞成怒的姬伊扈当即发动了对密须国的战争，灭亡了犯上的密须国。这大概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第一次因为争夺美女而爆发的战争。东迁的这一支密人就此失去了政权，并一度从历史的视野中消逝。但谁也没想到，这些神秘的垄人，会在3000年后，在另一个神秘的民族身上“附体”、“再生”。

屡败屡战，向东方发起不懈进攻的垄人终于在新兴的西周政权的强大攻势下彻底放弃了东进的打算，退回青藏高原，并将扩张的视野转向西方，于是，在岗格尔肖合力雪山一带，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陌生而不逊的客人。

那场没有载入史籍的战争无疑是惨烈的，远道而来的垄人面对疲倦和轻敌的阙，取得了一场久违的完胜。牺牲者和受伤者的血，染红了岗格尔肖合力的天幕。骄傲的阙站在蓝天白云下，根本不知道垄人在和东方人的交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拥有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最后阙被垄人生擒。那天，垄人的领袖偡（zhàn）坐在阙的帐篷前，望着岗格尔肖合力雪山顶上的皑皑白雪，按照垄人必取仇敌头级并将头颅骨做成饮器的习惯（这个习惯后来一直被羌、党项羌乃至西夏王朝的历代

君王、武将保留），下令将阙的头颅砍下，祭天、祭山、祭水、祭草后，将那个硕大而骄傲的头颅做成了饮器。而阙的那些女人自然走进了偡的牧帐，阙手下的男人成了偡的兵士或牧者，阙的所有领地成了偡的领地。

这些丵人占领岗格尔肖合力后不久，继续向青海湖周围地区挺进，成了青海高原中部、东部、北部的主人，他们对这片广袤高原的统治一直延续着，乃至于《后汉书》等文献将其称呼为“迷唐”、“迷吾”；后来的藏民将曾经的丵人生活地区的人也称为“mi”、“mi nia”。五世达赖在《史荟珍筵》中，也将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称呼为“mi”；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生活在洮河上游的羌人建筑的城堡记载为“迷和城”；后来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党项羌人也被藏人称为“mi-nak”（密纳克）[1]。

从现代地理意义和自然景观等方面分析，今天青海省天峻县西北隅的著名雪山岗格尔肖合力完全具备《山海经》中所记述的“昆仑之丘”的自然景观地貌条件，这是一条青海北部的众河之山、众水之祖。发源于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南侧的布哈河，向南流至快尔玛山脚下，折而东流入青海湖。布哈河在汉文献中称“布喀河”，也称作“喀喇细纳河”，前者为近代藏语，意为“公牛河”，后者为党项羌语，意译则为“黑城边的河”。丵人的称谓在“山海经时代”后，逐渐消失了，中原开始称之为羌人，羌人中的一支党项羌后来崛起并曾一度占据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和布哈河流域，于是这里留下了一些羌语地名，“喀喇细纳河”就是一例。

我所以在本书开头如此详尽地陈述丵人及他们生活、扩占的地

① “nak”是“黑人或黑民”的意思，明显带有歧视含义。这种叫法后来被汉文献采用，如《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中称党项羌为“黑党项”。

域、地理概念，是因为遗留下来的著名的西夏文献——《圣祖诔咏》，在讲述西夏立国的主体部族党项羌的族源时，有这样三行汉字直译诗句——

头黑石城漠水边，
颜赭父冢河白上，
弥药长里国彼有。

意译为："遥远的大漠边布满了黑色的石头筑起的城，那些赭面祖辈高大的坟冢就埋在白色河水边上，那里有我们祖辈创立的弥药之国——坌国。"俄国著名的西夏学者聂历山认为"河白上"即"白河上游"，亦即"白色的水"。

不仅坌人占领的青海地区的许多地貌符合《圣祖诔咏》中描写的地域特征，而且，在岗格尔肖合力雪山山脉西部中端的宰力木克雪山南，从雪山深处也缓缓流出一条河流——党河，向西南流出今青海省海西州境内，这就是《山海经》中所记述的"洋水"；而发源于岗格尔肖合力山北侧的拉萨尔河，一路向北注入黑河，这条河流一路流经过青海、甘肃，到内蒙古称作"弱水"。这样的地理位势很符合西夏人对其祖先生活地区的描述。西夏人建国之后，以"白上大国"自称，可能与西夏人追怀先祖的情结有关。

北到岗格尔肖合力山，南到巴颜喀拉山，西到昆仑山，东到阿尼玛卿雪山一带，犹如俄罗斯著名诗人叶塞宁笔下那"满头卷发的苍茫薄雾，在山后挥动着雪白的手"，草地上走动的牛羊及跟在牛羊后面的古羌牧人，在蓝天白云下，过着属于他们的恬静生活。

坌人的称谓从汉地文献消失后，内地人对这些高原主人的称呼开始变成了"羌"。从青海湖到黄河谷地的青海中部草原地带，成了羌人

的游牧天堂。成群的牛羊在高原上缓缓行走，羌人们跟随着牛羊的脚步移动着自己的驻牧地：夏天，他们在地势较高的水草丰茂之地放牧；冬天，他们走向河谷或湖泊地带，在大雪弥漫中让自己和牛羊都停止走动。这样的日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就这样世世代代地递传在他们中间。

当时针指向公元前5世纪70年代时，一个名叫爰剑的羌人出现在羌族历史及正统的大中国历史视野中。由于长期闭塞的落后生产力，加上陈旧的武器、数量不足的军队，羌人与秦人的战争以失败告终，爰剑被俘，他和他的众多族人，做了秦人的奴隶。

爰剑被俘到秦国后，秦王将其作为奴隶。这位流淌着羌族血液的有志之士，不甘为人奴，并没有被长期的阶下囚生活消磨了气节。在被秦人俘虏并接受繁重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他学习了秦人的粮食种植、耕作技术，以及冶炼技术。后来，他向西而逃，逃亡的路途遥远而艰辛，在逃回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故地途中，在山野间遇到了一个吡女（即割掉鼻子的女人），两人结为夫妻。据说这位吡女自嫌脸面丑陋，于是披散头发遮住面孔，后来的羌族妇女因此有了“被发覆面”的习俗。

公元前475年，爰剑偕妻子逃奔到三河（指黄河、析支河、湟河）地区，当地羌人知道爰剑的经历后，认为他是一个非凡的人，非常敬畏他，共同推举他为首领。由于他做过奴隶，羌语称“奴”为无弋，所以有了“无弋爰剑”这个汉人眼中奇怪的名字。

无弋爰剑将学到的农业耕植和畜养牲口的技术传授给还过着原始游猎生活的羌人，让他们种五谷、养六畜。爰剑和他的儿子、孙子使这个小小的部落逐渐强大，阿尼玛卿雪山以东的牧场也因此更换了主人。到他的曾孙忍和舞时，该部落达到了一个顶峰。忍生了九子，发展成为9个部落；舞生十七子，发展成为17个部落。到秦汉之时，无弋爰剑在青

海的羌族子孙已分为大小150个部落，雄踞青海高原。

中原人称呼他们为“羌”，他们自己却照旧自称为垄。元朝时，政府因地制宜，在这里设了一个郭密千户所。元朝政府里西北民族出身的高官众多，对“垄”或“密”还能分得清，到了明朝，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洪武朝的士大夫称呼这里的百姓为“果迷（郭密的音转）卜咂族”，此后不知什么时候又讹变为“思果迷族”。至今，青海海南藏族地区仍保留着垄人的称呼，并将他们生活的地区称为郭垄、果迷等。这些垄人后裔主要分布在今天青海省海南州的黄河以北的曲什安河、恰卜恰河、伊黑龙河、浪麻河、罗汉堂河、贺尔加河、尕让河和江拉河流域地区。因此，在考察西夏王朝的主体族群——党项羌的最初来源时，一定不能忽略了生活在青海海南藏区和果洛藏区一带的古垄人。

天狼西来：六千里外的不速之客

青藏高原，羌人的天堂，破坏甚至摧毁这座天堂的，是一支来自六千多里外的天狼部队——鲜卑。

位于大兴安岭腹地的鄂伦春旗境内的嘎仙洞，是鲜卑先民最早走进历史视野的地方。从嘎仙洞走出的鲜卑人，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就有记载。在零星而模糊的记载中，那些游牧在今天辽宁东部西喇木伦河以北的少数民族，被称为“鲜卑”，属于当时的“中国”之外的东胡。匈奴强大时，一度臣服于匈奴人，匈奴人被击败后，这个原本不起眼的部落迅速地在蒙古草原上亮出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他们收留了数十万的匈奴人后，很快成为北方草原上最强大的游牧力量之一。魏晋时期，鲜卑分为宇文部、慕容部、拓跋部、秃发部和乞伏部等若干部。影响最大的

是拓跋部，在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的北朝，除北齐外，北魏、东魏和西魏都是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①]。

鲜卑部落流行一种叫“马斗”的比赛项目。每年的马斗是鲜卑部落的盛会，是一场带有比赛和娱乐双重性质的鲜卑人的大集会。

公元284年，鲜卑人的马斗成了慕容部酋长涉归的两个儿子公开较量的舞台：16岁的嫡子慕容廆出身高贵，是可汗之位的合法继承者；庶长子吐谷浑则统领着1 700户部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在部落中享有盛名。

那天的马斗参观人数是历年之最，慕容涉归亲自带领自己的随从、亲信及宠爱的女人，来到人山人海的马斗场。从小过惯了娇宠生活但心高气傲的慕容廆一心想挤走对自己汗位有威胁的吐谷浑，当吐谷浑远路赶来参加比赛时，慕容廆差人在前一夜给吐谷浑的马槽偷偷投了泻药。第二天的马斗场上，在草原上纵横驰骋多年的吐谷浑怎么也没料到，这匹陪伴自己攻下一个又一个草原部落的心爱战马，会如此“掉链子”。就在他羞愧难当时，慕容廆骑着战马走过来高声说：“这难道就是草原上有名的吐谷浑么？骑着这样的马怎么能作战呢？我为有这样的兄长感到羞愧！”

糊涂的慕容涉归对比赛结果没有丝毫怀疑，反而对身边宠爱的女人和亲信说：“呵呵，你们平时都说慕容廆不能撑起鲜卑的大业，今天的马斗连吐谷浑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受到嘲弄的吐谷浑一气之下带领部众，决定另起炉灶，连夜带领人马开始了西迁之路。这场引起鲜卑部落严重分裂的马斗由此画上了一个伤心的句号。

吐谷浑带领部众向西部那广袤但陌生的地域进发，原来他统领的

---

①关于鲜卑民族的历史，本丛书之第二部《鲜卑帝国传奇》有详细的介绍。

1700多户部落人马大多选择了追随这位草原上的雄鹰，而且，越来越多的鲜卑人、匈奴人后裔、突厥人也慕名从或远或近的地方跑来跟随他迁徙。通过一包泻药爬上可汗宝座的慕容廆感到了很大的威胁，于是派遣使者到草原上的很多部落，一通胡萝卜加大棒，迫使这些部落不敢收留吐谷浑。

那个艰难的秋天，吐谷浑所到草原上的每寸土地仿佛都不属于他，吐谷浑每到一个部落，要么是遭到毫无余地的拒绝，要么是主人在接待他们后便委婉谢绝他们久留。他坚信总有一处草原能让他驻足。每个夕阳下，看着落下的残阳，他越发相信最美的一道斜阳之下，最美的一处草原将是属于他的。

严冬季节，吐谷浑策马来到黄河边，看着那一片冰冻的洁白，他的眼光越过黄河朝南望去，黄河以北的狼山、阴山脚下没有哪一方部落能容忍自己，那么，黄河以南的地方呢？他派人踩着厚厚的黄河冰面走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很快，他派去的人回话：黄河南边的那片草原上生活的是鲜卑人中的一支——拓跋鲜卑部落，他们最早和慕容鲜卑部落有过领地纠纷，交战失利且被慕容鲜卑屡屡欺凌后，才远徙到河套平原的。听说吐谷浑是被慕容鲜卑的慕容廆排挤而出的，愿意接纳吐谷浑。就这样，吐谷浑带领他的追随者在河套地区驻足下来，在这里开始了近二十年的游牧生活。

拓跋部在接受吐谷浑的人马后，势力大增。但随着吐谷浑力量的强大，拓跋鲜卑内部也开始对他产生各种猜疑，有人甚至主张铲除吐谷浑。吐谷浑只好再次选择流徙，他的才能和英名不仅使他原来带领的鲜卑人继续跟随他，就连拓跋鲜卑中的不少人也跟随他，他们跟随他继续朝着夕阳落下的地方而去。这也是后来的吐谷浑政权中有大量拓跋氏的原因。

吐谷浑定居河套近二十年的事实，为1000多年后建立西夏王朝的党

项羌叙说自己的族源，增添了一份似乎可靠的依据，所以西夏开国皇帝嵬名元昊登基第二年就派人到开封，他的使者给宋朝的表中说道："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意思是说，我元昊是具有帝王血统的，我的祖先早在东晋时期，就创立了后魏的根基。后魏即北魏。

312年，吐谷浑带领他的部众渡黄河，越贺兰山，穿过了鄂尔多斯草原、河套地区、黄土高原、河湟谷地、青海湖，越过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的地界，行程2000多公里，终于踏进了青藏高原。在这里，吐谷浑面对的不仅是一片高海拔地区的雪山和草场，更是无弋爰剑的后裔们掌控的大小150个羌人部落。一方要进入这块天高云淡、水清草茂的天堂，一方要捍卫祖先留下的这方草场的独立和完整，战争无法避免地摆在了鲜卑人和羌人面前。

吐谷浑部在辽东时就已经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沿途又不断吸纳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和武器，这使得他们就像一把犀利的楔子，极力想插进羌人的地界。羌人对这支远路而来的疲惫之师并不在乎，尽管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抵抗，但鲜卑人依靠吐谷浑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一步步地攻破了羌人的地盘，逐步向青海湖一带推进。这把楔子终于成功地楔进羌人生活的地界，在青海湖一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公元317年，吐谷浑在完成大迁徙后，以72岁的高龄辞世，他带领到青藏高原的这支鲜卑人自此被史籍称为"吐谷浑人"。

念：软化鲜卑尖刀的羌女

吐谷浑去世后，他的长子吐延率领吐谷浑人开始四处征战，高原上出现了吐谷浑人挥马征战的桀骜身影。这加剧了武力争夺羌人牧场、马

匹的进程，也使两个族落迅速融合。那些从对方掳掠来的女性成为己方兵士的女人，为自己的部落放牧、生子。随着征战范围的扩大，吐延已经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南至今四川省的阿坝县、松潘县一带，西边抵达黄河源头的鄂陵湖、扎陵湖。

329年，退居到阿坝一带的羌人在酋长姜聪的带领下，发起了反击，双方展开激战。战争的结果是吐延被羌人击毙，姜聪也被鲜卑人剁成了肉酱。

“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时，双方只能不情愿地请“和平”出场。

吐谷浑的新首领视罴（pí）应约和羌人的首领和谈。那一天的高原空气里弥漫着甜蜜的味道，首先闻到这种味道的是视罴，当他走进和谈的牧帐时，才发觉坐在帐中等待他的羌人首领——念——竟然是一位美丽而年轻的女性。而当视罴掀开帘布走进念的牧帐时，身后的那道阳光明显地刺到了念的视线，等那道光线退却后，念才发觉比阳光更亮的是走进来的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双方都愣住了，都没想到统领那么大部落的首领，竟然就是站在自己眼前的人。年轻、有着杰出的军事才能、能让各自部落心悦诚服等因素使他们互生敬意和爱意，草原上最具浪漫的邂逅发生了，两个被爱情笼罩的人手牵在一起的刹那，两个敌对多年的部落，在两个年轻首领的爱情前即将放下干戈，走向和平。

视罴忘了自己的使命，铁血在柔情前软化，他当场向念提出联姻。被爱神之箭在那一瞬间射中的念，愉快地答应了这场神奇的求婚。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了吐谷浑人的牧帐，成为羌和吐谷浑两大部落的高原王后。

视罴英年早逝后，念把羌人“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的习俗带进了吐谷浑的婚姻生活，转嫁给了视罴的弟弟乌纥堤。当乌纥堤整天沉湎于酒色时，她接管了大权，成为羌、吐谷浑历史上第一位执掌部族大权的女性。这样的才能，就连一向反感女性参政的司马光，也在《资治

通鉴》中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念氏专制国事，有胆识，国人威服之。"

念当政期间，是羌和吐谷浑两大族落走向融合的黄金时期，一个高原上的黄金家族出现了。她的四个儿子长大后，她让他们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带兵出征，谁征服的地方就归谁。四个儿子就这样离开母亲的牧帐，互不干涉地向各自的方向出征，使吐谷浑在原来的基础上越来越大，这四个儿子后来都成了吐谷浑历史上著名的酋长。从公元411~452年，这四个同母异父的兄弟，按照母亲的教导，遵循视罴开创的"舍幼立长"的传统，推行了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在当时的西秦、南凉、大夏等国对吐谷浑人和羌人虎视眈眈的形势下，兄弟四人能够巧妙地寻求到对外扩张、对内稳定的时机，并在上述几个民族政权走向衰落时，迎来了吐谷浑和羌的发展强盛时期。中国的北方游牧地区几乎成了他们的大舞台，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处的吐谷浑、羌成了这一地区的主宰。

5世纪中期，吐谷浑政权加速了在青海及甘肃南北部的扩张。公元457年，吐谷浑的王座上迎来了年轻的拾寅。他彻底改变了吐谷浑人"逐水草，无城郭"的历史，带领族人走进黄河西岸的曲什安河流域，在那里大兴土木，修建城邑。

新兴的吐谷浑政权引起了以拓跋鲜卑人为主体的北魏政权的忌恨。双方在今天的青海省兴海县河卡乡幸福村一带的曼头山展开激战，拾寅差点被生擒。这引起了拾寅对外策略的改变：向北魏派遣使者修好，向南朝进行纳贡，对汉文化开始大范围的引进，这种引进也使汉文化走进羌人中间。而羌人中的一支——党项羌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开始壮大，并将势力扩张到岷江上游地区，控制了松州（今四川松潘）、茂州（今四川茂县）等川西地区。

公元553年，另一个改写吐谷浑历史的人出现了：这一年即位的夸

吕在青海湖边的草原上，下令修建了吐谷浑政权的新都——伏俟城，在这座见证了吐谷浑王国最强盛时期的都城里，夸吕在金狮子床上自称“可汗”。他在执政的58年里，多次联合党项羌进攻隋朝。

夸吕于591年去世，其子世伏即位后就上表归属隋朝，并提出和亲请求，隋文帝顺势于596年将光化公主许配给世伏。光化公主走进青藏高原并没有取得双方希冀的效果，第二年，吐谷浑国内因为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而大乱，世伏被杀，他的弟弟伏允临危登基，重新采取了和隋朝对抗的态度。

608年，隋炀帝命令归附的铁勒部进攻吐谷浑，伏允带兵出逃。为了根绝来自吐谷浑的后患，隋炀帝带领大军于609年亲自西征——主要进攻目标为吐谷浑势力范围的青海湖东北部一带。战争打响后，党项羌因为支援路线太长而没能及时援助，导致吐谷浑军队大败，10多万人投降。伏允带领两千多人逃向今青海省果洛一带居住的党项羌地区，使这一带的党项羌势力更为壮大。隋炀帝在伏俟城设置了西海郡，并将大批罪徒发配到这里，“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尽管隋军撤退后，伏允曾带兵收复过故地，保持过一段时间的吐谷浑王位，但吐谷浑王国的盛景与辉煌不再，称雄青海高原的吐谷浑王国逐渐衰落了下去。

内附？躲避？：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一曲党项羌离歌

跟随吐谷浑西迁的拓跋部群在后来和羌人的联姻、联合中，逐渐成为党项羌部落中的显赫之族。566年，北周翼州刺史杨文思曾因“党项羌叛”，率领军队前往茂州讨伐。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党项羌的名号。

在目前的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鲜卑拓跋氏何时、何地进入党项羌控制范围。拓跋，最早在鲜卑人的语言中是“高贵的姓氏”，他们走进党项羌部族后，自然也成了党项羌语义里的“尊贵之姓”，至今，在藏语中“拓跋”仍是“高处的姓氏”之意，和吐蕃王朝中尊姓“吐蕃”近似。

585年的夏天，面对隋炀帝亲征时留下的还在渗着血的尸体，面对带着先进武器的内地军队留给高原生民的恐惧，羌人部落开始了大分化，在依附隋朝还是对抗隋朝的问题上，产生了一次次的争论。此时执掌党项羌政权的鲜卑族首领拓跋宁丛，排除了众多反对意见，带领自己统领的部落走出青藏高原，前往今甘肃省临潭县，在那里宣布归附隋朝，被隋朝封为大将军，这是党项羌被中原政权第一次厚封。至此，整个党项羌的势力范围东到甘肃临潭，西到青海和新疆交界的阿尔金山，南至巴颜喀拉山，北到青海湖以北的祁连山一带。

拓跋宁丛自此过上了十年的短暂和平岁月。按照归附的要求，他要直接接受隋朝边州将吏的控制，这个要求让自由惯了的拓跋宁丛逐渐不满，他从595年开始就在隋朝西北边境制造摩擦，并带兵袭击了隋朝的叠州，第二年又袭击了茂州。

唐朝建立后，拓拔宁丛依旧不安分。他带领党项羌联合吐谷浑，常常侵扰唐朝边界地区，大战不断、小战频繁。唐朝设在西北边境的7个州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战争之苦。党项羌人还不断向原来的吐谷浑故地推进。不幸的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新兴的吐蕃政权的正面阻击。真的要同时和两大新兴政权掰手腕吗？党项羌人再度陷入犹豫和彷徨。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对少数民族武装采取军事征剿和招抚的双重政策，自然对桀骜不驯的党项羌投去关注的目光。公元629年，唐太宗派遣一代名将李靖击败了长期侵扰唐朝北部边境的突厥。突厥诸部纷纷降唐，引发西北地区游牧部族纷纷归降唐朝的“蝴蝶效应”。这一年，

生活在茂州一带的党项羌也没能免俗。他们在酋长细封步赖带领下宣布投降。这件事引起长安城的高度关注，唐太宗下令细封步赖到长安城接受赏赐，并给予其很高的待遇，随后将他们生活的地区更名为轨州，细封步赖被封为轨州刺史。

在榜样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党项羌降附于唐。唐朝于是在党项羌生活的核心地区——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交汇的地带设置了16个州。原本就刚刚开始打地基的党项帝国大厦，在细封步赖的示范作用下，成了史上最长的烂尾工程。

凡事总有例外。当年带领2 000多吐谷浑残兵逃出隋军包围圈的伏允，带着强烈的复国梦想，一直拒绝向唐朝内附，因而成为大唐西部边界的隐患。和他脾气相投的还有一个党项羌首领——拓跋赤辞。唐太宗对拓跋赤辞青睐有加，可他就是“不识抬举”。

公元635年，大唐军队在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的带领下征剿吐谷浑。廓州刺史久且洛生派遣人对拓跋赤辞说明当时的军事形势及利害关系，拓跋赤辞对前来招降的使者说：“我身受吐谷浑给予的亲戚之恩，应该肝胆相照，腹心相寄，生死不二，怎么能顾及其他？你快速离开，别让你的血玷污了我的战刀。”

久且洛生得知后，带领骑兵发起突袭，在肃远山一带击败拓跋赤辞，击毙数百人，掳掠6 000多头牲畜，这使得拓跋赤辞在抗唐之路上越走越远。

唐朝军队征讨吐谷浑时，其中的一支由李道彦带兵从松州出发，目标是攻取赤水（今青海省共和县一带），这支大军的行军路线必须经过拓跋赤辞的地界。李道彦派人以钱币贿赂党项人，拓跋赤辞前往唐军营中说：“当初，隋朝军队进攻吐谷浑，党项人曾经提供给他们军用物资，可是他们言而无信，见到什么就掳掠什么，现在你们如果没有他心，那么我可以提供物资粮草，如果欺骗我的话，我会凭借险要地形来

阻塞你们的行军之路。”

为了取得拓跋赤辞的信任，唐军中的很多将领和拓跋赤辞歃血为盟，拓跋赤辞信任了唐军，便允许他们从党项羌的地界上经过。没想到唐朝军队行军到今四川省松潘西边的阔水时，见拓跋赤辞没有什么防备，就开始掳掠牛羊。拓跋赤辞大怒，在狼坡道抗击唐军，击毙唐军万余人。拓跋赤辞乘势侵犯叠州，李道彦只好退守松州。

李道彦的失信使唐朝五路大军失去了党项羌的战略联盟，反而使唐朝西北边境再次落入党项羌的侵扰中。唐太宗得知真相后，下令将李道彦流放边地，同时决定加大招降拓跋赤辞的力度。不久，拓跋赤辞的侄子拓跋思头带领一支党项羌降服唐朝。接替李道彦的岷州都督刘师立也再次派人前往拓跋赤辞处进行招诱工作，孤立无援的拓跋赤辞终于产生了归附的想法。在拓跋思头的引荐下，他带领部众内附。唐政府封之为西戎州都督，积石山以东地区因此并入唐朝版图。

唐政府对拓跋赤辞的归附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和礼遇，不仅封官赏地，而且以皇室之姓“李”相赐，这是党项羌发展史上拓跋氏第一次被朝廷赐姓。对于此前此后归附的党项羌，唐政府继承了汉代“属国”和魏晋以来中原王朝的“都护”、“护军”制，形成了唐朝独有的也相对成功的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也就是其羁縻府州随着部落移动，而且分并废置无常。唐朝一共设置了167个羁縻府州归党项羌统辖，可见其流徙路线和时间之长。

唐朝贞观以后，吐蕃势力开始北上。党项羌地处吐蕃和唐朝之间的中间地带，因而一度成为唐朝抵御吐蕃侵扰的前沿。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嫁给松赞干布，吐蕃和唐朝结成了甥舅关系，党项羌生活的大片地带获得了短暂的和平。

唐高宗即位后，吐蕃势力继续向北扩张，不堪战争之苦的党项羌请求唐朝将其内迁。太宗时，唐政府曾在今甘肃省庆阳地区设庆州都督

府，在六盘山西边设静边州都督府用于安置内徙的党项羌。随着吐蕃势力的进逼，静边州都督府获准向陇东和陕北一带迁徙。就这样，从青海腹地深处生长、壮大并一度在高原上创造辉煌历史的党项羌，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带着一曲悲壮的离歌走向黄土高原，最后来到陕北无定河南岸一带。这是党项羌进入陕北黄土高原的开端。

到“安史之乱”时，党项羌已经完成了在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东部等地的内迁，和内迁至此的其他民族一起开始定居生活。一个个党项羌部落，像一枚枚棋子，散落在唐朝西北边境地区的棋局上。至此，党项羌完成了从青藏高原到甘南大草原，再到松潘大草原，最后到走进黄土高原的族群大迁徙。

对他们而言，家园不再是往昔水草丰美的草场和牧帐，而是挂在马背上的一个流动的概念。他们的流动就是一次漫长的驿途，最终的驿站，便是陕北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交错地带，这里开始接受这些带着酒歌、牧歌的高原牧族。

那些遗留在原地没能迁徙的党项羌人成为吐蕃的子民。吐蕃人称呼他们为“弥药人”，这一称呼后来被扩大到其他党项羌部落，吐蕃也以此来称呼后来的西夏帝国。至今，在许多藏族文献或藏地口传中，仍称呼西夏为“mi nia”或“mi yao jia”。

第二章
黄土战歌：360年的长期“潜伏”

规规矩矩生活在新乐土上的党项人被胖子安禄山重新吊起了“复国”的胃口，一场福战，让他们重新回到逐鹿中原的大舞台。

因为助阵唐朝有功，曾显赫于青藏高原的拓跋氏、穿越青藏高原之绿和黄土高原之黄的拓跋氏消失了，这个诞生于青草之间的强大部落开始以李姓皇族出现在世人面前。

挥刀南向：一次改变命运的救援之旅

流徙到黄土高原上的党项羌起初在移民状态下，规规矩矩地生活在大唐政府安排的地域内。公元756年，改写党项羌部族整体命运的历史事件——“安史之乱”爆发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选择南下四川避难，梦想着崎岖难行的蜀道能使安禄山的骑兵却步。一个令人疲倦的正午，马嵬驿在阳光下迎来这支逃亡之旅。军士们认为杨贵妃是摧毁帝国的罪魁祸首，在生命与爱情面前，唐玄宗作出了一个将自己后半生放置在悔恨与追思中的选择：赐死贵妃。于是，一曲《长恨歌》从这里生根，蔓延到此后的中国

文学史和情爱史里，大唐的帝国大厦一夜间坍塌。

与唐玄宗选择逃亡成都平原不同，太子李亨选择了北上。公元756年七月九日，位于宁夏平原的灵州迎来了大唐太子李亨。三天后，灵州城南城门楼上，李亨在众人簇拥下，在这里宣告即位，把灵州的行政级别从郡升为大都督府，李亨（唐肃宗）任命灵州节度使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率领灵州辖区内的将士和前来归顺的党项、回纥、吐蕃等九国首领带来的兵士，开始兴唐大业。

起初，因唐政府下令沿边军队入卫京师，唐朝西部边防出现空白，吐蕃乘机夺取了河西、陇右等地，昔日架通东西方文化、经贸交流的丝绸之路大动脉被切断。党项羌人也开始乘机骚扰周围地区，甚至一度联合昔日迫使他们背井离乡的仇敌——吐蕃。

为了防止吐蕃和党项联合，唐政府下令将西北地区的党项羌迁移到夏州（今陕西省米脂县以北、陕西靖边县以东地区），将伴随着也见证了党项羌从青藏高原迁移到黄土高原的静边州都督府移植到今陕西省米脂县境内。与此同时，在今天的绥德、延安一带也安置了大批内迁党项羌。至此，在黄土高原区分布的党项羌基本形成了两大部落：居住在六盘山以东今甘肃省庆阳一带的党项羌被称为“东山部落”；居住在夏州一带的党项羌被称为“平夏部落”。统领党项羌从青藏高原、川西北高原上崛起并进入黄土高原的拓跋氏，就是平夏部落中的显赫大姓。

很快，历史给予党项羌一次跻身中国政治漩涡中心的机会。唐肃宗即位后，派出使者四处寻找勤王军队。当其中一个使者抵达距离灵州只有300多公里的静边州都督府时，静边州都督、党项羌首领拓跋思太决定带兵驰援灵州，这个举动不仅让唐肃宗对拓跋思太大加赞赏，还让他的儿子拓跋守寂带领党项羌参与到平叛“安史之乱”的战斗中。

这场战争对党项羌来说，是一场福战。拓跋守寂带领的党项羌将士

浴血奋战，在平定战乱中屡立战功，被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拓跋思太父子在大唐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时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和军事忠诚，为他们及党项羌赢得了政治资本。拓跋思太死后，唐中宗特意发布诏书，追赠其为“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使持节达恤等十二州诸军事，兼静边州都督充防御部落使”。

唐政府对拓跋家族的偏爱一直持续着，拓跋守寂的孙子拓跋乾晖后来也出任银州刺史，使陕西横山县一带成为党项羌的核心聚居地。公元873年，拓跋乾晖的孙子拓跋思恭带领党项羌占据了宥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并自称刺史，开始在内蒙古和陕北交界地区培育地方军事力量，他们一方面讨好中原政权，一方面准备军事和行政的双重独立。

党项羌势力的增长引起了唐朝政府的警惕。公元787年十二月，唐朝政府正式下令禁止向党项羌出售马匹和武器。党项羌人暂时还不想和唐朝发生直接对抗，于是，走私武器成为最佳选择，唐廷居然无可奈何。

党项羌的这种实力积聚到晚唐时期，终于随着黄巢起义而爆发。

公元881年的春天刚刚来临，显赫于世界视野300多年的大唐国都长安城被黄巢起义军攻陷。和“安史之乱”时相似的历史一幕再次传奇般上演：与唐玄宗一样，僖宗也选择了南下四川。拓跋乾晖的孙子拓跋思恭再次在这次战乱中看到了历史机遇，他当即决定出兵长安，帮助唐朝镇压黄巢军队。

这次出兵，不仅使党项羌得到了大量与内地军人作战的经验，也获得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俘虏，更重要的是，他们再次拥有了在黄土高原乃至鄂尔多斯高原合法立足、壮大的政治资本：拓跋思恭被唐僖宗任命为夏州节度使，不久又晋封为夏国公，统领陕北大片土地。

改造统万城：匈奴“废都”上崛起的军事巨舰

从长安归来后，拓跋思恭被陕北靖边县以北55公里处的一处匈奴人遗留下来的废城吸引住了，这座废城就是大名鼎鼎的统万城。这是一块在沙漠和当地人的记忆中被湮没在深处的废墟。

公元304年，匈奴族首领推举刘渊做他们的大单于，自此北中国再次呈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从公元304年到公元439年的100多年间，先后出现了少数族建立的十几个政权，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这其中就包括匈奴人建立的“夏国”。

公元391年秋天的一个黄昏，从内蒙古到陕北的大路上，一支疲于奔命的逃亡队伍所经之处，扬起大片的尘埃，遮蔽了本就黯淡的太阳。护卫们紧紧簇拥着一位11岁的少年，这位匈奴人打扮的少年是刘渊的后代，汉族名字叫刘屈孑，匈奴名字叫赫连勃勃。391年，他的父亲刘卫辰率领数万人攻打北魏，结果惨败。刘卫辰父子仓皇出逃。内讧的部下杀死刘卫辰，他的三儿子赫连勃勃逃出虎口，投奔薛干部。该部为了讨好北魏，将赫连勃勃押解到北魏，半路上经他人拼死相救才幸免于难。

406年，26岁的赫连勃勃做了一件可以说惊世骇俗且有悖仁义的事情：他率兵以打猎为名，杀死了岳父莫奕于。次年，赫连勃勃来到了统万城所在地，被这里的景色和重要的军事位势所吸引，于是，在这里开始了铸造匈奴人历史上第一个都城——统万城。据说在筑城的时候，每筑一段城墙就用铁锥扎一扎，扎不进去有奖，扎进去就杀工匠，因而整座城坚固异常。

27岁的赫连勃勃在修筑好的统万城自称天王大单于，定国号为夏，并改刘姓为赫连氏。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坐在王宫里，踌躇满志，做

着一统中原的美梦。公元417年，“大夏”立国后的第十个年头，赫连勃勃率兵南下攻占咸阳。418年，东晋所属的长安城发生骚乱，赫连勃勃马上意识到一统长安的机会到了，便带领大军突破因为内讧而疲劳不堪的晋军防守，大举入城，见晋军格杀勿论，整个长安城血污遍地。由于晋军被杀过多，赫连勃勃竟将人头垒成坟堆，名曰“髑髅台”，成为长安城一道血腥风景。由此，赫连勃勃登坛长安灞上，实现了他的梦想——做上了皇帝，但仍以统万城为都。

当年年底，赫连勃勃回到统万城，迎接他的是文武百官、成群的妻妾和刚刚落成的新皇宫。此时的大夏，疆土“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是北方最大的地方政权之一。

当赫连勃勃的生命走到45岁时，历史的时针指向了公元425年，这个把几乎一生的时光都投进了战争的匈奴领袖，因病而死在亲手缔造的统万城里。427年，北魏太武帝带领军队再次攻夏，一举攻破统万城。随着大夏国的湮灭，统万城的地位一落千丈，被北魏降格为还不如一个县的“统万镇”。统万城因此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视线，留给人们的仅仅是“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的衰象。

隋唐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争和乱垦滥伐，塞北草原生态遭到恶化，这里逐渐失去了昔日水草丰茂的景象，草场开始沙化，“眼见风来沙旋转，终年不省草生时”的统万城更是落入一片萧瑟之景。它更像个姿色失去的宫女，在繁华与喧嚣中被逐渐忘却。沙响过处，是一个失去了灵与肉，失去了梦想与记忆的古城，在日复一日的风沙流动与时间流失里渐渐苍老着容颜。沙响的背后，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最悲怆的吟唱。

被赐姓“李”的拓跋思恭从长安归来时，被眼前的这座废城吸引住了脚步。改名为李思恭的拓跋思恭以“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方式，在修葺一新的统万城开始一个小帝王的尝试：在自己的辖区内任命官吏，

征收租税，使以统万城为核心的整个夏州俨然成了一个小国，中原方面的无暇顾及成全了他的国君之梦。夏州也因此成了党项贵族在汉化过程中最早的一个实验场。

李思恭死后，他的弟弟思谏继位[①]。李思谏死后，由思恭的孙子李彝昌继位，形成了家族在夏州的世袭局面。李彝昌去世后，他的族父李仁福继承了定难节度使的位置；李仁福去世后，他的儿子李彝超代理职权。

早在李仁福执政期间，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惧怕仁福联合北方已经非常强大的契丹。得知李仁福去世，便发布命令让李彝超和治所在今天陕西省延安一带的彰武节度使安从进对调，并派人前去接收夏州地区。党项人拒绝退让，战争从此展开。

战斗中，党项羌联合了周围其他西北民族的骑兵万余人，迎击后唐军队。双方争战数月，夏州一直没有失陷，李彝超兄弟登上城楼对后唐军说：夏州是一个贫瘠之地，并没有珍宝和财富，可以给朝廷进贡；但我们的祖辈一直在此守卫，不想失去这么一个小城，何必烦国家耗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攻打呢?

在兵士厌战、粮草供给不足、党项羌占据有利地形的条件下，后唐军队只得撤退，撤退时留下的大量武器装备成为党项羌的重要兵器补给，同时，这场撤退也提高了党项羌在西北民族中的威望，此后，中央政权对党项羌再也不敢轻视了。

李彝超死后，他的兄长李彝殷继续执掌夏州政权，公元944年，李彝殷带兵从今陕西省神木县北渡黄河，帮助后晋进攻契丹，拉开了此后一百多年间党项和契丹的恩怨序幕。

---

①汉文献中，此后逐渐将这些拓跋氏称为李，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此后出现的拓跋家族的首领姓氏将改称为李。

萧燕燕与佘赛花：两位女杰背后的游牧争雄

1000多年前的北方草原，一个个游牧民族一面保持着草原上的野性扩张和纷争，一面悄然接受着从宋朝都城开封传出的汉文化影响，两者的消长过程，是这些游牧民族政权和宋朝的战争、求和、经贸。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就是其中一例。

公元4世纪，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分别被称呼为"潢河"和"土河"，生活在这两河流域之间的主体民族，就是后来史书上记载的契丹人。公元872年，一个叫耶律阿保机的小孩出生在契丹人的迭剌部中，这位后来被《辽史》记载为"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的契丹人，就是建立辽国的辽太祖。

在建立辽国的过程中，耶律阿保机的妻子述律平和丈夫马上征战，帮助耶律阿保机完成了大业。这位后来的皇太后，开启了辽国历史上太后活跃在政治舞台前沿的先例。公元953年，75岁的述律太后在阿保机的陵墓前寂然死去，巧合的是，这一年，一个叫萧燕燕的女子出生在辽国，这位17岁走进皇宫的契丹女子，就是辽国历史上真正掌握最大权力的萧太后。

契丹人有一种氏族外通婚的习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辽之后，认为后族对自己的建国帮助很大，便将后族一律改称萧氏。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本人虽未改姓，但她的两个弟弟却都改姓萧了。萧氏与耶律氏世代通婚的习俗一直沿袭下来：萧氏的女子都嫁给耶律氏，耶律氏的女子都嫁给萧氏，萧氏就此成为辽国仅次于耶律氏的权贵势力。

公元969年，辽穆宗被刺，时任辽国北府丞相的萧思温等大臣极力拥立穆宗的次子耶律贤即位，这就是辽国的第五任皇帝景宗。辽景宗即位后，为了报答拥立之功，提出选萧思温17岁的女儿萧燕燕为贵妃。

218年的辽国历史中，共有13名萧氏皇后，最有名的就是这位萧燕燕，她就是评书《杨家将》里的萧太后。

萧思温是个十分汉化的契丹贵族，在他的影响和家庭熏陶下，萧燕燕不仅精通诗文琴艺，对射箭、打猎等也十分擅长。萧思温曾经将萧燕燕许配给阿保机时期著名的汉臣韩知古的孙子韩德让。韩德让文化修养深厚，文韬武略均名冠一时。一纸年少时期的婚约，不仅为萧燕燕身为太后的生命历程添加了一段凄婉的歌谣，也为铁质的辽国历史添加了一份婉约。

耶律贤即位后三个月，萧燕燕就被立为皇后。982年，体弱多病的辽景宗病死，临终时留下"军国大事听皇后命"的遗诏，无可争辩地将军政大权交给了年仅29岁的皇太后萧燕燕。

萧太后执政期间，正是党项羌崛起之际。在拓跋部站稳脚跟后，青藏高原东北部一带的党项羌纷纷追随而来，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成了收容党项羌的一个巨大地域。党项羌以夏州为中心不断向四面扩散着能量，其势力范围的东北部已和契丹相连。

公元10世纪20年代，辽国不断加大向府州地区征伐的力度，生活在府州（今府谷一带）的党项羌中的折氏部落不愿臣服契丹，府州防御使折从阮，更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人物。931年，折从阮带领府州一带的党项军队，一举攻占了契丹人占领的鄂尔多斯东部地区，并出兵进攻山西朔州。党项折氏成了契丹人通过河套平原南下进攻中原、西进夺取河套平原乃至河西走廊、西域的巨大障碍，成了横在契丹人面前的一把闪着凌厉光芒的尖刀：凛冽而有威慑力！

党项折氏占据府州一带的好光景没能持续多久。公元935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在契丹人的支持下，夺取了后唐政权，次年建立后晋政权。为了答谢契丹人的支持，石敬瑭割后唐北部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折氏所统领的府州虽然不在割地范围，但契丹人开始觊觎这块地方，府州

就此被契丹人占领。

契丹人将所征服的各族，按照他们居住地的大小、人口的多少，分别设置属国和属部，大的准许封王、小的准设酋长，有了战事就向他们征兵，不顺从的话就讨伐。对征服的党项地区，契丹人将大的党项人生活地区封为“党项国大王府”，小的地区则是“党项部”、“山南党项部”等，但对一直抵抗他们的夏州党项李氏，契丹人却一直束手无策。

折从阮的儿子折德扆后来归附了后周政权，并被升为节度使，这个赏封引起了和府州相邻的夏州一带的党项李氏的不满。统领夏州的李彝殷认为夏州节度使自从唐朝末期以来就是节镇，世代相袭，党项折氏没有资格获得同样的政治待遇，便下令禁止府州使者经过夏州前往后周朝廷。

周世宗得知这个情况后，问他的宰相该怎么办？宰相回答说：夏州一直是边防重镇，朝廷向来比较优待，而府州偏小，相比夏州得失并不重要，应该安抚李彝殷以顾全大局。周世宗却认为：党项折氏尤其是折德扆多年来一直尽力抗拒依附契丹的北汉政权，怎么能够放弃他们呢？而且夏州只生产牛羊，贸易百货全部依赖内地，如果断绝供应，他们能怎么样呢？周世宗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夏州“问责”，李彝殷立即“惶恐谢罪”。

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府州党项折氏归附北宋。一直到公元1128年折可求以府州投降金朝为止，党项折氏一直经营着府州。

党项折氏历代在府州的军人门第，影响着一代代具有党项羌血统折家儿女的尚武传统，折德扆的女儿就是其中一例。当时的麟州土豪杨信自命为刺史，他的儿子杨业18岁时，府谷一带被折从阮、折德扆父子占据。针对契丹日益强大的攻势，杨业和折氏父子结为同盟，并同折德扆的女儿结了婚。后来的修史者因为“折”和汉族姓氏中的“佘”同音，便将折德扆的女儿折赛花称呼为“佘赛花”，她就是杨门女将的主帅佘

太君。

公元979年七月，宋太宗下令发动对辽国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归顺宋朝的杨业偕同夫人、党项女杰佘赛花及不少归降宋朝的党项军人第一次以宋将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战斗。宋军以优势兵力围攻辽国苦心经营的南京城（今北京）。辽景宗面对强势围攻，打算放弃救援。萧燕燕则力主抗击宋军，并动员强大兵力，保卫南京城。战争的结局是宋太宗身中数箭，化装并乘驴车逃命，辽军一直追到今北京城西南的范阳才回去。萧燕燕在辽国上下的视线里，不再是单纯能文治国家的女主了，更是能临敌迅速准确判断、部署兵力的女军事家。

在今山西省代县县城西北20公里的雁门山山腰处，有一个关口，就是有着九塞尊崇第一关的雁门关，它和宁武关、偏关合称为“三关”。这里自古就有“得雁门而得天下，失雁门而失中原”之说，历史上，发生在雁门关一带的战争一共有1 500多次。北宋时，雁门关的战事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已经号称“国无敌”的党项女婿杨业即驻守于雁门关。

公元980年三月，萧太后在辽都发布军令，亲率10万大军伐宋。战争将双方各自起着灵魂作用的女性推到了前沿。契丹女子萧太后志在必得，直逼关下。党项女子佘赛花向杨业献策，严防死守，每天晚上令士兵将水泼在城墙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城，从外无法攻破；同时，佘太君带兵守卫雁门关，让杨业和几个儿子带领部队出城，从侧面包抄契丹军队。雁门关战役，以宋军取胜而告终，不仅保卫了宋朝的边境安全，还扭转了战局。随后的近十年，契丹军队再也没有攻入过雁门关，一个党项女子的军事才华凸显在这场战役中。

公元986年，宋太宗出兵30万，分三路向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宋太宗亲自指挥，其中杨业在西路军中担任副帅。萧太后带领年幼的新帝辽圣宗亲自到今北京城一带抵御宋朝的东路军、中路军，先后全面击退了宋军进攻；她还命令辽国大将耶律斜轸抵御宋朝的西路军，并下令务

必活捉杨业，且不能使之受伤。在朔州一带，耶律斜轸几乎全歼了杨业部队，辽国军士用箭射伤了杨业并将其生擒。耶律斜轸亲自劝说杨业投降，杨业拒不投降，绝食三天而亡。

此后，长期的宋辽之战中，党项女子佘赛花和几代杨家人多次挂帅出征，将自己融入了宋朝政权的将系图谱中，留下了自己在爱国女性阵营中的席位。

公元1009年十一月，萧燕燕为儿子举行了契丹传统的“柴册礼”，将皇权交还给了耶律隆绪，决定从此结束她整整40年的“摄政女皇”生涯，去南京（今北京）安享晚年。南行的途中，染上了疾病，逝于行宫，终年57岁。

党项和契丹的两个杰出女性的较量结束了，但党项和契丹的较量却刚刚拉开序幕，到双方建立的西夏王朝和契丹王朝正面交锋时，给北中国的天幕点燃了一次次战火。

远交近攻：无定河畔的沙漠之狐

无定河，一条从陕北白宇山北麓缓缓流出的小河，因两岸长满红柳而被当地人称为“红柳河”，当它蜿蜒进入内蒙古额托克前旗境内后，有了一个颇具游牧民族特色的名字——萨拉乌素河，河水穿越黄土和沙漠交错地貌的沟壑后，进入内蒙古乌审旗，然后经过陕西省清涧县汇入黄河。这是一条缓缓流淌于陕北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上最长的河流，一条和西夏有着精神源头意义的河流，也是一条伴随党项羌在西夏建国之前奔波于黄土高原上的一条岁月之河。

公元963年，无定河边的一个小村庄（今陕西省横山县殿市乡李继迁寨村），一个叫李继迁的党项人出生了（643年后的公元1606年9月22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也出生在这个村子里，其父

希望儿子和先祖李继迁一样，成就一番事业，便给儿子取名为鸿基）。

李继迁的传奇一生是在他的马背写就的。他11岁时就被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光睿授为管内都知蕃落使，这使他成为党项羌历史上最年轻的军事将领，他一直担任该职到20岁。李继迁20岁这年，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党项民族的命运。这件事就是他的族兄李继捧决定带领族人内迁开封。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夏州节都使李彝殷当即派人到开封进贡，表示臣服宋朝，以此赢得了宋朝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换来了党项羌在夏州一带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李彝殷去世后，宋朝追赐他为夏王，夏州一带由李继迁的堂兄李继捧执掌。李继捧在亲汉之路上走得更远，他被宋朝封为定难军节都使。李继捧亲自到开封朝谒。大宋皇帝的威严、开封城繁华、奢靡的市井生活，让这位党项羌领袖大为惊叹，他当即向宋太宗表示愿意献出自己管辖的所有地盘，归顺宋王朝。

宋太宗欣然接受了这份大礼，不仅授予李继捧彰德军节都使，而且提出把李氏家族迁到开封。这一举措表面是让李氏家族进京享福，实际上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党项高层，因而很快在党项羌内部激起了风暴，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就是强烈反对者之一。

得知李继捧要献地称臣，他急忙召集弟弟李继冲、亲信张浦等人商讨对策。他说：自从祖先来到这里，已经300多年了，党项羌先祖占据了周围的州郡，雄视一方。现在宋朝下令让我们前往京师，我们的情形危急啊！他随即决定带领部属撤离银州，寻找新的根据地。撤离时，李继迁向外界发布自己乳母死亡的消息。“发丧”之日，李继迁令部下把兵甲器械暗藏于灵柩之中，家属与部下扮作送葬的队伍。当送葬队伍离开城郊，避开了宋朝兵士的监视之后，便直奔夏州东北300多公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北)。李继迁和那里的党项羌联合起来，举起了抗宋大旗，开始了他建立独立党项羌政权、反抗宋朝的人生。

四面沙碛，但里面水草丰美的地斤泽迎来李继迁的第一所营帐后，就成了党项羌人逐渐积聚的地方。李继迁在自己的营帐里供奉起先祖拓跋思恭的画像，祭起复兴党项羌的大旗。一个以李继迁为核心的党项族落在离开青藏高原300多年后开始重现端倪。

李继迁占据地斤泽后，开始对宋朝边境进行小规模的侵扰，有时也派人向宋朝进贡马匹、骆驼，不过目的都是试探宋朝的态度与虚实。984年七月，李继迁带领军队夺取了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的王庭镇，俘获宋军万余人，取得了对宋作战的第一次胜利。第一次胜利随之也引来了李继迁的轻敌和宋朝加倍的军事打击。宋朝的夏州尹宪和都巡检使曹光实，得知李继迁驻地内部空虚，马上派数千精骑偷袭。李继迁大败，与弟李继冲逃脱，李继迁妻子与母亲罔氏被宋军俘获，党项军死亡500余人。宋军放火焚烧了400多处帐幕，掳获牛、马、羊及兵器数以万计。

陷入绝境的李继迁兄弟一直没放弃军事复兴计划，他对党项豪族们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先泽，能从我兴复乎?"众豪右被他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都表示响应，大家相约在夏州以北的黄羊坪聚兵。同时，李继迁开始注重合纵连横的方略，与野利等党项豪族走联姻的路子，共同建立反宋联盟。

党项人在黄土高原上试图崛起时，整个中国北方被两大军事势力控制：以开封为中心的宋朝和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处于夹缝状态的党项部落，在这两大军事势力之间，寻找着自己的生存空间。李继迁审时度势，看好和辽国联姻的前景，以婚姻的方式架设起新桥梁。这为10世纪末期中国北方的两大新兴力量串起了一条复杂的线索。

公元986年二月，大辽皇帝在他的皇宫中接见了一批从遥远的西北辗转而来的使者，这批使者不仅送上了产自西北的珍贵物产，更送去了一份让辽国兴奋不已的礼物：他们的主人李继迁想归顺辽国，并提出娶

辽国公主为妻的请求。辽圣宗耶律隆绪高兴地收下了这份厚礼，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迎娶辽国公主，是党项和契丹上层之间的第一次通婚，从此，党项人和契丹人之间拉开了战争和联姻交错的序幕。

公元990年，辽国要册封李继迁，身为契丹女婿的李继迁主动提出，“我们党项羌自先祖拓跋思恭时期就占据了夏州，我请求赐封为夏国王”。李继迁就此成为辽国册封的夏国王。

李继迁这枚重要棋子一旦投到对手的棋盘上，将会对宋朝产生很大的威胁。为了拉拢他，宋朝于991年赐李继迁姓“赵”。

两大强敌的争相拉拢，给党项人创造了难得的西进良机。1001年，李继迁带领他的精锐之师向西挺进，攻占了位于宁夏境内的北方军事重镇灵州，这是党项人第一次大规模西进的序曲。在灵州，李继迁成立了具有高度自治色彩的西平府，完成了一个处于游击状态的军事力量向自立的地方割据政权的转化。灵州的取得，是党项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党项羌开始从游牧经济向农牧结合的二元经济结构过渡。

公元1004年，李继迁带领党项军队渡过黄河，穿越腾格里沙漠，一举攻下了凉州。守卫这里的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在逃走后又返回，请求李继迁允许他投降。潘罗支还召集六谷部落的诸多首领及勇猛善战的龙族军队数万人，集聚到西凉，派人对李继迁说这是全部来投降党项的，请李继迁检阅训示。第二天清晨，凉州城四处蔓延的清寒并没有让李继迁感到不安，他带着胜利者的笑容，来到凉州北城楼，站在高大威武的城楼上，看着那些穿着各种衣服的河西一带的诸多民族的番兵们负弩携箭，缓缓步进凉州城。猛然间，从正方入城的番兵中射出一箭，正中李继迁的左目。在众将领的拼命保护下，李继迁才冲出吐蕃人的包围圈。三天后，这位奠定西夏王朝基础的一代枭雄撒手西归。九年后，他

的儿子李德明追尊他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这是党项羌历史上的始皇帝。李元昊称帝后，追认李继迁谥号“神武”，庙号“太祖”，并将他的遗骨移葬于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墓群中。

李继迁在灵州临终前把儿子李德明叫到身边，叮嘱道：“我死之后，你要尽全力请求归附宋朝。如果一次上表不同意，就再次上表，即使一百次还不同意，你也不要停止。”他还给追随自己的得力幕僚张浦等人交代：“你们和我一起征战多年，情同手足。我自幼生长在兵伐武战中间，历尽艰苦，才有了今天聚齐灵、夏之众的局面，虽不能和宋、辽争衡，但只要你们尽力辅佐，见机行事，还是可以保持旧业，为祖先争得荣光。如果能够这样，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左手军事，右手贸易：党项少主的西进之路

公元1004年，23岁的李德明从父亲李继迁手中接过党项羌的大权，相对他父亲李继迁和建立西夏王朝的儿子元昊来说，他的许多政绩都被父亲和儿子身上巨大的光芒所遮蔽，因此，史书上多称他即位时为“弱子”。那么，这位“精天文，通兵法”，“深沉有器度，多权谋”的党项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在藏族史籍《红史》、《贤者喜宴》等书中，有这样一段带有神奇色彩但却暗含不少历史事实的记述。[①]

西夏王朝的东边是汉地，南边一直到绛（今云南的大理一带，书中

①2004年，我在甘南草原上探寻党项人生活源头时，在甘肃玛曲县，我的诗人朋友瘦水家中曾阅读过这两本书的汉译本；2008年10月3日，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州佛学院院长、藏传佛教大堪布丹求达瓦曾找来《贤者喜宴》的藏文本，并让嘎雍堪布翻译出有关西夏的一段。

发音为jiɑn，作者注），西方是吐蕃，北方是霍尔（书中发音为huo er，今内蒙古高原地区，作者注）中间是mi nia（即西夏，藏语发音为mi nia，作者注），后来被忽必烈占领。

在一个叫噶（即灵州，作者注）的地方，西边是西夏的主要地方然冬擦哇岗（即祁连山，作者注）。以前，西夏的国土都在汉人国家之中，北方和噶之间有一座叫miao xi的山（即贺兰山，作者注）。据说这座山的山神叫si hu huo ga hu，这是一座很暴烈的山，有一天，这座山的山神化成了七个骑马人，到达西边的城市（即西夏时期的凉州，作者注），和一个当地妇女生活在一起并让这个妇女怀孕（指李继迁攻打凉州时，和当地女子交合并使之怀孕，作者注）。

有一年，天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吉星，卜算者说：这个城市里将要出生一个消灭汉人国家的孩子。汉地的国王听说后，便让人卜算这个孩子具体在什么地方。孩子的母亲听说这个消息后，让人挖了一个地洞，把孩子放在里面，用木盖盖上，并在上面放了一碗水。汉地的卜算者看到一片水下面有孩子，但没能找到他。国王于是下令将城市里的2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掉。孩子的母亲假装她的孩子也被杀掉了，便把孩子放进一个小筐内，一路悲痛地哭着拿到城外，放在草丛中。后来，每天都有一只鹰来护着这个孩子免遭其他动物以及风雨伤害，还有一头奶牛经常来到孩子身边，卧在那里给孩子喂奶。有一天，牛的主人发现了这个现象，认为这个孩子是不平凡的，便抱回家，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给他取名ru ba dong ma（意思是吃牛奶长大的孩子，作者注）。

七年后，当年骑马人的另外六个孩子也长大了，这个孩子便和另外六个孩子去参军。他们参加的军队就是反对汉地王朝的，ru ba dong ma找到有智慧的人问：怎么才能推翻汉地王朝。寻找的过程中，有一个老太婆给她出了一个计谋：这个月的十四，你带上你的兵，在黄河上游的地方，将很多的马粪倒在黄河中，然后，十五这天你带兵来。十四那

天，老太婆在汉人的城中拍着自己的胸部大哭，国王的卫队看见后便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有一个奉上天之命而出生的mi nia（藏族对西夏政权或党项羌人的称呼，作者注）的小孩，将带给我们灭顶之灾，他们的兵明天就要渡黄河而来，如果不信的话，你们明天到黄河边一看就知道了。"第二天，这些兵士到黄河边一看，黄河里漂满了马粪，河水也变得浑浊了。他们便问老太婆怎么办？老太婆说，你们要带上皇帝的诏书，前去见他。那些士兵带上皇帝的诏书前去见ru ba dong ma时，被他带领的人杀了，皇帝的诏书也被抢去了。ru ba dong ma就有了皇帝的正式诏书而成了皇帝。也就有了藏地的一句谚语：听信一个女人的话，会毁掉一个国都。

这个孩子因此变成了mi nia jia bu（西夏的国王，作者注）。他取名他的父亲（山神）si hu jia bu或ga hu jia bu，他变成了汉族和蒙古族的许多地区的主人。他的儿子是整个mi nia（西夏）中最厉害的王。

在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藏地史料里，其主人公显然就是李德明。其中所说的是李继迁征服凉州时，和当地女性发生关系生下李德明一事，这种记载在内地及西夏的文献中一直没有出现过。

李德明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军营中长大。17岁时，李继迁就让李德明担任了夏州定难军行军司马。在攻打宋朝清远军时，李德明亲自领兵攻城，下令党项军士拉运黄土填埋清远军城外的壕堑，奋力围城七天七夜，直打得宋军粮尽援绝，开门献城。这是李德明军旅生涯中首次精彩亮相。

李德明即位时的党项羌处于一个缺乏辽国充分信任，宋朝及来自西北地区的回鹘、吐蕃部族虎视眈眈的复杂环境中。为此，李德明首先遵守父亲秘不发丧的遗嘱，将一切事宜安排好后才发布父亲的亡讯，消除了内部的纷乱。然而，李继迁去世的消息还是透露了出去，一些西北政权看到李德明没有得到辽的册封，便怀疑辽对党项羌的支持力度

在减弱。加上宋朝此时在边境上到处张贴布告，宣称凡带领部族归顺的党项羌，均可授予团练使之类的官职，并且赏赐大量银两、绢帛。这样一来，党项羌中的万山、万遇、妙娥等沿边部落在首领的带领下投向宋朝。驻守在宋朝西北边境的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知军曹玮得到李继迁死亡的消息后，也认为这是铲除党项势力的大好机会，便给宋真宗上书建议："李继迁横行夏州、银州等地二十余年，使国家有西顾之忧。现在他们国危子弱，如不及时扑灭，待日后更加强盛，就不可制服了。臣愿借精兵，出敌不意，生擒李德明，送到殿下。"河西吐蕃大首领潘罗支听到李继迁的死讯，更是欣喜若狂，他邀约回鹘部族首领，预备集结精兵，直抵贺兰山下，征讨党项羌。潘罗支还让自己的哥哥邦逋亲自到开封，向宋朝搬兵，李德明如何化解这一复杂而艰险的困局呢?

22年前，李继迁率族人愤然出逃，举旗抗宋，22年来他一直想着光复祖业，扩大领地，为什么临终时却一反常态，劝说儿子投降宋朝，做宋朝的顺民呢?在李继迁生命最后几年的时光中，党项羌政权面临着"国危子弱"的局面，一旦他死亡的消息传到宋廷，宋朝会不会乘乱出击，攻取夏州?河西走廊的吐蕃、回鹘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多次到夏州境内抢掠人口和牲畜，甚至还扬言要打过贺兰山；就党项内部而言，李继迁一旦去世，那些随他立下赫赫战功的部下，肯死心塌地地追随军事上并没太多建树的李德明么?

自从李继迁采取联辽抗宋的政策后，西夏官员的职务、爵位都是由辽国任命和分封的。李德明没有将父亲去世的消息呈报宋朝，同时也对辽保密，而且没有经过辽朝的任命就自封为"夏州定难军留后"。在对宋朝的外交策略方面，李德明并没有按照父亲的遗嘱，马上与宋朝议和。他召集将领们说："按照先王的遗命，现在应该立即上表求和。但是如果那样的话，降得太容易，人家就会轻视我们。现在，我想先发兵收复西凉，重振国威。"行军司马保宁建议说："自从西凉吐蕃潘罗支

扰乱我们，先王被害死，部众受到惊吓而产生怀疑，如果不借助辽朝的威令震慑部众，恐怕人心难以稳定。”李德明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决定一面派保宁赴辽国为自己请求册封，一面发兵河西走廊，亲自率兵攻打潘罗支。

党项人好勇尚武，复仇心理极强。早在青藏高原居住的时候，史书上就记载他们“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即使是那些没有能力报仇的人，也要招集妇女，吃饱喝足后，成群结伙地赶往仇家，放火烧毁仇家的房屋。如果双方的怨仇得到了和解，便要举行一个盟誓仪式，将鸡、猪、狗血和酒掺在一起，倒入仇敌头颅做的髑髅杯中共饮，发誓说：“若复报仇，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

李继迁命亡吐蕃人手中，使吐蕃人和党项羌之间的仇恨从李德明的丧父之仇变成了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仇恨，加上父亲尸骨未寒吐蕃势力就兵临贺兰山下，这一切让李德明下定决心，将攻打潘罗支作为自己执掌党项羌势力后的第一个大的军事举措。他派人说服潘罗支属下的党项部落首领，让他们做内应，在暗中协助自己；然后在潘罗支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率精兵突然攻入西凉，杀死潘罗支，占领了西凉府，并在此设置了凉州。

凉州，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商贸、经济、文化中心，八百里河西第一城池，从此走进党项羌乃至后来建立的西夏王朝的怀抱。党项羌从此赢得了重要的牧业、农业、商业三重基地，并掐断了延续千年的汉地和西域连接的丝绸之路。

公元1004年，是一个在宋、辽、新兴的党项羌三者之间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年。这一年，李继迁去世，李德明匆匆接过党项羌的危局；这一年，契丹军队发动了大辽建国以来对宋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萧太后和辽圣宗率辽军南下，打破宋朝军队一直北上侵扰契丹的惯例，开始

了辽国大规模征伐宋朝的步伐。宋朝上下，一片恐辽之声，连真宗皇帝也准备迁都，大臣寇准等劝说真宗带兵亲征。但宋真宗担心契丹军队攻破开封，在一种求和的心态下，采取了和谈的方式。以前曾出使过辽国的曹利用走进辽营，和萧太后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朝一度停止的对外贸易得以恢复，并开始形成了以瓷器、茶叶、日用品、文化产品与出版物为龙头的四大类拳头型出口商品，不仅换回了大量的真金白银和宋朝军营中缺少的精良马匹，也将每年提供给辽国的“岁币”、“岁帛”挣了回来。当时的北宋经济已是高度发达，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500万贯，而明朝276年间的总铸钱量也仅1000万贯，可见宋代商业之繁荣。按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计算，宋朝在公元1021年的收入总数，相当于60亿～70亿美元，“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曾如此大数量地流通”。

“澶渊之盟”的订立，给宋、辽、夏三角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多年来，李继迁能够同宋朝抗争，主要依赖的是辽的支持与辽宋之间冲突带来的生存空间。“澶渊之盟”后，这个联盟空间遭到破坏，使宋朝开始有精力考虑对西夏的策略。

李继迁去世的消息传到开封后，宋朝不少大臣主张乘机铲除党项势力。然而，刚即位的宋真宗却认为这是和平招抚党项的好机会，“花钱买和平”政策很快也用在党项羌政权上。早在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前，宋真宗就曾将驻守在和党项羌相邻的延州钤辖张崇贵召回，面授和谈机宜。为了使和谈顺利，他还给沿边蕃部和军队下诏：如果党项羌不出兵侵扰，千万不要派兵出境，以防激怒党项羌军队。此时的宋朝依然实行从宋太宗时就开始的“守内虚外”政策，以“安定国内”为主要方略。得知李继迁去世的消息后，宋真宗作出了一个令各方都想象不到的决定：派人去通知张崇贵，让他赶快设法与党项羌联系，提出议和愿望。

公元1005年二月，张崇贵给李德明带去了宋真宗的意见，宋朝和党项羌之间的七条协议出现了：（一）归还灵州领土；（二）党项羌的领地范围限于夏州一带；（三）党项羌应派遣子弟宿卫京城，即送亲属做人质；（四）送还被俘的宋朝官吏；（五）解散党项羌内的蕃、汉军队；（六）释放被俘的宋朝兵民；（七）如果边境发生纠纷，要服从宋朝政府的处理。

对于宋朝提出的七个条件，李德明只同意了五条，有两条坚决不同意，即归还灵州领土和送子弟到京城做人质。他的借口是先祖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宋朝没有办法，只好采取应对措施，取消允许党项羌进入内地贸易和夏州青白盐在沿边内销两个条款。这便是宋和党项羌的《景德和约》，一个"七减二条款"。

"七减二条款"是宋夏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和约。自从这个和约签订之后，宋朝和党项羌之间2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双方边境都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给了老百姓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和谈对党项羌而言，既可以顺势走出当时的困境，又可以从宋朝那里得到急需的资金和物品，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打破宋朝和河西吐蕃及沿边各族结成的攻打党项羌的联盟，为自己出兵攻打河西创造条件。"七减二条款"给了李德明和党项羌一个喘息的机会，对有着很强市场意识的李德明来说，通过边境走私盐使宋朝的禁止盐运变成了一纸空文；而没让自己的儿子元昊前往开封作为人质的选择，让元昊在李德明执政期间，发挥出了超常的军事指挥才能，也为其赢得了后来登基的政治资本。

公元1006年九月，李德明派牙将王旻捧着和表，携带贡品，赴开封求和。并且拿出李继迁临终时的遗言来表明他的归附之心。看到李继迁留下的"如一两表未蒙听纳，但连表上祈，得请而已"的遗言，宋真宗很是高兴，便赐给王旻锦袍、银带，好好地招待了一番，随后又派使臣

带着诏书，前往灵州答礼。

也就在此时，辽朝的使臣萧承德正手持节杖，带着封册、钱物来到灵州，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此举壮大了李德明的声势，加重了李德明与宋朝讨价还价的砝码。十月，双方正式签订了合约：宋朝任命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爵西平王，食邑六千户（实封一千户）；赐袭衣、金带、金勒鞍马，并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发给李德明与内地节度使相同的薪水；准许党项羌人进入内地贸易往来；撤销对夏州青白盐输入内地的禁令。

李德明是一个具有很强市场意识的人，他通过和宋朝签订合约，轻松获取宋王朝每年大量的赏赐和相当可观的节度使俸禄。在这种和平条件下，李德明一方面通过军事手段“西击吐蕃、回鹘，拓疆千里”，另一方面伸出贸易之手，在东边扩大和宋朝的贸易，发展经济。

占据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地段后，李德明下令劫取丝绸之路上的回鹘等西域国家或地区的贡物，或者实行高税收政策来补充自己的税赋，西域国家和宋朝之间往来的货物往往轻松地落入了党项人的口袋。

河西走廊归属党项羌后，李德明开始注重和西域国家的贸易，西域国家很想从党项羌手中获得宋朝的瓷器，他们将西域生产的棉麻作为贸易瓷器的主要商品。经过长途跋涉后，西域商人的棉麻制品往往会被路途上的雨雪淋湿，快到党项羌地界时，他们需要将棉麻等晒干后再进灵州或党项羌地区，而党项羌人的瓷器在运往西域的路上也常因为颠簸而破碎。在这种情况下，李德明想到了一个为党项羌赢得利益的办法，他下令：“今后，凡自西域进入党项羌境内的棉麻制品，西域驼队必须装上绿豆并进行封口。而从党项羌区域内出口的瓷器在装上驼队前，也必须在瓷器空隙处填放绿豆。”

不久，西域驼队的“洋商”来到党项羌地界，党项商人问西域来的商人棉麻产品是否淋过雨水，西域商人矢口否认。党项商人淡淡一笑

后，从驼队的行李中抬出一小袋绿豆，请西域商人验明封口印证后，下令当众倒出，只见不少绿豆早已发芽——证明驼队来到党项羌地界前，已经淋过雨水了，西域商人不得不乖乖接受罚款。

而瓷器运到目的地后，竟没验出一个碎瓷器。原来，在运输途中，绿豆遇水慢慢发芽，几乎将瓷器空隙全部填满，瓷器因此被保护得完好无损。

李德明还大力发展走私贸易。按照双方签订的合约，宋朝特意允许李德明派去的贡使在开封城里进行贸易，也可以在沿途进行贸易，这就为这些使者在往返途中进行走私贸易提供了条件。当走私贸易的量占到相当比例时，才引起宋朝方面的警觉。

李德明非常注重市场建设，在他的大力请求下，宋朝于公元1007年七月，在今陕西省志丹县设置了专门进行边境贸易的榷场，允许双方境内的百姓进行贸易。在这里，宋朝百姓以丝绸等换取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器、漆器换取麝香、柴胡、苁蓉等药材。三个月后，李德明又提出在陕西北部的神木以西一带开辟榷场，未能得到宋朝允许。公元1026年，宋朝政府应李德明的请求，在并州和代州两地开设市场，其管理和控制虽然不如榷场那样严格，但大大方便了那里的党项人交易，同时，党项人拿自己的土特产来换取他们所需的宋朝境内的货物及生产技术。

在鼓励非官方贸易、发展盐业经济方面，李德明也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早在李继迁时期，党项人就开始发展未经宋朝同意的地下贸易，鼓励边民进行私下交易和违禁物的交易。公元1009年，在陕北的神木、府谷一带，双方边民就私自设立榷场，进行非官方的市场贸易。李德明更是派人私自在这一带进行换取自己所缺的货物交易。在这些贸易中，盐的交易最为明显，宋朝为了遏制党项羌的经济发展，一度禁止宋朝的青白盐进入党项人生活的地区。为此，李继迁时代着力向西扩张，力图

夺取陕北和宁夏、内蒙古交界处的盐场。夺取灵州后，更是牢牢将这三省区交界的盐场控制在手中。由于党项人的地界不断扩大，盐的需求不断扩大，《景德和约》中，李德明答应了五条，宋朝作为回应，首先禁止青白盐的流通，李德明执政期间，一直要求解除禁盐流入，但宋朝一直没有解除青白盐之禁，李德明只得依靠大量边境走私贸易来缓解盐等其他物资的紧缺。

李德明伸出的经济之手，助推了党项羌经济壮大的步伐，而他的军事之手，更是为党项羌的壮大提供了契机。李德明执政期间，常常拦截从西域通往中原地区进贡的使者，这种不劳而获的掠夺使李德明逐渐将掠夺的范围伸向这些西域商人来往中原地区的商路上，导致党项羌的军事扩张向河西地区渗透。

公元1007年，李德明图谋发起袭击回鹘的战争，因为宋朝急令吐蕃六谷部厮铎督和回鹘相接为援，才停止出兵。次年一月，他发动了进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的战争，因甘州回鹘的顽强抵抗而失败。二月，李德明又组织兵力围攻凉州，因为遭到吐蕃六谷部军队的回击而改攻甘州，回鹘人以示弱的策略诱使党项军队深入到祁连山下，使党项军队掉进提前设好的埋伏圈，几乎全军覆灭。这次兵败使宋朝和回鹘放松了警惕。短短几个月后，李德明下令于8月再次发动对甘州的进攻，不料，这次进攻不仅被回鹘击退，而且回鹘还乘胜追击，将党项军队赶到黄河以东，李继迁在黄河以西打下的一点儿老底被李德明甩光了。

经过四个月的休整，李德明于公元1009年年初继续发动对甘州的进攻。这回回鹘人采取夜袭战术，党项军再次大败而归。这次失利使李德明将进攻甘州回鹘的准备时间放得更长。年底，李德明准备再次发兵甘州，因为白天出现了恒星，占卜者说出师不利，才未出兵。

1010年，甘州回鹘走到了历史的节点：接连遭到党项军队进攻的甘州城，突然迎来了一场陌生者带来的战争——远路而来的契丹军队于五

月发动了对甘州回鹘的进攻，并攻破了肃州（今甘肃省酒泉），俘虏了大批当地民众。强大的契丹军队在这次进攻中削弱了回鹘的势力，也加快了李德明向河西走廊地区扩张的速度。甘州成了宋、辽、回鹘和党项羌共争的一块大蛋糕。

对甘州久攻不下，加上契丹人也觊觎甘州，李德明得罪不起，于是下令进攻湟水流域的吐蕃宗歌族势力，并将甘州回鹘派遣到开封的使者带给宋朝的进贡物掠夺，结果却导致宋和宗歌族和好。几年的掠夺和征战，迫使甘州回鹘前往宋朝的使者只能绕远路，经过祁连山西麓的吐蕃地界，由宗歌部护送到开封。公元1011年，李德明再次派遣军校苏守信进攻西凉的乞当族，又遭到失败，河西成了李德明一个难以消除的梦魇。

公元1026年，辽朝西北招讨使萧慧进攻甘州失败，使契丹王朝彻底放弃了对甘州的进攻，对甘州实施有效进攻的只有党项羌了。1028年，李德明派自己的儿子元昊率领党项大军，攻取甘州。“甘州之战”使党项历史上闪烁着最灿烂光芒的元昊有机会展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雄踞河西数百年的回鹘在元昊的铁鹞子军的神速和勇猛前，彻底瓦解了。两年后，元昊又攻取了位于敦煌一带的瓜州，瓜州回鹘王贤顺正式向李德明投降。

如果说李继迁用了20年完成党项羌在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崛起，并实现了党项族群向河套西部的宁夏平原过渡，那么，李德明恰好也用了20年，完成了对祁连山东麓八百里河西走廊的攻取，使党项羌完成了立国前对巨大的草场和农耕基地的拥有，也完成了一个能逐步和大宋王朝抗衡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基础的积累。

经济贸易和军事扩张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使党项羌在李德明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这些显然不是李德明的终极追求，经济和军事上的努力，是为政治上的崛起作准备，他图谋的是一个在政治上强大

的党项羌。他刚即位时，积极开展和宋朝的和谈，又不断向辽朝靠拢，以换取这两个大王朝的支持。公元1005年，他得到了辽朝给予的“西平王”的封号；1010年又得到了“夏国王”的封号，两个不同名称的后面，含蕴了他的建国梦想，同时也体现出辽国对他逐步立国追求的默许。

这种默许后面也有着辽国的警惕：公元1020年，辽圣宗借口李德明没允许他借道党项羌地盘进攻回鹘政权及党项羌不给辽朝纳贡，以狩猎为名，率领50万大军侵犯党项羌地界，被李德明击退。第二年，辽圣宗册封李德明为“尚书令、大夏国王”，这无疑是承认李德明统领下的党项羌已经成了一个“大夏国”，李德明也成为“国王”。这时的李德明再次展示了娴熟的外交才华，于1029年，为自己的儿子元昊向辽朝请婚。两年后，元昊作为辽朝的皇婿，被辽朝封为夏国公。

从11世纪开始，李德明就开始了一个帝国的试验，它开始模仿宋朝改革官制。其政权建制已经开始由王而帝了。首先，追认自己的父亲李继迁为“应运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其次，将灵州城中自己的住所按照宫室标准进行修建；第三，在今天的银川一带营建新都，取名兴州，也就是后来的国都兴庆府。

第三章
亮剑：大白高国的巨舰起航

公元1004年，一个让契丹人备感快慰的年份。富得流油的宋朝人谦恭地奉上了澶渊盟约，西边那个对自己阳奉阴违的李继迁也在他梦魂萦绕的高原故土死掉了，灵州城里生出的小娃娃，想必也是未来顺从的奴仆。没有敌人的日子，会不会太寂寞了？

豹越大野：二百多年武风濡染的帝国之子

公元1004年，不仅是党项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拐点，也是影响中国北方政治格局的一年。这一年，纵横于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党项羌首领李继迁在和雄踞青藏高原的吐蕃的较量中，命殒异乡；这一年，契丹军队在辽圣宗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的带领下，南下攻宋，宋朝和辽国签订了停战合约，史称“澶渊之盟”。同样在这一年，灵州城里突然增添了一种喜气：李德明的第一个妻子卫慕氏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股喜气明显冲淡了李继迁中箭身亡的晦气和李德明在灵州仓促即位带来的慌乱，这个孩子就是西夏王朝的奠基者元昊。

和父亲李继迁长期与宋朝对立不同，李德明在长期和宋朝作战、贸

易的过程中，对中原汉文化很推崇，他让儿子元昊从小在学习党项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学习汉地文化，这使元昊自幼就通晓汉蕃佛典、法律、占卜及军事知识，为后来成为一个文化上的通才、军事上的天才、治国上的异才、政治上的奇才打下了基础。

元昊出生于党项军人世家，一直在一种浓厚的军风濡染下成长。自幼熟读蕃、汉书籍使他又能通过政治策略和军事手段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这在他不满20岁就出镇银州时就体现出来了。那一年，元昊奉父命前往银州镇守，途中遇上一只老虎，元昊箭射老虎，老虎带箭逃亡，没想到镇守银州的党项大族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碰巧出外狩猎，也射中那只老虎。

野利家族是从青藏高原迁徙到黄土高原的党项羌大姓部落，因为屡立战功而被李继迁委以镇守银州的重任。李德明时期，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兄弟镇守银州。然而，野利兄弟屡立战功却得不到奖赏，一度向李德明申请岁赐却屡遭拒绝，而且，他们频频动用武力和宋军作战，这和李德明的附宋政策相左。当野利兄弟和元昊为那只射中的虎争执时，陪同元昊的没藏讹庞担心元昊安全，便带兵前来寻找，导致野利兄弟误认为元昊的真实意图是来银州夺取野利兄弟的兵权，双方立即发生厮杀。元昊当天摆脱了被围杀的危险，但在第二天的对阵中，却被长得漂亮武功又高强的野利旺荣的妹妹野利玉蓉使诈生擒，元昊以自己的英俊相貌和动人的话语，俘获了野利玉蓉的芳心，两人反而成就了一段姻缘。元昊的银州之行，不仅收获了爱情，而且消弭了野利氏在银州的势力，并使野利家族在西夏政权成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早在公元1001年，宋真宗就在一天的早朝中收到兵部尚书张齐贤的一道奏疏，这位对宋朝西北边境一直心存忧患的尚书写道：“以今日西鄙事势言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在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若山西蕃部响应，远处族帐倾心，则凶

丑之势减矣。若缘边兵得及五万余，更诱蕃部，逾十万，但彼出则我归，东备则西击，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

出任宰相后，张齐贤又上书真宗：“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唯西凉而已。”张齐贤的两次上书都被宋真宗采纳，前一个奏疏提出对西北地区采取防御性的战略，联合和党项羌有仇的游牧部族来孤立他们；后一道奏疏则明确提出借西凉吐蕃势力来牵制李继迁。宋朝对后一道奏疏的采纳可谓一石二鸟，一则联合了吐蕃政权并从吐蕃人手中购买到战争所需的良马，也借吐蕃人之手铲除了李继迁，种下了党项羌对吐蕃的仇恨种子。所以，从报祖仇的个人私利出发也好，从整个帝国大业出发也好，谋夺凉州成了党项羌志在必得的一件大事。一旦夺取凉州，党项羌的势力就能形成一条初具形态的龙：陕北黄土高原、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为龙头，灵州为龙身，凉州为龙尾。稳据灵州的话，龙头就能有伸张的活力和后援，有了凉州，那么这条龙就根基稳固了。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元昊在消除灵州东边的一些党项羌敌对势力后，被李德明派往河西走廊。河西之战因此成了年轻的元昊展现军事才能的舞台。这时的元昊，已经成为一个“圆面高准，身高五尺余，性沉勇刚毅，多谋略”的大帅哥。

带着出征的复仇快意和为党项羌开疆拓土的雄心抱负，在出征前的宴席上，元昊和随行将官们放杯痛饮，有些醉意的元昊回到家中，妻子野利玉蓉早就收拾好行装和他最喜欢的《孙子兵法》、《野战歌》、《太乙金鉴诀》等军事方面的书籍，一灯摇曳的烛光下，元昊对野利玉蓉说：“我身为党项男儿，自当在马背上成就威名，此生恐怕就这样走在出征的路上和回归的路上了，你同样为党项女子，应该理解这样的生活是多么快意。”野利玉蓉没想到的是，她嫁给的这个男人，娶的不是她，而是战争。

第二天出征时，前来送行的人个个吃惊于元昊的打扮。只见平常

穿着白色长袖衣服、头上戴着黑冠、身佩弓箭的元昊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只见元昊端着一个人头骷髅做的酒碗在马背上为送行者说："我党项人好复仇，至今仍在我党项羌部族中遗留这样的习俗，如果仇人没有遇到，必然蓬头垢面、跣足疏食，不杀仇人就不过正常人的生活。双方怨仇得到和解的时候，要将鸡、猪、狗血掺入酒中，用髑髅（死人头骨）盛着，双方同饮，发誓不再报仇，'若复报仇，谷麦无收，男女秃癞，六畜疫死，毒蛇入帐'。因此，我此次出征不能失败更不求和解。若此次远征吐蕃与回鹘不成功，便永远不穿我心爱的白色衣服，身后不打我心爱的青色大伞。这只碗是用我上次消灭的长期与我拓跋部为敌的祖迷部落首领的头颅做的，远征河西归来，定拿敌人的头颅做成酒碗和大家共饮！"说完，元昊带着他的大军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远征。

大队人马行到贺兰山下，元昊突然下令继续向西而行，向吐蕃占据的凉州缓慢进发，造成要攻打吐蕃的声势，自己则率领几年间偷偷训练的一支由三千精壮的党项职业军人组成的"铁鹞军"横越贺兰山进入阿拉善沙漠——这是一支充满神秘色彩却能在关键时刻带来胜利的传奇军队，既是党项羌最高统治者的禁卫军，也是战场上最需要的时候出没的神秘之旅。

元昊带着这支仅仅带了三天口粮的"铁鹞军"兵出贺兰山后，立即驰骋在茫茫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中。此前，元昊秘密布置在沙漠深处的接应人员向"铁鹞军"提供了饲养好的良马和战争所需，使这些党项羌的精锐之师在换马不换人的状态下，将休息时间缩到了最短，向回鹘占据的甘州（今甘肃张掖）急行军。

当回鹘可汗还沉浸在对党项军队攻打凉州吐蕃的想象中时，当回鹘可汗在一场酒事后沉沉睡去时，当守卫甘州城的回鹘兵士在城楼下做着美梦时，党项人的战刀之影划过甘州城的黎明天幕。在这场以速度赢取

胜利的战争中，党项军队凸显了制胜的最大法宝：快速作战的指挥系统和精良的马匹，这一点被成吉思汗统领蒙古军队征服世界时所汲取。经过激战，回鹘政权遭到彻底摧毁，谢幕于元昊的战刀之下。从此，西夏人占据了河西重镇甘州，彻底解决了一个新兴帝国所需要的粮食和畜产生产不足的问题，并为继续向西和向北推进，奠定了地理优势。这次战役，不仅凸显了元昊的军事才能，也使他在这次战功后被册立为太子。当元昊带着凯旋而归的党项军队及大批虏获的回鹘美女、马匹、粮食、骆驼等来到灵州城下时，野利玉蓉才知道丈夫这次军事行动的真实攻打目标。李德明与元昊这对父子演了一出麻痹回鹘人的双簧。

回到贺兰山下的元昊不再蓬头垢面，依然穿着他的那身白色长袖衣服，头上戴着黑冠、身佩弓箭，秋凉之后，他穿上皮衣出入父亲的大殿。一天，李德明指着自己那身从内地运来的绸缎做的衣服给元昊说："你贵为党项羌大酋，应该学习宋朝皇子们那样穿绫罗绸缎，出入乘坐轿子，别再穿牛马之皮做的衣服，也别整日骑马射箭的。"元昊一直对父亲臣属宋朝的政策颇为不满，他总是坚持党项人的生活禀性，当场反驳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以后依然穿着党项羌传统服饰，带领自己的亲信骑马射箭。

元昊帮助父亲稳固了黄河东部地区且使之成为和宋朝进行边境贸易的重要地区，同时又攻取河西地区为党项政权获得大片丰美牧场和粮食基地。之后，元昊劝说一直称臣于宋的李德明："称臣宋朝得到的俸禄，只能养活一小部分人，而众多的部落仍然陷于穷困之中。这样会失去他们的支持，如此下去，拿什么来守卫我们的政权？不如习武自强，杜绝朝贡。从小处而言，可以占领周围富庶的地方，从大处而言，可以夺取疆土扩大党项羌的实力。"但这个建议遭到了李德明的拒绝，他说："党项人长期用兵，我已经感到疲倦了。我们这个家族30年来能够穿上绫罗绸缎，过上安逸的日子，这是宋朝的恩典，不能辜负他们。"

年轻气盛的元昊立即争辩道："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李德明不仅没有听从元昊的意见，反而于第二年为他再次缔结了一份政治婚姻：向辽请婚。1031年十二月，辽兴宗将自己的宗室女兴平公主嫁给了元昊，封元昊为驸马都尉，并要求元昊前往辽境迎亲。元昊并没有反对这场政治婚姻，他从中看到了日后党项羌借助辽国力量壮大的契机，欣然走上了迎亲之路。

在迎亲途中，元昊亲自带领数万党项骑兵驻屯在今天陕北一带，宋朝的知府折惟忠深知元昊极具智谋，便下令兵士坚守不动。一个阴郁的夜晚，元昊突出奇谋，故意让人向宋营方向纵马，让受惊的马匹狂奔入宋营，试探宋朝军士的态度。折惟忠令人把马拿住，让部下切勿妄动，元昊这才知道宋军早有准备。便绕过宋营，迎娶第二个妻子去了。

凉州是河西走廊面积最大、开发最早、人口最多、经济繁荣的一片绿洲，适应多种农作物生长。自古就有"凉州不凉米粮川"之说，吐蕃占据这里后，一直成为党项羌势力西进的巨大障碍，尤其是吐蕃和宋朝联合后，凉州成了宋朝牵制党项羌的一枚重要棋子。李继迁在西征途中命丧凉州，更使这里成为党项羌政权的一个化解不开的伤口。

1032年九月，元昊再次接受父亲李德明的命令，带领党项军队开始攻打凉州。这次他采取了和攻打甘州一样的战术——声东击西。出兵前，元昊到处扬言要攻打和宋朝交界的庆州和环州，吸引宋军的西北边境主力到这一带，同时也使吐蕃兵力失去戒备。然后出奇兵突袭凉州。"铁鹞军"继续发挥长途奔袭的优势，很轻易地攻取凉州，使东边河套平原的塞上江南富庶之地和西边的千里河西走廊南大门的"银武威"，开始像两条血管，源源不断地给此后190多年的西夏王朝输送着营养。

从黄土高原到青藏高原，从鄂尔多斯高原到蒙古高原，公元11世纪初的西北大地上横扫过的是元昊统领下的党项旋风，这股旋风所到之处，是刀影箭声及其卷过大地时的血腥，染红的自然是党项拓跋家族的

威名。

1032年十月，当元昊攻打下凉州城的消息传到李德明耳边时，这个极大的好消息竟然让李德明因高兴过度而身亡。

整个党项羌军政大权落在了鹰派人物元昊的手中。元昊于十一月嗣位，将父亲的亡讯派人告诉宋朝，宋朝政府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等，并派工部侍郎杨告为旌节官告使、朱允中为副使前往兴州颁布朝廷的任命。杨告一行抵达兴州郊区时，望见贺兰山上皑皑白雪，但却走不进正在建设中的兴州城。已经有了封王之心的元昊故意拖延时间，不肯在兴州迎接宋朝特使，后来虽然答应接见，但会见时又故意距离宋朝派来的使者很远，经过再三催促，才勉强接受了宋朝的诏书。

拜受宋朝诏书后，元昊起立对他的左右僚臣说："我的父亲错了。我们如此雄厚的实力和作战能力，却还称臣于他们！"按照宋朝的外交惯例，当时的兴州政权仅仅是宋朝境内的地方政权，宋朝特使到达时应该代表朝廷坐在主位上，但在设宴招待杨告一行的宴会上，元昊想独自坐在主位，经杨告的再三劝说才没去坐主位。宴请期间，杨告等人不时听见东屋背后有千百人在打铁、锻铸、磨兵器的声音，吓得问也不敢问，回到朝廷后也不敢上报这件事。

袭封后的元昊，总以臣于宋朝为耻。宋朝的使者返回后，元昊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一系列措施：公元991年，宋朝就赐封李继迁姓赵，而契丹人还对党项羌首领沿用唐朝赐封的李姓姓氏，称元昊的爷爷为李继迁。元昊以宋朝封自己的赵姓为一大耻辱，下令将党项皇室李姓改为党项姓氏"嵬名"，并且让党项统治氏族中所有"内"亲都采用"嵬名"，嵬名元昊还自称为"兀卒"，这个来自党项语的词汇相当于皇帝或后来蒙古人的可汗，汉语的意思是"青天之子"。随之，元昊在党项羌统治的区域内，开始推行一套独立的、具有明显宋朝风格的职官制

度，并且都有匹配的党项名称。

1032年的一天早晨，野利玉蓉早上起来发现，比她起得更早的元昊从外面进来时，她几乎不认识了：他的那头乌黑飘逸的长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她从没见过的秃发形象，她问这是什么原因。元昊说："这是党项羌先民在青藏高原上时，和鲜卑先民融合后出现的一个发型；我十分不满父亲的亲宋政策，党项羌有过自己的王国，我以后必定要建立自己的王国，今天的这个秃发就是我党项羌区别其他草原部族的一个标志，一定要在我党项羌内推行。"元昊带着那头秃发走进了整个党项羌高层的视野里，不仅向他们讲明秃发的意义，还下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这个带有极强夸张色彩的命令一下，党项羌统治区域内的民众，竟然很快就实行起了这个和中原汉人、北方其他游牧部族有着明显区别的发型。

元昊还大力改革服饰制度来显示党项羌的民族特色，他本人在成年后就改变了年轻时戴黑冠的习惯，而是头戴里面是红色外面是白色的毡冠，冠顶后垂着红色的结绶。元昊的服装改革，使西夏境内的官吏中，汉人和番人各有不同的服饰，西夏法律《天盛律令》就明确规定，汉人官吏应当头戴汉式头巾，违背的官员罚马一匹，平民则打十三杖。

元昊在生活上是个追求时尚的帝王，这种风尚也在整个西夏帝国内蔓延。北宋时期的开封，妇女以头上戴花为装饰时尚，甚至男人也以头上戴花为美，这个习俗很快也传到了西夏。在西夏，男人和女人在身体某些部位或服装上配上小的装饰物，不仅美化自己，也能显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在一个爱美的民族中间，当时尚的饰物逐渐在消费经济中占有一定比例时，势必引起朝廷的注意，西夏政府甚至为此专门设置了一个专门负责宫廷需要的高档首饰制作机构——属于末等司的首饰院。

铸剑为旗：席卷青藏高原屋檐的党项旋风

尊重父亲的遗愿，元昊在李德明过世后的三年间，以守丧为名，实施休养生息，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公元1033年，元昊作出了一个重要举动：将父亲命名并在贺兰山下修建的兴州城改名为兴庆府，并仿照宋朝开封城的建筑风格，结合党项羌的部族特色和习俗，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宫城、殿宇。

公元1034年，卫慕氏族人卫慕山喜密谋暗杀元昊而另立，被元昊的侍卫发觉后告发，元昊大怒，将卫慕山喜及其族人缉捕后全部投于黄河处死，而后又用鸩酒药死了他的亲生母亲卫慕氏。他的妻子卫慕氏妃因怀有身孕而暂免一死，被幽于别宫，于第二年同样遭到诛杀，至此，西夏朝廷中卫慕氏族人几被杀绝，“性凶鸷，多猜忌”的元昊用严酷的诛杀粉碎了西夏宫廷里的篡位阴谋，有效地防止了外戚篡权的发生，也为其他党项显姓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通道。

出于政治上的自卫而诛杀了母亲和妻子，使元昊常常陷入对人性之恶认识的迷茫中，他开始向佛教寻求解救灵魂的答案。佛教的义理让他觉得接近佛教或许能减少自己的罪业，便于1034年十二月，向宋朝进献50匹马，求佛经一藏，得到了宋朝的允许。1035年正月，天竺僧人善成一行9人前往宋朝进贡梵经、佛骨及铜牙菩萨像，路经西夏控制的夏州境内时，元昊在驿馆中向他们索求贝叶梵经遭到拒绝，于是下令将这些人强行扣留。1037年，元昊再次上表宋朝，允许他派遣使臣前往五台山供佛，此外，元昊参照汉地风俗，还规定每年的四个孟朔日为“圣节”，届时境内的所有官吏百姓必须拜佛，为他诵经求福。

1035年的年末，在一种激奋的民族情绪驱动中，在党项羌始终没有淡化的家国概念的役驱下，沉寂了三年的元昊犹如惊蛰后的冬眠睡

狮，再次将指挥党项羌的战刀指向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这次出兵，在攻打甘州和凉州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铁鹞军”由苏奴儿指挥。苏奴儿曾是李德明派驻银州并监护四州榷场的大将。有一次，因为获利较少，注重经济效益的德明下令杀掉苏奴儿。当时，没人敢替苏奴儿求情说话，元昊刚刚出使辽国回来，立即赶到德明面前陈述道：“苏奴儿是党项大姓，其部落人口有千帐以上，他本人又武功高强，精通汉文，有智谋、有韬略，是党项羌中难得的人才。”对于苏奴儿拿马换取的丝绸、茶叶数量少一事，元昊解释道：“党项年年拿良马资助邻国，换取一些并不急需的物品，已经属于失策，为这种事情诛杀良将是错上加错，如此下去，在党项各个大姓中会出现离散部落、失去人心的局面。”这件事不仅在西夏传为美谈，连宋朝大将曹玮听说这件事后也赞叹道：“这个少年如此想用苏奴儿，心里必有大智谋！”在攻打甘州和凉州战役中，苏奴儿带领自己为元昊训练的“铁鹞军”立下了奇功，这次攻打青藏高原，苏奴儿和“铁鹞军”再次成为元昊张弓射出的一支远程之箭，远征雄踞青海一带的唃厮啰。

远征青藏高原的战争以党项人的战败而结束，苏奴儿被俘虏，这给准备全力向西发展的元昊以很大的刺激。和众多的开国帝王们一样，越是难以攻克的地区越能成为成就他们伟业的最丰富的元素。于是，元昊决定亲自带兵远征。在牦牛城之战中，连续进攻一个月后，机智多谋的元昊用诈和计破城，接着又攻下了安仁、宗歌等地，进而向西宁一带进发。唃厮啰命大将安子罗带领10万吐蕃军队截断西夏人的后路，一场攻守青唐之战爆发了。

持续了大半年的“青唐之战”一直延续着，两个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古老而强悍的族群，在这里进行着惨烈的较量。双方昼夜激战200多天后，安子罗兵败，元昊终于取得了这场持久战的胜利。但党项将士也因为深入敌后过深，补给不足，饥饿与冻死者过半。青唐城里丰富的

给养已经明显地向元昊和他的军队招手了，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个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城池”。他下令军队渡过湟水。一个致命的事实被他忽略了：来自黄土高原上的党项兵士，几乎全是“旱鸭子”。先遣部队在河中插上小旗以表示河水的深浅，而唃厮啰的部队则一边坚守不出，一边暗中派人将夏军插在水中的旗子移到了深水处，随即亮出要迎接战争的信号，结果党项羌军队在溃败途中缘旗而行，大半溺死。这是党项羌和吐蕃两大族群中两个杰出的军事家的唯一一次正面交锋，也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一个“高原水战”的特殊战例。

党项羌马踏高原不仅收获了大量的马匹、美女、青稞，还有疆域。对善于学习对手长处的元昊来说，他发现青藏高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落后，河湟谷地的农业耕作和畜牧业都很发达。他在几次和对手的较量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对手往往一箭就能射中党项兵士，而党项兵士有时几次也射不死对方士兵，原因何在？后来他发现是对手的铠甲锻炼技术非常高明，于是引进了这种传奇的“瘊子甲”。这种传奇护身甲衣也被宋代科学家沈括写进了他的《梦溪笔谈》：在青藏高原的青唐一带的羌人非常擅长锻造铠甲，这种铠甲颜色铁色中带着青黑，锃亮得可以映照出毛发。羌人用柔软的熟皮将铁制铠甲串起来，柔薄中带有韧性。

当时，北宋设在和西夏边境交界的镇戎军中，有人偷偷保存着这样一副青唐铠甲，在当地相传以为宝器。名将韩琦带领宋军镇守这里时，曾经派人取来验证，在距离50步之外，让军中的最佳射手拿最好的箭射击却不能穿入，那些射出的箭都被挡在了地上，只有一支箭扎在了铠甲上。韩琦让人拿来一看，原来是铠甲上固有的一个小孔，箭无意中射中这个小孔才算穿过，而穿过小孔的箭头已经卷刃了。这种用当时最先进的冷锻法制成的铠甲，利用冷变形提高金属的硬度和韧性，是当时硬化金属的重要方法，它对西夏的冶锻技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攻取河西走廊的凉州和甘州一带后，党项人在悄然间完成了一个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事情：因为党项人对河西走廊腹地的占领，丝绸之路上的僧侣、使节、商人开始开辟河西走廊以外的贸易通道，穿越柴达木盆地的新丝路就是其中的一条，这使宋朝和西域各地的贸易出兰州后不再往北走传统的丝绸之路，而是向西经由今兰州进入青海境内，出柴达木盆地后连接起西域。处在这条日渐繁忙的商贸之路上的重镇青唐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它就是后来的西宁。

冷兵器时代，战马的精良与否，往往是一场战争的主要因素。宋朝在失去河西的战马基地后，对青唐乃至青海的依赖更加明显，双方谁能争取到来自青唐的支援，就能取得更多的胜算。

完成了对唃厮啰的征伐和对河西走廊回鹘政权的彻底清剿后，嵬名元昊发兵进攻兰州等地，并在那里修筑了军事城堡瓦川会，意在拒绝吐蕃和宋朝的往来。进而，元昊将他的征伐之鞭挥向河西走廊北部更为辽阔的地区。

祁连山积雪融化，汇聚成疏勒河、黑河和石羊河三大内陆水系，形成了疏勒河流域的敦煌平原、黑河流域的酒泉平原和石羊河流域的武威平原三大内陆平原。1036年，元昊领军开始对敦煌平原和酒泉平原远征，完全夺取了瓜州、沙州、肃州等整个河西之地后，使河西走廊成了西夏帝国疆域中仅次于宁夏平原的重要农业区和商业贸易区。

嵬名元昊经过长期的征伐攻讨，使党项羌政权的疆域东到陕北和山西交界的晋陕黄河大峡谷，北到黑河流域的居延绿洲、蒙古高原中的沙漠地带，以及新疆境内的巴里坤草原，南到今宁夏南部境内的六盘山北麓一带，西到今敦煌西边的古玉门关、祁连山西麓的青海北部草场这样一个地理框架内，这片辽阔的土地内插遍了党项羌胜利的战旗，一个藩镇小政权逐渐变身为拥有广土众民的王国。

一个帝国诞生的条件具备了。

帝国的器官：载着西夏前行的“中国怪字”

公元1037年初春的一天，早朝的宋朝皇帝接见了来自党项政权派来的使者，和往常一样，使者带去的党项境内的土特产让大宋皇帝的内心被一阵又一阵的喜悦充斥；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一年的使者带来的元昊给大宋皇帝的信札上，不再是往年的汉字，而是一些看似汉字但细看却非汉字的古怪文字。皇帝让群臣辨认，没有一个宋臣认识这种古怪的文字。使者随之现场“翻译”了那些古怪文字的内容，并解释道，这是元昊下令创造的党项羌文字。以后，党项羌和宋朝乃至周边其他政权往来的官方正式文书，皆用这种文字。这就是元昊时期创造的西夏文字，至今因为极少有人认识而成为中国文字史上著名的“死文字”。

随着疆域的日益扩大，一个新的帝国雏形逐渐浮现。面对一个空白的文化空间，元昊在开国之始就预见通过文字可以达到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控制。他深知，军事力量发挥逐渐到了极限时，一个政权所需要的文化应该出场，一个帝国的建立，政令的通达必须靠文字；他也深知党项羌千百年来一直奉行口口相传的文化传承，使这个族群许多美好的东西轻轻地飘散在发展过程中。他和这个族群、新兴的帝国都需要文字，需要文字来记录族群的耻辱与光荣、流离与团聚，记录帝国的兴盛与强大，也记录西夏和周边王朝在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出于这个考虑，他除了向宋朝和周边其他游牧王朝派遣军事或经济间谍外，还派遣了大批文化间谍，专门搜集对方的文化情报和信息，他喜欢的文臣野利仁荣就背负着这样的特殊使命去开封城里“游玩”了。

回到兴州城后，元昊开始思考一个文化上的话题：用什么文字来记录他所身经的和以后要发生的一切？大臣们为此开始了激烈争论，有的主张用中原汉文字，有的主张用吐蕃文字，也有人主张用回鹘文

或契丹文字。这时，只见从开封城里进行“文化潜伏”的野利仁荣语出惊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流浪和征杀，我们进行的是祖先没有过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一切都是新的，包括文字。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文字呢？于是，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就有了一项新的工作：创造西夏文字。

兴州城西北角的一处绿林掩隐的高楼，白天十分幽静，夜晚灯火通明。野利仁荣这位曾经多次深入中原及契丹、吐蕃人生活地区并对其文字很熟悉的党项文化人，奉命开始秘密创制文字。野利仁荣专心研修，废寝忘食，不分白天黑夜，终于创制出6 000多个单字。

野利仁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下令尊为“国字”。颁布之时，举国庆贺。在创制文字的过程中，野利任荣常常召集自己的学生，一起研习、探讨。文字创制出来后，为了新的文字顺利推广到王朝的境内，野利仁荣派他的学生深入民间教习传授，他也常常不辞辛劳，从兴州城出发到很多地方传授、解惑。在利用政令进行新文字的推广上，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的文字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从政府机构内部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文字推广渠道。

经过应用，西夏字逐渐演绎成一套如汉字楷、草、隶、篆书体的固定体式。野利仁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在国家的政权中设立了“蕃字院”，同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文书，一律由蕃字院用西夏文字书写。野利仁荣还在党项和汉人官僚子弟内，选拔品学兼优者，让他们进入蕃字院学习，等到他们学业有成时，出题考问，根据他们的成绩，授以大小官职。

作为元昊称帝的谋主、西夏第一文士、西夏建国后的第一任宰相，野利仁荣在世时就被封为“莫宁令”(天大王)。1042年七月，为西夏民生国计操劳一生的野利仁荣去世。元昊悲痛至极，三次前去祭奠，当场抚灵痛哭悲呼，并给予厚葬，赠封为“富平侯”。

然而，由于西夏文字仅仅流传于西夏境内，因而随着西夏帝国的灭亡，其文字也逐渐湮灭在历史深处。随着岁月的流逝，在西夏故土偶有发现，也因无人认识而变成了死字。

1804年秋天的一天，在家乡凉州养病的清代著名学者张澍与友人共游当地清应寺，见寺内有一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得严严实实。张澍一时好奇心切，请寺内的和尚拆封，但和尚不答应。原来当地久有传闻，此碑亭不能拆封，若拆封当有风雹之灾。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责任。碍于张澍的情面，和尚只得答应。

拆开砌封砖后，出现一个250厘米高、90厘米宽的石碑，上面刻的文字形体方整，共计28行，每行65个字。乍一看，好像都能认识，细看却没有一个字可认识。张澍认定碑后一定另有文字，又令拆除后面封砖，果然见到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第一行就写着“大白高国境凉州感通塔之碑铭”，建碑年款是：“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是西夏崇宗乾顺的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文字为西夏国字。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张澍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学界中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第一人。

兴庆府：贺兰山下的白色王朝

早在公元1020年夏天，李德明将灵州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经营时，从黄河对面一个叫怀远的小镇就传来一种说法：镇西侧的贺兰山上有龙。一些大臣乘机对李德明说，灵州处于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容易受到敌方围攻，作为国都，它的环境还不如怀远镇，那里西有贺兰山做天然屏障，东面和南面有黄河能阻挡敌方的进攻，西面可直接打通向河西地区扩张的通道，不如在那里修建国都。

李德明采纳了大臣的建议，派一个叫贺承珍的人负责怀远镇的建筑工作，并于公元1020年十一月，将党项羌的政治文化中心迁往贺兰山下的怀远镇，改名为兴州。为了避免来自北面的骚扰，他又下令在今天的宁夏惠农县庙台乡修建省嵬城，作为兴州的北门户。

对一个新兴的帝国来说，国都的设置需要从国防安全考虑。西夏建国之前，就有回鹘和吐蕃两个强大的政权雄踞在其西北和西南。西夏在成长过程中与这两个民族的矛盾也最为突出。

将都城定在贺兰山脚下，使西边的河西走廊成为对付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袭击的前沿地带，成为国都西部的屏障。而在北边，贺兰山、阴山、库布齐沙漠等地理单元成了西夏北疆的天然屏障。东边，党项羌在陕北黄土高原、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上苦心经营的一系列城池、军镇，是抗衡宋朝的前沿。南端，灵州及元昊时期就已经构建的天都山屏障，成了保卫西夏南部边境的重要力量。西夏国都兴庆府就这样处于一个外围军事防御体系的围拢之中，国防安全得到了相应的保证。

作为西夏都城的兴州，依据当地地形，并不像中原都城那样讲求方正，从贺兰山到黄河边的开阔地、加上南北两端多为水域，使得这个城池"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字形……南北各有两门……东西各有一门"（弘治《宁夏新志》）。同时，它的建设在城池、宫殿、宗社、籍田等方面，又借鉴了诸多中原城市的建筑方法，"从原则和系统上皆以中原都城为成法，甚至一些具体建筑也模仿中原王朝都城，如城门上建城楼，城门名称光化门和长安光化门同名，南熏门与开封府的南熏门同名"（史金波：《西夏社会》，第532页）。

从西夏当时的经济势力和疆域规模来看，兴庆府的城市规模已是不小：唐代的长安城周60里，兴庆府城周18里，相当于长安城的三分之一；唐宋时期的都城城门都在10个以上，兴庆府的城门有6个。后来，随着城市建筑向南北扩散，兴庆府的城郭比例逐渐不再是"东西倍于南

北”，而是1.6∶1的比例，而这个比例恰好和人身体的高和宽比例一致，是巧合还是设计者的智慧所在？

从兴庆府旧城遗址东端出土的砖瓦构件来看，当时的兴庆府已经完全能够利用黄河的自流水系来保证自己的给水、排水系统。兴庆府的城市设计，直接受到唐代长安与北宋东京的布局影响，城内居民估计在20万左右；城呈长方形，周18余里，护城河阔10丈；南北各2门，东西各1门；道路成方格形，街道较宽，有崇义等20余街坊；皇家手工业作坊集中于宫城宫厅；对佛教尊崇的李德明、李元昊及后来执政的几位西夏皇帝、太后大力弘扬佛法，从内地请来高僧传播佛教，修建了承天寺、高台寺、戒坛寺、佛祖院等寺院，到西夏中期，藏传佛教传入后，整个兴庆府内外更是弥漫着越来越浓厚的佛教氛围。

注重汉地物质文化享受且又有着很强经济头脑的李德明，在修建兴庆府时，很注重城中皇家园林建设和手工作坊的建设，皇家园林占有很大面积，包围着规模宏大的宫城，而一般居民则密集分布于数十个街坊之内，均为低矮的土屋或土板屋。从汉地、西域、漠北来到兴庆府做生意的人，被特意安置在模仿唐时长安城安置胡人的“经济特区”内，一个个作坊和一个个操着不同语言的各地商人、艺人，就构成了这个特区的主体。

就这样，一个贺兰山下的小镇，很快变成了西夏的国都以及整个西夏王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在贺兰山和黄河的双重注目下，融合党项羌和中原建筑风格与智慧的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一个个中央官署围宫而设，一所所学校（后来专门设立了蕃学、汉学、大汉太学、内学等）顺势而现，一间间作坊因市而生，一幢幢酒楼沿街而兴，一院院平房绕宫而建，一个新兴的都城出现在贺兰山下、黄河之滨。

李德明带领大批党项羌从灵州搬迁到兴州后，城市中最核心也最森严的地方，显然是皇宫所在。那些习惯了马背上征杀的酋长们，走

进如此繁华而富庶的城市，开始自然有些不适应，尤其是那些按照中原王朝风格设置的重重宫门，甚至让一些从草原上来的大酋、武将无所适从。有一次，一位酋长喝醉酒后，晃晃悠悠地走到了皇宫附近，守卫的兵士不让进，这位酋长便鞭打兵士，并私自闯入皇宫。因为他位高权重，兵士不敢阻拦，结果让他直接闯入皇帝的内宫。按照西夏《天盛律令》规定：未被允许而冒入皇宫者，依据入宫门深浅而判处不同的罪，最轻的是“车门”，其次是“摄智门”，再次是“广寒门”和南北“怀门”，误入皇帝“帐内”要判最重的刑，这位误入“帐内”的官员，差点被斩杀，由此可见西夏皇宫建筑形制之复杂和律令之严格。后来，西夏境内的灵州、凉州、甘州等城市的建筑规模也随着都城的规模提升而扩大。

借用外脑：“以毒攻毒”的必由之路

公元1037年五月，从陕北黄土高原通往宁夏平原的路上，出现了两个宋朝儒士打扮的年轻人，他们分别叫张元、吴昊。和在宋朝屡次不第后想到党项羌地区发展的人才一样，张元、吴昊也将背影留给了家乡，只身前往那片陌生的土地。

早在留居河南长葛县时，科举失意的张元身上就体现出一种侠风。夜深人静时，他常常带着自己的铁笛走进林间，独特凄厉的笛声穿越山林，连强盗也选择躲避。

张元、吴昊来到贺兰山下的兴庆府时，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浓郁异族风格的党项羌文化政治中心，开放的民族心态又使这里能随处可见中原文化的影子。初来时，人生地不熟，加上入仕之路并不是很通顺，他们只好整天出入兴庆府的酒楼茶肆之间。一天，两人在一番豪饮后，乘着酒兴在酒馆的墙壁上大书“张元、吴昊来此饮酒”。巡查的西

夏将士看到“元、昊”二字竟不避元昊名讳，一了解他们不是党项人，便捉拿到元昊处。元昊见来人气度不凡，颇有侠士风度，非等闲之辈，便询问他们为何来到西夏。张元回答说：“听说党项人在这里招募汉地优秀人士，我们便来了。宋朝的当朝宰相富弼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汉地的知识分子没能走入仕途的，因为贫贱而无法回归家乡，有不少人投奔到你们这里来，我们来这里，有什么过错？”元昊接着问他们为什么要犯忌讳地称元称昊，张元回答道：“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大王的赵元昊之名用的仍是宋朝皇帝赐予的赵姓，这不比袭用人家的名字更丢人吗？”元昊看出这两个人是治世之材，决定重用他们，并在内心作出了决定：一定要废除宋朝赐的赵姓，用自己的姓氏。张元、吴昊的经历，在西夏历史上不仅留下了一段酒话，也留下了“贤士题记留名遇明主，元昊礼贤下士重人才”的一段佳话。

张元建议元昊缓称王：“辽国和宋朝都很强大，如果建国会导致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力征剿。如果能减缓称王建国的步伐，会减轻来自辽和宋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元昊采纳了他的主张，将建国的时间推迟了一年多。

公元1038年，一个改写党项羌历史的年份。

秋天的凉爽里，整个宁夏平原似乎都弥漫着一种甜蜜的味道，尝到最大甜味的自然是宣布建立大白高国的元昊，他的脸上写满了一个帝王的兴奋，他将建立党项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帝国。登上帝王宝座的那天，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身穿白色帝袍登基的君王规定：白色是“国色”、“帝色”，整个西夏帝国里，只有国君才有权穿白色的袍子。宋朝的文臣武将及修史者为了将其和李继迁、李德明时期的“夏国”区别，称之为“西夏”。

立国前一晚，元昊想到张元、吴昊初见自己时说的那番话，决定建国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废弃宋朝封赐的姓，恢复党项姓氏。因此，

在登基建国那天，元昊宣布：自己带头废除宋朝赐的赵姓，取名为嵬名元昊：北魏拓跋氏曾自改姓元，元即是拓跋皇姓，昊即为天。直到公元1063年，元昊的儿子谅祚改用汉姓，才恢复唐朝赐姓——李姓。

一个开国帝君往往是这个帝国的精神路标，他的精神取向对这个帝国的走向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被历史披上诸多神秘色彩的元昊，从一片巨大的白色里站起，随同他的身影一起站在历史屏幕上的，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到200年时间但影响却远远超过它的时间界限的西夏王朝。

三线作战：一个“狂徒”日益完善的龙形版图

张元没看错元昊，元昊也没看错张元。刚刚宣布建立大白高国，元昊就接受了张元递上的攻宋总方略：联合契丹抗衡宋朝，使宋朝在北方同时遭受党项和契丹两个政权的威胁。这个方略恰好符合元昊“小则恣行寇掠，大则侵夺封疆”的构想，西夏和宋朝、契丹近200年的三角关系就此定调。

公元1039年十一月，元昊在皇位上刚坐了一年就下令大举进攻宋朝的延州。

宋朝有一个致命软肋：派大批文官往前线指挥作战。镇守延州的最高军事长官范雍就是其中一位。开始时，宋朝凭借城池稳固、兵力众多、粮草丰足，击退了西夏的几次进攻。元昊于是开始不按套路出牌：让不少党项军人假装投降宋军，而且降军要求定居的地方全都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堡寨：金明砦。

金明砦是延州外围的一个堡砦，要想攻取延州，必须先拿下金明砦。金明砦的守将李士彬能征善战，手下有士兵十万，延州人称之为“铁壁相公”。对这样的军事将领，嵬名元昊一反常态，使用了反间

计。他派人把一封写给李士彬的信和锦袍、银带故意扔在路上，信里的内容是约李士彬叛宋投夏。宋朝士兵捡到后，层层上报到延州。不料，此计被延州官员一眼识破。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元昊又派宋朝降将刘重信到延州去招降李士彬。结果，李士彬抓住刘重信，将他处死。诱降不成，又采取诈降，派手下部落主动投降李士彬。李士彬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延州知州范雍，怯懦无能的范雍信以为真。不仅全部接纳投降的党项兵士，还赏赐给“降民”们金帛，安置在李士彬的各个堡砦中，这导致离开西夏前往宋营“投降”的军士越来越多。

诈降成功后，元昊又使用“骄兵计”。李士彬的祖上本来是宋夏边界地带的蕃部“熟户”，因忠心向宋而改汉姓李，世世代代镇守金明砦。元昊命令手下将士，凡遇到李士彬就不战而逃。然后放出话来，“西夏士兵听到‘铁壁相公’的名字，胆都吓得没了，狼狈逃跑，拦也拦不住。”李士彬真以为西夏兵怕他，愈发骄横。在内部治军方面，士兵偶有过失，李士彬就严刑拷打，导致手下人多生怨恨。得到间谍送来的这个消息，元昊暗中派人用金帛、官爵去引诱那些心怀怨恨的将士，让他们为自己做内应。1040年正月，元昊亲率10万大军南下，作出一副要攻打保安军的样子，迷惑李士彬。李士彬严阵以待，做好了准备，但等了一整天也不见动静，便解甲就寝。凌晨时分，元昊突然攻入砦中。李士彬与儿子李怀宝一同做了夏军的俘虏，这是西夏首次俘虏宋朝高级军官。

嵬名元昊轻而易举地攻下了金明砦后直逼延州城。其时正逢严冬，满山积雪，河谷冰封，西夏大军将延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知州范雍恐慌至极，一面下令紧闭城门，一面派人去召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前来解救。石元孙、刘平调集5万人，昼夜行军赶往延州。队伍走到距延州城仅五里之遥的五龙川时，遭到西夏军队伏

击，赶来救援的鄜延路都监黄德和、保安军北巡检万俟政和宋将郭遵等人，也被夏兵裹入包围圈中。突出包围后，五位将领会齐步骑兵一万人马，结阵东进，到达三川口。西夏军故意丢弃老弱士兵和牛马，宋军士兵都争着去夺，阵形大乱。西夏军迅速杀了个回马枪，宋军全军覆没。三川口战役，是西夏立国后对宋朝的第一大战。

三川口之战后，西夏以金明砦为基地，继续进攻、围困宋夏边境上的不少堡寨。1040年，宋仁宗下诏，宋军从进攻转为防御。延州、横山一带逐渐被西夏军队控制。1041年，宋朝启用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和名将韩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副使，和宋朝名将、经略安抚使夏竦共同布防延州一带。元昊乘机派被俘的塞门砦砦主高延德给范仲淹带去请和的书信。范仲淹扣留下这封信，并未呈报给宋仁宗，而是写信给元昊，劝他取消帝号，臣服宋朝。

1040～1044年，大白高国和宋朝发生了三次大的战争，张元在这三次战争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在历史上影响最大、最能体现张元思路的是1041年在宁夏南部六盘山北麓的好水川之战。

乘范仲淹加强延州一带的布防时，元昊听取张元等谋臣的意见，于公元1041年二月，领兵进攻今甘肃省平凉一带。

进攻之前，元昊先派人到韩琦那里请和，韩琦告诫部下说："无故请和，必定有诈。"下令各堡加强戒备，并亲自巡边至原州（今宁夏固原）一带。当宋朝将士还沉浸在春节带来的欢娱氛围中时，党项军队已经逼近了前沿。韩琦急忙调镇戎军守兵2000余人，并招募勇士8000人，合计万余人，命行营总管任福率领，其他将领也率领士兵，随同作战。元昊亲自带领士兵，一遇见宋朝主力部队，便假装西逃，诱敌追赶。任福不知是计，率数千轻骑奋力追击，至六盘山下的好水川时，已是人马困乏，只好屯兵扎营。这时，元昊领十万精兵埋伏在好水川口，并令人将百余只军鸽分装在一些泥盒中，放到道路旁边。

次日清晨，任福领兵沿好水川继续西行，走近今宁夏西吉县南的羊牧隆城时，发现道旁散落着很多的泥盒子，外面封裘谨密，里面有咕咕的声音。任福命士兵将盒子打开后，装在盒子里的百余只鸽子顿时飞出，盘旋于宋军的上空。在没有远距离通信工具的情况下，元昊采纳张元的这个办法，以信鸽当诱饵让对方上当，并让鸽子成为自己的进攻号令，在中国军事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一代战帝元昊丰富中国军事史的一个典型案例。西夏军根据鸽子飞旋的位置，很快判断出宋军指挥官和主力所处的方位，立即从四面将宋军团团包围。宋军数十名大将阵亡，兵士死伤达万余人。

好水川之战既是嵬名元昊军事指挥史上的经典之作，也彻底改变了宋和西夏的军事格局，令元昊万分得意。踌躇满志的元昊面对胜利，让张元在好水川的山间峭壁上题诗以庆："夏竦何其耸，韩琦不足奇，满山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在他的眼里，宋朝的将领已经不足为威胁，他的眼光是建立抗衡大宋的大白高国的帝国体系。

公元1042年，元昊将攻伐的目标放在了西夏南部边境附近的定川砦（今宁夏海原县天都山西南）。元昊再次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宋兵引诱到砦中后，断绝水源，重重包围，俘虏宋兵达9400多人。随后，元昊用"诏书"的形式告谕宋朝关中军民"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不难看出，元昊的远大图谋不再局限在黄河边的宁夏平原和河西地区。

由于频频发动进攻，宋朝关闭了设在边境的榷场，致使西夏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影响。1044年十月，双方终于开始和谈，并达成一致。宋朝封元昊为夏国王，赏赐西夏绢153000匹，白银72000两，茶3万斤，在保安军、镇戎军高平寨重新开通榷场，恢复双方贸易。

1044年春天，辽国西部越来越多的党项人和800户岱尔族人叛逃到西夏，辽国方面认为是元昊采取了诱纳政策，要求西夏方面返还这些

"叛民"。元昊不仅没有同意，反而指使、支持辽国西边边境的一些部族接连叛离辽国，投入西夏。

1044年十一月，辽兴宗命皇太子重元和韩国王萧惠为先锋，自己带领辽军亲征西夏。元昊故伎重演，引诱辽军到河套一带，并亲自到辽军营中上表谢罪。辽兴宗命令北院枢密副使萧革接待元昊。对辽国的指责，元昊装出诚恳认错的样子，亲自捧酒具为辽兴宗祝寿，在鼓乐声中，元昊还折箭盟誓，且命令西夏军队后撤，三次后撤百余里，但每次撤退都将方圆数十里的村寨烧尽，致使跟进的辽军人马无法就地补充给养。等到辽兴宗答应和西夏言和时，元昊估计辽军已经草尽粮绝、人马饥乏，又故意拖延了几天，然后带兵反击辽军。辽军数量庞大、武装精良而且组织了有效抵御，西夏军队差点被击败。就在此时，突然刮起大风，来自草原的契丹军队无法适应西北的风沙天气，长期在沙漠戈壁间驰骋的西夏军队趁机奋起反击，激战过后，几乎将辽兴宗活捉。

1046年十一月，辽兴宗再次派兵进攻西夏，在黄河上提前搭建浮桥，以做退路，接着打造船只，在上游钩取浮物，保护浮桥，结果渡河部队遭到西夏军队迎击而失败，西夏军队在上游放巨木，试图撞坏浮桥，断绝辽军退路，辽军倚仗巨大木船上的大钩钩取木头，才得以保护住浮桥，安全撤退。

天骄亡曲：迷失于酒杯与香枕的开国皇帝

党项羌是一个马背部族，酒香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迁徙、壮大乃至最后的颓亡。起初，党项羌人积极汲取其他部族的先进酿酒技术，酿出了坛坛好酒，在一阵阵酒香里为自己的出征壮行、为自己的胜利喝彩、为自己的失利苦闷。党项羌人还根据西部游牧部族嗜酒的特点，用自己酿的酒引诱宋夏边境的党项、吐蕃人叛变宋朝投奔西夏。对战功显

赫的将士，西夏也往往以宫廷美酒犒劳。

饮酒不仅是西夏人的一种物质享受，而且在联系部落间的团结和发扬尚武精神上起着无法取代的作用。一个个武士在酒香中走向前线，一个个将军在酒香中得到提升，帝国的内脏散发出的酒香，成就了一个崛起王朝。然而，这种酒香泛滥的结果，不仅迷醉了元昊的双眼和理智，也浇软了帝国的躯体和意志。元昊这个帝国的缔造者，和历代君王一样，在不断吸取汉族先进的文化、科技、教育的同时，也被酒香及酒衍生出的迷药般的宫廷糜烂生活扰乱了判断力和慧心。

如果说早期娶野利玉蓉和辽国的兴平公主是出于对党项羌内部大姓和辽国势力的笼络，那么，元昊的第三个妻子卫慕氏则是效法娶野利玉蓉的失败之举。

卫慕氏作为西夏建国前后银、夏两州一带党项羌中最显赫的族姓，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和父亲李德明都曾经与之联姻。李德明的皇后卫慕氏为了加固其娘家和皇室的关系，将自己的娘家侄女自幼接进宫中抚养，准备长大后许配给儿子元昊。

卫慕山喜密谋篡位的阴谋被粉碎后，整个卫慕家族遭元昊血洗，元昊的妻子卫慕氏因有身孕而免遭诛杀，被囚禁在别宫。公元1035年，年轻的皇后、元昊的妻子卫慕氏生下一个儿子，这时，元昊的另一个宠妃野利氏诽谤说那个孩子不像元昊，元昊一气之下竟将卫慕氏和婴儿一起杀死。

元昊的第四个妻子姓索，嫁进来后得不到宠爱，这个软弱而富有音乐天赋的女子只好每日弹琴、跳舞，在自娱自乐中打发孤寂的日子。元昊在牦牛城战役中初次战败，传到后宫的消息却说元昊战死了，这个始终没能得到元昊宠幸的女子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仅没有半点悲伤，反而喜形于色。脸上终于露出的笑容伴随着自己的琴声舞影，很快就因为元昊的归来而凝结了。索氏担心被诛杀，便自杀身亡了。

第五个妻子都罗氏，因为娶来不久就去世，没留下什么记载。

第六个妻子咩迷氏来自一个小族，是他一次出巡时的意外收获。然而，走进元昊的怀抱后，她的美丽却没能留住元昊迷离的眼神。比先前的几个妻子幸运的是，咩迷氏为元昊生了一个叫阿哩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元昊并不喜欢他们母子，让他们一直居住在夏州的王亭镇。阿哩长大后，深为母亲的遭际不平，聚众谋反，被其党羽鄂桑格告发，等待阿哩命运的是像处置山喜家族一样：沉河而亡。阿哩的母亲、那个一直未曾得到宠爱的党项女子，也被元昊赐死。

从李继迁割据夏州到元昊称帝，野利家族一直伴随着李继迁、李德明、元昊三代人，可谓战功累累，李德明就是李继迁娶的野利家族女子所生。元昊在银州艳遇到的野利玉蓉不仅漂亮且有智谋、善战，深受宠爱，和那些被元昊迎进怀抱后很快遭到冷遇的女人不同，她就像一株被元昊一直宠爱着的常青树。她喜欢戴金饰的“起云冠”，元昊不仅派人定制，而且下令国内其他人不得带这种冠。命运垂青于野利氏，这个党项女子不仅得到了元昊的宠爱，还为元昊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宁明，天资聪慧，爱好学习，深明大义，被元昊立为太子；次子宁令歌，因为长相酷似元昊，深得元昊钟爱。太子死后，野利氏请求立宁令歌为太子，得到元昊的许可。第三个儿子薛埋，早卒。野利氏后来被元昊立为宪诚皇后。

然而，元昊一次次的婚姻中因为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也为元昊的生命甚至西夏王朝的政治命运埋下了一颗时时增长威力的炸弹。西夏立国后的190年间，有五个君主经历了外戚专权，元昊本人就是因为外戚权谋的渗入而死亡。野利玉蓉的两个哥哥——国舅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分别统领明堂左厢和天都右厢。两个人在对宋的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西夏重臣。宋朝在战场上无法战胜野利兄弟带领的党项精兵，便开辟了第二战场——间谍战。环州知州种世衡派手下王嵩前往西夏施反间

计，终于使生性多疑的元昊上当，于公元1043年九月诛杀了野利兄弟。

一个个女子走进元昊的怀抱，一个个女子也因此承受被冷落甚至失去生命的命运，终结元昊这种“花心命运”的同样是一个女子——没藏氏。

诛杀野利兄弟成了元昊发泄怒气的一个渠道，他还下令将野利家族的财产没收、年满8岁以上的男孩全部杀死、女性全部被分配给贵族充当奴婢。当那些过惯了奢华日子的野利家族女子一个个低头走过元昊的眼前时，野利遇乞美丽的妻子没藏氏被元昊看中，这个后来改写西夏初期历史的党项女子就此走进了西夏皇宫和元昊的生命中。当天晚上，他就完成了对没藏氏的肉体征服。

元昊晚年虽然沉湎于酒色，但还没忘记出巡和狩猎。然而，身边出现的不是皇后妃子，而是没藏氏。他们的私通有了太子谅祚的出世。谅祚自幼被寄养在舅舅没藏讹庞的家中，公元1047年三月，由于没藏氏在香枕边的不停建议，没藏讹庞被元昊升任为国相，开始掌控国政大权。元昊在酒色中越陷越深，国事基本由没藏讹庞掌控。

在没藏氏深得元昊宠爱时，又一场掺杂着政治因素的婚姻走进了元昊的生活，这场婚姻的女主角是元昊的儿媳没哆氏。1047年五月，元昊被儿子宁令歌娶的妻子没哆氏的美貌所迷，便将她纳为新后，没藏氏因此失势。元昊专门为没哆氏在贺兰山修建离宫，日夜游宴作乐。看到没藏氏被废，而元昊依然沉湎酒色中，没藏讹庞从个人情感出发，要为妹妹的失宠报仇；从图谋大业的角度出发，这也是他篡权的绝好时机。

没藏讹庞从西夏形势中嗅到了出击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元昊来说，就是一种死亡气息的逼近，遗憾的是酒色之味影响到了他一贯敏锐的政治嗅觉，根本没有觉察到死亡气息的到来。一场宫廷政变即将发生。

1048年五月十五日晚，元昊在皇宫内喝醉酒休息，没藏讹庞唆使

宁令歌约好野利家族的浪烈等人潜入元昊的寝宫行刺，没想到浪烈未能得手，当场被杀。年轻的王子在别人的怂恿下，慌乱之中割伤元昊的鼻子，仓皇逃往没藏讹庞的家中躲避。阴谋的策划者没藏讹庞看到利用宁令歌诛杀元昊的计划没有得逞，便以弑君之罪杀了宁令歌和他的母亲野利氏，而元昊也因为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因鼻子被割而身亡的君王。元昊被妻子和妻舅合谋，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太子杀了自己的父亲，也灭噬了一个帝国良好的开端。西夏第一代皇室上演的这场亲情之间的残杀，成了西夏皇权之争的开端。

第四章
草丛里的血与火：女斗士主导的党项帝国

强悍而孤傲的元昊死掉了，儿子也上了西天，巨大的政治空白留给了曾被他抛弃的老婆，于是，外戚成了帝国的主宰。或许是为了发泄怨气，或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许……反正这些女人都把鲜血和长刀当成了至爱。倒是几位正牌的皇帝怀着仁爱之心不懈地谋求和平。于是，一对奇怪的政治组合出现在党项帝国的高堂。

外戚主战，皇帝恋安：一对奇怪的政治组合

元昊以自己的强悍和智谋带来西夏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张和满满信心，同时在这种信心支配下的是整个王朝的自信乃至傲慢，这必然导致周边政权的反感。当这种反感通过战争来体现时，西夏的危机也就降临了。在这些战争中，来自草原的辽、金王朝给西夏一度构成亡国之险，双方的战争伴随了整个中后期的西夏历史。

就像书写一封没有读者的信一样，元昊临终前留下这样一个没人继承的遗言："假如西夏衰弱，应该依附宋朝，不能专从契丹，因为契丹残虐而宋朝仁慈；假如顺从宋朝的话，子孙安宁，还能得到岁赐和官爵，假如被契丹胁迫的话，那么，西夏国就危险了。"

元昊的突然亡命，给西夏留下了巨大空白，来填补这个空白的合格人选太子宁令歌却已经成了政治牺牲品。整个西夏帝国的高层权力基本实现了走向没藏家族的软着陆。襁褓中的谅祚于公元1049年被抱着登基，这是西夏历史即位年龄最小的皇帝，太后没藏氏临朝听政，国家军政大权由没藏讹庞为首的三个大将分治。

一代战帝元昊的死讯被辽国知道后，辽国朝廷普遍认为这是绝好的进攻西夏的良机。闻听元昊是为了漂亮的儿媳而丧命，辽兴宗对这位被西夏人传说得赛若天仙的女人也动了心思，一心想看看这位几乎倾倒西夏帝国大厦的女人。1049年，西夏依照惯例派遣使者前往辽国恭贺正旦，辽国借口西夏使者去晚了，扣留了使者。半年后，没藏氏因为西夏使者没返回，于六月份再次派遣使者前往辽国观察动静，这批使者同样遭到被扣留的命运。七月，辽兴宗借口西夏恭贺正旦的使者去迟了，是对辽的不敬，发兵攻打西夏，暗地里又下令要将那位导致元昊丧失生命的党项美女掳到辽国。历时5年的辽夏第二阶段战争就这样爆发，河套地区成为这次交锋的主战场。

辽国三路大军中的南路军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神木一带；北路军横越沙漠戈壁地区，直逼西夏的黑水燕镇军（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并试图以此为跳板南下进攻河西走廊；辽兴宗亲自带领中路军向西夏境内推进。元昊时曾在西夏北部、东北部边境部署精兵防御契丹人的进攻，因此，这次进攻中的南路军很快就被西夏军队击溃；由耶律敌古鲁带领的北路军十月份攻入西夏，在即将进攻到凉州地区时，辽军在巴丹吉林沙漠中突然改变方向，向东突袭贺兰山地区。这次突然改变方向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机密，辽军派出的细探已经查明，导致元昊亡命的那个美貌女子没啄氏就被秘密安置在贺兰山腹地。

元昊去世后，美丽的没啄氏被秘密安置在贺兰山百寺口深处的一处原始林区里。她的家族中不少人随同她前往这里。没啄氏认为是自己的

容貌毁了未婚夫宁令歌和元昊的生命，心灰意冷之下在林区深处建造了一处寺院，打算在林绿草长中安心修佛。没想到契丹军队突然出现，陪伴没哆氏的西夏大臣家属数十人被一同掳走。得知消息的没藏讹庞率军营救，遭到契丹军队有准备的痛击。

契丹军队深入西夏境内，使辽兴宗获得了比得到美貌的没哆氏更大的快乐，他从此看到西夏驻防的软处：因为联合契丹抗击宋朝的战略思想，使西夏对契丹军队的防守线非常脆弱。1050年三月，执掌西夏大权的没藏氏屯兵西夏和辽接壤地区，以弥补西夏在和辽边界线上的空虚，这个举动导致辽兴宗再次出兵伐夏。

两个月后，辽军直抵兴庆府并实施了包围，这是西夏国都第一次遭到围攻，没藏氏下令闭城坚守。辽军困城一个月后，转而向西越过贺兰山，攻破贺兰山西麓的摊粮城，将西夏储备在那里的粮食全部运走。没藏氏深感无力抗衡辽国，多次派人向辽求和。辽接受西夏臣服后，针对西夏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将辽国公主嫁给吐蕃首领董毡，以达到借吐蕃钳制西夏的目的；二是代西夏向宋朝请和，利用西夏的战略地位牵制宋朝。

没藏氏为了继续对辽政治婚姻，曾经派人到辽国为谅祚求婚，遭到辽兴宗的拒绝。宋朝的三司使、吏部侍郎王拱辰就此在出使辽国时讥讽辽兴宗说："我们早就知道你们的公主曾经嫁给了元昊，却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结果是在幽忧中死的，是么？"辽兴宗说："是的，直到饮恨而死！"王拱辰挑拨说："现在陛下如果和西夏再通婚的话，那岂不是太自屈了？"这从侧面上刺激了辽兴宗。另外，辽国甚至没有给予谅祚正式的册封。相反，在谅祚10岁时，辽国却和吐蕃实现了联姻。

没藏讹庞权倾一时，甚至出入的仪仗也按照皇帝的规格。没藏太后死于情人三角冲突后，为时九年的西夏没藏母族摄政至此宣告结束，但没藏讹庞依然控制着西夏大权，谅祚并没有恢复自己的真实帝位。为

了继续控制谅祚，没藏讹庞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年仅9岁的谅祚，以国舅、国丈、国相的多重身份继续独揽朝政。谅祚初立时，诺移赏都等三名统军大将各拥强兵驻守在外，他们久掌兵权、分掌国事，讹庞还有点顾忌。当三个大将逐一去世后，没藏讹庞开始有恃无恐，朝廷大臣对其稍有不满，便被撤职罢官，谅祚和群臣都敢怒不敢言。没藏讹庞对内大权独揽，对外则扩地拓土，牟取私利，导致夏宋关系恶化。

公元1053年二月，没藏讹庞向宋朝索取古渭州地。宋仁宗派遣使者前往巡视，很快就正式将这里定为宋朝地界，没藏讹庞于是纵兵侵扰宋朝沿边堡寨，剽掠人畜，频频挑起事端。同时，没藏讹庞又令西夏民众越界侵耕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以西一带的沃土，并将耕获所得全部攫为已有。宋朝多次要求没藏讹庞归还所占耕地，并更定疆界，没藏讹庞不但不收敛，反而在军队的保护下，发动几万人带着耕牛、农具强行开垦，此举激怒了宋廷，全面封闭了沿边的一切官私贸易，致使西夏境内物资紧缺，西夏官民怨声四起。

政治上垄断朝权、军事上引发战争、经济上导致外贸困窘，没藏讹庞不仅引起了朝臣和民众的不满，也引起了逐渐长大的谅祚的不满。一场集外甥和舅舅、女婿和岳父、皇帝和权臣之间于一体的夺权战斗，在谅祚12岁这年正式打响。

1059年，12岁的谅祚开始参与国事，西夏历史上，嵬名谅祚是一个致力于改变母族执政、挽救西夏国家权力和声望下滑的有为之君。从12岁时，谅祚就开始表现出一个有为的年少天子的魄力、智谋和勇气。他开始启用一些能站在自己一边的文臣武将，其中最明显的是启用毛惟昌和高怀正两个汉臣。这两个人的妻子曾经在谅祚年幼时哺乳过谅祚，谅祚便授予他们六宅使（负责管理皇帝诸宅院事务的官员）的职务，他们奉谅祚之命暗中搜集没藏讹庞的资料，经常向谅祚汇报臣民对没藏讹庞不满的信息，这些举动引起了没藏讹庞的怨恨，他抓住高怀正向国人发

放高利贷的把柄除掉了高怀正，而毛惟昌也因偷穿元昊龙袍被处死。没藏讹庞和谅祚之间矛盾的逐渐白热化。

没藏讹庞还常常将谅祚带到自己家中玩耍，以防止政敌接近谅祚。一天，谅祚在舅舅家见到了没藏讹庞的儿媳、一位姓梁的汉族女子。那时，没藏讹庞为了给儿子积攒政治资本，正让儿子带兵镇守边塞，儿媳常常独守空房。

那是一个对西夏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刻。一个是即将执掌皇权的少年天子，一个是漂亮、聪颖的成熟少妇，一见钟情的情爱火苗在他们中间很快点燃，私情在皇子谅祚和他的表嫂之间蔓延。私情浓处，谅祚还特意将一枚随时出入宫廷的金牌送给了梁氏。

年轻的天子到舅舅家的次数越来越多，还常常借故不回家，这让没藏讹庞有点奇怪。1061年四月的一个下午，谅祚与梁氏正在私通时，没藏讹庞的儿子突然归家，发现皇帝和自己的老婆正在床上翻云覆雨。天子给自己戴绿帽子，是忍受还是反抗？没藏讹庞的儿子实在无法决断。那天晚上，月光洒在没藏讹庞的府邸里，四月的贺兰山下依然一片清寒，出来散步的没藏讹庞发现儿子在凉亭下独自饮酒，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一回来就钻进房间，和美丽的梁氏缠绵，而且，那样的清寒中，一个人端坐在孤独中，饮下的已不再是酒了。看到父亲询问的目光，儿子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将白天看到的一切告诉了父亲。老谋深算的没藏讹庞觉得时机到了，他从那顶绿帽子，看到了置换到自己头顶上的皇冠的契机。

当夜，他们便以此为由密谋杀死谅祚而另立。父子两人边喝酒边谋划。因为是在自己家中，再加上是夜深时分，他们没有任何顾忌地谈论着篡位的计划。

因为丈夫没有像往常那样归家后便钻进自己铺设的被窝，梁氏披衣出来找丈夫。没藏讹庞父子说的那些话全被暗地里的梁氏偷听到，

在丈夫和情人、家族利益和国家危亡之间，梁氏选择了连夜出府密告谅祚。

没藏讹庞父子谈完计划后，仿佛看见西夏皇权已经被自己彻底掌握。在兴奋感笼罩下，父子俩在寒月之下开怀畅饮，不知不觉间有些醉意，他们没想到梁氏已经从后门出去，带着谅祚送给她的金牌急匆匆走进皇宫。按西夏皇室规定，持金牌出入皇室必有重大事情，侍卫立即禀告谅祚。闻听这个消息后，谅祚立即采取行动，派出亲信漫咩带领“铁鹞军”缉捕没藏讹庞父子及其家族。还沉浸美梦中的没藏讹庞父子就这样被梁氏出卖了。按西夏律令，整个没藏家族遭到诛杀。

那天晚上，梁氏再没回到没藏讹庞的府邸，她永久地留在了皇宫，并于不久就被谅祚立为皇后，这是西夏历史上第一位汉族皇后，也是西夏历史上的第一位梁太后。

1061年，14岁的谅祚正式登上国君大位，开始运行西夏第二位皇帝的历史轨道。

十一月的一天上午，早朝。宋朝大殿上迎来了西夏的使臣，他们在大殿上高声念着西夏帝国的第二代皇帝谅祚的意图：“本国一直羡慕汉人的衣冠装饰，现在，本国人民都不用蕃礼，明年七月我的生日时，就开始在西夏的蕃礼馆修复汉人礼仪，十月，就拿汉人的礼仪迎接大宋朝的使臣。”宋仁宗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然欣喜不已，他下令在回诏中要求谅祚将西夏方面的请求写得再详尽一些，并允许西夏方面使用内地礼仪服饰。

第二年四月，谅祚一面下令向宋朝购买汉人的衣服，一面向宋朝申请允许内地工匠进入西夏制作或传授技艺。为此，宋朝特意颁布两道诏令，完全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谅祚继续派人前往开封，向宋朝提出学习中原礼仪，并以马匹换取《诗经》、《尚书》等9种儒家典籍、唐史，以及《册府元龟》等书籍。宋朝政府以国子监印制的9种典籍和

《孟子》、《正义》及一些医学书籍赐给西夏，这是西夏历史上第一次从中原求得的数量巨大的儒家经典、医学书籍。

如果说元昊的开放性体现在他的军事视野和开国气度上，那么，谅祚的开放性则体现在文化的交流和制度的借鉴上。元昊为了建立割据政权，与宋抗衡，在国中提倡蕃礼、推行党项旧俗。但是，党项羌从唐代初年徙居西北后，和当地的汉族人民杂居，受到汉族文化的深远影响。同时在西夏统辖的范围内，汉族人口依然占多数，西夏的各级官僚机构中，也有大量汉人任职。因而用汉礼自然要比行蕃礼更能获取汉人的支持，谅祚看到一味强调蕃礼、蕃制、重用党项人而排斥汉人及其他民族，不利于西夏政权内的团结和国内的稳定。他在亲政后实行的第一个重大政治措施，就是去蕃礼从汉礼。公元1063年，谅祚改用汉姓，恢复用唐朝给党项羌高层的赐姓——李氏，嵬名这个姓氏经过元昊时期25年的使用，走向了西夏王朝的历史记忆，此后的西夏皇帝开始采用李姓。

通过长期的战争实践，元昊总结了一套成熟的兵制。在建国后，他没有像宋朝那样实行文官集团体系，而是将王朝内部分为12个监军司，将随自己征战多年且富有军事和政治管理经验的党项大姓中的野利遇乞、野利旺荣、赏多、如定多多马，以及投靠自己并随自己征战立功的汉人成逋克、窦惟吉等人派往这些监军司负责军政工作。其中6个监军司为左厢，辖制后来的西夏王朝的东半部，另外6个辖制西半部，这种独特的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中，每一个监军司照例由“贵戚豪右”中任命3名官员担任首领，次一级的官职则由党项中的非贵族或汉人担任，左厢、右厢的首领通常由王族或王后的戚属担任，行使着一个区域内的高度自治权。元昊统治时期的军队数量在15～30万，这些军队就被派驻在不同的监军司内。当决定调动军队时，中央政权派使者拿着银牌，向被调动的将军发出调令，将军则从辖区内的征兵册中召集所需兵员，接受银牌，就表示遵奉君主的调令。出征前，君主常常还要和将军们歃血

盟誓。

公元1062年五月，谅祚对元昊设立的十二监军司作了部分调整和改编，更换军名和驻屯地点等，同时设立了一个总的管理各监军司的机构。不仅加强了夏宋边境的军事力量、巩固了西夏边防，而且改变了军政合一、各监军司权力过大的弊病，地方文武官员相互牵制，还对巩固西夏中央封建集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谅祚在元昊立国初期制订的中央官制的基础上，仿照宋朝的官制作了一些增益和充实，使西夏的中央官制比元昊时更为完备。在调整官职的同时，谅祚还十分重视使用汉族知识分子，尤其对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的知识分子非常亲近和优厚，赐给他们中原所产的物品，为他们在兴庆府修建内地风格的府邸，因此很多宋朝知识分子愿意投奔西夏，因此为西夏储备了大量知识分子资源。

没藏讹庞为西夏国相时，由于侵耕查野河宋地，使西夏与宋麟州交界一带的老百姓很不安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谅祚亲政后，退出没藏讹庞兴兵所侵占地界，于公元1061年派官员与宋朝议定，恢复旧界并在边界设立地带，两方人户都不得再在边地耕作。地界划定后，夏宋因边地争执连年发生的冲突停止了。公元1069年，又进一步恢复了榷场，开通互市，开辟了一个和北宋的商贸活跃时代。

谅祚对西夏的政治、军事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适应了西夏封建经济日益发展的需要和统治阶级日益汉化的需要，从而使西夏转危为安，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对以后各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谅祚统治20年间，夏辽双方外交往来只有20多次，夏辽关系直到谅祚死后，他的儿子秉常即位后才有所好转。谅祚和吐蕃的关系也显得复杂而微妙。公元1063年，吐蕃首领禹藏花麻将兰州一带的土地作为献礼，投降西夏，谅祚以西夏皇室女嫁给了禹藏花麻，封他为西夏的驸马。此后又成功诱招了吐蕃木征部。

公元1064年，宋仁宗驾崩，谅祚遣使臣吴宗赴宋祭吊并贺英宗继位。宋朝的引伴使高宜因礼仪事与吴宗发生争吵，高宜出言不逊，“当引一百万兵逐入贺兰巢穴”。宋朝政府下诏给谅祚，指令他以后仔细选择使者。谅祚以为这是有意侮辱西夏，遂决定以武力维护自尊，并自这年七月集结军队攻入宋境，夏宋战争再起。

佛音与战声：风流皇后和他的好战儿子

就在西夏处于复杂的外交环境中时，西夏宫廷内却悄然吹来一缕佛音。当元昊移情于儿媳的美貌时，没藏皇后对此心灰意冷，夜夜独守空房的巨大寂寞包围着这个聪慧而美丽的党项女子，这时，她接触到了佛教。佛教教义让她放下了奢华而尊贵的生活及对元昊还能回到自己身边的美好愿望。一卷卷佛经诵读后，一个清凉的早晨，没藏皇后带着一颗清凉之心走进了自己长期敬香的戒坛寺。随着剃度前的钟声响起，皇后看见自己那一头曾经让元昊迷恋不已的秀发一缕缕落地，也似乎看见了那些美好而甜蜜的岁月如晨雾般消失了。

青丝落地、佛意出场，西夏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元昊的没藏皇后消失了，取代她的是戒坛寺里众多尼姑中的一位，这是西夏皇室中第一位出家的女性。出家的没藏皇后虽然离开了兴庆府里的皇室生活，但对儿子谅祚的命运一直关注着。从襁褓中的谅祚被抱着继承西夏帝位的那一天起，没藏皇后一心希望儿子龙运长久。为保儿子谅祚“圣寿以无疆”、“宗祧而延永”，出家的皇后尘心未尽，想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大崇精舍，中立浮图”。

公元1050年，没藏皇后开始让人设计并在兴庆府建造起一座寺院，因为是“皇太后承天顾命”而建的寺，因此被称为承天寺。这是西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造寺，整个工程历时5年零7个月。在寺里后来

又兴建了一座比长安城里的大雁塔还高半米的如云宝塔，这就是近千年间一直屹立在兴庆府且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的承天寺塔，从此，巍峨的塔尖迎来兴庆府的晨曦、送走兴庆府的斜阳，默默地记录着大白高国政治心脏里的风土人情。

承天寺建成后，宋朝朝野也一片震惊。这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宗教建筑，恢弘的建筑、云集的高僧、朝拜的信众使得承天寺塔成了大白高国软实力的象征，回鹘、吐蕃、党项、汉人纷纷前来礼佛敬香。1055年，没藏皇后派遣专使前往开封，向大宋皇帝迎请一部《大藏经》并珍藏于寺中。随着建筑规模及收藏经卷的增多，承天寺成了吸引西北地区高僧大德讲学弘法、研佛修行的上胜之地，没藏氏和谅祚也常到这里来听高僧讲经。当时的承天寺，与后来在西夏境内兴建的凉州护国寺、甘州卧佛寺，同为西夏三大佛教圣寺。

西夏历史上，历代帝王、皇后都笃信佛教，没藏皇后虔诚的佛教态度及从小就带谅祚出入寺院对谅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夏历史上曾经六次向宋朝求赐佛经，谅祚在其19年执政期间就有三次。其中第三次是在他亲政后第二年完成的。同时，谅祚还继承了元昊时期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的工作，他在迎请佛经时也向宋朝提出派精通翻译佛经的高僧到西夏的请求。

承天寺里日益繁盛的香火并有使没藏氏彻底忘却红尘，她也没有将自己的晚年尽付青灯之下。这位春心未泯的党项女人不久就将先前与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的私通半公开化。此后，美丽而率性的没藏氏又与担任过元昊侍卫官的宝保吃多已偷情。没藏太后的移情引起了李守贵的嫉妒，公元1056年十月的一天夜晚，没藏太后与宝保吃多已在出猎贺兰山的夜归途中，遭到李守贵密派的骑兵伏击，没藏皇后和新情人宝保吃多已都被击杀。没藏太后死于情人的三角冲突，为时9年的西夏没藏母族摄政至此结束，也给西夏历史留下了一个风流皇后入宫、得

宠、出家、摄政、偷情、死亡的人生足迹。

尽管佛音在西夏上层中逐渐漫漶，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弥漫在这个王朝的上空。公元1067年，是西夏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一个叫王韶的汉族人给宋神宗递上了一份《平戎策》，引发了西夏建国以来的重大战役。

王韶当时任建昌军司理参军，他的奏疏引起了朝野一片震惊，自然也引起了宋神宗的高度关注。王韶在这封奏疏中指出：西夏一旦攻破青唐城，就扫除了南下的屏障，会大规模地掳掠渭水秦地；而占据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的吐蕃首领董毡、瞎毡的军队根本不是西夏的对手，河湟一带、甘肃中部一带随时可能成为西夏的地盘。因此，他建议宋朝想要谋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扰”。他的这些战略主张赢得了王安石的赞许，自然也就得到了宋神宗的赞同，王韶因此被任命为秦凤经略安抚司机宜文字。尽管这是一个文职，但王韶抵达秦州后立即发挥了他的军事和经济头脑，开始注重和河湟一带的吐蕃人修好，在边界处设立贸易市场。

王韶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后台老板王安石的大力支持，王安石积极向皇帝说王韶的好话，并提拔王韶为提举秦凤路蕃部及市易司事，主管在西部边境地区和吐蕃人的商业贸易。这期间，吐蕃人俞龙珂统领的部落势力不断增长，对边境形势有着前瞻性判断的王韶带领身边的几个骑兵，直接到俞龙珂的军帐，当面陈述了与宋朝联合的利害关系。烛火映照的军帐里，两个人经过一个通宵的谈话后，俞龙珂终于下定决心，带领12万人马归附宋朝。宋神宗给俞龙珂赐名“包顺”，很快又授他负责今甘肃临洮、青海东部地区的蕃部巡检。王韶和吐蕃势力的修好，使西夏向西发展遇到了一座坚硬的屏障。

要突破这个屏障，必须依靠战争，这场战争就是谅祚执政后期开始的夏宋战争。谅祚即位之初，宋朝宰相韩琦曾轻视地认为：谅祚是个狂

童，没有元昊的计谋和智慧。然而，党项羌好战的血性在执政后的谅祚身上喷张，让韩琦等宋朝官员大吃一惊。

西夏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使大宋宰相韩琦察觉到西夏的边防力量已经比元昊时代大为增强，便建议英宗对西夏停止岁赐，终止榷场生意。宋英宗为此发诏书谴责谅祚，并且提出要中断榷场。聪明的谅祚再次出台了灵活的外交政策，派遣使者到开封向宋英宗谢罪，司马光对此警惕地指出：谅祚的这个举动，一是为了骗取宋朝的岁赐；二是有利于西夏人到开封贸易；三是让宋朝放松警惕。

不过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经过一定时期的国力储备后，谅祚于公元1067年下达了对宋作战的命令，并秉承首领亲自带军出征的传统，领数万西夏军队出兴庆府向东直抵位于今陕西绥德县的绥州，开始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东征。

西夏控制绥州时，派驻的军事首领是嵬名山。1067年十月，宋朝发兵围困绥州，宋朝将领种鄂事先利诱嵬名山的弟弟嵬名夷山等人做内应，胁迫嵬名山率众归顺宋朝，宋朝因此得到党项及其他蕃部首领300人、15 000户居民和上万士兵，并击退了前来夺城的4万西夏军队。谅祚认为这是宋朝知保安军杨定对西夏的欺骗，于是设计在十一月诱杀了杨定等人。因为以前杨定曾在出使西夏时向谅祚称臣跪拜，接受了西夏的馈赠，回去后却向宋朝政府上交了谅祚赐给他的宝剑等部分物品，私自将谅祚赏赐的金银藏了起来，并且夸口可以刺杀谅祚，还因此被提升为知保安军。

西夏政府向宋朝方面提出索要嵬名山及此前叛逃宋朝的西夏横山酋长，而宋朝也向西夏方面索要杀害杨定的凶手及此前被俘的宋朝官员。双方谈判失败后，谅祚带领的西夏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终结这些胜利乃至谅祚生命的是围攻大顺城之战。

大顺城守将蔡挺得知西夏军来攻，下令沿边人户坚壁清野，全部进入城堡，不得派兵出战，又事先在城堡周围护城河中布满铁蒺藜，西夏人马渡水多被铁蒺藜所伤，进攻迟滞。谅祚冲锋在前，带领西夏军士一次次围城进攻，攻了三天后，仍然一无所获。谅祚最后一次亲临阵前督战，蔡挺命令蕃官赵明带领800名弓弩手埋伏在城外，宋军箭如雨下，西夏军死伤不计其数，谅祚也被宋军神射手的毒箭射穿铠甲。

身受重伤的谅祚流血不止，西夏军只好撤退。谅祚回到军营后，饱受箭毒带来的痛苦，回师兴庆府后仍是无法治愈，不久便死去，时年21岁。于是，一个内外环境更加复杂的西夏，被推给了他7岁的儿子秉常。

汉女太后的天幕：五路宋军的溃败

公元1067年是夏宋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双方的最高领袖都在这一年去世：宋英宗赵曙和夏毅宗谅祚分别死于这一年的年头年尾。

宋英宗去世后，20岁的太子赵顼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神宗，他执政后拒绝了富弼等元老重臣提出的“二十年口不言兵”的规劝，启用了“负天下大名三十年”的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开始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军事上则主动出击无定河流域，志在摧毁西夏在无定河流域构筑的宥州、夏州、石州、银州、罗兀城、米脂、绥州等城池、堡、寨链，揭开了西夏中期和宋朝50年战争的序幕。

和鹰派的宋神宗不同，嵬名谅祚去世后，年轻的秉常虽然宣布即位，但皇权却被好战且对宋朝采取敌视态度的母亲梁太后掌控。

公元1069年，宋朝政府册封秉常为夏国主，王安石特意对西夏局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册封秉常后，应该严格约束，别让他在边境上再滋事。但夏宋边境上不断有摩擦产生。1070年五月，西夏在距离夏、宋边

界仅10公里的庆州荔原堡北边筑起了闹讹堡，引发双方小规模的战争。八月，西夏再次发兵直逼庆州城下。随后，攻城未克的西夏军队在无定河下游地区又展开了夺取绥州的战役，王安石顺势向宋神宗提出坚壁清野的策略，被采纳并运用到对西夏的作战中。执掌西夏大权的梁太后也加快了收复无定河下游地区的步伐。

由于宋朝采取守势，梁太后仅取得了收复罗兀城的胜利，战争给夏宋边界上的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王安石派人调查后给宋神宗建议，放归西夏俘虏，以宋夏和平来加快自己的改革力度，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宋夏之间的和谈持续了三年多，终因和谈无望而于公元1071年爆发“罗兀城之战”和1082年的“永乐城之战”。

谅祚最初是在梁氏的辅佐下顺利地走上了皇权的巅峰。但他早期的亲宋政策却遭到了梁氏的抵制。梁后苦于手中无权，只能忍让。谅祚去世后，梁太后立即实行他的反汉政策，这又和后来逐渐长大成人的秉常发生了冲突，最终导致宋朝五路大军伐夏。

汉人血统的梁太后执政初始，就受到来自各党项部族的压力。汉人身份，成为她的原罪，也成为她执政的最大障碍。为了抹去西夏王朝上层中间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印象，她在掌握大权后，宣布废除汉礼，恢复了党项礼节。早在1082年，她还让人给宋朝方面写过一封信，信里提出“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表明了她对汉文化的敬重，但为取悦党项族少数上层统治者，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她却下令禁汉礼，恢复蕃仪。

秉常虽然顺利登基，但却由好战的梁太后摄政。宋朝此时也开始在西边和吐蕃、西夏的交界地带兴建大批要塞，宋夏之间的合约被双方屡屡违背，梁太后对宋朝频繁发动的武装进攻或骚扰，加上宋朝政府出台的丰厚赏赐制度也大大地刺激了宋朝各级官员对西夏战争的狂热情绪，

他们主张对西夏发起进攻。

公元1072年，梁太后将秉常的妹妹嫁给了控制青海东部的吐蕃新领袖董毡的儿子蔺逋叱，吐蕃和西夏的关系得到暂时改善。梁太后有个哥哥叫梁乙埋，凭借妹妹成为皇后而逐步高升，最后一直升到国相。

为了更好地控制秉常及保证梁氏家族在皇权分配中的地位，梁乙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秉常。童年、少年时期长期受母亲支配，以及这种包办的政治婚姻，越发刺激着秉常的反叛性格。

公元1073年，北宋宰相王安石给皇帝上书："今其主幼，妇人为政，所任要重皆其亲昵，虽有豪杰无由自进。"这个陈述，说的就是西夏进入公元11世纪70年代后，出现秉常无权、梁太后当政的局势。梁太后在西夏内部奉行蕃礼的举措，使她和儿子秉常的观念发生了冲突。秉常便联合大臣谋取太后实权，密谋暴露后遭到了太后的囚禁，拥护皇族的西夏大将纷纷拥兵自立，向宋朝提出派兵讨伐太后。秉常被囚引起宋朝的高度关注，宋神宗认为这是攻打西夏的最好借口和时机。这时的宋朝经过王安石变法，已初步实现国家富裕的目标。

王安石首先派遣心腹王韶为安抚使兼田市司易司事。王韶带兵打败西夏军队后，占据了临洮一带，在这里设置了熙河路，给西夏带来更大的威胁。从1073年开始，西夏一直发兵攻打熙河路，但都没能成功，王韶乘机指挥宋军南下攻取了今甘肃岷县、宕昌一带，临洮、迭部一带的吐蕃人纷纷归附宋朝，这些"安史之乱"后300多年间脱离中原王朝统治的地区重新回到宋王朝的手里。青海乐都一带的吐蕃人，则成了夏宋双方争取的对象，也就出现了这一地区的吐蕃人既接受宋朝官职，也接受西夏俸禄的情形。

变法和开拓熙河路，激发了宋朝征讨西夏的斗志，王安石也充满自信地对宋神宗说："区区夏国，何难讨荡之有？"被王安石的自信感染的宋神宗也下了征讨西夏的决心。宋神宗发文责问西夏："今闻国主为

强臣所制，不能专命国事，亦未能悬测存亡。”梁太后拒不答复。

公元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梁太后幽囚为借口，兴师问罪，在西至今甘肃临洮、东到今山西西北部的上千里边境线上，分兵五路，攻打西夏。熙河经制李宪统领来自今甘肃西南部的西路军，从西进攻；王中正领兵6万从今陕西神木一带自东进攻；种谔率9万多军队从今陕西绥德出击；高遵裕带近9万兵从今宁夏和甘肃交接的环县一带进攻，刘昌祚率兵5万军队从今宁夏南部的固原一带出击，史称“五路伐夏”。

五路北伐军几乎是齐头并进，东、西两线直逼西夏国都，其中东线的宋将种谔率军深入横山要冲，大败西夏兵，并在无定河边筑起啰兀城。这场小小的胜利使得宋朝一片鼓舞，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也做诗《闻种谔米脂川大捷》，来描述宋人的欢喜：“闻说将军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应知无定河边柳，得共江南雪絮春。”

这时，梁太后对整个战局作出了正确判断。她勇敢地将自己那双没有缠过的脚伸进马镫，先集中十万精兵保住都城四周的要害，然后派出机动兵力切断宋军退路，自己带领守卫西夏都城的精锐部队和训练有序的西夏“麻魁”女兵，看准宋军最精锐的中路部队实施反攻。在今宁夏南部山区，经过一场场激战后，将宋军逐步击退到六盘山地区。梁太后和她带领的“麻魁”取得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西夏其他战场的将士，他们很快组织了反攻，取得了反击的胜利。从此，宋朝再没有组织过这样规模的对夏战争。

取得胜利后，梁太后没有骄傲，而是命西夏西南都统昂星嵬名济给宋朝的泾原路经略使刘昌祚写了一封信。但这封充满和平意愿的信却没让梁太后等到回音。

1083年，战争和宫廷争斗让梁太后产生厌兵之心，加上宋朝、辽国，以及群臣的压力，梁太后宣布退让，她的儿子秉常开始处理西夏朝政，母子之间长达10多年的权力之争画上了句号。

1085年十月，梁太后死去，国相梁乙埋不久也去世。谅祚在世时就允许梁家世袭国相位置，按照谅祚的规定，他的儿子梁乞逋继承国相之位。

秉常：第三代西夏帝王的中原之梦

秉常复位前，就曾多次得到归降宋朝的吐蕃王子木征的书信，木征反对西夏和宋朝之间的战争，希望双方能够和谈。由于西夏曾要求宋朝归还侵占西夏的城池疆土，遭到宋朝的拒绝而使和谈破裂。木征派遣使者八昌郡、丹星等人到西夏，再次撮合西夏与宋朝和谈。秉常即位后，派遣使者谟固哞迷前往开封，表面上是给宋朝纳贡，其实是带去了西夏对当时宋夏形势的意见。谟固哞迷在开封城的大宋皇宫大殿上递上了秉常的上表："我们西夏历代贡奉朝廷，从没懈怠，近年来更是希望和平，然而宋朝却大肆起兵，侵夺疆土城寨，构成双方怨愤，现在我希望朝廷能够显示大义，将侵占的城池归还。"

面对这份绵中带刚的书信，宋朝在回复中对其五路伐夏积极争辩，说攻伐西夏是源自西夏没有恪守双方签订的合约，但依然对西夏赐封赏银，花钱买和平，但对西夏要求归还土地的要求没有理睬。公元1083年七月，秉常再次派使者到开封要求归还西夏失地；十月，西夏使者第三次出现在开封城里，宋朝依然拒绝。

五路伐夏失败，宋朝仅在灵州一战中就损失军队40万人，但没能从中汲取教训，反而认为应该在东线占领的西夏疆域中建筑城堡。公元1082年七月，宋朝派徐禧带人前往陕北一带视察。徐禧主张在无定河谷的银州和米脂之间的永乐筑城，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宋神宗的允许。八月，23万人用14天筑成了永乐城，又在附近河谷地带修建了12座永乐城的卫星堡寨，宋神宗赐名为"银川寨"。宋军修筑永乐城时，西夏方面

就暗中派人侦探，城筑成后9天，西夏统军叶勃麻、咩讹埋等带领6个监军司的20万军队就赶往那里争夺，西夏骑兵抢渡无定河时，鄜延路铃辖曲珍对徐禧说：“这就是西夏的鹞子军，他们渡到河水一半时，我们可出兵。”徐禧没有听这个建议，一向以速度快而著称的鹞子军很快登岸并为后面的大军开辟了道路。包围攻永乐城后，西夏军立即断绝了城里的水源，使宋朝军队渴死的达十分之六七，以致到了喝马粪汁解渴的地步。外面的援军也被西夏军死死阻拦。随后的一个大雨之夜，西夏军队乘机急攻永乐城。城陷后，死亡军民人数达到20多万；加上此前的灵州之战，宋朝军队损失人数达60万，元气大伤，再无力组织对西夏的军事进攻。

西夏方面反而来了劲头。1084年一月，国力得到恢复的西夏开始向兰州发兵，秉常命令被宋朝誉为“西贼首领最为凶黠者”的星多哩鼎领兵10万围攻兰州，但在兰州城外留下了近5万西夏兵士的尸体后，因为粮草供应不足半途而废。然而这一仗让宋朝朝野都知道了星多哩鼎的大名，宋仁宗亲自昭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李宪：“西贼虽已伤败散去，然凶酋星多哩鼎倔强任气，不可不念。”并叮嘱李宪吸取灵州和永乐之战的失败教训，采取防御战略。同时，宋朝下令重金悬赏星多哩鼎的头级，甚至不惜血本派间谍深入到兴庆府刺杀星多哩鼎，但没能成功。

年轻的秉常身上依然流淌着好战的党项人的血，攻打兰州城失败后三个月，他便下令攻打今陕西安塞县北的塞门堡。西夏军在统领伊实巴特玛、副统领密乌玛的带领下，围攻塞门寨，结果伊实巴特玛、密乌玛和西夏军队大首领铃辖在这次进攻中都被宋朝军队击毙。

失败再次刺痛了秉常的心，但也刺激了这位一心想在即位后有所建树的新皇帝的野心。公元1084年十月，西夏军队再次开拔到今宁夏隆德县桃园乡西坪村的静边寨，星多哩鼎带领10万西夏精锐部队南下，志在

将宋军布防在北部和西夏交界的边防线撕开一个口子，好图谋南下进军关中之地。面对宋军的死守，西夏军队久攻不下。就在星多哩鼎极力进攻时，宋朝知渭州卢秉派部将姚麟、彭孙带领宋朝的一支精锐部队连夜出城，绕道夜袭葫芦川，成功后又进入六盘山腹地的瓦亭关，切断了西夏军队的归路，腹背受敌的星多哩鼎这才发现上了当。六盘山腹地里的这场恶战，不仅完全击溃了西夏军队，而且使星多哩鼎命丧于此。

一代战将星多哩鼎的死亡彻底结束了秉常图谋关中的美梦，当年冬天，他就派遣使者前往开封进贡，请求宋朝归还属于西夏的疆土。1086年，秉常去世，3岁的儿子乾顺即位，实权由秉常的寡妻、梁乞逋的妹妹、新的梁太后把控。这是西夏历史上的第二位梁太后，她执政下的西夏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鸽派司马光和两个皇太后的较量

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死于开封城中，这位执政期间一直没有放弃和西夏征战的帝王，给他不满10岁的儿子赵煦留下了没有解决好的宋、夏关系。历史上演了巧合的一幕：宋神宗死后，宋朝政权出现了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第二年，西夏皇权也由第二梁太后执掌。两个女性执掌下的王朝，会出现怎样的较量?

宣仁太后刚掌握朝政就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召集一个人进京来辅佐自己，实施自己的梦想，这个人就是司马光。一代著名文臣司马光在宋神宗时被提拔为翰林学士，是王安石变法的强烈反对者。由于神宗重用王安石，他退居洛阳15年，在洛阳期间完成了著名的史籍《资治通鉴》。宣仁太后临朝后所坚持的“祖宗执法不可变”，和司马光的主张一致。司马光就此被召进京为门下侍郎，第二年被拜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数月间就基本完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司马

光等人提倡对西夏妥协，这就影响了宋朝对西夏的整个外交态度。

1086年正月，已经重病的司马光还为没能彻底废除王安石的新法而感叹，在病榻上仍将王安石的青苗、免役、将兵三法和对西夏关系列为四患，并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就在司马光在病榻上为如何解决西夏问题长叹时，西夏的使者来到了开封。西夏是在举兵攻打金城（今兰州）未能如愿的情况下，派遣使者到开封要求宋朝归还金城、米脂等5个军事要地的。北宋的大臣们围绕这个要求展开了激烈讨论。司马光认为：这些地方，不是良田肥地，不可以耕种，也不是险要的地方，不可守御，应该归还给西夏。他还认为五路伐夏是宋朝引起的，新夺回的这些地方本来就是西夏的。司马光甚至要求放弃熙和路。著名文学家苏辙也强调务必立即满足西夏的要求，否则会引起对方聚兵边境，再次导致战争。而主战派则主张不能对西夏妥协，最后，司马光在主战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下，放弃了自己的主张，金城等地这才没有让还给西夏。但宋朝政府照旧册封乾顺为西夏国主，并将米脂、葭芦、浮图、安疆等寨归还给西夏，西夏先后归还北宋俘虏467人。

和宣仁太后启用向西夏妥协的司马光不同，梁太后重用好战的梁乞逋为相。司马光坚持的妥协政策刺激了西夏更大的野心，世袭国相之位的梁乞逋仗着梁氏家族两代为相积累的势力和“一门二后”的显赫地位，让梁太后授命他执掌西夏军权。他依靠辽国、联合吐蕃，连年兴兵进攻宋朝，将西夏拖进了对宋战争的深渊中。

1087年五月，梁乞逋联结河湟吐蕃首领阿里骨大规模攻宋，双方约定如果夺得熙、河、岷三州归吐蕃，如果夺得金城和定西则归西夏。于是阿里骨带兵攻破洮州，梁乞逋带兵出河州和他会合，共同攻打南川寨、定西城。六月，西夏军队又开始进攻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八月、九月，西夏军队进攻今宁夏南部地区和甘肃东部地区。宋朝武

将主张出击，但执掌大权的文官集团却约束宋军自守，助燃了西夏军的火焰。

双方同样是女性当政，但宋朝方面没有大国固有的底气。连续的退让使梁太后提出了索要横山和兰州以南堡寨的要求，宋哲宗听信了司马光的意见，竟然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再次刺激了梁太后的贪婪之心。

随着军功的提升和执掌军权日久，梁太后和梁乞逋之间的权力较量也开始了。11世纪的最后十年，西夏对宋朝的战争多数是由梁乞逋指挥的，在战争中逐渐掌控整个西夏军权的梁乞逋开始图谋帝位，成了梁太后及西夏帝党们的心患。1094年十月，梁乞逋密谋叛乱，被他的政敌——党项大首领嵬名阿乌、仁多保忠、贝中撒等平息并诛杀全家。穷兵黩武、专权十年的西夏国相梁乞逋时代得以终结。

梁乞逋被杀后，西夏的军政大权集于梁太后一身，这个好战的女性继续推行对宋作战的政策，一心想以军事上的建树超越老梁太后，这种心理使西夏对宋的战争并未减弱。机智多谋且一直致力于西夏疆土扩张的梁乞逋死去后，宋朝方面的忌惮少了，而此时16岁的宋哲宗也已即位。宋哲宗开始启用对西夏采取强硬政策的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向宋夏沿边各路增派兵马，准备主动出击西夏。西夏则亮出梁太后的战旗，双方都在寻找着合适的进攻时机。

宋哲宗在鹰派人物的鼓舞下，终于下达了对西夏开战的命令。1096年二月，梁太后在强敌压境的情形下，再次亲自带兵50万，分兵三路迎击宋军，陕北一带的天幕下又是刀光剑影、烽火连空。梁太后就像一头母雕带着幼雕盘旋于空中锻炼翅翼一样，在这次出征中带领13岁的儿子乾顺一道前往前线，以增强儿子的实战经验并赢得政治资本。西夏军彻底歼灭了金明寨的2500多名宋朝守军，并抢得500多石粮食。这场战斗扭转了双方的攻守格局，从此，宋朝开始防御性地在沿边地带构筑城堡，尤其是开始将重点布防放在今宁夏海原县境内的天都山，在通往天

都山没烟峡的前后峡分别修筑了通峡寨和荡羌寨，不仅逐渐蚕食了西夏在葫芦河和苋麻河两个河谷地带的大片膏腴之地，而且遏止了西夏从天都山南下的势头。

梁太后在金明寨胜利后，于1098年十月再次亲征，旨在摧毁宋朝设在西夏南部边境的一些堡寨。这一回，梁太后带着西夏人发明的最新高大战车“对垒”。在这种能载几百人的先进攻城武器的帮助下，她带着西夏军队连续攻打平夏城13天，终因粮草供给不足和突然间的大风吹折战车，而不得不撤军。

按照西夏法律规定，男子长到15岁就是成人。1099年，16岁的乾顺却依然无法从母亲手中接过皇权，这引起了辽国方面的不满，加上辽道宗对梁太后的专权和好战一直很厌恶，适逢梁太后在一次上书中言辞不恭，结果直接点燃了辽国消灭她的导火索。辽道宗让人在酒中下毒，将梁太后毒死。一杯毒酒终结了西夏历史上第二位梁太后执政的局面。第二位梁太后，这个在西夏政权舞台上活跃了13年的强权女性，走完了自己复杂、坎坷的人生。在辽国的扶持下，16岁的乾顺终于走上了早该属于他的皇位，成为西夏第四位皇帝。

第五章
乾顺亲政：上升的帝国轨迹

一个看似文弱的皇帝，骨子里却充满杀机。游刃于宋、辽、金、吐蕃四方势力之间，乾顺皇帝把西夏帝国带到了巅峰。白色帝国在青藏高原和蒙古戈壁之间，在贺兰山、祁连山和六盘山三座山脉之间，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地理单元。

佛音和战声的轮回：帝国意识形态的初步整合

党项政权在李继迁时期就和辽国结盟。西夏建国后，两个王朝之间虽然有矛盾，但基本处于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中。西夏乾顺皇帝依靠辽国势力剪除了后党，这就带来了双方立场的改变。

拔思母是辽国西南招讨使所辖的一个部落，在辽大安末年，这个部落联合达里底部一起频繁反辽，尽管辽国一度平叛，但他们还是谋反不已。1099年二月，拔思母部和达里底部再次叛乱，辽国请求西夏出兵平叛。在辽国扶持下亲政的乾顺皇帝自然答应了这个要求。

帮助辽国平叛的同时，乾顺皇帝派遣南路都统军嵬名律令到宋朝请和，遭到宋哲宗的拒绝。主张与宋朝修和的乾顺又派使臣到辽国，请辽

国出面调停。宋朝提出了要西夏方面处死屡犯宋朝边境的党项大将嵬名保没和结讹遇，然后才能议和。权衡再三，乾顺还是处死了这两个长期对宋主战的党项战将。

乾顺开始了和平岁月的固国大业。西夏时期，佛教逐渐兴起。乾顺即位后，和此前的西夏国君一样重视佛教，而且在1093年六月至1094年一月，乾顺和他的母亲梁太后一起发愿，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了凉州的感通塔，并在完工时，立碑赞颂。这座如今已成为国宝的石碑上，记述了凉州古佛舍利塔的感应故事和重修此塔的经过。

西夏立国后，甘州成为西夏军事重镇，并改甘州为镇夷郡，在这里设立了宣化府。1099年，梁太后死去，乾顺特意下令在甘州修建了宏仁寺，由于里面塑修了目前中国最大的室内卧佛，也一直被称为“卧佛寺”。该寺在今张掖市农贸市场后面的一个僻静的小街上，佛殿前是康熙年间重修时留下的一副对联：

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

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有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成真空。

关于宏仁寺的修建，有两种说法。甘州成为佛教重地后，先后有几位国师来到这里。1098年的一天，国师嵬咩思能忽然听到从甘州城西南处传来悦耳动听的佛曲和诵佛的声音，便出门循着声音寻访，到了声音所在地，发现是从地下传来，便命人开始挖掘，在距离地表四尺多的地方，忽然发出阵阵金光，仔细一看是一堆金砖玉瓦。搬开这些金砖玉瓦，是一尊精美的卧佛像。国师喜出望外，便倡导在这里兴建佛寺。

另外一个说法是：梁太后去世后，乾顺皇帝通过大做佛事为之祈福，这时，甘州一个叫法净的高僧求见，说他在城西南的甘浚山下，夜晚望见山上有光，并在发光处挖掘出三尊佛像，这三尊佛像都是卧

佛，便把它们献给皇帝，乾顺皇帝于是下令兴建佛寺，并在这里供奉三尊佛，亲自为佛寺题写额匾“卧佛”，民间后来逐渐将这里称为“卧佛寺”。

梁太后在甘州建大寺除了信佛的主观原因外，还有更客观的需求。她当政时期，西夏连年用兵，国库空虚，东与宋、东北与辽的关系都较紧张。农牧咸宜、居住着众多西夏人的河西走廊，既是向西夏提供军马的天然牧场，又是提供粮食的丰足粮仓，更是西夏进行东西贸易的商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1028年占据这里后，西夏经过70年的治理，加强对河西的思想控制显得更加迫切。在甘州创建佛寺，建立佛教中心，东可连凉州，西可衔敦煌，南可通今青海西宁，北可控大漠。这一广大地区的民众，在前凉张轨时有着“世信佛教”和北凉时大力发展佛教的基础，这里进行佛教弘传有着便利条件。

梁太后选择在甘州建大佛寺，显示了她英明的战略决断。大寺不到一年就建成了，也显示了她为战略需要而建寺的紧迫感。她建的这个张掖大佛寺（即宏仁寺），后来被西夏人称为“甘州圣宫”（敦煌为“世界圣宫”），成为西夏佛教的中心之一。

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沧桑，经过几番修缮，大佛寺仍然重檐歇山，古朴雄浑，翘角凌空，壮丽飞动。它掩映在红墙内的古木丛中，自有一番古刹情趣。在漫长的河西走廊中，它是现存最大的一座古寺，更是甘肃境内唯一留存的西夏古刹。

一方面是大肆修建佛殿庙宇祈求和平，一方面又得应对突然降临的战争危机，西夏就这样陷入不断轮回的佛音和战声交织之中。

1100年，总结历代党项人向辽国请婚的各种益处后，乾顺派遣使臣前往辽国为自己求婚，这次请婚的目的显然在这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婚姻稳固刚刚缔结的和好关系；二是表明自己和辽国的特殊关系；三是在辽国派人毒杀他母亲后，向辽表示他不会报复。可是辽道宗没有答应。

1102年六月，乾顺再次向辽国请婚，辽天祚帝没有拒绝，也没立即答应，以商议之后再定夺为由委婉推脱。不久，乾顺第三次派使者赴辽为自己请婚，这才得到辽国的首肯。

辽乾统五年三月，天祚帝将自己的族女南仙封为成安公主嫁给了乾顺，这是夏辽之间的第三次和亲。

消除了来自王朝外部的不稳定因素后，乾顺开始了他的政治文化改革。首先，迈开更大的步伐学习汉地文化。1101年，御史中丞薛元礼给乾顺上书，论述西夏进一步推行儒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列举了一些北方民族遵行儒学治理其辖境的事实，希望乾顺皇帝能够提倡儒学，改变西夏境内百姓安于物质享受的不良社会风气，读书人不愿刻苦读书的懈怠风气。乾顺采纳了这位汉族大臣的意见，开始建立国学，选拔皇亲贵族子弟300人率先入学，并专门设立了“养贤务”来负责国学的物质保障，迈开了西夏大规模推行儒学的步伐，确立了儒学在西夏政治、文化中的至尊地位，也完成了乾顺、仁孝两朝百年盛世的文化基础的夯实及文化人才的储备。

乾顺皇帝还积极借鉴中原王朝封王的办法，开始西夏历史上的第一次封王，逐步实行分封皇族，用以巩固皇权。1103年，他的庶母所生的嵬名察哥成为西夏历朝中第一个受封为王者，被封为“晋王”后，逐步掌管了西夏军权，多次在战争中展示了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1120年，乾顺封宗室中的嵬名仁忠为“濮王”、嵬名仁礼为“舒王”。这两兄弟的父亲嵬名景思在秉常被梁太后囚禁时，就曾竭力保护秉常。秉常复位后，曾打算启用嵬名景思，因为国政大权被梁氏后族掌握而没能实现。乾顺将这两位通晓蕃、汉文字且善于管理的党项人分别授予礼部郎中和河南转运使。

1110年，宋徽宗即位，蔡京开始执掌宋朝大权。转运使、知延州的陶节夫派宋兵进攻西夏设在和延州边境的粮仓石堡寨，掠夺了西夏藏在

这里的众多粮食，并修筑了城堡，西夏出兵争夺失利，反而引发了宋朝向西夏南部地区的进攻。1104年十月，乾顺向宋朝请和，遭到陶节夫的拒绝，于是调集4个监军司的军队，突入宋朝设在和西夏南部边境的泾原路，包围了平夏城，接着又攻打了镇戎军。一直提倡和平的乾顺在这次胜利后，于1105年正月派遣使臣向辽国求援，希望辽国出面斡旋，夏宋罢兵议和。

辽国枢密副使萧良前往调停。萧良对宋徽宗说："辽国皇帝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西夏国主，你们还是请及早退兵为好，并且应退还侵地。"蔡京等人怕激怒辽国，便请宋徽宗派翰林学士林摅出使辽国。仗着有蔡京撑腰的林摅在辽天祚帝面前故意装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说："夏国的人有罪，你们辽国不仅不指责他们，反而为他们请和，这是什么道理？"出言不逊的林摅不仅被辽国赶出了国境，而且还要他转告宋朝，归还侵占西夏的城寨，否则辽国将出兵帮助西夏讨回。接着，辽国派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南院枢密使牛温舒，以宋朝派来的使节失礼为由，前往宋朝再次要求退还西夏领地。迫于辽国的压力及辽、夏联盟的担心，宋朝不仅退还了所占部分西夏领地，还和西夏和解；而辽国也利用和西夏的联盟，在辽末的政治颓境中，维护了自己的大国政治声誉，和西夏一起抑制了宋朝的扩张。至此，乾顺当初几次向辽国求婚的伏笔才出现了答案：一桩看似简单的婚姻，竟能产生如此奇妙的政治效果。

1115年，宋朝再次开始对西夏发兵，这次采取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西夏南部边境逐渐受到蚕食。1116年，宋朝军队包围西夏仁多泉城（今青海省门源县东南），西夏军队困守一个月后，因为粮尽而投降，没想到投降的3000多人却全部被屠杀。乾顺在求和不成的情况下，于当年十一月大举出兵围攻靖夏城（今宁夏同心县南），这次战争采取了当年嵬名元昊攻打牦牛城的战术：从城外挖地道入城，将城内的宋朝军队全部屠杀，以报西夏仁多泉城的屠城之仇。

1117年二月，宋朝七路大军围攻西夏，西夏藏底河城（今陕西省志丹县北境白于山筑的城堡）失陷；六月，宋朝和西夏南部地区接壤的一些地方发生地震，乾顺乘机发兵侵扰；1119年三月，宋朝再次发兵攻伐西夏，嵬名察哥亲自指挥了这场西夏保卫战，消灭了宋朝10多万军队，迫使宋朝接受议和。

“海东青”飞临：血与火书写的“四国演义”

乾顺时期的西夏，和辽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和宋朝在时战时和的状态中完成着向辉煌的积累。就在这时，一支来自东北的军事力量介入了当时辽、宋、夏三国并立的政治格局，开始书写12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四国演义”。这支陌生的闯入者，就是女真。

阿城，位于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东南23公里处，城市不大，却是一座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城。在白山黑水之间，有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阿什河，阿城就位于这条蜿蜒流淌着的小河畔，阿什河满语曾叫阿勒楚喀河，清朝在此设县时就将县名定为阿勒楚喀城，简称阿城。

辽国强大时，一个叫女真的古老部落就生活在阿什河流域。当西夏皇权的更迭发生到乾顺即位但实质性的权力被其母亲梁太后执掌时，女真族中的完颜部落完成了在11世纪末的逐渐强大，部落的酋长叫完颜阿骨打。女真人尊奉的吉祥物是一种小鸟——海东青。据说这种小鸟很敢于和比自己大得多的鸟搏斗并且能回回取胜。完颜阿骨打十分敬奉海东青，从起步到建立金朝，乃至后来女真人的一场场以少胜多的战役，都认为是在这种吉祥鸟的保佑下取得的，因此敬奉其为神鸟。女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崛起，并打败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辽国和北宋，且建立与西夏、南宋三足鼎立的大金帝国，并统治大半个中国长达120年之久，说

明女真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只顽强的海东青。

按照女真族的风俗，每年春季最早捕到的鱼，要送给死去的祖先上供，并且要摆宴庆祝。1112年春天的一天，正在率族人捕鱼的完颜阿骨打突然接到辽国的命令，要他去参加辽国天祚皇帝在春州（今黑龙江肇源县西）举办的头鱼宴。完颜阿骨打匆匆忙忙赶到春州才知道，辽国天祚皇帝来到了春州。宴席中，天祚皇帝乘着酒兴让酋长们给他跳舞助兴，其他女真部落的酋长不敢违背命令，只得离座跳舞。只有完颜阿骨打一个人仍然坐在位子上。天祚皇帝当场勃然而怒，其他酋长也纷纷劝说完颜阿骨打跳舞，完颜阿骨打以“不能跳舞”为借口推辞，惹得天祚皇帝在尴尬的气氛中愤然离席而去，整个头鱼宴不欢而散。天祚皇帝离席后对大臣萧奉先下令，除去完颜阿骨打。萧奉先则说，在女真人的地盘上，杀完颜阿骨打会引起女真部落的动荡。完颜阿骨打因此免遭暗害，且因硬气而赢得了在女真部落中的尊重。

经过两年的厉兵秣马，1114年九月，完颜阿骨打起兵攻打辽国控制下的宁江州，揭开了女真和契丹大规模战争的序幕。宁江州战役，不仅是女真人起兵反抗辽的第一次胜利，同时将女真士兵从2 500人扩充到3 700人。女真的胜利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引起了辽国的征伐。1114年冬天，宋朝发兵攻打西夏时，辽国也集结10万人在出河店(今吉林省前郭旗八郎乡塔虎城)准备消灭女真兵，女真人的军队和契丹军队的人数比例是1：27。

东北的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战争在东北地区的两个少数民族之间展开。完颜阿骨打用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梦卜之说来稳定和鼓舞军心，说自己得到了神的暗示，连夜出兵必能大获全胜，否则定有灭顶之灾。三千多铁骑乘风踏雪，直扑出河店，第二天拂晓赶到出河店，给没有任何准备的辽兵以措手不及的军事打击，辽军溃败，3 700女真人破敌10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取得胜利的女真人

和辽国争夺北方广袤大地上的草场时，西夏和宋开战，整个北中国陷入了契丹、女真、党项和汉人各自建立的政权之间的混战，一部血与火书写的“四国演义”登台亮相。

1115年正月，开封府内酝酿着一场兵事：大宦官童贯派遣熙河经略刘法带领15万人从河湟一带出兵，秦风路经略刘仲武带领5万兵从会州接应，联手夹击西夏设在庄浪河谷口的卓啰和南监军司。战争爆发后，西夏军队奋力抵抗。就在童贯决定发兵攻打青藏高原的西夏守军时，1115年正月，完颜阿骨打在东北的阿城正式称帝，国号金。

和西夏开战以来，宋朝的兵力被大量牵制在西北地区，宋太祖时“收复燕云”的遗愿，成了宋朝后代皇帝努力但未能达到的目标。当金构成对辽很大的威胁时，远在中原的宋朝因为辽横在中原和东北中间，并不明了辽的北边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时，一位叫马植的辽国人投降到宋朝，并得到了宋徽宗的接见。一直在观望辽的国势、并寻求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宋朝政府这才知道，兴起的女真已经成为一把尖刀，插在了辽的背后，宋朝因此看到了联金攻辽的曙光。

由于宋金之间没有陆路通道，宋朝派人从山东登州出发，选择海路北上，与金谈判攻辽。完颜阿骨打听取了宋朝想缔结盟约的意见后，明确表示愿与宋朝结为联盟、联合灭辽。1120年，北宋在无法消灭西夏的情况下，转而与西夏和谈，双方签订和谈条约，宋夏之间暂时实现和平。

稳住西北局势后，北宋政府派马植再次出使金国，向完颜阿骨打提出双方联合灭辽且宋朝要收复“燕云失地”的建议。这时的金朝在对辽战争中已经形成优势，完颜阿骨打在和北宋联合的过程中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提出包括要宋朝每年给金朝大批贡奉等一些较苛刻的条件。宋徽宗收复“燕云失地”心切，同意将当时北宋每年向辽朝缴纳的货物全部转给金朝，金朝同意北宋收回“燕云十六州”。这就是金

宋关系史上的“海上之盟”。

得知金宋之间达成“海上之盟”，乾顺皇帝立即派人前往辽国，约双方联手发兵攻打宋朝，辽国方面没有允许。西夏失去了辽、夏结盟共同抗击宋、金联盟的机会，导致宋、金联盟很快攻到自己的门前。

1122年二月，金国大将谋良虎在一个月内就攻破了辽的中京和西京。三月，乾顺发兵五千前往救援。西夏军队还没离开国境，就听说西京被破，只好班师。辽国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意志消沉，整日狩猎。文妃萧瑟瑟作诗讽谏：

勿嗟塞上兮暗红尘，
勿伤多难兮畏夷人。
不如塞奸邪之路兮，
选取贤臣。
直须卧薪尝胆兮，
激壮士之捐身。
可以朝清漠北兮，
夕枕燕云。

天祚皇帝看了这些诗歌，不仅没有醒悟，反而心生恨意，后来竟下诏诛杀了文妃的姐夫、朝廷重臣耶律挞曷及其妻子，并逼文妃自尽。这使得文妃的妹夫、辽南军都统耶律余睹率军投奔女真，并借来金兵攻打辽京。

面对女真人的进攻，天祚帝统兵70万御驾亲征。结果辽军大败，天祚帝以一日狂奔500里的距离，创下了中国战败皇帝的逃跑纪录。

得知天祚帝往阴山一带逃亡，1222年三月，乾顺派大将李良辅领兵3万前往救援。西夏军队在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

岸）遭到女真将领完颜娄室的阻截，无法前行。1223年五月，金军都统领斡鲁命令斡离不、银术率军袭击在阴山避难的天祚帝，天祚帝派人向金军呈送国印诈降，以作缓兵之计，然后向西逃亡。

乾顺得知天祚帝即将抵达西夏边境地区，便派遣使臣前往迎接天祚帝到西夏避难，但被金军中途拦阻。阿土罕带领骑兵前往救援，也遭到女真人的伏击。六月，为了表示对乾顺的谢意，也为了寻求西夏的帮助，天祚帝在自己都不能保证安全的情形下，派使臣前往西夏，封乾顺为夏国皇帝，尽管这个封号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但却是西夏自嵬名元昊建国后，第一次得到辽国的正式册封。乾顺看到辽国将亡，虽接受册封后却按兵不动。就在这时，金朝方面也派出使者前往西夏，以辽国西北一带的疆土诱使西夏归顺金朝，乾顺在这种大势下，决定臣服金朝。

1124年正月，乾顺派遣御史中丞芭里公亮向金朝正式称臣。金将辽国西北地区的大片土地划给了西夏，使西夏的疆土发生了巨大变化。三月，为了答谢金朝的赐地之恩，乾顺再次派遣丞芭里公亮带着西夏特产出使金朝。乾顺在上表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一）不再臣服辽国；

（二）如果辽国天祚帝逃到西夏境内，当即抓捕并送给金朝；

（三）以后将对金朝进贡、接受金朝的封赐。

接到西夏上表的金朝新皇帝太宗完颜晟，在一个月后即派遣使臣阿海、杨天吉到西夏赐诏书，因为这次时间发生在金朝天会年间，这次夏、金议和史称“天会议和”。

1125年二月，天祚在山西应州被金兵包围，他在无法逃身的情况下，对金兵说：“我就是大辽国天祚皇帝。”金兵要拿绳索捆绑他，他大声斥责：“放肆，我乃天子，你们敢捆我？”金将军完颜娄室喝令军士后退，自己来到天祚面前，翻身下马，跪地作揖并说：“请陛下下

马！”就这样，天祚一个人在临死前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耶律阿保机打下的百年基业，就这样从马背上跌落进了历史。从李继迁时期开始的辽、宋、夏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随之宣告结束。

女真飓风：宋夏之间的“第三者”

几年的往来，金国君臣对宋朝军事实力已经心中有数，而富庶的中原对女真人的诱惑是无法抵挡的。1125年，金灭辽后，开始将征服的眼光瞄准北宋。当年十月，金国开始了自其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分兵东西两路攻打宋，拉开了宋金大战的序幕。

金军将主力放在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军，西路军仅女真兵就达6万之众，在女真人横扫北中国草原的时代，6万女真军完全成为一只令人望而生畏的打击力量。仅太原之战，金的西路军包围太原长达9个月。经过240多天的苦守，宋军将领王禀最终未能挡住金国大军，背负着供奉于太原祠庙中的宋太宗画像投汾河自尽。

女真人的东路军很快就兵临开封城，京师禁军在女真铁骑前显得不堪一击。宋朝只得整编残余败军坚守开封城墙，一个多月后，宋朝的十万余勤王军才汇集开封城下，金军被迫撤军，金军对宋朝的第一轮冬季攻势结束。

攻破太原后，金军西、中两路军共6位元帅汇集一起，召开了军事会议。前线总指挥完颜宗翰坚持直接拿下汴京，灭亡宋朝。1125年十一月末，10万金军从东、西两路分别渡过黄河，再次包围开封。一个月后，汴京被攻破，宋钦宗出城乞降，北宋政权被摧毁。

在金、宋交锋时，乾顺乘机于1126年三月，出兵收取了金答应赐给的天德、云内、武州等地，并袭取了震威城（今青海乐都县）。金朝又将从宋朝手中劫取的陕北、内蒙古一带的麟州、府州和丰州割给了西

夏，乾顺立即派人在这里设官置守，西夏版图大大扩展。

1127年三月，金划分了和西夏的边境：以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为界构成西夏东界，南边以今陕西米脂、宁夏海原县境内的萧关、甘肃靖远县为界。就在此时，宋朝也派出使者谋求和西夏议和。乾顺利用后三国鼎立的良机，出兵收复宋朝在西夏境内修筑的城堡，并占领了宋朝西北的大面积土地。1139年六月，56岁的乾顺驾崩。

刀锋上的光：马背上的呼啸惊醒青草的梦

战争是一面镜子，考量着双方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检验着各自的武器制造技术和国防力量。经济实力、疆土面积、兵士数量等方面，宋朝都处于绝对优势，为什么战争总趋势却呈现一边倒态势呢？究其主要原因，是宋朝决策者一直重视南方富庶之地的控制和工商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对骑兵的温床——草原的占据，没有培养出作战能力强的骑兵部队。

19世纪的法国皇家院士让•布封曾经这样说过：“人类迄今为止所能从事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豪迈而剽悍的骏马。”马进入人类社会五千年的历史中，是人类社会进展中最辉煌、最有成效的五千年。古希腊人认为，马是海神波塞东的影子，是神送给人间的礼物。中国人认为，马是贵兽，是龙的五世孙。无论东西方，对马的推崇和敬重是一致的。就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样，马也是择地而育。党项羌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一直对马匹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强大的需求，也有着精良的驯马、养马和用马的技术。

党项羌是在马背上成长、壮大的部族，西夏也是在马背上命名的帝国。早在青藏高原上时，他们就依靠青海骢这种高原神驹驰骋在雪山草地之间，亮出了一个族群最初的面孔。

隋唐时期，党项羌先民生活过的青海湖一带的马匹有“龙驹”之称。党项羌进入黄土高原后不断扩张，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其实也是对马场的争夺。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流徙途中，相依为伴的战马成了他们忠实的朋友。拓跋思恭在马上一呼，即聚集了党项羌血性男儿，将马背上的身影留在挽救大唐危局的征程中。李继迁竖起抗宋自立的大旗时，他将部众带进四面沙碛、但里面水草丰美的地斤泽。要复兴党项羌，最主要的利器就是要拥有精良的马匹和丰美的草场，那天，面对先祖的画像，李继迁对跟随自己的部众说：“我党项祖先长期居住在西边，一代代先祖留下口训，那里有上好的草场和天赐的良马，我们为什么不回到那里，却要将眼光限制在眼前的荒漠之中呢？”从此，党项羌复兴之路其实就是一次次争夺马场之路，然后通过设立在夏宋边境的榷场，向宋朝输出马匹以换取自己所需的物资。

马上看壮士、月下观佳人的时代，马成了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和人文资源。不仅普通的兵士在马背上能成就一个军人的荣誉，内地的帝王同样和草原上游牧部族的部落首领一样，希望通过马背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党项羌凭借自己的马上优势，雄踞西北长达数百年，他们在和其他游牧部族及中原政权的交战中，更加清楚马及马上的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大规模的机动骑兵是战场上制胜的王牌，军事上的优势使得平原上的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在长期的战争中，他们总是胜利者，因而会引起更多的仇视。故而，战胜的他们是尊贵而高傲的，而战败的他们又是那么的自卑。这种复杂的心理，使他们不间断地改良马上的装备，跨过生存区域向中原政权统治下的地域不断发起进攻，成为大宋王朝的一大威胁。

元昊建国后，更是看重马在西夏立国大业中的重要性，他那骑着快马、在长途战中实行换马不换人的党项职业军人组成的“铁鹞军”，就是以身下跨骑作为取胜法宝的。

西夏版图稳定后，境内的宁夏南部地区的六盘山马、祁连山下的山丹军马、黄河首曲的玛曲马、青海湖一带的青海骢、青海河湟谷地的大通马、青藏高原上的青藏马，这些名种马相继走进西夏军队中，为西夏立国和强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顺应马背王朝的管理需要，元昊实行了军事化的政治构架，在正、副都统军以下设置了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使禁官等，在低级的军事官员中使用了不少汉族军人，使各部酋帅军权不能完全自专。1033年，元昊仿照宋朝体制，将全国的军政部门分为13司（后来增加到15司、16司），直接涉及军事的部门有4个。在这种军政合一的政权体制下，西夏全民皆兵，男子15岁以上就成为一名军人。西夏著名法典、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成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西夏男子15岁以上就到了参军年龄，家中有两个男孩，就得有一个参加正规军队，一个随军做杂役。战争发生时，6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性，都得自己带甲衣弓箭随军。《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还规定：西夏地方部队允许女性参军，称之为“麻魁”。

工业革命以前被称为“木材时代”，木材被广泛地用作燃料和工具，只有少量的煤被开采，铁是昂贵而稀少的。工业革命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冶铁炉中以煤代替木炭。西夏拥有比较成熟的用煤技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制陶，这也是西夏陶器能成为中国陶器史上的瑰宝的一个原因。同时，在武器的锻造上，因为有了煤炭的使用，其武器装备很快达到了和宋朝相当的水平。西夏定都兴庆府后，曾经做过党项羌政权政治文化中心的灵州有些旁落，然而，随着这里的煤炭开发和当地适于烧制陶器的土质被发现，灵州成了西夏的瓷器中心，因为缺少金属资源，瓷器得到大量使用。西夏人在烧制陶瓷的过程中，也逐渐掌握了冷锻硬化工艺：锻甲时不用火，采取冷锻；锻刀剑时，则通过冷水剧烈降温，提高钢化程度。正因为掌握了持续高温与冷锻硬化工艺，所以西夏的兵器

非常犀利，尤其是当时负有盛名的“夏国剑”。宋朝的王公贵族、文士侠客、商贾庶民，都以得到西夏剑为荣。

西夏的军事装备到乾顺皇帝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乾顺的庶弟嵬名察哥是一位性格刚毅、精通兵法的将领，他十分重视武器的改良并将其装备到军队中。在乾顺开始亲政时他就提出：党项人打造的特种骑兵部队“铁鹞军”适于驰骋平原，党项人打造的特种部队“步跋子”则适于穿行在险要山谷间，然而一遇到宋军的“陌刀法”，骑兵就难以驰骋，遇到从西夏传到宋朝经过改良发明的“伸臂弓”，“步跋子”就难以发挥作用，这就使西夏军事设施能够做到守常，但不能防御变化，而用兵贵在随机应变。党项羌本身就存在弓箭射击方面较弱、刀剑尺寸较短的缺点，应该经常选派国内蕃、汉壮士，让专人教他们练习射箭，让这些壮士平时带着武器种田，遇上战争就参加，拿党项羌人的短处，换取宋朝军队的长处，那么，西夏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乾顺皇帝采纳了察哥的意见，改进了这些装备，不仅使宋朝一度学习西夏的武器制作技术，连其他少数民族也不断学习。

嵬名察哥提到的“伸臂弓”，在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记载，即“神臂弓”。“神臂弓”其实是一种轻型弩机，便于携带，可一人发射。它用坚韧的山桑木为弩身，坚实的檀木作弩梢，铜制的扳机，麻绳做的弦，轻巧坚劲。在300步（约合465米）的射程内，可以穿透两层铠甲，是11世纪到13世纪早期中国单兵武器的巅峰。党项人的“神臂弓”传入中原后，得到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后来成为宋朝兵器中很重要的一种。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就曾经仿照“神臂弓”制造出威力更大的“克敌弓”，大败金朝军队。成吉思汗也对西夏的弓箭制造很感兴趣，曾经派人找到一个叫小丑的党项弓箭制造工匠，用他所造的弓箭装备军队。然而，成吉思汗没想到的是，西夏人还秘藏了一种威力更为强大的连环弩，一代天骄就几乎命丧在连环弩射出的毒箭下。

宋代，火药的炼制及应用得到了很大推广。然而，当宋朝的火药被大量用于盛扮开封城的烟花胜景时，西夏派到开封的间谍带回了火药制作的工艺，并被其武器专家用在了铜炮中。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远距离武器。

党项人在早期的战争中更多使用的是旋风炮。炮手200人，每人配置一门旋风炮，固定在骆驼鞍上，可以发射拳头大的石头攻击对方。这实际是一种围绕炮轴转动、可以任意变换方向、调整射击方位的抛石机，它灵活机动、射程较远，很有威力。西夏的旋风炮有两大特点：一是机动性强，安装在骆驼鞍上，由骑兵发射，转移方向速度快。相比辽、宋火炮的炮由步兵发射，机动转移速度比较慢的特点，西夏火炮在当时已经走在时代前列。二是可以任意调整射击方向，打击力强，宜攻宜守。

第二梁太后带兵攻打平夏城时，随军带去了一种新型攻城的武器战车："对垒"战车，这种攻城专用的巨型战车，因与城墙等高，又称"高车"。它的两个车轮又高又圆，越过沟壕不致滞陷，一次可以运载上百名士兵填壕而进。

整个西夏王朝的武力发展呈现出一种上抛物线状，乾顺时期则是这条抛物线的最高点。

乾顺在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走着该战则战、该和就和的灵活道路，通过杰出的外交和军事才能，将西夏版图扩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给儿子仁孝皇帝留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到仁孝皇帝执政时，西夏的版图扩张与巩固达到了极致：出现了东西1500公里，南北超过2000公里的帝国版图，它的北端到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甚至更远一点的巴里坤草原，最北边的军事中心是今天内蒙古西北的额济纳旗的黑水城；西北边界在甘肃和新疆交界一带，最西北的军事或政治中心是今天甘肃的安西一带；西南边界延伸到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军事中

心设在今天青海的贵德县；东边疆域一直延伸到山西和陕西交界的晋陕黄河大峡谷一带，军力强大时，一度还进入山西省境内。

白色帝国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和内蒙古北部大戈壁之间，在贺兰山、祁连山和六盘山这三座山脉之间构成的“山”字形中，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地理单元。

第六章
辉煌中的死亡：游牧英雄主持的汉化改革

西夏，一个游牧起家的帝国，难免被理解为一个尚武、剽悍、粗犷的王朝。其实，她在诞生之前就执著地向东，向中原，向汉文化靠拢。仁孝皇帝，一个不折不扣的孔圣人的粉丝，把西夏引上了全面汉化之路。一个文官政治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泯灭了党项人的血性，也掘掉了帝国的灵魂。

仁孝文治：遍地学府汉地风

1123年的乾顺皇帝是开心的，这一年六月大辽王朝天祚帝派使臣前往西夏，封乾顺为夏国皇帝，这是西夏自嵬名元昊建国后，第一次得到辽国的正式册封。同在这一年，西夏皇宫被一股喜气笼罩：曹妃生了儿子，给40岁的乾顺皇帝送去了令他兴奋不已的礼物。按照西夏史书记载，这个男孩出生时，屋子里充满了彩色的光芒，乾顺的女儿成安公主非常喜欢这个异光中降临的弟弟，向乾顺皇帝请名为“仁孝”。

乾顺56岁驾崩时，仁孝已经16岁了，和他的爷爷、父亲因为幼年即位而使西夏陷入母后摄政的局面不同，仁孝一即位就开始亲政。他汲

取爷爷、父亲执政时后党谋位的教训，在办理完国丧后，即颁布一道圣旨，尊任氏、曹氏两位母后为两宫太后，但不允许她们干预朝政。

1140年二月，仁孝册立党项大姓罔氏的女子为皇后，这个聪敏贤惠、知书达理的党项大姓女子登上后位，不仅帮助仁孝在后来的政治决策中起了作用，还加强了皇族势力，避免了第二、第三代皇帝在承领皇权时的后党执政局面。封后三个月，金朝就派遣使臣册封仁孝为夏国王；1141年八月，西夏群臣又集体上书，请仁孝尊为“制义去邪”皇帝。

仁孝即位初期，北宋灭亡，宋室南迁，中国的大势进入南宋、女真人建立的金和党项人百年苦心经营的西夏“三足鼎立”的局面。三个王朝之间开始了微妙的外交关系：夏被金包围，仁孝采取附金和宋的国策，而且这个国策在仁孝54年的执政期间，没打折扣地被予以实施，同时，仁孝并没有放弃和南宋王朝的交往，尤其是对他深深景仰的儒家文化，开始了大规模的吸收和融合。

1143年三月，兴庆府突然发生了强烈地震，不仅震级较高，而且余震持续一个多月，造成京城内及周围地区官邸、民房倒塌，城墙断裂，人畜伤亡上万。一个月后，夏州一带又发生更为强烈的地震，地下喷出的黑沙埋没了民房、林木、田野，人畜死亡不计其数。连续两场大地震，动摇的不仅仅是房屋和建筑，更是人们对新皇帝的信心。御史大夫苏执义向仁孝皇帝进言：京城和夏州相继发生地震，这是上天给陛下的警示，您不可不察。于是，仁孝亲自出行，深入灾区视察，看到地震灾情后，他下令，这两个地震灾区因遭地震地陷而死者，家中2人可免税3年，1人可免税2年，伤者可免税1年，等等；倒塌的房屋和城墙则由朝廷责令有关部门负责修复。灾情带来了粮食绝收，一些灾区的民众群起为盗，州兵镇压也无济于事，请求朝廷出兵镇压。仁孝再次采纳苏执义的建议，于八月颁布了赈恤法，命令各州按照灾荒的轻重程度赈恤灾

民。这些措施使仁孝渡过了上任来的第一次危机。

随着西夏王朝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一些贵族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开始沾染宋朝地主贵族的敛财习气。仁孝的叔叔就是一个典型。他因为助乾顺有功，借拥有重兵而居功自傲，抢夺民间宅院为自己建造府邸，70多岁仍然妻妾成群，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一时成为党项贵族效仿的对象，引发党项上层贵族的攀比风气。仁孝下令制止了这种不正之风。当时，一些发生饥荒的地区，民众生活艰难，加上地震带来的经济苦难，各地灾民暴动，其中最大的是西夏北部党项部族起义，仁孝命西平王任得敬统兵镇压了起义，终于将即位后的第二个社会危机消除。

西夏早期的土地、水利设施等随着其社会制度的逐步建立，出现了私有化倾向。仁孝时期，制定和颁布的《新法》明确了土地的私人所有制，这是西夏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皇帝和高层贵族成了土地的最大拥有者，武将则通过军事扩张为自己争得领地，一些高级文臣则强迫兵民为自己去侵耕边境地带的土地。那些普通的民众，只有靠开垦荒地来为自己谋取耕地，这种方法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西夏的《天盛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导致西夏境内的大片牧场被损毁、森林被砍伐，许多原本林草茂盛的地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制合法化后，仁孝开始仿照宋朝的政治结构，改革政权机构，从法律上确立官员的等级制。

1144年六月，仁孝皇帝下令各州县仿照宋朝办学，设立学校并实行科举考试；甚至在宫廷设立“小学”，专门让宗室贵族中7～15岁的子弟全部入学，接受儒家教育，自己还常常带着皇后去“小学”察看教学情况。

1145年八月，仁孝皇帝又模仿宋朝设立太学，根据学生的成绩优劣，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赏赐；通过科举形式来选拔和任用官员，确立了西夏的科举取士制度。1146年三月，仁宗作出了一件令南宋王朝的儒

家知识分子们也吃惊的事情：他亲临太学祭奠孔子，并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孔子尊到帝位的皇帝。随后，又下令各州郡建立孔庙、祭祀孔子，让百姓顶礼膜拜，这是西夏向中原学习汉文化迈出的最大一步，党项人身上的凌厉杀气逐渐从这个王朝的肌肤中淡去。

1148年三月，仁孝又下令设立内学，亲自挑选儒家学派的著名人士主持授课，进一步推行儒家文化。仁孝对汉文化的引进与推崇，开始将西夏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向了黄金时期，为西夏赢得了和平发展的空间。仁孝皇帝不仅重视和宋朝的文化交流，还于1154年九月派人前往金国，请求在西夏和金国交界处（金国境内）设立书市，出售西夏国内翻译的有关儒、释、佛方面的书籍，这个举措得到了金国皇帝完颜亮的允许，为两个民族政权之间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道桥梁。

1161年一月，仁孝完全借鉴宋朝，设立国内最高学府翰林学士院，将那些还未走上仕途的学子纳入其中，给他们为西夏皇权出谋划策的机会，一旦国内的官职出现空缺，就从翰林院中进行选拔，使翰林院不仅成为皇朝的智囊团，更成为文官的储备库。

遍地塔影：帝师与藏传佛教的东传

1990年11月末，几个不法之徒用炸药炸毁了拜寺口沟内的一座古塔，这是迄今为止西夏唯一有具体纪年的古塔。废墟上的琉璃构件、方砖等说明了它的建筑规格与规模。一套用西夏文印制的9卷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和其他几件有价值的西夏文物，在盗墓者的忽略中被拂去历史的尘埃，展现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其中，《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为活字印刷最早出现在中国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它是目前所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的海内外孤本，虽为西夏文，却是藏密经典的最

早刻本。

方塔仅仅是西夏众多古塔中一处，方塔所在的山沟因为西夏古塔林立而被称为百寺口，沟口有著名的西夏双塔，是西夏帝师、藏地高僧热巴一度主持寺务和修行的地方。它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塔中十字折角束腰座塔源于藏传佛教，是藏传佛教在宁夏地区传播的一个具体实证。塔后的10排60座喇嘛塔林显示，至少有60位藏传佛教高僧在这里译经、弘佛、讲学、修行，并在此圆寂。

在西夏王陵博物馆二楼，有一个被缩小的倾斜古塔复制品，这就是被誉为“宁夏的比萨斜塔”的宏佛塔。1990年，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在银川市北20公里处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东面的一个废寺（宏佛塔）里进行勘查，发现这里的7尊藏彩绘泥塑佛头像，或双颊流泪，或单面流泪。这些流泪的佛像打破了千百年来“佛不流泪”的神话，那滴滴清泪的因由何在？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佛教在西夏大地上蔓延而过，无论是距离宫廷很近的皇家寺院，还是深山僻壤中的禅院古寺，无论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西夏内地，还是受游牧文化影响的内蒙古草原、祁连山下的河西草原，以及青藏高原上的甘南草原、青海果洛大草原，都遍布着佛教建筑，里面出入着虔诚的僧人或信众。佛教顶峰时期，在西夏大地出现了“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百者，无不必葺”。意思是说，从皇都近郊到偏远的荒野山林，到处是寺院的遗址，里面只要超过百座佛像的，就一定进行修葺。所以，后人曾用“云锁空山夏寺多”来形容西夏王朝寺院之多。

仁孝时期，西夏的佛教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藏传佛教开始走进王朝的内部，这也是藏传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开始。

西夏大规模接受藏传佛教应该是仁孝的文治时期（1140～1193）。形成于这一时期的西夏文《新集金碎置掌文》中记载：“弥药勇健行，

契丹步行缓，羌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可见，藏民敬奉佛陀和上师的文化传统，开始被西夏政权上层引入，仁孝皇帝就首先尊礼藏区高僧为上师。

澜沧江的上游流经青海省最南端的囊谦县，在该县觉拉乡境内是一种恬静而舒展的流态，河流南岸是青灰色的觉扎神山，和周围被绿草覆盖的其他群山明显不同。在藏传佛教中，有着这样的说法：觉扎山是莲花生大师加持过的神山，山上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其中建于800多年前的西夏古寺——觉扎旧寺是其中之一。

藏传佛教在藏地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个大的支派，和西夏王朝最先产生关联的是噶举派，该派的祖师玛尔巴曾三次去印度、四次去尼泊尔学习佛教密法，这就是后来闻名全藏的密宗“那饶六法”。它要求学习者必须清静心境，避世苦修。凡是修炼这种密法的僧人，都要依照印度习俗穿着白僧裙。因此，噶举派又被称为“白教”。

噶举派在玛尔巴的再传弟子塔波拉杰时期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塔波拉杰的弟子都松钦巴[①]首创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派。相传他能畅通无阻地穿越岩石，被后人尊称为“喇嘛扎巴”，意思是“穿越岩石的上师”。

鉴于都松钦巴在藏区宗教界的影响，1159年，仁孝皇帝专门派人前往藏区，迎请都松钦巴来西夏传教，此时的都松钦巴年事已高，一则担心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二则当时的西藏地区还需要他弘法，于是，他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格西藏波哇前去西夏传教。这位得到都松钦巴亲传的一代高僧，以自己渊博的宗教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折服了当时在西夏的许多高僧和西夏政权的上层人物，被仁孝皇帝

①相传他能够知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藏语中将“三世”称为“都松”，将“知晓”称为“钦巴”。

奉为上师。1187年，78岁的都松钦巴在今拉萨西北70多公里的堆龙兴建了著名的楚布寺，仁孝皇帝派人送去了不少皇室赏赐物。这时，噶举派已经在川藏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影响与寺院分布网络。在西夏境内也被当作主流宗教允许传播。

噶举派发展到塔波拉杰时，分出了“四大八小”的支派，拔绒噶举就是其中一个大支，其创始人是塔波拉杰的弟子达玛旺秋。

和西夏历史上为了皇权不惜夫妻反目、母子反目的情况不同，对仁孝皇帝感情专一的罗皇后，在丈夫过世后，连续大做佛事，显著地推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

在印施佛经的过程中，罗皇后也没有忽略本族文化，她注重用西夏文印施佛经，黑城出土的西夏文《佛说宝雨经》、《佛说长阿含经》等佛经卷首经名下，有一块长方形的押捺牌记，里面有5行西夏文，其中就记载了罗皇后新写西夏文《大藏经》一藏，已入寺内经藏中永远读诵、供养的事迹。誊写数千卷的《大藏经》，并非易事，从罗皇后下令让人抄写西夏文《大藏经》的事情也可看出这位皇后对佛教的尊崇。

仁孝皇帝去世后，即位的纯佑皇帝依然秉承着仁孝时期敬奉藏传佛教的习俗，迎请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来西夏传教。这些高僧大德中，对西夏佛教和藏传佛教体系中噶举派产生重大影响的热巴就身列其中。

1198年，从青藏高原腹地到兴庆府的漫长路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僧侣队伍，绛红色的僧装成为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一道风景，在藏区已经声名鹊起的热巴受西夏第六位皇帝纯佑的邀请，前往西夏开始他31年的修建寺院、翻译佛经、传播藏传佛教的生活。他在西夏负责修建了很多寺院，翻译了大量藏传佛教经典，他被西夏国王奉为德师、帝师、国师等。直到蒙古灭夏，热巴才返回藏地。

回到藏地的热巴授意他从西夏带去的弟子热巴噶布修建一座寺院，这就是坐落在澜沧江边的觉扎旧寺。热巴还把在西夏的经历写成了书，

即《噶本》。

在进入文治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集中力量用西夏文翻译了3600余卷大藏经，还大量刊印西夏文、汉文、藏文佛经，成为历代王朝中屈指可数的使用多种民族文字刻印佛经的政权之一。在佛教组织制度上，西夏亦多独创，不仅把前代的功德司发展成地位甚高的三个功德司——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而且还先后封授了一批国师，特别是出现了帝师之称，这个职位的设置，在中国历史上属首次，对元代帝师制度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影响。

西夏帝师之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藏传佛教在内地普及的最高政治保证，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次以这样高的层面实现了藏传佛教和其他教派的有机融合；在继承了吐蕃社会僧俗双轨统治传统的同时，也以抬高佛教领袖地位的举措。从史学和佛学的角度看，西夏帝师之设，不仅修正了中国帝师之称始于元代的传统看法，也使帝师一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僧人地位的提高，促使西夏寺院经济的发达，并使那里成了民众借贷的主要去处之一。在黑城发现的一份西夏文书上这样记载：一个叫梁功铁的党项男人于1194年正月二十九日，冒着凛冽的寒风走进黑城的普度寺。他不是来这里乞求神灵保佑的，而是向这里的僧人梁任麻以每月1斗2升的高额利息，借了1石小麦、10石大麦。按照西夏法律，他还必须带上妻子或儿子一起来，他们也要作为同借人在契约上画押。这样在梁功铁发生意外时，可以夫债妻还或父债子还。在黑城出土的借贷文书中，相当数量的借贷人都是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借贷的。妻子或儿子陪丈夫借贷，这是西夏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独特方式。同时，不难看出西夏僧人的富足，田产经营已成为寺院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藏传佛教的引入，使西夏佛教的成分更加复杂。西夏佛教前期主要以翻译汉文佛经为主，中后期则越来越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使藏传佛

教在西夏境地内异军突起，西夏成为藏传佛教形成初期发展到最北面也是最东面的一支。这也为西夏文明添加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元素。

一对汉人父女搅动的西夏政局

在今宁夏海原县的天都山地区，西夏曾在此集结王朝的5万职业军人组成精锐之师。元昊还一度在天都山修建行宫。宋朝军队于1099年占领这里后，用4个月的时间，在天都山脚下的一块平阔地上，修筑了一座边长1200步、周长约4.6公里的土城，皇帝赐名“西安城”，这个叫法比现在的陕西省城西安城早了几百年。

1126年九月，西夏乘宋、金交战之机，重兵围困西安州城，此时的西安州城的州判是一个叫任得敬的汉人，他在对局势作出一番判断后，率领军民献城投降，被夏崇宗乾顺封为代理西安州知州。宋朝精心打理了27年的西安州城，从此成了西夏人的重要军事基地，甚至一度成为从其南境进攻宋朝的前方军事指挥所和大本营。

西安州之所以出名，除了在西夏行政版图和军事版图中处于重要位置外，还和这里走出了一位皇妃有关。这个古城走出的汉家女子，几乎颠覆了西夏王朝的根基。

1120年，任得敬的夫人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任得敬投降西夏时，女儿已经6岁，她根本不知道这些陌生的、说着她听不懂的党项语的西夏军人攻取西安州城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命运。1137年，任得敬将自己17岁的漂亮女儿进献给乾顺皇帝，这位长袖善舞、莺语娇颜的汉家女儿从此走进了离西安州城300多公里、许多漂亮女子毕其一生也走不进的西夏皇宫，成了西夏历史上又一位被册封为后的汉家女子。任得敬的女儿因为庄严寡言而深得乾顺宠爱。任得敬深知一个外族要跻身西夏重臣之列，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他首先拿钱财买通了御史大夫芭里祖仁，

策动芭里祖仁向乾顺进言："古者天子取后，藩国来媵，诸侯一取九女，盖奉宗庙，广继嗣，阴教之职不可缺，中宫之位不可虚也。"乾顺就此事问大臣，那些受过任得敬贿赂的大臣一起奉承说：目前，在西夏皇室中门第、才德没有超过任妃的。于是，1138年，乾顺册立任氏为皇后，任得敬也因此被提拔为靠近西夏都城的静州防御使。

1139年六月，乾顺驾崩，16岁的儿子继承皇位，这就是西夏历史上的仁孝皇帝。令仁孝皇帝没想到的是，对他执政期间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甚至差点亡国的，竟是间接来自母后、任得敬的女儿。

1140年六月，夏州统军契丹人萧合达密谋叛乱，派人携带重金和邻近的西夏各州联络。这些州府的首脑要么拒绝联合，要么将萧合达派来的人送到兴庆府，只有老谋深算的任得敬热情地接待了来人，并详细地问清了叛乱筹备情况，然后才把这些情报汇报给仁孝皇帝。萧合达联合辽国境内的昔日残部发动叛乱。叛军西进，很快就攻陷盐州，继而围攻灵州。任得敬奉命平叛，围魏救赵，一举攻下夏州。萧合达得知消息后，立即回撤攻打灵州的叛军，行至盐州时，被任得敬的伏兵击溃，萧合达也被部下斩首并献给了任得敬。任得敬因为这次平叛表现突出而被仁孝皇帝授予驻灵州的翔庆军统军，晋封为"西平王"。

封王为任得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他于1147年五月请求入朝，并通过女儿任太后向群臣透露这种意图或施加压力。这自然遭到一些重臣的极力反对，毕竟前朝的太后当政带来的后党和帝党之争，给西夏政权产生过负面影响。因此，以濮王嵬名仁忠、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为首的党项羌贵族百般阻挠，为任得敬入朝设置了一道道门槛。热辣公济还上书说：我看到外戚大臣任得敬上表要求入朝，他的心思自然是想图谋干预朝政，自古外戚专权，国家没有不乱的。任得敬虽然属于懿亲，但毕竟不是党项羌人，谁能保证他没有二心呢？

1148年十二月，濮王嵬名仁忠去世，任得敬见有机可乘，便用金

银财宝贿赂晋王、夏崇宗乾顺的弟弟嵬名察哥。察哥在崇宗在位时屡立战功，任都军统，但晚年对钱财地产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横征暴敛一度引起朝臣不满，濮王嵬名仁忠还弹劾过他。濮王嵬名仁忠的去世，使任得敬开始肆无忌惮地贿赂察哥，察哥也开始肆无忌惮地接受贿赂，然后向仁孝皇帝提出召任得敬入朝，而任太后也在朝中大力活动，向皇帝施加压力，为其父步入西夏皇权的核心地带趟开了一条阳关大道。就这样，借着自己的平叛表现、皇室重臣的举荐、女儿的游说，以及大臣中间的公关等几方面要素，任得敬完成了从西安州小城到西夏皇宫的跳跃，入朝为尚书令，两年后又升为中书令。1158年八月，晋王察哥去世，临终前还积极建议皇帝重用任得敬。一个月后，任得敬升任国相，这是西夏历史上第一个汉人宰相，从此，西夏的大权为任得敬所掌握。

嵬名察哥去世后，升任国相的任得敬没有了顾忌，开始将自己的弟弟提拔成殿前太尉和兴庆府尹，直接控制了西夏皇宫和都城的行政大权。1162年三月，任得敬加封自己为楚王，开始了和仁孝皇帝的正面较量。任得敬清楚自己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入朝的，这是他心头的一块耻辱印记，而仁孝皇帝推行的兴办学校、科举取士选拔朝廷命官的做法，也妨碍了他网罗亲信，更重要的是他崇尚武力，因而对仁孝的改革举措多有抵制。他上书给提倡节俭的仁孝皇帝说，国内的读书人太多，不利于节俭，应该废除学校和科举策士，这个建议当然遭到了仁孝的回绝。

1165年五月，任得敬以灵州为根据地，动用10万民工，大兴土木营建西平府，开始加快篡权分国的步伐。同时，为了扩展西夏在西南方向的疆土，他两次派人前往四川，给南宋宣抚使虞允文修书，约好联合进攻金国。第二次的修书被西夏边界巡逻队截获并秘密送往仁孝皇帝手中。出于对任太后的尊重及权谋需要，仁孝皇帝不动神色地将这封信暗地里派人送往金国，引起金朝对任得敬的不满。

在西夏朝廷内，对任得敬不满的党项贵族也是怨言四起，热辣公济

甚至给皇帝上书，请求罢免任得敬。任得敬为了报复，想寻衅杀掉热辣公济，仁孝皇帝只好想办法支开他，让他和热辣讹发兵围攻居住在夏、金边界上的庄浪族，杀死吐蕃首领结什角，并将其母亲掳获。庄浪族是当时吐蕃中的大族，一度接受西夏统治但又常常叛乱，任得敬镇压了庄浪族后，在原来的积石军的旧址上修筑了祈安城，使西夏中期统治势力成功地渗透到青藏高原东北部一带。

随着掌控军事力量的增加，任得敬的篡权之心日益膨胀，乃至向仁孝皇帝公开提出了分国而治的要求：让仁孝皇帝去西夏西北部的今甘肃敦煌一带去当王，将灵州、夏州一带让给自己分据治理。

借助辽国的力量剪除梁太后的一幕，再次上演在西夏的皇权稳固战中。仁孝皇帝于1170年五月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兼枢密都承旨焦景颜赶赴金国，向金朝陈述了任得敬的分国图谋。金世宗决意帮助仁孝皇帝。任得敬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密谋宫廷政变，仁孝皇帝采取果断措施，将任得敬及其同党一网打尽，并诛杀了任得敬，任太后间接造成的西夏亡国危机随之化解。

文脉贯穿300年：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1170年，任得敬篡权阴谋被粉碎，西夏文臣集团也出现了危机，谁出任文臣集团的首领成了导引西夏政治走向的一个大问题。开明的仁孝再次问计于臣，这时，一个深受众臣喜欢的大臣被众人举荐，这就是长期被任得敬压制的斡道冲。1171年五月，仁孝皇帝再次启用斡道冲为中书令，朝中官吏引为楷模。

西夏总让后世历史误读为一个重武、剽悍、粗犷的王朝，其实，这个王朝从诞生前就一直注重文臣参与政权建设，王朝建立后，更是积极吸纳来自中原、西域、青藏高原甚至契丹、女真等敌对政权中的知识

分子，来充实王朝的统治力量。早在党项羌夏州政权建立时，就有不少汉地知识分子参与其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北宋初年，李彝兴被宋朝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兼检校太师，当地的汉族官宦康氏家族就积极帮助他，助其走上夏州政权五州管内都指挥使的位置。从李彝兴重用汉地知识分子起到1227年西夏亡国，党项羌政权走过了一条血腥征杀之路，伴生这条路的也有一条重用知识分子之路。

李继迁时代，越来越多的汉地谋士走进党项羌的夏州政权为之效力，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宋朝任命的灵州屯戍军校郑美，背弃北宋政权而投奔李继迁政权麾下，被李继迁授予指挥使，助其夺取了北方重镇灵州，后来又得到李德明的重用，赋予他一定的兵权。郑美投归不仅引起了党项羌的重视，也引起了宋廷的高度关注。当时身为少壮派的政治改革家、后出任北宋宰相的富弼就曾经上书专门论及此事："灵州屯戍军校郑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终失灵武。"认为宋朝失去灵武的主要原因就是李德明重用了熟悉灵州军情的郑美。

李继迁帐下的汉地谋士中，最杰出的是张浦。982年五月，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作出了亲自带领族人前往开封并接受宋朝封赐的决定，并将党项羌控制下的银、夏、绥、宥等四州八县的地方献给宋朝。李继迁坚决反对这个决议，他采纳了谋士张浦的意见，选择沙漠中的地斤泽为根据地，使自己的反抗力量有了漠北的地理优势和军事优势。985年二月，李继迁再次采纳了张浦的建议，诱杀宋朝汝州团经营活动使曹光实，攻占被宋军占领的银州地区。四月，李继迁还没来得及巩固自己出生的地方——银州，宋朝就发起了对这里的收复战。李继迁再次采纳张浦的建议放弃银州，并开始和宋朝进行游击战。

银州战后，张浦的外交能力也逐渐体现，他建议党项羌走联合辽国抗衡宋朝的路，并通过政治婚姻达到这个目的。986年二月，张浦亲自带着金银财宝前往辽国，贿赂辽国大臣韩德威。韩德威向辽圣宗建议缔

结双方政治合约，并答应李继迁的请婚。张浦的这次秘密之行换回了辽国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也被授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并得到辽国赏赐的300匹战马。

公元994年，李继迁和宋朝大将张崇贵、田敏交战失败后，派张浦到开封周旋，谋求缓兵。宋太宗在崇政殿召见张浦，并让一个强壮的卫士当场挽一张一石六斗的硬弓。太宗羞辱张浦道："戎人敢敌否？"张浦深知自己的使命是求得缓和，而非争强好胜，便假意示弱道："蕃部弓弱矢短，不敢敌也。"通过一系列的试探后，太宗对群臣说："张浦，继迁谋主也，留之京师，授郑州团练使。"

宋太宗答应封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名赵宝机后，以郑州团练使的位置吸引张浦为宋朝效力。张浦拒绝后遭软禁，导致李继迁发兵围攻灵州，派人向宋朝索要张浦。党项羌政权和宋朝为张浦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张浦暗地里派随从回去劝说李继迁采取忍让之策，并让随从在返回途中刻意留心宋朝往灵州的运粮路线，建议劫掠宋朝运粮队并谋取灵州。李继迁按照张浦随从画下的宋军运粮线路图，成功地劫掠了宋军的粮草后，结果招来宋朝的征讨。在宋军压境的情况下，李继迁继续发兵围攻灵州并向宋朝索要张浦。公元997年十二月，李继迁围攻灵州失败后，派遣使者前往开封请降但要求宋朝放还张浦，宋真宗正式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使等职务，并放归张浦。

张浦回到李继迁身边后，立即建议攻取灵州，认为一旦攻取灵州，党项羌就可以"西曲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进而统一整个西北，与宋、辽抗衡。同时，他建议李继迁积极吸纳汉地人才为其服务。这个建议被采纳后，大批不如意的汉地知识分子纷纷投奔李继迁。

988年，宋朝派李继捧回镇夏州，并在李继迁占领银、绥两州后，采纳李继捧和郑文宝等人的建议，用软、硬两手策略迫继迁就范：一是

加官晋爵（授继迁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以笼络之；二是禁绝青盐进入宋朝，从经济上封锁李继迁。李继迁采纳张浦等谋士的意见，拒绝招抚，不为所动。

李继迁攻取灵州后改灵州为西平府。西平府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继迁得意忘形，在攻占灵州后的第二年就想立王称霸。张浦劝他缓称王，指出此时称王不仅会引来宋朝的彻底讨伐，还会引起辽国起兵征剿，建议他攻取凉州，继续为建立帝业奠定基础。李继迁听取了张浦的建议，于1003年十一月声东击西，占领了富庶的凉州。

守卫凉州的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在逃走后又返回诈降。张浦劝诫陶醉在巨大胜利中的李继迁："兵务慎重，贵审敌情，潘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而降顺，必有诈也。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若悬军孤立，主客势殊，未见其可保。"脸上一直堆着胜利笑容的李继迁，坐在凉州府内骄傲地说："我得凉州，彼已穷途末路，力屈而降，何诈有之？况杀降不祥。"对张浦的再三劝诫，他后来甚至有点生气，要求张浦"尔可先返西平府（即灵州），待我安抚余党，功成即还"。张浦只好返回灵州。

潘罗支立即召集六谷部落的诸多首领及勇猛善战的龙族军队共计数万人，集聚西凉城下，以投降为名，骗取了李继迁的信任，并乘机射中李继迁的左目。随后，潘罗支的兵士乘乱入城。在众将拼命保护下，李继迁才冲出凉州。冬日的落阳里，疼痛难耐的李继迁对部下说，这次失误是我没听从张浦的意见，放松了警惕导致的。

受伤的李继迁匆匆返回灵州，在离灵州城西南三十多公里的三十九井的地方，和前来迎接他的张浦相遇，他拉着张浦的手说："我因未听公之言，才致今日之局面，我与诸公一同举事，领我党项男儿自地斤泽而出，半生戎马，备受艰苦，情同手足；先民生息于析支之地，无奈离

乡背井，又被流放在不毛之地，经年受累，若要族种不亡，就得自己立世立朝。今我党项正在兴起，河西之地志在必夺，望诸公辅助吾儿德明早日夺回凉州，以谋河西之地，再攻取河州一带，夺回我党项之析支之地，光我党项，兴我羌荣，我则死而无憾！”说完，这位奠定西夏王朝基础的一代枭雄撒手西归。

李继迁临终对张浦的遗言，使张浦在德明执政期间成为托孤之臣。接受“宋七条”和谈及发展经济的主张，和张浦的远见卓识有着很大关系。李德明的许多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大都出自他的谋划。1014年七月，张浦去世，李德明亲自参加了他的丧礼，并当众恸哭不已，元昊建国后也追封张浦为“银州伯”。这位“忠诚练达，知无不言”的谋臣，为西夏立国前的帝国雏形育成奉献了自己32年的岁月。

野利氏是党项羌进入黄土高原时的八大部落中的一支，在对李继迁及李德明政权的巩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家族中不仅出现了李继迁、元昊的妻子等美貌女子，也出了野利遇乞兄弟等西夏战将，更重要的是还出现了野利仁荣这样重要的文臣。爱默生曾经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野利仁荣就是西夏时期的一位人文知识分子，他不仅帮助元昊谋划帝国大业，还为元昊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党项羌的民族特点的建国方略和典章制度。1042年七月，为西夏民生国计操劳一生的野利仁荣去世。元昊悲痛至极，三次前去祭奠，并给予厚葬，赠封为“富平侯”。

到了西夏史上最重视文治的仁孝皇帝时期，文臣更是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仁孝是西夏历朝中少有的廉洁皇帝，他于1145年六月向全国下诏，征求谏言。1155年九月，仁孝皇帝带人去贺兰山狩猎，在途中因为军马

失蹄受伤，便下令将负责治理道路的官员抓来问罪。这时，尚食官阿华对他说：“您今天为了狩猎的事情，甚至要为一匹马而杀大臣，尊贵了牲畜而鄙贱了人，传扬出去，国人怎会信服呢？”仁孝听取了阿华的建议，释放了主管道路的官员。回宫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罔皇后，皇后当众赏赐了阿华众多银币，既让那些明知道皇帝不对还不劝止的大臣感到羞愧，也鼓励了直言劝谏的大臣。1162年十月，仁孝皇帝为了“上无勿知之隐，下无不达之情”，将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大机构移到了内宫门外，直接接受来自民间底层的汇报，这一举动激发了群臣直言劝谏的勇气和积极性，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越来越多，出现了濮王中书令嵬名仁忠、枢密都承旨焦景颜、御史中丞贺义忠、热辣公济、中书令斡道冲等西夏历史上的文臣，为西夏社会的政治开明、良好风气甚至经济繁荣带来了推动作用。

仁孝皇帝十分赞赏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定下的不杀直言进谏的文官的举措，他也很快将这种做法付诸实践，中书令的斡道冲因此成为文臣直言的范本。在斡道冲刚介直言的影响下，西夏朝廷很快形成了一种群臣敢于直言、敢于对时政提出自己看法的风气，出现了西夏政治上第一次的开明盛世。

1183年，91岁的斡道冲劳累而死。他任西夏国相十余年，生活俭朴，死时家里除大量书籍外，没有其他的私蓄。仁孝皇帝闻讯后，悲痛万分，命人给他画像祭祀在学宫内，并下令各州县都遵此实行。直到元代，斡道冲还被尊为一流学者、儒学大师。

推启开放之窗：一个迷失的草原帝国的风情画卷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让我选择一个中国的朝

代来居住的话，我一定会选宋朝。”而那幅带有理想色彩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民众生活幸福指数并不低的北宋都城生活场景，为汤因比的这个说法作出了有力的诠释。

对于10世纪的北方少数民族来说，“西索温洛，东镇齐鲁，北依燕赵，南控江淮”的开封，不仅是一个地理和军事意义上的重心，而且也是一个无法想象的“人间天堂”。当时的北方民族政权不断派出使者、间谍、僧侣、工匠、商人进入开封，学习这个王朝内部不断迸发出的先进科技、军事装备、政治制度、法律文献、科举形式甚至生活方式。西夏也不例外。

开封的繁华，带来了北方民族当政者的羡慕。而实现这种羡慕的另一种途径，就是发动战争。战争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学习，在战争中学习到的东西往往是和平方式所没有的。

西夏惠宗秉常是一个爱好汉文化的皇帝，他曾经下了一道古怪的命令：高薪招诱宋朝境内的娼妇、乐人。那些相当于今天的歌舞小姐、走穴的音乐人，带着宋朝的歌舞，走进西夏，让西夏的皇帝、大臣乃至巨富们能够在境内就欣赏到中原汉地音乐、歌舞。秉常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每逢打听到宋朝宫廷释放宫女，便派人前去高价引进，让这些才艺双全的宫女表演宋朝宫廷歌舞，或讲述宋朝的宫廷生活，并按照这种讲述来“复制”或演绎成西夏的宫廷生活。

秉常的这两个举动仅仅是西夏向北宋学习的一个侧面，西夏向宋朝或周边政权打开了学习之门。

从衣食住行看，立国前的西夏就开始学习宋朝的服饰制度，正式规定文武官员的衣着。借鉴唐、宋官员的服装特色，以文职官员穿紫衣缀红色、普通民众穿青绿色服装来区别贵贱。武官则头戴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穿着紫色战袍，这明显具有本民族特色。那些西夏使臣穿着改观后的本民族服装，到了开封，自然会引起宋朝

方面的反应甚至会上升为双方的外交问题：曾经，宋朝方面要求那些穿党项民族服装的西夏使臣更换衣服，西夏的使者说："我们是奉本国的君命来见你们的，头可断，衣服和头冠不能更换。"结果被开封方面遣送回去。另有一次，西夏使者出使宋朝，同样遭到开封方面的拒绝，使者在开封东华门脱去了西夏国的服装，换上宋朝服饰后才被允许进入开封。

由于西夏前期在皇帝更迭时出现学习汉礼和恢复蕃礼之间的争执，也就出现了西夏朝廷或民间服装的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原来的皮毛服装逐渐改成了纺织品，富裕的人穿起了绸缎，一般平民穿起了布衣。

在饮食方面，西夏百姓的饮食生活最初比较简单，农业区的人们主要以粮食、蔬菜为主，肉食兼有，而牧区则以乳品和肉品为主。后来，宋朝的大量饮食品流入西夏，从高层到民间，北宋的饮食习俗逐渐在西夏蔓延流布。

居室方面，西夏由游牧时期的帐篷时代到定居后的住房建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都城兴庆府毁于战火，我们无法更多地了解西夏皇城内的建筑结构和特色，从一些离宫里的建筑材料分析，那时的西夏皇家建筑在选材及技术上，甚至在王陵的建筑上，大量借鉴了宋朝。

交通建设方面，西夏的交通主要是陆路，经过几朝努力，逐渐形成了以今天的银川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同时，其境内的祁连山、贺兰山等大山，以及毛乌素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地貌，给交通又带来很大的阻碍。马匹、骆驼、毛驴、牛等成了帝国境内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西夏和周围其他政权日益繁忙的经贸往来，加上不停的战争扩张，给交通运输业带来了更大的需求。西夏专门设置了都转运司，在各地又设置了10处边中转运司、21个地边城司，形成了交通网络。出没在这些交通网上的人，除了步行外，还有马、骆驼、车、轿，以及牦牛

等，最多的是马。西夏境内盛产马，马匹不仅是作战取胜的法宝，还是大批普通民众出行的交通工具。

西夏《天盛律令》中规定对道路、桥梁要及时修整，假如到了应该修造时而不上告，有关官民要受惩罚。水路交通上，《天盛律令》中记载西夏境内有24个的渡口。国家机构中为此还设立了“渡船门”，渡船也由政府严格控制，水利税收则由国家负责收缴。黄河上的交通工具中，有皇帝出行的御舟，也有平民的木船、木筏，在青海、甘肃、宁夏境内的黄河段，西夏的水上交通工具还有羊皮筏子和牛皮筏子。

第七章
帝国黄昏：北方升起黑煞星

如果说西夏王朝是一辆由李继迁、李德明精心打造的战车，那么，这辆战车就是由元昊隆重推到历史前台的。此后的百余年，这辆战车在三国演义中走向辉煌，走向巅峰。铸就巅峰的是刀剑，成就辉煌的是汉化。一对矛盾的组合，注定帝国内部波澜迭起。为了恢复祖先的血性，纯佑皇帝的生母咬牙拿下温良恭俭的儿子。可来自北方的黑煞星会给他们留下多少时间呢?

拐点：从三国演义到单向外交

如果说西夏王朝是一辆由李继迁、李德明精心打造的战车，那么，这辆战车就是由元昊隆重推到历史前台并亮相在11世纪中国的历史大屏幕上的。元昊以后的100多年，这辆战车在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大历史环境下，沿着一个上行的轨道攀升着，通往自己的辉煌之巅。到了仁孝皇帝时期，这辆车已经到了顶峰状态。仁孝之后，帝国出现了下行的迹象。

仁孝皇帝以其勤劳将西夏推向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这位勤劳的皇帝，直到53岁才喜得太子。1193年九月二十日，西夏历史上执政

时间最长的皇帝以70岁的高龄辞世，他的长子、17岁的纯佑即位，这就是西夏历史上的第六个皇帝夏桓宗。纯佑在他14年的执政期间，虽然勉强维系着帝国在仁孝皇帝晚期的滑行状态，但这艘巨舰已经在逐渐偏离理想轨道。

对外关系上，纯佑继续推行仁孝时期的修和政策，这种修和在一定程度上内耗着西夏帝国的血性，让越来越多的温顺之气替代了起初的狼性。

外部环境也促成西夏王朝的运行出现了拐点：崛起的女真人灭亡了北宋，并将黄河流域纳入囊中。黄河流域恰好是西夏通过贸易、征战从北宋获取经济利益的地方，金朝消灭了北宋并占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使西夏的东、南、西南都处于金的包围中。这种疆域上的变化和军事联盟改变的局势将存在了上百年的辽、宋、西夏三国鼎立局面拦腰斩断，出现了"新的三国"局势：金、南宋和西夏。仁孝皇帝执政期间，"新的三国"局势带来的危机已经隐藏在西夏王朝的肌体内。臣服于金的外交政策，加上奉行汉化的崇儒、尚文之政，使崇实尚武的西夏精神被削弱，整个帝国高层出现纵情声色、恣意吃喝的局面，原先的质朴、勇毅、刚劲、剽悍、勤劳等民风荡然无存。

对外经贸方面，金朝的崛起，使宋朝和西夏都长期倚重的经济圈从黄河流域退出，西夏的外贸仅存对金贡使和榷场两种形式。贡使贸易是西夏使者借助赴金国的驿馆进行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金史》卷一三四中记载其为"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仁孝执政期间，争取复开了保安和兰州两地榷场，使西夏和金的关贸交易点增加到7处。西夏通过西域所产的珠玉、硇砂、香料、药材、畜产品换取金朝的绢帛、铁器、瓷器、纸张、书籍及日常用品，这种贸易方式很快引起了金的不满，认为西夏是"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因此关闭了兰州和保安两处榷场。纯佑执政期间，通过努力争取，才使关闭了25

年的这两处贸易市场得以恢复，为进入“下午状态”的西夏外贸经济苟延了一丝活力。

外交上，夏桓宗和金章宗代表的两个帝国之间没有第三势力介入，双方也没有大的利益冲突，西夏对金采取了友好政策，将臣属状态持续了80多年。南宋政权曾经多次想结好西夏，但西夏拒不理睬，这为后来西夏抗衡金朝侵略时缺少盟友埋下了伏笔。同时，从双方的整体国力来看，西夏和金都在处于下滑阶段，尽管西夏方面在纯佑时期出现了嵬名世安、刘忠亮等为代表的忠臣和贤臣，却难以抵挡整个朝野的堕落之气，不能挽救走向衰微的西夏国运。纯佑时期的大事佛事，对国力的浪费也很巨大。

14年的执政，纯佑皇帝给西夏历史留下了一个仁慈恭俭的形象，但这种软形象也使得他的皇位一次次面临颠覆之险，最终被他的堂弟和他的母亲合谋后赶下了皇位。

为大义而灭亲？被生母赶下朝堂温良皇帝

任得敬挑起西夏政局危势时，差点颠覆了西夏。仁孝皇帝在镇压他时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仁孝委派他的族弟、乾顺的孙子嵬名仁友诱捕了任得敬的弟弟任得聪和任得仁等，孤立了任得敬的叛变势力。嵬名仁友因此被封为“越王”。嵬名仁友去世后，他的儿子嵬名安全立即给纯佑皇帝上书，要求继承父亲的爵位，面对“天性暴戾、心术险鸷”的嵬名安全的无礼要求，纯佑皇帝在察觉他的阴谋后将其发配到了甘州地区。

甘州地跨青海、甘肃、内蒙古三省区，北控居延，南接凉州，西连青海北部草原，东边和西夏设在今内蒙古额济纳境内的12个监军司之一的黑山威福军司互为照应，稳固着西夏西、北边防，也是西夏帝国重要

的粮食基地和军马基地。西夏在这里设置的宣化府和凉州的西凉府、国都兴庆府、灵州西平府一并成为西夏四大府。

考虑到嵬名安全是皇族，纯佑将其发往甘州后降封为“镇夷郡王”。他没想到，这次降封反而使嵬名安全可以凭借这里的丰饶和丰美草场，培植自己的经济和军事资本。他于1198年就诱惑西夏朝中大臣刘忠亮谋叛，透露了自己篡位的野心，然而，他的拉拢遭到了刘忠亮的拒绝。1204年，夏州的一户农家养的一头猪生下了一个像麟的动物，这个动物长着两个头，这家农户将它献给朝廷。得知这个消息后，嵬名安全私下让人占卜，卜者说这是一个国家两个王的兆头，这就更加坚定了安全篡位的信心。1205年，嵬名安全差使卜者散布谣言的事情被刘忠亮发现，刘忠亮临终前向儿子刘思义讲了嵬名安全一直图谋皇位的忧虑，希望儿子别卷入这场无益西夏的谋乱之中。

纯佑皇帝虽然没明显感到来自甘州的威胁，却接到了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1205年的一天，纯佑皇帝接到了一封令他十分吃惊的信。写信的人叫铁木真。铁木真信中指责西夏收留了他的对手王罕的儿子桑昆，要求西夏交出桑昆，否则发兵攻打。还没等西夏方面表态，铁木真的蒙古骑兵已经杀到西夏边境，这是铁木真率领蒙古军队对西夏的第一次进攻。

1207年秋天，铁木真借口西夏不纳贡，发动了第二次对西夏的战争。面对蒙古军队密集而猛烈的进攻，纯佑皇帝没想到在疲于应付这个新敌人时，真正的威胁却来自身边。

嵬名安全终于等来了机会，就在纯佑皇帝应付蒙古人的第二次侵扰时，1205年的秋天，纯佑皇帝的母亲、笃信佛教的罗太后跟儿子说想去甘州敬香礼佛，祈求国内平安。纯佑皇帝满足了母亲的愿望，并派人将母亲送往甘州。

纯佑根本没发觉母亲的内心正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仁孝皇帝70岁时辞世让位，纯佑自小就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几乎没什么建树，既没有带兵打过仗，也没有像李德明那样经过商，他即位前的17年是在后宫平和安详的生活气氛中度过的。儿子即位，本该是罗太后高兴的事情，但这个深居后宫的女人，看到儿子信奉着仁孝时期的修和外交，使西夏帝国的血性日益减弱，而北边草原上崛起的铁木真正统领着蒙古军队在草原上纵横驰骋，这样下去，一旦战争爆发，西夏迎来的必是亡国的命运。她多次提醒儿子注意这种危险，但纯佑始终没有采纳。

西夏历史上的两名梁太后马上御敌的威风从小就是罗太后学习的榜样，她一直梦想着能够恢复西夏的血性，但是，从仁孝到纯佑之间的和平过渡，并没有留下多少资源提供给罗太后来实现她执掌皇权的梦想，她只有向宫廷外寻求援助，就这样，远在甘州的嵬名安全走进了她的视线。

在甘州，两个各怀鬼胎的皇权觊觎者走在了一起，嵬名安全想利用罗太后每日能正常接近皇帝的机会铲除皇帝；罗太后想利用嵬名安全拥有的甘州军队实现篡位。

利益一旦一致，合作自然会很顺利，一场宫廷政变即将开始。

1206年正月，纯佑皇帝还没从兴庆府里欢快的节日气氛中缓过劲来，他那远在甘州的堂弟嵬名安全就打着庆贺节日的旗号，返回兴庆府，一个纯佑皇帝没有想到的悲剧发生了：嵬名安全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合谋，发动了宫廷政变，纯佑皇帝就这样被赶下了皇位。嵬名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应天”。西夏的皇权虽然仍掌握在嵬名家族的手中，但已经偏离了自李继迁时就开始的嫡传轨道。

嵬名安全篡位后，罗太后派遣使者奉表到金朝，奏请册封安全，金朝派遣使者问其缘故，嵬名安全以罗太后的名义回复：“纯佑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金国并未认可这次篡位的合法性，西夏

方面先后三次求封，金国方面看到木已成舟的事实无法更改，顺便也好给新兴政权顺势做个人情，才在安全篡位后9个月，正式册封他为夏国王，承认了他的皇权合法性。但在此后的外交上，金国对安全保持着相当冷漠的态度，明显地和宋封乾顺，金封仁孝、纯佑不同。双方原来保持的一些礼节遭到金国的单方面废除，经济上同样取消了对西夏的封赐，外交上也降低了接待西夏使节的规格。两国外交关系上的趋冷，使后来的蒙古军队摧毁西夏时少了些顾虑。

嵬名安全的篡位不仅带来了金国的不满和两国盟友关系的恶化，还给西夏树立了一个致西夏于死地的对手——铁木真。

枕侧的刀光：草原升起“不落”的太阳

12世纪晚期，中国的政治大势图系是这样分布的：以临安为中心的南宋政权，控制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黄河中下游流域在文化上完全处于汉文化影响圈内，但大部分及东北平原地区完全在金朝控制下；以今银川为政治核心的西夏王朝控制着鄂尔多斯高原、陕北黄土高原、阴山西北部，直到内蒙古高原和新疆交界的大片地区，在这片地区向西南拐弯沿着祁连山东麓的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青海中部地区、甘肃南部大草原一带，这个范围内遍布着西夏臣民。

这三大势力圈外，从吐鲁番盆地到库车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着具有佛教和聂斯托里派基督教（景教）文化信仰的突厥人；今天的青藏高原大部生活着吐蕃人，云南高地上存在着大理国。而在亚洲北部的西伯利亚—蒙古边境上，阿尔泰山、杭爱山和肯特山一带的戈壁滩及草地上，漫游着一个古老的游牧部落，他们由突厥、蒙古和通古斯三个种族组成。这个部族的人普遍有着阔脸、扁鼻、高颧骨、细眯眼、厚嘴唇、稀疏胡子、五短身材的特征，恶劣的生存条件使他们具备了游牧民族强悍

的性格。这个部族中，有一个乃蛮部落，居住在今科布多地区和乌补萨泊郊区，西边到黑额尔齐斯河流域，东到色楞格河上游地区。乃蛮部落在草原上生存、繁衍时遇到的最大对手是生活在色楞格河以南、鄂尔浑河上游地区的克列人。

1199年，金王朝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出兵帮助克列部的首领脱斡邻勒打败了他们的敌人塔塔尔人，并封其为王。脱斡邻勒自己也以中国的王和突厥的罕相结合的双重头衔“王罕”来命名自己。12世纪最后10年里，脱斡邻勒带领的克列部遭遇到一个强大的对手——大兴安岭西侧崛起的蒙古部落，部落的首领叫铁木真。

蒙古部落最早发源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额尔古纳市的室韦，随着部落的壮大，他们逐渐走出额尔古纳河流域向南扩张。最初，铁木真采用联盟方式，依靠脱斡邻勒强大的庇荫免受其他部落侵害。脱斡邻勒和还没强大起来的铁木真一直有着战略合作关系，他们最后一次合作是联合攻打1201年在怯绿连河畔自立为“汗”的扎木合。在追击扎木合余部的过程中，铁木真收获了泰赤乌惕部的神箭手哲别——后来帮助铁木真成就霸业的蒙古史上杰出的将领。这次联合进军后，铁木真替自己的长子术赤向王罕的女儿察兀别吉公主求婚，但遭到王罕的拒绝，铁木真遂决定和王罕决裂。

1203年，铁木真给王罕写了一封表面上很感人的长信，信的内容是建议统一蒙古高原。这已经透露出铁木真想统一蒙古各部的野心。这时的铁木真不再是《蒙古秘史》中记载的那个“枕着衣袖，铺着裙子，以流涎解渴，以牙肉充饥”的铁木真了。他在13世纪初已经统领着一支堪称当时世界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印证这一点的是这支军队的作战失败率越来越低。

在成功地统一蒙古高原甚至更为辽阔的草原游牧地区的过程中，战略物资、人力补充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富庶的中原和西域也不断

吸引着铁木真扩张的眼光，而西夏就是横亘在这支蒙古军队和这些地域之间的一个巨大障碍。西夏的良马、能供蒙古军队在沙漠和戈壁间穿行的西夏骆驼、西夏闻名的弓箭、刀剑、后期的火炮等武器，都是蒙古军队短缺与急需的，西夏能征善战的骑兵也是蒙古军队扩大战争的理想兵源。西夏因此成了西进最佳的实战训练场。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中国政权地图上，相对于金和宋来说，西夏相对弱小。

就在铁木真给王罕写信的这一年，他发动了对王罕的战争，王罕的儿子桑昆兵败后逃入西夏，这为铁木真试探性进军西夏带来了足够的借口。

偌大的西夏，该从何处选择进攻的突破口呢？站在蒙古草原的青草间，铁木真的眼光扫向西夏的疆土及更远的地方：西夏地处连接中原和西域，是中原和大漠南北的要冲，地处祁连山东麓的丝绸之路横贯西夏西部，从辽河流域沿阴山经居延海到达天山南北的“居延路”横贯西夏北部，丝绸之路的北端和居延路交汇处就在居延海一带。自汉唐以来，经居延海沿着弱水南下进入河西走廊的通道，就是从漠北进入中原地区的黄金路道，居延处在这条黄金线的北起点上。蒙古军队如果占据这里，可深入西夏河西地区，继而南下中原，西攻西域。因此，居延成了铁木真进攻西夏要撕开的第一道疤口。

这是蒙古军队在横扫草原游牧地区后第一次对定居的文明族群采取的征服行动。和征服西域那些游牧政权时如横扫秋叶的境遇不一样的是，这次他们遭遇到了西夏坚固的城池。纵横在青草间的蒙古马匹显然无法飞越高大而坚固的城墙，城墙上藏在暗处的西夏军士的远箭更是带着致命杀伤力。从1205～1207年，西夏的城池成了横亘在蒙古军队面前的一个巨大障碍，这些障碍让蒙古军队逐渐学会了攻城战术。这些战术在蒙古人征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小城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铁木真首先运用间谍弥补马背上的不足。充当间谍的西夏士兵、民众得到了他们的重用，以致在后来的对西夏战争中，一些前线将领甚至就是西夏人。他们熟稔西夏的缺点，更容易带领不熟悉城池攻坚战的蒙古人攻城略地。有时，他们又充当说降者的角色，比如在后来攻打甘州时，就是先投降蒙古的西夏将领察罕，向他的养父、甘州守将曲也怯律写信劝降。

在1203年的对西夏之战中，铁木真在攻占力吉里寨后，将寨墙和基础设施全部毁平，将随后占领的罗失城及西夏其他地区的城池进行了极尽可能的洗劫，然后将城池里的民众及他们的牲畜驱散。这些地区由于距离西夏国都较远，西夏未能组织兵力进行有效保卫，导致蒙古军队进一步深入到帝国的腹地。对西夏进行了一次成功试探后，还未等西夏方面组织反扑，蒙古军队就像一股旋风，很快地刮回到蒙古草原上去了。那些遍布在草场上且随时能出击的蒙古人，作为西夏真正的敌人出现在王朝北面，西夏北面的门户面临着随时被蒙古人踹开的危机。

仓皇的应对：美妙而短暂的中兴之梦

当铁木真出生在偏僻、荒凉的草原上时，西夏已经有了全国性的、健全的国家教育体系，遍布全国的300多个培训学者和官僚的教学点，集中在国都内的太学、翰林院，以及拥有大量培训僧侣的基层寺院等，这些机构支撑着西夏的教育体系。教育发达的最巅峰也是西夏王朝的最辉煌时期——仁孝皇帝统治期。这些机构加速西夏向中原汉文明靠拢的同时，也在削弱着一个剽悍民族的战斗性和血性。短短几十年后，这种削弱就显示出了力量。仁孝皇帝作为西夏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统治者，于1193年去世，将一个帝国留给了几个无能的后继者，偏偏这些无能的后继者碰上的又是一个强悍的对手——来自蒙古高原的铁木真。

1207年，整个蒙古草原被铁木真征服，他的九白旄纛成了草原上一面飘扬的旗帜，他也有了一个后来被历史收藏的尊号——成吉思汗。这年的秋天，北中国的大片地区仍然是草肥马壮。成吉思汗将蒙古利剑再次挥向毫无设防的西夏。这次，成吉思汗的理由是西夏没有向自己纳贡，其真实目的是想废除金、夏联盟，迫使西夏臣服于自己。

夏、蒙之间的战火依然从北方燃起。这次，蒙古军队选择的突破口是西夏北部的重镇斡罗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境内的狼山一带）。攻城的艰难再次体现，蒙古军持续攻打了40多天才被破城。这是成吉思汗出征以来第一次遭遇到的强大抵御，看到死在斡罗海城下的那些蒙古士兵，想到自己40天才攻下这个小小的城池，成吉思汗的内心被恼火占据，那天，他作出了一个此前从没有过的决定：下令屠杀城中的幸存者，并派兵四处劫掠。这次屠城有如一场无法医治但却蔓延在他强壮体魄内的疾病，此后，每逢遇到对方军民坚守后久攻才破的城池，他都是下令屠城。满城横陈的尸体、浓得化不开的稠血、被染红的天幕都成了激发成吉思汗征战的兴奋剂，在这样的兴奋剂作用下，当年草原上那个善良的孩子，那个在征战各部落中逐渐强壮起来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动辄以屠城为乐的屠夫。

斡罗海城失守很快引起西夏高层的重视，当政的夏襄宗嵬名安全下令调集右厢各路大军进行抵抗，双方相持了5个多月，蒙古军队因为供给不足而退军。

撤回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越发对西夏的顽强抵抗产生征掠的快感。1207年的冬天，他一直思考着怎样在来年攻打西夏。而中兴府内的嵬名安全也在思考着怎样才能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蒙古旋风。

嵬名安全日益掉进了对蒙古军队的惧怕中，他已经将防御蒙古军队当成了整个帝国的心病。1208年春天，成吉思汗再次发兵进攻西夏，西夏很快集结重兵准备反击。然而，当年的“铁鹞军”已经变成了一支行

动迟缓的军队，蒙古军队却完全学习到了“铁鹞军”的精髓。当那些肥头大耳的西夏指挥官在酒足饭饱后下令追击蒙古军队时，成吉思汗担心遭到西夏方面的反击，迅速回撤了。

1210年秋天，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三次进攻，这次的突破口是从斡罗海城西边进入河西地区。谍报人员将成吉思汗的战略意图送到西夏皇室时，嵬名安全任命自己的儿子嵬名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帅，率兵5万前往斡罗海城救援。双方在斡罗海城外展开激战，西夏军队失败，高逸被俘后坚持不降，被蒙古军队杀害。城内，西夏太傅西壁讹答率兵巷战，最后也被俘。蒙古军队攻入斡罗海，西夏的北部防线被蒙古骑兵踏破，并很快逼近西夏国都的外围克夷门（今宁夏石嘴山市东北贺兰山内的一处要塞）。元昊曾经在这里设立右厢顺监军司，派驻7万党项军队把守。

嵬名安全派嵬名令公带领5万人前往迎敌。嵬名令公利用克夷门“两山对峙、中通以径、悬绝不可登”的地理条件，击败了蒙古军队，暂时抵挡住了蒙军的攻势。双方随即进入了两个月的相持阶段，西夏军队在暂时的胜利中放松了警惕，被蒙古人精心设置的圈套迷惑，待发觉时，已经走进了这个圈套，嵬名令公被俘，克夷门被攻克，西夏国都的北面防线被攻破。

早在1205年时，西夏皇帝就做起了王国复兴大梦，并将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然而，复兴之梦却越做越远。蒙古军队在第三次入侵时，将战火引到了中兴府。这座建立在贺兰山东边冲积扇平原上的城市，东临蜿蜒流经平原的黄河，当时正是雨季，围城的蒙古军队久攻不下，就利用下雨黄河暴涨的机会，修筑堤坝，引黄河水试图灌淹中兴府，浑黄的流水在平坦的平原上漫漶而过，城外的西夏居民溺死无数，城墙被河水浸泡，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但随着河水越来越大，蒙古人修筑的堤坝也被冲毁，河水溢出堤坝后冲进了蒙古军营，试图水淹中兴府的蒙古军反

而被黄河水淹了军营堡寨，蒙古军队只好选择撤退。

成吉思汗很会利用俘虏，撤军后，他派被俘的西夏太傅西壁讹答进入中兴府招降。西夏派人向金求援。接到西夏方面的求援后，金朝政府展开争论，不少有远见的大臣呼吁，和西夏形成首尾相攻之势，乘胜攻打蒙古军队，否则蒙古人在攻破西夏国都后攻打金时，金会失去西夏这个钳制蒙古的重要力量，但金国主完颜永济却带着幸灾乐祸的口吻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拒不发兵。西夏求援失败后，困守中兴府三个月的嵬名安全只好登上中兴府的城楼，隔着滔滔水面答应了蒙古人的要求：向成吉思汗称臣，允诺做成吉思汗征战时的"右手"；同时将西夏的公主献给成吉思汗；西夏愿意将骆驼、毛毡、猎鹰等进献给成吉思汗。蒙古军队才在逐渐寒冷的塞上冬日中撤兵而去。

这场战争中，蒙古军队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重要的是拆解了夏、金联盟，使夏金联盟变成了西夏附蒙攻金，为自己日后分别消灭西夏和金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让马背上作战的蒙古骑兵第一次学习到了在河渠纵横的平原地区作战的经验，为日后攻打南宋统治的江南水乡积累了经验；第三，消灭了西夏军队的有生力量，使自己在第二年进攻金时，甚至后来西征时也没了后顾之忧。

第八章
丧钟为西夏而鸣：一对幻想家的最后挣扎

鬼名安全在皇位上坐得并不舒服，刚当上皇帝，就碰到了帝国成立以来最凶悍的对手。他在皇位上最后的感触可能就是两个字：报应！

就在鬼名安全被来自北方的噩梦困扰时，来自皇宫的内乱更加深了恐怖的梦魔。1211年，一个幻想家，嵬名遵项，仿效当年的自己登上了帝位，开始中兴的梦想之旅。等待他的，却是噩梦中的死亡。

嵬名遵项：选择投降的梦想家

嵬名安全在皇位上坐得并不舒服，自己刚当上皇帝，就碰到了帝国成立以来最凶悍的对手。夏、蒙的交锋将西夏拖进一个巨大而无休止的战争泥淖中。而他在皇位上最后的感触可能就是两个字：报应！

就在嵬名安全被来自北方的噩梦困扰时，来自皇宫的内乱更加深了恐怖的梦魇。1211年，他当年废除纯佑皇帝的一幕重新上演。嵬名遵项废黜了嵬名安全，登上了这个开始步入黄昏期的王朝帝位。

嵬名遵项是一个抱有重兴西夏大梦的继承者，他已经看到崛起的蒙

古军队执意要灭绝西夏。权衡利害后，他采取了联金抗蒙的外交政策。带着向金朝说明西夏愿意臣服金朝、并和金朝联手抗击共同的对手蒙古的使命，嵬名遵顼派出的使者悄悄离开兴庆府，前往金朝。此时的金朝已经远非当年那只勇猛的“海东青”了，在呼啸东北甚至北中国的“东北虎”契丹政权消亡后，依靠常年称雄北方草原的“西北狼”党项政权，共同抵抗蒙古军队显然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最好的选择。金朝方面当即让西夏使者回复遵顼，双方愿意结成抗蒙联盟，并于遵顼即位第二年就册封了他。

金国的册封，无疑给嵬名遵顼甚至疲软的西夏打上了一支兴奋剂。他下令就此进行隆重庆贺。庆贺酒的香味儿还没散尽，消息就传到了成吉思汗的耳中。他仿佛看见昔日草原上的两股强大力量正联手盟誓，并发兵攻打正在崛起的蒙古军队。在蒙、金、夏的三角关系中，任何两方联盟，都是第三方的损失。成吉思汗不能看着金、夏联手成为自己的强大对手，而摧毁金、夏联盟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实力上显得弱些的西夏下手。

1214年，成吉思汗向他麾下的蒙古将士下达了第四次进攻西夏的军令，以达到拆散金、夏联盟，威逼西夏进攻金的目的。这次，蒙古军队在西夏境内可谓长驱直入，直接兵临西夏国都。面对强敌压境，嵬名遵顼不像此前的西夏帝王们，或多或少地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他没有作战经验，也没能力指挥一场有效的反击战。蒙古的最后通牒是一道单项选择题：要么归降蒙古军队并协助蒙古军队进攻金朝，要么蒙古军队立即攻城，并将中兴府夷为平地。那个上午，整个中兴府笼罩在雨雾之中，全身淋湿的嵬名遵顼站在雨地里沉思着。

越来越浓的雨雾让嵬名遵顼的眼前一片雾蒙，仿佛一块遮住了帝国命运的雾布横在他眼前。他走进祖庙，那里供奉着来到黄土高原的历代党项羌先祖的画像。在拓跋思恭的画像前，他仿佛听得见这位先祖诉

说着党项羌沉重的历史；紧接着是李继迁的画像，这位西夏王朝的奠基者仿佛告诉他党项羌的战刀在那时的锋芒何其耀目于北方草原；然后是李德明，仿佛给他陈述党项羌在他执政时期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并驾齐驱，拉动着党项羌的战车快速而行在北中国的大地上，也正是他那时候在贺兰山下的这个小镇上开始了帝业的缔造，使这个小镇成为此后西夏王朝100多年的都城；而西夏王朝的开国君王元昊那威严的画像似乎对嵬名遵顼是一种指斥，党项羌的历史在元昊手中缔造了何其辉煌的高度，大白高国的旗帜开始飘扬在辽、宋、夏三国鼎立的历史镜面上，闪耀着它独特的魅力；谅祚也仿佛叙述自己即位时的西夏面临着一个险恶的外部环境，帝国的战车依然按照先辈理想的轨道前行，使西夏在与辽、宋三国并立的大背景下完成着帝国大业……以此类推，历代西夏君王画像前，嵬名遵顼阅读着这个王朝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之策和国力打造之艰难。看一幅画像，他的心就疼一次，面对如此颓废的国势和强敌压境的窘境，祖先留下的这份大业眼看就断送在自己手中。如果选择归降，那些勇猛好战、以血和汗打下江山基业的先帝岂能宽恕自己？选择决一死战吧，此时的西夏和蒙古军队抗衡无疑是以卵击石，而且，成吉思汗那遇到阻挠后便屠城的血腥确实令抵抗者心惊胆战。是自己落下骂名以保全国都及生活在兴庆府的臣民呢，还是逞匹夫之勇引来蒙古人的血腥屠戮呢？那个难熬的上午，嵬名遵顼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命运走向。最后，他作出了归降蒙古，保全国都的选择。夏、金、蒙之间的战略关系立时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夏、蒙合攻金的局面。

从中兴府内西夏皇宫到城墙的那段距离，平时没觉得远，那天，作出了归降决定的嵬名遵顼却觉得十分漫长，身后是带着各种眼光审视这件事的西夏文臣武将和普通臣民。走到城墙上时，望着城外密密麻麻的蒙古军队，他亮出了西夏的态度："愿意成为蒙古人的右手而行。"嵬名遵顼动摇了，这次动摇的不仅是自己抗击蒙古军队的信心和连金抗蒙

的结盟之约，更动摇了西夏帝国那带着残喘的大厦根基。

城下之盟签订后，成吉思汗放心地将蒙古利剑挥向了西方。西征前，成吉思汗派使者前往西夏，带去了征召西夏兵的指令。还没等嵬名遵顼开口，驻守在今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西夏大臣阿沙敢布就抢先发话了："气力既不足，何以称汗为？"在这样的鹰派人物的支持下，本身就一直动摇的嵬名遵顼代表西夏王朝回复：拒绝出兵助战！

遭到拒绝的成吉思汗十分气恼，愤怒地指斥：哪能允许阿沙敢布这样挖苦呢？看他能跑哪里去！但因为当时要集中兵力西征，成吉思汗只好暂时先放下西夏。但西夏的这次反复给成吉思汗的内心留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派人详细侦察了阿沙敢布驻守地区的军事情况，为后来出兵阿拉善埋下了伏笔。

成吉思汗西征时，给大将木华黎留下了选择时机成熟攻打西夏的命令。1217年冬天，这个机会来了。木华黎派兵侵扰西夏，西夏境内出现了面对蒙古军队"列城不能御"的惨败局面。蒙军长驱直入，再次抵达中兴府城下。嵬名遵顼据城苦守20多天后，将守城的重任托付给太子德旺，自己率随从逃亡陪都凉州。等蒙古军队撤离后，才返回中兴府继续做自己的西夏皇帝。

1221年的中国大地上，军事格局的分化和裂变更加迅速且明朗，成吉思汗帐下的大将木华黎已经征服了原属于金的华北平原，攻取陕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夏天，木华黎向西夏提出借道。这个要求引起了嵬名遵顼的极大恐慌，他认为这是蒙古军将再次攻打西夏的信号，便派大将塔海在河套地区宴请木华黎。明确了木华黎的意图后，西夏方面派兵5万，由塔海带领，随蒙古军队出征，这是西夏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派兵参加蒙古军队的军事行动。在西夏军队的帮助下，蒙古军队在十一月就攻破了素有"铁打的葭州"之称的葭州。

木华黎为防备西夏人乘机夺回原属于西夏的葭州，也为了日后更好

地从东边攻取西夏，派手下大将石天应留守。这个举动引起了西夏方面的不满，但在强大的蒙古军队面前，为了消除这种戒心，嵬名遵项更加讨好地派大将迷仆带领3万西夏军队到陕北，帮助蒙古人攻取了金统治下的绥德、延安等地。

西夏军队的相助，使木华黎南征的步伐明显加快，西夏继续做着蒙古攻金的帮手，但在攻金时因数次失利，遭到蒙古方面的多次责问。惶恐不安的嵬名遵项发觉了帮蒙古进攻金朝的尴尬和危险，帝位对他来说日益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选择将帝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去做西夏历史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太上皇去了。

夏、金联盟：百年战争后的糟糕握手

1223年，嵬名遵项将西夏的帝位传给了儿子嵬名德旺，将一个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帝国交给了儿子，也将自己的身影就此隐于西夏历史深处。

和嵬名遵项相比，年轻的太子即位后就亮出了自己的血性，他不甘心西夏接受蒙古人驱使的局面，主动和那些鹰派大臣接近，企图反抗蒙古。这种反抗惹怒了已经处于战无不胜状态的成吉思汗，招致蒙古军队的镇压。命运将巧合再次写进西夏的历史中，就像1067年，交锋多年的大宋王朝和西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宋英宗赵曙和西夏毅宗谅祚同年去世；1223年，时战时和的西夏王朝和女真王朝的最高统领嵬名德旺和金哀宗同年登基。两个即位的年轻皇帝都不甘心被蒙古势力驱使。

在这里，请允许我将女真和党项两个草原部族建立的两大帝国之间的恩怨做个简单交代。12世纪初，女真帝国给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带来了重新洗牌的机遇，宋、辽、西夏都承领了这支草原铁骑引发的不安

和危险。辽国受到女真铁骑的攻击时，处于战略结盟的辽和西夏关系良好，接到辽国的求援后，乾顺皇帝派大将李良辅带兵3万前往救援，熟稔山地作战的女真人在西夏救援军队途径的山区埋下伏兵，重创西夏救援军，这是党项和女真两个部族第一次正面的较量。

西夏和金的交战结果，使双方的军力优劣立即显现。1123年，西夏的乾顺皇帝像一只红绣球，辽和金谁能接到它呢？这一年6月大辽王朝天祚帝派使臣前往西夏，封乾顺为夏国皇帝，这是西夏自嵬名元昊建国后，第一次得到辽国的正式册封。乾顺的快乐不仅如此，这一年，他在40岁时喜得贵子——后来继承皇位的西夏仁孝皇帝。同样是这一年，为了扫除灭辽路上的障碍，金朝派负责西北方面军事指挥的大将宗望前往阴山和西夏议和。宗望带去的其实是一个骄傲的帝国居高临下的指令，西夏开始面临要么称臣、要么招致兵灾的两难选择。长期在大国势力包围中的西夏，再次运用娴熟的外交策略，选择向金称臣，双方正式建立政治上的主从关系。大辽帝国灭亡后，女真骑兵顺势占领了大辽的大部分地界，而西夏也乘机摘桃子式的占领了辽国和西夏接壤的地界，使互相隔绝的夏、金国土开始相连。

辽亡后，耶律大石建立西辽，金一直担心西夏和西辽联手，所以对西夏一直存有戒心。1125年，宋钦宗即位，西夏派使节前往恭贺，宋钦宗给西夏乾顺皇帝的信中指出：如果金亡宋朝，西夏也不会独存，希望西夏停止侵宋而防备金。这种外交往来自然引起了金的怀疑和不满。而西夏又乘金攻打北宋之际，从宋朝边境的薄弱地段下手，先后占领了西安州、怀德军等地，并围困兰州，这些举措更加引起金的不满。

1127年，北宋政权灭亡，西夏、金和南宋的“新三国”取代了原来的辽、宋和西夏的“旧三国”。

金灭北宋后，拥立了伪楚政权并使之和西夏划清地界，以限制西夏扩张，导致双方联盟出现破裂迹象。

1132年，西夏向金申请赐给甘肃境内的环县、庆阳一带遭到拒绝，西夏于是暗地里和南宋川陕宣抚使、著名抗金名将吴玠来往，并且拒绝金朝借道攻打南宋，这就使双方盟约公开破裂。金和南宋政权交战时，西夏乘机扩大地界。1133年，西夏举兵攻打金国的怀德城。次年冬天，金兵展开报复行动，但遭到西夏军队的反击。取得胜利的西夏继续扩大疆域。

1137年，西夏又发兵攻取了青海境内的西宁等地，使西夏疆土再次扩展到青藏高原边缘，乾顺皇帝随后向金求取已被金占领的今甘肃甘南、青海东南部地区，金应允了西夏的请求，使西夏的疆土西南端也再次伸向了青藏高原。

夏、金双方境内都是地广人稀，交战的目标除了争夺疆土，掳掠人口也是一个目标。金灭辽前后，西夏曾多次招徕辽境内的人口，金占领辽的土地后，要求西夏返还当初的移民，遭到西夏拒绝，这也是引起双方战争的一个导火索。

1150年，金朝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海陵王完颜亮篡夺皇位，废除金熙宗，并派出大将完颜改撒前往西夏观察西夏的态度和动向，被仁孝皇帝下令阻止于边境上，双方缓和了的关系再度紧张。1155年的夏、金战争，西夏取胜；1157年的夏、金战争，金朝取胜。夏、金战争期间，西夏的外交关系中出现暗地里准备联合南宋政权攻打金的现象，但未能实施。

1169年，西夏政府派人在今青海省贵德县境内修筑祈安城，引起金朝的高度警惕。金朝不仅在邻近地区布防军队，而且关闭了兰州和保安两处与西夏接壤的榷场。榷场的关闭引发了西夏内部的外贸危机，仁孝皇帝下令进攻金朝的麟州，损毁城池后，将城中的财物和人口掳掠而去。

1190年，在金朝国内混乱、自然灾害频繁的情况下，仁孝皇帝又

下令进攻金朝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仁孝皇帝死后，夏、金重新修好。这时，北方蒙古族崛起，成了钳制金朝的又一支力量。蒙古人在1205～1208年进攻西夏，夏、金再次合盟，互为声援。1209年，蒙古军队长驱直入西夏境内，围攻中兴府，西夏襄宗嵬名安全派人向金求援，但执政的卫绍王完颜永济拒绝救援，导致西夏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向蒙古人纳女求和，和蒙古人签订了城下之盟，和金维系了60多年的盟友关系彻底破裂。

1210年秋天，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大军围攻中兴府后一年，西夏就展开对金的报复，两个草原民族展开了最后的厮杀，主战场在葭州一带，“铁打的葭州”成了金防御西夏报复性进攻的前沿阵地。葭州之战，拉开了夏、金之间最后也最惨烈的战争序幕。1211年9月，蒙古发起了对金的战争，西夏乘机攻取和金相邻的地区，为了避免两面受敌，金一面抵抗西夏进攻，一面在政治上谋求和西夏缓和关系。但西夏政权利用1213年成吉思汗发动对金战争的时机，再次发动了对金的战争。收复了一系列城池的西夏军队，和蒙古军队形成两面夹攻金朝的局势。

从1215年春天开始，西夏重点攻取金国控制的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双方战争一度进入相持阶段。这一期间，西夏派出的部分军队和成吉思汗的军队曾在东线联手，南下进攻潼关，并且深入河南的许昌、郑州一带。1217年，金宣宗决定出击西夏，开始金朝历史上对西夏的最后一搏，由于和南宋的战争又起，只好作罢。蒙古兵却以西夏人对自己的礼仪渐渐少了为借口，再次发兵攻打西夏，迫使遵顼纳降，这次挫折迫使西夏对金的态度有了转变。1219年，西夏两次致书金，要求开放绥德、葭州进行互市，金朝的拒绝导致西夏再次侵扰金朝。

1217年，随着成吉思汗率兵西征，蒙古军队对金国的压力略有减轻，夏、金之间的战事开始升温。西夏军队进攻的重点在今甘肃的定西地区，名将嵬名令公带领20万大军南下攻取今甘肃陇西一带，夏、金双

方展开激战；1220年冬天，西夏大军配合蒙古军对金管辖的陕西境内发起进攻，帮助木华黎攻破葭州，但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池却被蒙古人独占；西夏军队继而攻取延安府，遭到失败。东线没尝到甜头，西夏军队把对金的进攻再次放在了西线，进攻今甘肃定西、青海的循化一带，没能如愿后，双方在今青海大通一带又展开激战，西夏再次失利。

嵬名德旺接过西夏帝国的最高权力棒后，不甘心西夏成为蒙古人攻打金朝的帮凶，他选择了再次和金结成盟友抵抗蒙古人。然而，他派往金朝的使者还没返回到中兴府，他和金的密谋就被擅长利用间谍的成吉思汗知晓，加剧了成吉思汗灭亡西夏的决心。他暗中将主持中原战局的大将孛鲁招到中亚，密令他伺机出兵西夏，将西夏的图谋消灭在萌芽状态。

1225年夏天，夏、金双方重新缔结盟约，定为兄弟之国，但是，双方十年间的征战已经内耗了各自的国力，在蒙古人的进攻前，双方的盟约只是一张白纸。这种缔结盟约的举动，反而加快了成吉思汗消灭西夏的进程，两年后，西夏亡于蒙古人之手，整个中国境内，对成吉思汗而言成为障碍的就只剩下女真这只“海东青”了。失去西夏这个有力的盟友，孤独的“海东青”不久也被蒙古人的弯弓射落。

沙州胜利：西夏帝国的最后残喘

成吉思汗西征未归之际，嵬名德旺暗地里派人前往漠北，联络和成吉思汗有仇的一些部落，试图组成抗蒙联盟，同时也派人前往金朝，希望和金恢复昔日的战略联盟，共同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两路西夏使者都被成吉思汗的间谍截获，知道嵬名德旺的这些举动后，成吉思汗更是无法平息内心的怒火，这种怒火一旦在他的身体燃烧并扩散为一个武装力量的能量集体释放，灭顶之灾就降临到西夏王朝。当时，中国境内的

南宋、金和西夏甚至成吉思汗征服过的那些地区，都无法准确估量出成吉思汗身上具备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和恐怖。他不再是西征前的那个铁木真了，他是世界的征服者和战无不胜的大汗。

13世纪，是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带领下征服草原外的世界的世纪，这位后来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帝国的蒙古族男人，统一了蒙古各部后，相继把欧亚大陆的40多个国家、700多个民族归服于他的蒙古帝国。美国科学院名誉院士捷克•法萨切优德这样说："成吉思汗改变了世界地图，当时的欧、亚洲由无数封建小国组成，成吉思汗把它们统一成了似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国家地形。"

1224年夏天，西征归来的成吉思汗在归途中围攻了西夏西北边境的沙州（今甘肃省敦煌），遭到了西夏战将籍辣思义的顽强抵抗，蒙古军竟然围攻数月未能攻克。

成吉思汗担心西夏出兵救援沙州，下令孛鲁、黑马率领军队从河东出兵，攻打西夏东部的银州，使西夏从东西两方面同时受敌。沙州在没有来自国都或其他方面救援、城中粮食告缺的情况下，杀牛、羊、骆驼替代粮食。这些能食的动物被杀尽后，城中军民依然坚守。蒙古军采取从城外挖地道攻城的办法，被籍辣思义察觉，在地道口放火击退蒙古军，蒙古军一时无法攻破这个西夏西北重镇。东线的蒙古军越过黄河后，就和西夏战将塔海领导的西夏将士展开激战，西夏东线守军在强大的蒙古军进攻下战败，塔海被俘，银州被蒙古占领。这种情形下，嵬名德旺不得不派人前往成吉思汗帐前请降，并答应送人质去蒙古。

沙州被围半年之久，依然未能攻破。攻城的蒙古军队也是人疲马乏，成吉思汗因为西征军东返，部队实力需要恢复，强大的金国是他夺取的重要目标，对西夏作战只是威慑，探明西夏态度后也只好下令撤军。孛鲁也因为要征战金国而从东线撤兵，西夏再次渡过了危机，但帝

国境内的一片残局，已经很难收拾了。

黑城之战：一座“伟大古塔”678年间的使命

1226年秋冬之际，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的最后一次亲征。惨烈的黑城之战，拉开了帝国最后的亡曲序幕。

汉代以来，一代代戍边人在黑城一带修建了一条条水渠，把黑河水引入耕地。黑城和它所在的居延，在自身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要塞，或者是连接漠北和中原地区的重要驿站，争战和农耕构成了这一地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西夏王朝在境内共设有12个监军司，最北边的黑水燕镇军司就设在黑城。黑城的居民在和平时期承担生产劳动，战时则参加战斗。这里的居民不仅有党项人，还有汉人、回鹘人、契丹人、鲜卑人、吐蕃人和回纥人等，他们共同居住在黑城，互相通婚结亲，共同繁荣着这个西夏的边塞城市。

1206年，铁木真宣布接受草原上众多部落联合推戴的成吉思汗称号，也就在这一年，西夏中兴府内发生的一场宫廷政变使西夏桓宗纯佑被他的堂弟嵬名安全废黜。他的母亲罗太后在那场政变中没有站在儿子身边。得到帝位的嵬名安全迫使罗太后致书金朝，请求金主正式册封他为西夏皇帝。当金朝的册封到了之后，嵬名安全和历代篡位者一样，玩起了过河拆桥的把戏，将信奉藏传佛教的罗太后发配黑城，在那里给她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佛寺，下令她不能出黑城一步，不许和都城里的皇室再有联系。

黑城因为太后的到来，增加了不少寺院，而为了防止罗太后和都城里的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嵬名安全下令增加了黑城的驻军，一则是增强

黑城的边防力量，二则是监视罗太后在黑城的行踪。在黑城寺院的青灯之下，想到自己为了皇位争夺，以图和西夏历史上那些有建树的皇太后一样能够统兵御敌，才和侄子联合推翻儿子的皇位，没想到儿子因此亡去，皇权旁落侄子之手，自己还遭到被囚禁在寺院的命运，罗太后自此心灰意冷，一心一意地在黑城的寺院里诵念佛经了。

罗太后在寺院里的生活，祥和而宁静，然而，随着蒙古军队的到来，这里持续多年的平静生活被打破。

在抵御蒙古军队的几次抗争中，居住在黑城中的党项男人甚至其他种族的男人都被编入了军人序列，党项人大多被编入“正军”[①]。黑城外围有一片南北长约40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的地域，当地牧民称为“额尔古拉”，汉语的意思是“幽隐神秘的黑沙包”。西夏在此驻扎了不少军队，旨在切断契丹和西面吐蕃、回鹘等民族的联系，历代西夏帝王的苦心经营，使黑城成了连接西夏和西域的区域商贸中心和文化、宗教中心，自然也就成了蒙古军队征伐西夏的一个障碍。一旦攻破这个重要的军事重镇，整个丰饶的河西走廊就像一盘丰盛的大宴摆在蒙古军队面前，吃完这道盛宴后，蒙古军队会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把西夏国都夹在中间。失去黑城，对西夏而言，就意味着失去最后的生机。

黑城在历史上发生过多起饥荒，史料中关于干旱、虫害、绝收的描述比比皆是。每年的春夏之交，都是黑城生活最困难、防守最薄弱的时候，因此也是最危险的时候。早在1205年春天，成吉思汗就借口西夏收

---

①早在西夏开国之初，元昊定制西夏军制时就有“正军”。正军是“抄”的主力。“抄”是西夏军事组织中最小的军事单位，由两到三个人组成。正军通常由英勇善战不负众望的人担任。正军之下还有一个副手，称“辅主”，随时准备接替正军的位置。正军和辅主之下，还有一名杂役，叫做“负担”，任务是保证正军的后勤。西夏法律规定，两个年满15岁的男人中，必须有一个成为正军或辅主，而另一个成为“负担”，有女性的家庭必要时还要参加地方军队。

留了蒙古仇人，在三月粮荒时首次袭击了西夏，从此开始长达20年之久的对夏战争。黑城是蒙古人每次都要攻击的要塞，面对蒙古军队的几次进攻，这个城池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依然牢固地掌握在西夏手中。

最后也是最残酷的战争在1227年春天开始，越来越多的党项男人战死，女人和牛羊被征虏者带走，牧场被踏毁，农田被毁坏。全城军民在饥寒状态中抵抗了3个月，10万将士几乎全部战死，城市沦陷后，西夏军民的奋力反抗同样给这个西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城池带来了被血洗和屠城的命运。

黑城，这个相伴西夏王朝200年的城池，以1227年春天时的悲怆陨落在历史的视野中。关于战骑踏过黑城后被血洗的史实，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详细的记载，在那场战争发生以后的近50年中，这里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沉默。

屠城带来的是一片死寂，但蒙古人很快便在这里调集军队和移民，使这个边塞城池恢复了繁华。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这里，看到的已经是一个绿洲之中生气盎然的城市。几百年后，人们在勘探黑城的时候，发现城墙遗址中竟然还嵌套着一个更古老的小城，原来这才是西夏的黑城，而套在它外面的是元代时修建的亦集乃城。从1372年开始，由于黑水河改道，致使古居延海急剧萎缩，黑城渐渐变成了一座废城。

黑城在西夏时期，有个党项语的名字——亦集乃。蒙古军夺取了这个军事重镇后，沿用了党项人的叫法，这种叫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被口头演变为现在的“额济纳”。800多年里，它就像一尊名贵的瓷瓶，一天天忍受着风沙吹过，不曾有人为它擦拭。直到536年后，黑城以解读西夏的另一个使命再次出现在一个俄国军官的眼前。

19世纪末，俄罗斯旅行家波塔宁从中国旅行回去后，在他的一本

传记里记载了一个叫黑城的地方。在他的笔下，黑城是财富的代名词，那里藏有许多的珍宝和见证一个神秘王国的文书与经卷。波塔宁的描述给西方带来了新奇、探询、征服、获取等各种心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最早开始准备向黑城进军的工作，他们组织了一个“文化远征军”，委托一个叫科兹洛夫的军官带领有关人员去发掘那个“神秘王国的见证之物”。

1908年3月19日，科兹洛夫带着他的探险队从甘肃张掖出发，踩着厚厚的白雪连续行走了三天，除了茫茫无际的积雪外，沿途几乎什么也没有，如果不是偶尔出现的几个零星的村落，他一定以为自己是在一个巨大的无人区内穿行，沙漠气候对他们的考验是严峻的，但那茫茫积雪后隐藏的神秘的“东方黑城”对他的吸引力远远大于严寒、迷路、饥饿等各种困难。突然，一座在沙漠里显得高大突兀的古塔跃入了他们的视线，那是一座典型的中国西夏时期的古塔，科兹洛夫和随从终于到了梦幻般的黑城，他在日记里如此记录看见古塔时的激动：“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那座古塔不仅在茫茫沙海与雪原中给他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成就了他在西方探险史上的地位。第一次步入黑城，他没动那座古塔，而是在黑城遗址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就挖出了10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文物。经过13天的挖掘，他们发现了这个古城既不是中国中原王朝的建筑，也和沿途他们进入中亚地区的那些古城有着很大的差异。介乎这两者之间的神秘及那些稀奇古怪得连当地向导也无法辨认的文字，使他们欣喜若狂。当他们透过历史和大雪的两重隔距发现了这个沙漠深处的历史秘境后，在一种巨大的狂喜中对古塔发出了“真是一座伟大的塔”的赞叹。由于不认识那些经卷上的文字，不懂那些精美的绘画作品，科兹洛夫以为这是一个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地带上一个小的城邦而已，加上带的经费与给养已经不够，天气的寒

冷使那些雇佣来的中国民工陆续逃离。3月31日，科兹洛夫带着随从匆忙离开了这里，他们把在古城的各处翻找出的认为有价值的遗物，如书册、信函、钱币、装饰品、家具、佛像画像等，打包后寄回了俄国。然后，他开始准备取道青海去四川，继续寻找波塔宁笔下的“黑城”，他并不知道自己待了13天并进行挖掘的地方就是那个古老的黑城。

两个月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收到了科兹洛夫从酒泉寄出的那批文物，打开时，在场的人都被那些精美的装饰品和佛像画像、帛画、工艺品吸引了。经过认真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能充分体现中国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汇融水平的王朝，从年代看，要比成吉思汗的蒙古王朝早。但具体是什么年代和什么朝代，谁也说不清楚。皇家地理学会非常重视，立即发出电报，要科兹洛夫一行返回发现这些文物的地方，继续挖掘。科兹洛夫正行进在青藏高原的东缘，沿着青海准备进入四川。接到让他返回的信息时，已经是6月了，科兹洛夫仅用了9天时间就重返黑城，开始对黑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挖掘。

这次，天气热了，雇佣的民工也多了，自己带的给养也充分了，他开始把眼光瞄向城外这座“伟大的塔”，当尘封的古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面对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他们把挖掘的范围扩大到古城四周，几乎是见塔就挖。黑城周围70%～80%的塔被彻底毁了。这次，他们又发现了各类文书40驮，24000多册，佛画500多幅。这些文物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直至1909年秋，才运抵俄国圣彼得堡地理学会所在地，共编了8000多个号，佛塔内丰富的文物，为之后揭开西夏历史之谜提供了翔实的文献史料。

1929年，科兹洛夫第三次来到黑城。上次，在挖掘过程中，他听说这一带流传的西夏著名的军事将领黑将军率军抵抗蒙古军队的故事：黑将军在蒙古军队来临前，将共计80车财宝和自己的女眷埋进一个巨大的坑内，自己则和军士们拼命抵抗，后来，在城西北侧破墙打洞率军突

围。在城外的一片树林里，与追杀来的敌军遭遇，经过殊死拼杀，最终全军覆没……几百年间，黑将军藏宝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下来。科兹洛夫对这个传说有着很大的兴趣。他第三次进入黑城的最大目标就是黑将军的宝藏。他雇用当地牧民挖掘了两个月，挖到一定深度后便解雇了牧民，由他带的队员挖掘。科兹洛夫在一座藏式佛塔里发现了刻本、抄本书籍2 000种以上，并发现300张佛画和大量木制的、青铜镀金的小佛像。另外，他还在一座公主墓中发现了画在丝绸、麻布和纸上的佛教绘画25幅。

科兹洛夫再次把这些文物搬运到了俄国。来自黑城的文物，被俄国学者很快认知，但他们不认识那些布满佛经、文书、契约上的古怪文字——西夏文，便把太多的关注放在佛经与公函上。后来，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在成堆杂乱的文献中发现了那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有了这本西夏文词典，在黑城挖掘出的众多文物上的神秘文字逐渐被俄国学者认知，他们从中知道了这些文物来自一个古老的王朝——西夏王朝。这部字典，成了他们进一步探寻神秘的西夏王朝的一把钥匙。

俄国的学者们至此才明白，科兹洛夫带来的是一个有着190多年历史且突然消失了的王朝的文物，海外西夏研究从此真正地开始了。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国运衰败的时候，没有人关心祖国大地上的这些珍贵文物的去向，当地政府和民众也没有出面阻拦这些打着探险旗号的盗窃行为。

科兹洛夫就这样站在西夏王朝的黑城文物上出名了，不久，他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展示了他的伟大发现，而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们“辉煌的战果”。科兹洛夫没有想到，这次发现几乎缔造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基础。

科兹洛夫的所获引起了国际的注视，其他一些国家的“探险家”也

纷纷前往黑城。1911年，英人斯坦因(A. Stein)率第三次中亚探险队，前往黑城，掘走了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文献，其中西夏文文献较多，还有不少水墨图画。斯坦因后来出版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成了鼓动西方探险家前往中国西北地区探险的兴奋剂。他在英国举办的展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就是这些西方人中的一位，很快，华尔纳就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程。

1923年冬，在中国最高当局签发的通行令保护下，华尔纳坐的木轮马车上插着具有保护伞和炫耀性质的星条旗，行进在河西走廊坎坷不平的泥泞土道上，再次留下了其作为文化探险者和掠夺者的行踪。华尔纳的挖掘结果是懊恼和沮丧的，整整十天中，在他挖掘的每一处，几乎都能看到曾经被人挖掘过的痕迹，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是壁画、木雕还是塑像、手稿等，都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残片和盗坑的遗迹。他在失望中痛骂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是“两头野猪”，把这里啃得一干二净。即使这样，华尔纳还是挖到了几件壁画残片和3只陶罐、几十枚钱币等小东西。在雪花飞舞、滴水成冰的严寒袭击下，在野狼的嗥叫声中，华尔纳撤离了黑城。

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也介入了对黑城的文物掠夺，他们在悄然中掠走了西夏重要文献《蕃汉合时掌中珠》和西夏文字典《音同》。中国学者出现在黑城，已经是1926年9月中旬。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中国北京大学徐炳昶教授共同担任团长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黑城考察时，在这里进行了测量、绘画、拍照、制图等工作。热衷于追录前人未发现的空白点的斯文•赫定，在黑城仅停留两个半小时便继续向西北行进。这次中外合作考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觉醒。协议规定考察团的一切发现不准带出国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珍宝的巧取豪夺终于第一次在中国被成功地制止了。

中国考古界对黑城的真正科学考察时间，比科兹洛夫的挖掘整整晚了67年：直到1976年，中国才对黑城这个西夏的军事和文化重镇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挖掘。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黑城附近的老高苏木古庙，发现了西夏文重要字典《音同》的一些残片。黑城的发现成为20世纪中国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跻身20世纪中国四大文献发现行列。

西夏学，何尝不是一门令人心酸的学问？

铁骑过处：从祁连山到贺兰山的哀歌

黑城陷落后，带着胜利者的笑容和血洗西夏北方重镇后的快感，成吉思汗让阿塔赤带领西路大军从今天的新疆西部起兵，借道新疆东部，直接将攻取的下一个目标锁定为沙州。

蒙古军队的围攻遭到沙州守军的再次抵抗。蒙古大将忽都帖木儿见无法以武力取胜，便写信招降。沙州守将接到信后，结合当时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使用诈降计，派使节前往蒙古军营请降，并准备了牛羊和酒肉犒劳蒙古军队，忽都帖木儿率军前往纳降时，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混战中几乎被西夏军队擒获。这次诈降激怒了阿塔赤，他集结大批蒙古军围攻沙州。沙州在力量悬殊、外援不继的情况下，成为又一座失陷的城市。

沙州被攻克后，肃州成了西路蒙古军队的第二个攻占对象，蒙古军遭到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归降成吉思汗的沙州党项人昔里钤部被忽都帖木儿召集到营帐中，眼见不久前蒙古军队屠沙州城的惨状，昔里钤部为了保住居住在肃州城中的父母亲人，也为了避免肃州因为屠城而使无辜百姓遭殃，便告诉忽都帖木儿，守卫肃州的西夏战将举立沙是自己的弟弟，他愿意前去说服弟弟献城投降，条件是不能屠杀城里的百姓和投

降的士兵。

昔里钤部来到肃州城里，弟弟举立沙对他说："大夏立国百年，何曾出现过为求生而投降的将士？只是不能因为我的匹夫之勇而使百姓遭受屠城之累，我同意献城。"献城的那天上午，就在忽都帖木儿带着蒙古兵士来到城下想乘机羞辱举立沙及其他西夏将士时，只听举立沙在城门上高声说："我大白高国的将士断没有投降之先例，我等不反抗你们蒙古人，是为了避免全城百姓遭受你们的污手，今献城给你们，如果屠杀无辜百姓，我做厉鬼断不放过你！"说完，当场自刎而亡。还没等忽都帖木儿反应过来，举立沙手下的10多位将军也齐刷刷自刎而亡。那时，缓缓开启的肃州城门拉启了一曲西夏勇士的悲歌。这让忽都帖木儿非常气恼，一则是肃州城久攻未下而怒气未解，二则是西夏将士竟然采取这种态度对待蒙古军队，他当场下令屠城。

昔里钤部立刻为自己留在城中的父母、亲族求情，就这样，整个肃州城仅有昔里钤部的亲族一百零六户被赦免。这是1226年秋冬季节成吉思汗发动的对夏战争中，第三个遭到彻底屠城的城市。西路蒙古军继续沿着祁连山南下，攻取西夏在河西的城池、草场、村落，蒙古军的厮杀和西夏军的抵抗，构成了1226年冬天八百里祁连山下的景观。

流淌着西夏抵抗者之血的蒙古战刀，开始刺向甘州。

成吉思汗的间谍战在这次甘州之战中发挥了作用，一个叫察罕的党项人出现了。察罕是甘州的西夏守将曲也怯律的庶子，早年投奔成吉思汗，被成吉思汗认作养子并多次立功。随同作战的察罕被授意给曲也怯律写信劝降，这封信被甘州副将阿绰发现，便联络军中的36名将领，杀死了蒙古使者和曲也怯律全家。双方展开激烈的攻守战，阿绰和其他36名将领带领众多将士全部战死，甘州失陷。成吉思汗本想继续下令血洗甘州，因为察罕的极力劝阻才罢手。

蒙古军沿着河西走廊向南推进，河西走廊最南端的大城市、西夏陪都凉州，迎来的是蒙古军的全力攻城。西夏守将斡扎箦是著名文臣斡道冲的后代。经过短暂的抵抗，斡扎箦为了保全这座名城，选择了献城投降，整个河西走廊全部从西夏的版图里消失了。

攻取凉州后，蒙古军继续向青海境内的西夏守军发起进攻。一路蒙古军队穿越腾格里沙漠，一举攻下了西夏的应理州（今宁夏中卫一带），西夏的东部重镇灵州成了蒙军下一步攻取的目标。

早在1223年四月，遵顼派太子嵬名德仁带兵助蒙攻金，太子就向他进谏：金国现在的兵势依然强大，攻打他们会无辜耗损我们的力量，不如和他们缔结和约，结成盟友。这个建议遭到遵顼的驳斥：金国丢失了兰州都不能收复，怎么说它强大呢？太子见父亲根本听不进自己的建议，便舍弃太子之位，想出家做和尚，希望以此感化父皇。这反而让遵顼认为太子不孝，将太子囚禁在灵州。1226年冬天，蒙古军队兵临灵州城下。

西夏名将嵬名令公带兵10万渡河驰援。这时的黄河已经结冰，双方在厚厚的冰面上展开激战，西夏将士虽然拼力抵抗，但作战能力显然弱于蒙古军队。倾全国军力支援灵州的结果是嵬名令公带领残部退守灵州，灵州守将佐里战死，被贬黜到灵州的废太子被俘后因不肯投降而被处死。

灵州一战，西夏除都城外的最后一脉血气全部散失，蒙古军队扫荡了西夏东部的盐州等地，昔日辉煌的帝国只剩下国都一座孤城。看着这座西夏的心脏在做着微弱但顽强的跳动，在一时攻打不下的情况下，成吉思汗在蒙古军队对中兴府形成包围后，带着自己的精锐之师走进了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境内。

随着马队的移动，成吉思汗仿佛看见这次征服会将西夏一举灭亡。当他在马上沉浸在这种愉悦的想象中时，那片广袤的草原上突然出现了

一座孤兀的山丘，山丘下的戈壁碎石使他的坐骑突然失蹄，成吉思汗就这样摔了下来。关于这次进军西夏的路线，目前所见的史料没有详细记载，但在今天内蒙古鄂托克旗境内的阿尔寨石窟有着描述这次出征时的壁画。阿尔寨石窟，离鄂托克旗旗府所在地乌兰镇130多公里，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鄂托克旗以盛产白羊绒而享誉世界的阿尔巴苏木（乡）境内。这组集寺庙、石窟、岩刻为一体的佛教建筑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草原地区规模最大的西夏石窟建筑群。

据当地史料记载，成吉思汗率部下在阿尔巴斯山围猎野马，坐骑受惊，不幸坠马受伤。阿尔寨石窟东南侧的10号石窟被当地学者认为是成吉思汗养伤时的住所。该石窟门口竖有代表成吉思汗战无不胜的威猛神勇的苏勒德神矛，门西侧壁上有一座西夏风格的佛塔浮雕。关于这个说法，《蒙古秘史》里有着补充性的记载：进军途中，成吉思汗围猎野马。忽然，一群野马迎面撞来，成吉思汗乘坐的那匹马惊叫跳跃，将成吉思汗掀下马背。成吉思汗因此受伤，当天夜里就发起高烧来。第二天早晨，他随身带的也遂妃对诸子、诸臣说明了这个情况，建议他们商议军队的进退问题。晃豁坛氏的脱仑扯儿建议暂时退兵，但成吉思汗不甘心无功而返，主张就地扎营，派使者探听西夏人的态度后再决定是否撤兵。

端坐在这个传说中的成吉思汗显然无法继续亲征西夏，但他依然派人到兴庆府问责新即位的嵬名德旺，要他对阿沙敢布几年前的傲慢无礼作出解释。

成吉思汗的使者带着高傲的姿态走进西夏皇宫，嵬名德旺以最高的礼节招待不可一世的使者。酒宴上，使者对西夏君臣转达了成吉思汗的质问："以前你们曾说过，西夏百姓愿为我的右手。然而，当花剌子模挑起争端时，我在征讨前派使者希望你们从征，你们却不实践自己的诺言，不但不派从征人马，反而用恶言恶语讽刺挖苦。战无不胜的成吉思

汗当时就说过，等西征回来后再与你们算账。今天让我来与你们‘证其言来矣’。”嵬名德旺听了这段话后说：“我未尝出言相讥。”

成吉思汗的使者再次问道：“当初让你们出兵，听说你们这里有个大臣叫阿沙敢布，讥讽大汗无能，现在，大汗远征西域凯旋归来，凡是有牛羊的草原都已经被大汗的军队征服，凡是抵抗者都倒在了蒙古军士的战刀下，大汗让你追究这个对大汗无礼的人。”嵬名德旺赶忙打圆场说：“哪里，这纯属谣传，我们对大汗一直尊敬无比，怎么会有这样的话呢？”这时，阿沙敢布立即站出来承担责任：“相讥之语，我尝言之。今汝蒙古若以惯战而欲战，则我有阿剌篩之营地，有褐子之帐房，有骆驼之驮焉，可趋阿剌篩山奔我，在彼战之。若需金、银、缎匹、财物，则可奔额里合牙、额里折兀。”意思是说，我们西夏有贺兰山做营地，有银川、西凉这个财物富足的后方，欲战欲抢，悉听尊便，我们不怕。

使者回到成吉思汗身边自是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当时成吉思汗尽管还在发高烧，但仍然坚持继续进军西夏，并发誓要洗雪耻辱，“虽死也要到阿拉善去，来证明我铁木真汗的威力”。

已临暮终时期的西夏，在强敌压境时，能有如此骨气的大臣，确实是奇迹。嵬名德旺在阿沙敢布这样的鹰派人物的鼓励下，表示坚持和蒙古交战。然而，阿沙敢布的表态并没有给处于垂暮状态下的西夏朝廷提气，反而招致蒙古人对西夏彻底的毁灭性打击。

成吉思汗大军中的一支精锐之师从黑城南下，直抵贺兰山西部的阿拉善地区，和驻守在这里的阿沙敢布交战，阿沙敢布战败被俘，西夏军队的营帐、军需物资、骆驼等都成了蒙古军队的战利品，俘虏中强壮者全部遭到屠杀，瘦弱者被分发给蒙古军士做奴隶。这是继黑城、沙州、肃州、灵州后的第五座被屠的西夏城池。

和中兴府仅仅隔着一座贺兰山的阿拉善失陷，让嵬名德旺被日甚一

日的恐惧包围着。他常常在噩梦中惊醒，终于，他在最后的一个噩梦中再也没有醒过来。这个连儿子都没有的倒霉皇帝，在风雨飘摇中留下的西夏皇位，该谁来坐？皇位的继承者，还能给这个垂暮般的王朝带来什么好运么？

最后的快感：死于党项女子手下的成吉思汗?

嵬名德旺在惊慌中死去，他的侄子南平王嵬名晛在最后的残局下，被仓促推上帝位，这也是西夏最后一个皇帝。

带着在阿拉善屠城后的快感，带着征服应理州的胜利，1227年六月，成吉思汗从应理州渡过黄河进入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区避暑。

1227年春天的一天，归降成吉思汗的党项人察罕再次被成吉思汗唤到帐前。他对察罕说："你和昔里钤部都是归降我帐下的唐古特（蒙古人对党项人的称呼），跟随我参加过无数战役，立下了很多功劳。在攻破肃州的战役中，昔里钤部在攻城之前曾到城中劝降他的哥哥。在攻打甘州的战役中，你曾进城劝说你的父亲和弟弟放弃抵抗，甘州之战后，你提出不要屠杀那些唐古特，我下令只杀了那誓死抵抗的36名唐古特，使你在整个唐古特中赢得了无比崇高的声誉。整个唐古特将你视为英雄，现在，唐古特的中兴府已经被我的大军包围了半年，但他们依然不归降，我也不想尽杀民众，如果唐古特的国王归降，我保证不杀他们。现在，我希望你能前往中兴府，给唐古特新任的王子告诉这个消息。"

带着成吉思汗的旨意，察罕从六盘山的林地中走出，沿着清水河向北而行，前往中兴府"谕以祸福"。嵬名晛坐在中兴府的皇座上，接见了察罕。察罕向西夏皇帝说明成吉思汗的意图后，嵬名晛显然不相信成吉思汗的话，他反问道："当初，蒙古军队攻占我大夏，一些城池并

没抵抗，却遭到屠城，一些归降将士，却遭到屠杀。而且，在灵州之战中，竟然连出家的太子也被俘虏并威逼归降，太子不从后遭到屠杀，你们的大汗是个屠戮成性的人，是一头草原上的饿狼，没有什么能够满足他贪婪的胃口。”

传奇的想法在那一刻从这个西夏末代皇帝的大脑中产生，出于逃生本能，或许他想给自己和随从充足的逃亡时间，便派使者和察罕一起去觐见成吉思汗，请求和谈并订立誓盟，希望成吉思汗给他一个月期限，以便准备礼物，将城里居民迁出来。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些秘密就此发生：西夏的末帝或许安排好了逃跑的一切事宜，带着自己的随从、妃子、工匠、精锐的御林军等，在提前设计好的路线上，带着一个帝国最后仅存的果实，开始了秘密逃亡。

关于西夏末帝的逃亡，汉文、藏文和西夏文历史书籍中没有记载，只是说在觐见成吉思汗途中被蒙古人杀害。如果西夏末帝逃亡，其逃亡方向或路线是这样三种：

一是向西逃往祁连山一带，越过祁连山进入今青海最北端的祁连县。我曾经在祁连县查阅藏文文献，文献记载，西夏末帝叫多杰华，逃到祁连县城西侧后在那里的山上修筑了一座规模宏大易守难攻的城池，当地也流传着西夏皇妃在那里投黑河自尽的传说，至今，那座山仍被叫做“多杰华”。

二是向西南方向进入岷江流域，逃往今四川西部高原的羌人生活地区，如今，在那里也有许多关于西夏逃亡者和当地女性结合留下诸如四川丹巴美人谷等的传说。

三是在他们的首领赛吾（藏语发音）带领下，从青南大草原辗转进入甘甲一带垦荒种地，逗留长达20多年，其部下的华秀氏、交合秀氏、掖合秀氏、嘉秀氏、达合秀氏等260多个部落，分为三个大的部落，一部分随赛吾沿岷江南下到今康定西部的木雅地区定居，建立了西吴尔

王国；一部分西上今西藏地区定居，元朝时被八思巴接纳为卫藏13万户之一；还有一部分流散在川西高原、甘肃南部甘南草原一带，从事游牧生活。

进入六盘山地区的成吉思汗迎来的是死亡的命运。六盘山下，成吉思汗被党项人的连环弩发出的毒箭射中，箭毒发作时带来的痛苦开始折磨这个横扫世界的蒙古男人。大半生长途征战使一代天骄的体质受到很大损害，加之出征前的坠马跌伤，远离蒙古高原的气候、地理条件、饮食等原因，使他得了一种大概属于瘫痧伤寒的疾病，同时，常年马上征战的无规律生活，使得胃病、风湿病、脾气暴躁带来的心脏病等，都成为夺去他生命的敌人。最终，上帝之鞭折断在六盘山下的丛林里。成吉思汗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大限将至，命令自己的儿子窝阔台、拖雷等来到自己的身边，给他们留下了三条极其重要的遗嘱：第一条，儿子们必须齐心协力抵御敌人；第二条，关于灭金的战略方针；第三条，如何彻底灭亡西夏的意见："我死后，你们不要为我发丧、举哀，好叫敌人不知我已死去。当唐兀惕国王和居民指定时间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后来又对自己统领的军队下令："每饭则言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对西夏王朝进行灭绝性的政策此时已经出台，成吉思汗决心将西夏的百姓全部屠戮净绝。

当然也有其他关于成吉思汗死因的说法，比如说西夏进献的党项女子，带有复仇使命走进成吉思汗的怀抱，在成吉思汗和她房事过程中，拿出准备好的剪刀，剪伤了成吉思汗的性器，导致成吉思汗下身一直受伤直至死去。这个传说在著名的蒙古学家拉铁摩尔的记录中得以体现：成吉思汗曾经做过一个红血撒在白雪上的梦，解梦者说这意味着所有少女中最美丽的女子，要成为他的女人。成吉思汗召集所有纳贡国家进献的女子，问最美丽的女人在什么地方，这些人集体推荐红墙之国——唐兀惕国王的女儿，于是成吉思汗遣使索取了这个少女。而西夏的国王对

使者说："如果神圣的成吉思汗想要我的女儿，我当然会将她送去。"但私底下给女儿一把小而锋利的刀，并嘱咐女儿"把它藏在衣服里，当那一刻来临时，你知道该做什么"。当这位党项女子伺候成吉思汗熟睡时，她手中举起的尖刀剪伤了成吉思汗的性器。

这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的出现，最大的可能不是炫耀西夏皇室女子的机智和勇敢，而是蒙古人不愿意陈述自己的精神领袖在自然中死亡的平庸。

而在蒙古人写的《蒙古源流》中说，成吉思汗要强占西夏国王的妻子古尔伯勒津，这个艳惊四座的西夏美人说，在成吉思汗的军队搅起的灰尘弄脏她之前，她会更加美丽，因此她才被带进黄河里沐浴，就在她沐浴时，她父亲养的一只鸟飞临上空，并预言了她要溺水身亡。沐浴后的西夏女子果然美艳无比，这样就避过了她走进成吉思汗军帐时的脱衣检查。就在成吉思汗进入她身体时或已经进入时，她拿出了备好的剪刀使"汗体受伤，因致不爽"。损毁成吉思汗的生殖器后，这位西夏皇后寻机投河而亡，这个故事同样在藏族文献里有明确记载。可以肯定的是，这个66岁的世界之王的死亡，和西夏人有关系。

显然，成吉思汗的死因、亡地及后来的埋葬地，都作为蒙古人最高的机密被严守了下来，但成吉思汗临终前的遗言及对西夏的攻略，却被他的继承者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意志执行着。

为了完成铁木真的遗愿，蒙古军队加紧了对中兴府的进攻。恐惧和愤怒震撼着1227年春天的中兴府上空，征杀者和防御者的对峙之声淹没了其他一切声音。夏都被围达数月之久，一场带来灭顶之祸的地震恰好发生在西夏国运最衰时，建筑被摇塌了，民众被埋在地下，一切外援被阻隔，在一个大面积崇奉佛教的国度，这场地震摧毁的更是西夏军民抵抗蒙古军队的信心，他们最终因弹尽粮绝和信心丧失，于这一年六月举城投降。

成吉思汗没能看到西夏王朝的大厦轰然垮塌的那一刹那，在他的征伐地理中，宁夏平原仅仅是他英雄征程的短暂一瞬，也是被忽略的一瞬。

蒙古军队摧毁掉这个鲜活的都城后，连贺兰山下依次排放的那些西夏帝王的坟墓也没有放过。从元昊将自己的祖父李继迁的墓地迁移到贺兰山东麓的那片冲积扇地带上，元昊以后的几代西夏君主也安葬在这里，那些高大的坟丘、华丽的建筑还有珍贵的随葬财富，都足以吸引蒙古骑兵前往并摧毁。

贺兰山下的那些西夏帝王之陵，如今已成一堆堆内蕴沧桑的土冢，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少数民族帝王陵园，与北京的明十三陵、河南巩县宋陵并称“中国三大帝王古陵”。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几十个土堆零零星星地散居在一片约50平方公里的开阔地上，成了当年蒙古军队屠城灭朝的一份无字证词，9座皇帝陵园和250多座达官贵人的墓葬遗迹，成了帝国之死的另一份沧桑见证。

第九章
传奇之后的传奇：王朝后裔的一地迷影

传奇帝国在亡身后依然续写着传奇，这个续写者就是党项的遗民。

中国已无西夏朝，世上已无党项人。和其他逝去的王朝不一样的是，这个神秘的王朝还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数百万模糊的背影，以及无尽的猜测和揣摩。这个习惯了流徙的民族，再次唱着悲怆的歌谣，负载着一个民族的沉重希望，在一个个浓重的夜色里，一批批仓皇地离开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帝都。面临着铁桶般的包围圈，他们能逃向哪里？

西夏王朝虽然带着一身秘密消失在历史的关注之外，但这种神秘就像一坛陈年老酒，时光越老，香气越浓，那些裹在其中的谜团也就越大。十年间，我孤身一人走在寻找西夏后裔的路上，这种追寻遍及中国18个省市的都市街巷和田野丛林，终于完成了一个人文学者对一个消失王朝遗定的使命。

阿拉善高地和额托克草原的唐古特

西夏亡国后不久，马可•波罗就来到中国，当他经过西夏故地时，听到元政权对西夏及西夏遗民的称呼——“唐古特”。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最初十年，在西方驻北京使馆及其相关机构中工作过的英国学者卜世礼曾经对消失的西夏人给予过很大关注。1895年，他在专著《唐古

特的西夏王朝及其钱币和奇特的文字》里面这样写道：

> 唐古特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名字在中世纪的中亚旅行者中广为人知。唐古特在1227年最终亡于著名的成吉思汗，其后被划分成了五个州，马可•波罗用了好几章的篇幅来描述这片地区。当时这里叫甘肃。

生活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的党项人，对于蒙古人来说并不陌生，蒙古语中把党项人称为“唐兀”(tangu)或者带复数词缀的“唐古特”（tangwut）。从马可•波罗到卜世礼甚至更多的国外学者，更多地也把西夏王朝或党项人称为“唐兀”或“唐古特”，可见，西夏人还是有不少遗留在上述地区。

西夏王朝的疆域东北部曾一度延伸到今内蒙古的五原县、乌拉特旗、和林格尔一带。契丹人最早也称西夏人为“唐古”[①]，这是用河套地区的方言来称呼党项人的。

西夏亡国后，西夏故地被划归给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管辖，《蒙古秘史》中有这样描述：“成吉思汗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合墩。”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鄂托克旗的布拉格苏木、巴音陶亥苏木和查不苏木一带，仍住着称为“唐古特”、“斡索黑”的党项人后裔，应该就是也遂合墩的属民。

在青草间穿行，我来到鄂托克前旗的哈沙图嘎查（嘎查是草原上相当于内地村的建制），在牧民那雅家里喝茶时，我随手拿起放在炕边的户口本。那雅老人说：“上面那个叫那雅的名字是蒙古族的名字，我是唐古特，叫唐仲才。鄂托克草原上的唐古特都不对外说自己

---

①《辽史》里最早出现的“唐古”写作“陀古”或“唐括”。

的名字，这个习俗保持了700多年。”他告诉我们一个巨大秘密：整个鄂托克草原上分布着一支神秘的人群，他们是唐古特党项后裔。那雅说：“我奶奶那辈从鄂托克前旗北边的杭锦旗过来，我们是唐古特，来到上杭盖那里落户。”

那雅老人介绍，仅他所在的哈沙图嘎查就有20多户唐古特，他们都将自己的唐古特姓氏藏在心中，填写在身份证上的是蒙古化的名字。“我们是布力也沁唐古特，也就是吹号的唐古特。我们的祖先是西夏的乐手，从西夏时就传下来的一个木头做的长号，长1.5米，专门用蒙古包供着，解放后交到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在那里供着。”布力是“号角”、“号管”的意思，也是语助词，沁表示“的人”，布力也沁就是吹号的人、号手或掌管吹号的人。

当我在鄂托克前旗的青草间遇到拜图嘎查的丹必老人时，他正和一些附近嘎查的唐古特在一个敖包举行祭祀仪式。他一听我的来意后立即说：“我就是唐古特，我们周围的公务素嘎查甚至鄂托克旗有很多唐古特。”几口烈酒下肚，丹必老人唱起了草原上流传下来的歌曲。那穿透在青草间的苍凉之声，仿佛在为那逝去的王朝、那隐名遁身的唐古特命运抒唱。

在鄂托克草原上行走、调查、采访的日子过得很快，我的收获也逐渐清晰：鄂托克草原上有4万多蒙古族人，唐古特就占20%，这8 000多唐古特是西夏王朝湮灭后最大的西夏后裔聚居地。和那雅老人这样的布力也沁不同的是，在鄂托克草原上还有主要聚居在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今属上海庙镇）的上唐古特、主要聚居在鄂托克旗陶亥乡、查布苏木的下唐古特和从原宁夏陶乐县黄河边聚居后迁入鄂托克旗境内的河畔唐古特，共同构成四大唐古特聚居区。

780年过去了，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西夏后裔，一直坚持着自己作为唐古特的秉性，保持着隐名埋姓的习惯，仍然坚持自己就是“唐

古特”。

早在2004年冬天，我在追寻鄂托克前旗散落的西夏后裔过程中，就曾前往鄂托克前旗，那里保护的比较完整的11座古城中，有9座是西夏前期党项人的古城。西夏建国后，这里依然住着大批党项人，他们一直伴随着西夏王朝的盛荣衰枯，直至其灭亡后，才归降了蒙古势力。

在整个西夏时期，从祁连山到贺兰山之间的地域全归西夏所有，而处于这两山之间的阿拉善地区遍布着西夏民众，这里就是连接西夏和整个河西走廊的巨大纽带，驻扎不少兵士且设置了一个监军司，管辖不少臣民。

最后一次走进阿拉善高地是2010年9月15日到19日，吸引我前往的主要原因是那里分布着几幅西夏岩画。岩画旁边的西夏文字明确地告诉我，那是西夏人留下的艺术品，岩画在今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孟根布拉格苏木的曼德拉山上。曼德拉是西夏骑兵和商旅往来旅途中的驿站，处于西夏都城银川与河西走廊之间的一条枯燥而艰辛的沙漠之路上，因为其远离宋朝军队和西夏军队交接地带，也远离西夏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骚扰，所以，对西夏而言这也是一条安全性和隐蔽性都很高的“国道”。1028年，元昊发动对甘州的长途奔袭战，带领富有传奇色彩的西夏“铁鹞军”突袭甘州并取得胜利，走的就是这条路。

如今，生活在曼德拉山四周的居民，身份证上显示的几乎全是蒙古族，这里的居民不像鄂托克前旗的那雅老人、丹必老人那样爽快地承认自己就是唐古特。因为民族情感，没人谈及这里和西夏的关系。当年，这里不仅有定居的西夏居民，还有驻军，更有来往于西夏国境北部的大量的商旅、僧人。成吉思汗对西夏发动的几次战争中，这里也并不是重灾区。从曼德拉山岩画上大量的北山羊、骆驼画像来看，古时候的曼德拉山周围，应该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适合养殖北山羊、骆驼，可以承载牧群和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很大，而西夏时期的重要交通工具——

骆驼的最大产区就在这一带。

这里的西夏牧民们，在阿拉善草场上放牧，在山上休息，当他们发现这种黑色的岩石上有先民们创作的岩画时，自己也开始了岩画创作。其中有一幅岩画上刻着几行西夏文，这段文字是“怀念自己的姑娘”的意思，是作者对心上人的一种情感寄托，这种把情书刻在石头上的方式，在国内很少见。另一幅是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图，整幅画呈正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端画着一个人，旁边站着一个怀孕的妇女，三角形下面是两个、三个、四个，到最后发展到四个人，没有文字，完全用画的形式表现了一个家族的发展。岩画从侧面反映了这里当时良好的放牧条件和人们的生活自足状态。

马可•波罗抵达这里时，这个王朝已经消亡了，但西夏留给这位世界著名旅行家和文学家的影子还是很清晰的，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这里的羊绒是世界上最好的。

木雅地区：川西高原上的“西吴尔王朝”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巴卜尔、屋尔芬敦和美国人保尔斯曾相继在四川木雅地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南部一带）做过调查，并提出这里的居民是南徙川、康地区的西夏党项遗民。1944年，四川大学的邓少琴先生曾两度深入木雅地区调查，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他认为木雅人非当地原始居民，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王族逃亡到这里，建立了新邦叫做“西吴甲布尔”（西夏王），木雅人就是他们的后裔。这部分人于明代“洪武后授为明正土司，至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嗣斩而绝，传世几五百载”。已故的吴天墀教授在他的《西夏史稿》中指出：

当蒙古铁骑进侵西夏、大肆蹂躏的时候，西夏居民有的向境外逃走……另一支大约是从事畜牧生产，带有林野精神的以党项人为主的民族，他们向着辽阔祖国的南方冒险长征，经过数千里跋涉，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地方（即今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乾宁以南，九龙县以北的地区）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小政权；至今在本地的藏族居民中留下传说。他们把这个小政权的首领叫做“西吴王”，实际也就是“西夏王”的称号。

如果这个论断正确，那么，西夏亡国后，帝国的坚定守卫者怎样突破蒙古人的包围圈，从西北来到西南的呢?

吴天墀教授认为：他们选择的路线，最可能的一条是南渡洮河，横越松潘草原，沿金川河谷南下，经丹巴、乾宁到达木雅。因为这条路线，沿途有丰美的水草。

这个古代边裔小政权的出现，正如辽亡后耶律大石远奔到中亚细亚所缔造的西辽国家一样。木雅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时间比西辽几乎长达6倍……假如我们给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经历470余年才绝嗣的明正土司，就无疑是西夏王国的延长，而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则是西夏民族的比较纯粹的后裔。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教授和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教授等曾深入木雅地区调查。这是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深入这里从语言上进行调查，作为一个最容易消失和变迁的文化现象，木雅语言没能给李范文教授的调查提供理想的佐证。

从2003年开始，我曾几次深入到川西高原，寻找那个掩隐在横断山脉一条条崇山峻岭中的神秘王国——西吴尔王朝。如果真有这

么一个神秘王朝，那么，其缔造群体是不是西夏后裔呢？如果是西夏后裔，他们又是循着怎样的路线抵达这方远离西夏国都的神秘角落呢？

不少藏族学者认为，“木雅”是个藏语音译概念和地域概念，又是一个族群名称。作为地域概念它是指木雅人生活的地区——今四川西部高原雅江以东、道孚以南、九龙以北、丹巴西南这一片地区。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与九龙县交接地带的沙德和营官地区，木雅文化保留得较为完整，因而，这一带是“木雅”的核心地区。木雅语分布的范围恰好是大渡河、雅砻江甚至岷江流域的部分地区，由于明代土司提倡说官话——康定话，而使这一地区的木雅语逐渐萎缩。

在木雅地区的找寻依然是艰辛的，由于没有文物或文字资料来支撑学者们的观点，这就需要依靠大量田野调查。就生活中一些细节区别来看，当地老乡的旧衣服中，有毛织的百褶裙，那些帽子也是其他藏区没有的奇特样式，他们仍保留着披羊皮褂的习俗，但这和川北的羌族人毛在外、皮在内的羊皮短褂不同。不少至今仍没通电的地区，还用的是松明子采光。

在生活细节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是他们的奶酪，形式上很像北方内地的麻花。他们的日常生活器皿，使用的多是木制品，诸如背水用的桶、舀水用的瓢等，这也和其他藏区不一样。服饰上，他们的衣服看起来很古老。同时，在木雅地区，妇女一度保持着留刘海的发式。如今，在木雅地区最南端的四川稻城、木里一带还有这种习俗。而康定的木雅人由于土司时期大规模的藏化，使这一地区的木雅妇女不再留刘海发式。另外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木雅人在杀动物时，采用的是明显的北方草原上的不放血的方式，杀死动物后，放在麦草上烧，边烧边刮毛，这和北方草原上的习俗一致。

在宗教上，藏传佛教虽然已成为木雅人的主流信仰，但木雅人同时

还保留着党项人古老的白石崇拜。只要走进木雅的村寨，随处可见每户人家的房顶四角都堆放着一些大小不一的白石头。在服饰上，木雅人的衣着已经是典型的藏族服装，但木雅妇女也有将长辫盘于头上，用一块黑布或蓝布叠成瓦形盖在头顶，然后用辫子在头上绕上几圈，将其固定在头顶的习俗。木雅男子则喜欢用红头绳将长辫盘于头上，腰间横别一把长刀，显得英武异常。

在住所建筑方面，木雅人擅长垒石建筑，房高数丈，一般三层，底层养畜，楼上堆物住人；康北藏区十分典型的木结构"崩空"房在木雅地区几乎没有。

历史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当年那些从西夏国都逃亡出的皇室人员，一路辗转进入藏彝走廊。在川西高原上分开的党项民众，出于自身的安全和以后复国的准备，开始了再一次的化整为零，分成三股力量：一股西进西藏高原；一股逐渐融入当地；一股继续南下，一直进入云南和四川交界的泸沽湖一带。

在青藏高原的腹地，澜沧江上游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境内的觉扎山一带，还有一支西夏后裔。2008年10月初，我在觉扎山一带相继发现了西夏后裔、西夏时期的宗教建筑、西夏国王赏赐给当地寺院的法器等。抵达玉树时，我的上师、玉树佛学院院长丹求达瓦仁波切无意中说，在他的家乡玉树州囊谦县觉拉乡的著名藏传佛教拔绒噶举派寺院觉扎寺里，就有西夏后裔。

久尕是当地的一位藏族妇女，今年已经60多岁了，她告诉我当地一个流传下来的说法：当年，从弥药来到这里的人，带着国王赏赐的珍贵财物，渡江时不小心将一些装有重要经书、财宝的牛皮箱子掉进了江里，曾经有人打捞过，但都没有收获，但那些弥药来的人却留在了这里。

10月11日，尕玛担任翻译，我们前往距离觉扎寺5公里左右的索角

扎村继续寻找西夏后裔。45岁的村民才仁旺嘉说："那个弥药人[1]就在距离这里1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他的一个兄弟死了，另外一个出家了。他们的姓氏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大姓，老人们一直保持着对他们尊重的习俗，周围地区的人对他们也很尊重，说他们是皇室的后代。"我们在觉扎寺里进行采访，不少僧人的说法都和才仁旺嘉、久尕的一样。

10月12日下午，终于发现一个被群山包围的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静静地卧在半山腰，在一户屋顶堆放着白色的牛头骨人家前，我们见到了要找的米娘多哇。米娘多哇确实有着和周围藏族人不一样的相貌和神情。他告诉我：自己的祖辈确实留下了从外地来且是贵族的说法，"文革"前，家里还保存了一些皇帝的诏书、赏赐的财物，尤其是诏书上的文字很怪，不是汉文也不是藏文，那些奇怪的文字像是一个一个堆上去的。我当即写了几个西夏文，他说那上面的文字和我写的很像。可惜那些珍贵的文物在"文革"中被毁掉了。他从家里拿出的一些力图证实自己家族身份的东西，包括在床头的那个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牛皮箱，而且，他说这个家族在当地就剩他们一家了，他的一个本家在当地的一个寺院康奈寺里出家，很有学问。

米娘多哇说的那个出家的弥药人，叫米娘丹增。2008年10月19日夜晚，我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米娘丹增。这是一个对藏地建筑很有研究的学者，他从当地建筑以及西夏和当地的历史渊源来分析：西夏文献和藏族文献都记载了这样的事实，当地的昂欠国王派往西夏传教的德师热巴，被西夏国王奉为国师，他从西夏带回的弟子热巴噶布修建了当地最大的寺院觉扎寺，而且从西夏带去了不少工匠。

觉扎山顶上新修着一座修行中心，古老的觉扎旧寺就在旁边。在寺

---

①藏语对西夏人的称谓。

里，我意外地发现了神座上面供奉着藏传佛教的众多尊者，在左右放的最下端出现了西夏时期的供养人像。

泸沽湖：女儿国里的神秘西夏遗影

地处云南东北高地和四川彝族地区交界的泸沽湖，是一个因为走婚习俗而带有暧昧和艳遇味道的地方，没人知道这里和西夏遗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在泸沽湖，我住在朋友择史大吏家中，他带我走进一个神秘的摩梭人世界。生活在泸沽湖周围的普米族，称呼摩梭人是“nia mi”，和藏族人称呼西夏人为“mi nia”刚好颠倒。无论“nia mi”还是“mi nia”，在藏语或普米语里，都是“黑民”或“地位低下的人”之意，在他们的理解中，因为摩梭人当时从北方羌族地区流徙而来，所以被称为“黑民”。而摩梭人对“nia mi”的解释则有“天的儿女”、“天骄”的意思。

洛克在他的《中国古西南纳西王国》一书里，对这个称呼表达了自己的迷茫：“汉文献里查不出纳西这一名称的出处，我从其他地方得到启发，认为这个名称可能是麽些（纳西），因为羌人的皮肤比较黑而给他们取的，因为纳西（‘纳’意为‘黑’，‘西’意为‘人’）这个名字成为占据了濮人（这一带的原住民）以前领地的民族的名称；究竟是麽些人吞并了羌人，还是羌人吞并了麽些人，这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麽些这一名称出自汉文，而为纳西人所不喜欢，认为这名称是贬低他们的称呼。”

显然，摩梭是一个外来至此的“神秘部族”，在藏族人的称呼里，和西夏一样，都有“黑民”的意思，带有一定的贬低意味。

来到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祖先，并不是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为了

保存自己，他们称呼当地的土著藏族为“古主”（意思是“大哥”、“老大”），称呼白族人或皮肤白的人为“二哥”。他们只是依靠祖辈口传的“从河湟地区来的”模糊记忆，给后代传述着同样模糊的历史。

在当地，摩梭人死后，要举行一种叫“开路”的送魂仪式，把死者从家里一站一站地送往祖先所在的地方，而这个方向恰好就是泸沽湖地区进入四川木里地区的方向。这种认宗归祖、找寻源流的方式，无疑对破解这里的居民来向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统领这里的木氏土司迫于元政权的高压，在元代一直隐姓埋名地生活。在明代建立后，土司立即向朝廷奏请自己的身世并非土著，皇帝也诏令他们就地管辖当地人。

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种植水稻，周围地区的民族却不种水稻。当地人说，这是他们的祖先从内地带来的。西夏政权建立后，曾在兴庆府所在的银川平原一带种植水稻。

1516年，木氏土司将藏传佛教迎入纳西族地区。整个丽江地区相传有13种喇嘛教派，但在泸沽湖一带信仰的却是西夏王朝时被奉为国教之一的宗教——噶举派。这里的喇嘛寺被称为“吉拉米柯”，汉语意思是“无战争”。

西夏人的白色崇拜在这里也有着明显的印记。海拔3 800米的狮子山坐落在美丽的泸沽湖边，和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信奉神山多为男性偶像不同的是，生活在泸沽湖边的摩梭人信奉的却是女神山，是穿着白色长袍的格姆女神，是一位给他们带来安宁、粮食耕种技术、爱情的女神，这和西夏人的女性崇拜一样。

南逃的西夏后裔在云贵高原上的泸沽湖一带，终于画上了逃亡的句号，或许使这里成为西夏党项人活动或影响的最南端。

夏尔巴：站在世界高地上的东方来客

1953年5月29日上午11点30分，著名的新西兰登山家希拉里站在了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上。英雄般的光环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打量他们，当人们把敬仰的眼光和掌声、鲜花送给希拉里时，他冷静地告诉世人，如果没有喜马拉雅山下的夏尔巴做向导，任何人也不能够登上这座地球上最高的山峰。这使得全世界的眼光再次关注起夏尔巴这个神秘的部族，而学术界在此之前就有不少人指出：夏尔巴就是西夏后裔的一支。

“夏尔巴”，系藏文“sar—pa”一词的音译，意为“东方来的人”。分布在中国西藏与尼泊尔交界处，中国境内的夏尔巴主要聚居于西藏聂拉木县樟木口岸的立新、雪布岗村。关于夏尔巴的源流，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其渊源与古代羌人有密切关系。

“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夏尔巴。樟木是中国境内的夏尔巴最集中的地区，他们中的不少人说自己是党项人最后的皇裔，至今仍保持着许多西夏故地的生活习俗。

从他们的建筑、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看，这的确是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和周围的藏族人、尼泊尔人一直平安相处，但明显不同于的是，夏尔巴一直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游弋于两个不同国家的两个民族之间，置身于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折冲樽俎之地。

樟木海关外的立新村是中国境内的夏尔巴最大的村落。他们信仰藏传佛教，婚姻习惯和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一带一样。夏尔巴能歌善舞，男女都穿白毛线织成的镶黑边的短袖外套，白色是他们认为最尊贵的颜色，这和当年西夏建国后，元昊仍然继承羌人的白色崇拜一样。夏尔巴住两层的木制阁楼，阁楼底部一般是堆放杂物或供畜生住，这和阿

坝一带的羌人居住风俗一样。或许是从内地逃亡而去，夏尔巴带去了农业技术和商业意识，使他们在商海中能很快冒尖。

夏尔巴的主要经济来源和藏族不一样，藏族主要靠牧业，而他们一直靠农业和商业，农业占主要，一年有三次收入，主要是玉米、小麦、土豆，而当地藏族和尼泊尔人是不种庄稼的。流传在夏尔巴中间的说法是，他们的祖先来这里时，带来了这些庄稼的种子，让他们世世代代地耕种。

夏尔巴的婚俗也和西夏旧地一样。青年男女如果互相看上了对方，男方会拜托人上门去女方家里提亲，第二次上门就要拿酒、拿东西，订婚。第三次或者几次后，就决定结婚，所有的亲人这天来给新郎新娘送哈达，祝福他们婚姻美满。从男方到女方家，要走着去。迎亲时，在女方家门口，要唱歌，有夏尔巴流传下来的，也有自己编的。

和藏族人有名没姓不同的是，夏尔巴有五大姓，即格尔兹、色尔巴、撒拉嘎、茄巴、翁巴。夏尔巴认为如果没有姓，就不是夏尔巴。他们认为，是当年逃亡到这里的祖先为了躲避追杀，才把自己的姓隐瞒了。到现在，夏尔巴都有一个传统，姓记在心里，名要说出的。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姓名是不能说的，只有遇上结婚这样的大事才能说，因为夏尔巴有一个传统，即同姓人不能结婚，要是同姓人结了婚，会被赶出村子，青年男女要是相爱，到结婚时，双方的家长就会问对方姓什么，姓氏只有这个时候才说。他们的结婚仪式和西夏故地也很相近，很复杂，加上同姓人不能结婚，导致现在的夏尔巴越来越少。

藏文文献中称西夏为“弥药”，也称夏尔巴为“弥药”，而尼泊尔境内和樟木相连的地方，目前还有“弥药”这个姓。

法国著名的藏学家石泰安在他的《西藏的文明》一书里就说道：“西夏王朝的奠基者，木雅的掌权家族在王朝覆灭和成吉思汗征服该地之时，曾迁移到了藏地以北和昂木仁一带。”这说明，至少在西藏的昂

仁县——“中国藏戏之乡”有着当年西夏人的足迹。元明时代就有“昂仁寺一带犹多西夏王裔”的说法。而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教派在西夏王朝没有湮灭时就和西夏上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双方曾经互派僧人到对方的寺院里学习。西夏灭亡后，不少西夏僧人到萨迦寺学习、交流、避难。

关于夏尔巴是西夏人后裔的说法，在尼泊尔也有很多支持者。比如尼泊尔著名的夏尔巴学者桑杰丹增在专著《神牛雪光》一书里说：夏尔巴是700多年前，从木雅地区迁徙去的西吴人。忽必烈南征时，他们逃亡进了西藏。

1980年8月～198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乃文和张国英在西藏经过一年考察，也认为夏尔巴就是木雅人，是建立西夏的党项羌的一支。蒙古族灭亡西夏后，党项羌中的一支向南迁徙到西康木雅地区，后来在忽必烈南征大理时，又逃离木雅迁往后藏，其中一部分人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囊巴拉山口，到达今天尼泊尔境内的索卢昆布（又名“夏尔昆布”）。

西域大地：那些归顺元朝的西夏遗民

和西域各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花剌子模人等走进蒙古人的军帐并为其服务一样，投顺蒙古政权的西夏人同样得到不同程度的任用。在元朝“上马为军，下马为民”政策下，征战到中国内地的党项人随着战争的结束，就地耕种，将自己的那一脉党项基因，悄然融进一片片遥远而陌生的地域中。同时，那些优秀的西夏文人，也走进了元帝国的官员序列；那些修为高深的西夏高僧大德，成了元朝宗教界的领袖人物；那些杰出的西夏高级将领，最远者曾将足迹踏进越南。

西夏时期，西夏政权和今新疆地区的民族政权有着正常的经济贸

易、文化、宗教往来；西夏政权灭亡后，生活在河西地区的西夏后裔，尤其是黑城被攻破前，大批的西夏后裔选择向今新疆地区逃亡，给那里的绿洲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宋元时代，新疆地区就有一定数量的西夏人入居，西夏不仅和甘州回鹘常年交战并灭亡了这个一度称雄河西地区的王朝，还和高昌回鹘一度发生关系。至元十六年，忽必烈曾调河西军（即归降的河西西夏军）1000人戍斡端城（今新疆和田），这是西夏降军被整体安置最西北的地方。

西夏人在高昌回鹘的活动，从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残卷中也可得到印证。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早就提到，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印刷品中，除汉、回鹘、梵、藏和蒙古文外，还有西夏文印本遗物。

位于新疆地区的柏孜克里克石窟是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时开凿的第一个佛教洞窟，这里藏有的西夏佛经就是西夏僧人带去的。这些西夏僧人逆着丝绸之路方向，从西夏故地进入哈密盆地传教。西夏文献记载，曾有一个来自龟兹的高僧白智光，不远万里，横穿天山南麓和哈密盆地，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然后翻越腾格里沙漠和贺兰山，走进西夏国的心脏，后被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为“安全国师”。

西夏亡国后，驻守在今天的玉门关、黑城以及哈密一带的军队和忠于王朝的民众，选择了一条经过巴里坤草原东缘的逃亡线路，逃往新疆的东北部和漠北地区。

占据今甘肃西北部的酒泉一带、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一带的西夏人，也就是当年西夏在这两个地区设立的黑山威福军司和黑水镇燕军司的民众及将士，向西穿过巴里坤草原，在阿尔泰山西边穿过准噶尔盆地西缘，抵达额尔齐斯河发源地。

早在西夏亡国前，就有一部分西夏人迁居中亚。《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原花剌子模国都邪米思干城中见到过不

少西夏人，他们和汉人、契丹人一样，社会地位很高，成为回纥人依附的对象。

祁连山下：千寺万僧组成的绛红色地图

祁连山东麓的千里河西走廊，自从1028年被元昊征服，到西夏灭亡，一直是西夏的领土。成吉思汗在攻打甘州和凉州这两个祁连山下的西夏重要城市时，没有实行屠城，而是将这里的西夏人保留了下来，那些西夏人自然走进了元朝的统治之下。

马可•波罗在他《马可•波罗游记》的《唐古特大州》一章里这样记述："你在沙漠穿行30天后，如我所说，便会在其东北和东部之间找到一座名叫沙州的城，该城属于大汗，坐落在人称唐古特的地区。"从中不难看出，蒙古军队屠城沙州后，还是有人脱逃，而城外的西夏民众并未遭到全部屠杀，所以马可•波罗依然看到了西夏遗民。

西夏占据甘州后，以"镇夷郡(州)"和"宣化府"取代了唐宋时期叫张掖为"甘州"的称谓，使之成为其民族宣抚机构，主要职责是处理回鹘、吐蕃事务，以强化对当地各民族的统治。从政治的角度看，西夏由府、州、县、乡、社五级行政级别构成了这里的政权系统。这里一直是西夏稳固的后方基地，从西夏中期开始，也逐渐变成了西夏的佛教重地。

西夏占据了甘州和肃州两个重镇，取甘州、肃州两个州的首字命名为"甘肃军司"（这是今甘肃省名称的最早由来）。这时的"甘肃军司"仅仅是个军事管理机构，并不负责地方行政事务。随着西夏的灭亡，"甘肃军司"烟消云散。元初，在全国共设立了10个行省，甘肃境内的行省最早被称为"西夏中兴省"，省治设在宁夏银川，主要管理西夏故地。甘肃、宁夏境内的西夏归顺兵民自然就成了西夏遗民，只是随

着元朝的民族政策实施，而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族群身份。后来，西夏中兴省的名称和管理范围多次发生变化。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成立甘肃路总管府。1281年，正式成立了“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简称“甘肃省”。这样，才正式有了“甘肃省”的名称。那里的西夏民众自然也就成了元朝臣民，而且不少被迁移出当地，流向不同地区。

蒙古骑兵攻占凉州后的第三年，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把原属西夏地区和甘青部分藏区划给了阔端作为封地。阔端镇守凉州，成为蒙古军的西路军统帅，号称“西凉王”，凉州的西夏臣民自然就成为元朝政府的子民，那些陪都时期的西夏人的骄傲甚至傲慢，逐渐因为遁隐其西夏人身份而消失。

西夏亡国时，藏传佛教萨迦派的“萨迦五祖”中的第四代祖师贡噶坚赞刚45岁，卫藏[①]各地百姓都尊称他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为“萨迦派的大学者”。萨班在接到阔端派使者送来的邀请诏书后，毅然决定亲往凉州去见蒙古皇子。萨班先派了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两个侄儿先行启程，而他本人就归顺蒙古事宜与各地方势力进行磋商后才从拉萨动身。

63岁高龄的萨班不顾路途遥远艰险，经过两年跋涉，于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此时西夏亡国已经17年了，西夏的政治势力已经完全从凉州消失了，因为信奉藏传佛教，西夏的僧人却得到了很好的庇护。当时，阔端王子正在蒙古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典礼，未能立即见面。萨班利用空闲在当地广设经场，弘传佛法。1247年，阔端返回凉州，即邀萨班在白塔寺见面并举行会谈，经过磋商，议妥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赋、接受派官设治，等等。萨班认为：西藏现在如果和西夏、畏吾儿、甘青地方各族一样，和平地隶属于蒙古汗王的统治

①西藏旧时别称。西藏旧分阿里、藏(后藏)、卫(前藏)、康(喀木)四部。

之下，定会给西藏的僧俗民众带来永远的利乐和莫大的好处。为此由他出面，拟写了给西藏各地僧俗势力与百姓的一封公开信即《萨班致蕃人书》，书中说："汗阔端于余关切逾常，故金国、蕃、畏吾儿、西夏等地之善知识大德、各地人士均目为奇异，前来听经，极为虔敬。"不难看出，此时的凉州，仍有西夏"善知识大德"者。

江南高官：一群以杭州城为原点的党项后裔

萨班到达凉州时，西夏的影响依然存在，不少凉州西夏人被元政府移民迁往江南。祖籍凉州的党项人余阙归顺元朝后，历任泗州同知、监察御史、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1353年任淮南行省左丞。这位西夏后期杰出的诗人，他的父亲沙剌藏卜于元代自凉州随军迁到了今天的安徽合肥。西夏学专家史金波经过实地考证安庆余姓家族后认为："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老祖先是余阙，是从武威那边迁过来的，西夏地区迁来的，而且还讲了他们的民俗，他们过年的时候都要挂灯笼、灯笼上写着'河西郡'、'武威郡'。"余阙因为归顺元朝而得以保身，而那种亡国亡族之痛却永远在心中，他的《白马谁家子》就是很好的例证。虽然他想象中的贵族公子骑着白马，"绿辔缦胡缨。腰间双宝剑，璀璨雪花明。甫出金华省，还过五凤城。夜入琼楼饮，金樽满绣楹。慷慨顾宾从，英风四座生"，但是，"一朝富贵尽，不如秋草荣"，这何尝不是诗人身为党项贵族的真实写照呢？所以他最后所说的"黔娄固贫贱，千载有余名"也成为西夏王朝在历史席位中不该缺席或者不能缺席的一种低调自信。

尽管经过了元代的高压统治，在元末时期，看着族人尽皆"消失"，西夏王朝就如"贫贱的黔娄"，西夏文字成了死亡的文字，党项语言成了遥远的历史记忆，诗人只能寄希望于西夏王朝别被过早的

遗忘，而在漫漫历史中能够“千载有余名”。而他的《拟古杨沛》借东汉末年归附曹操的杨沛来说自己不畏豪强，不仅“谋国不谋身”，而且“辛苦岂之念？杀身旦成仁”。《黄鹤楼》一诗中的“隐见长沙渚，想望阳云台”更是寄托了自己身在南国向往北方故土的心思。

出生于1284年的昂吉，同样是凉州的党项人，后来也供职于元，最后迁到安徽省的贵池县。他的《乐府二章送吴景良》等诗同样表露了党项人亡国后的心声。1269年，昂吉“率河西军（即西夏军队，作者注）一千三百人”守今河南信阳，以后又驻镇今安徽省合肥市。直到元末，庐州地区仍有西夏人组成的军队驻守，余阙在庐州时曾看到这里“一军皆夏人”的情景。

1302年，元成宗下令，在杭州的大万寿寺内雕刻3621卷的西夏字大藏经，《观堂集林》卷二十一中说明了这些数目巨大的西夏经卷去向：“施宁夏、永昌等路。”这些西夏文字经卷在西夏亡国75年后，又回散到西夏故地，说明这样几个信息：一是西夏文经卷的刊行与印刷，在元代仍得到朝廷的重视；二是西夏时期的宗教信仰也得到重视；三是在西夏故地仍有很多人使用西夏文字；四是在属于元代江南浙西道杭州路的杭州一带，有着西夏文印刷的条件，而且有着一批熟悉西夏文印刷的工匠。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能让朝廷重视的西夏人负责这里的宗教事务，这个人就是西夏高僧杨琏真迦。

1277年，距离西夏亡国已经整整50年了，忽必烈任命八思巴的弟子杨琏真迦出任江淮释教都总统，此前，这个位置由著名高僧一山大师担任，一山因为得道高深而被迎请到日本传法。西夏灭亡后，元代政府对其军士采取的是屠杀甚至灭绝政策、对其民众采取的是非歧视政策，把他们划入当时的四等人中的二等人“色目人”，对西夏的僧侣采取的却是“事僧敬佛”。这使许多普通民众和军士也遁入佛门，以避免被追杀的命运。元代著名学者马祖常写的《河西歌》云：“贺兰山下河西

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瞿昙本指佛，这里指西夏僧人，可见，当时的僧人中有不少是军士或民众，为了避免战争死亡而遁入佛门，到元代时又纷纷还俗，娶妻生子，过起了正常人的生活。

元朝建立之初，急需宗教界人士传教，大批的西夏僧人开始走向为元朝服务之路。杨琏真迦以永福大师的汉化身份走进杭州这个江南大都会。到杭州后，他立即恢复了西夏僧人身份，推行藏传佛教。《明史》记载，他于元至元二十二年八月，率众挖掘了南宋理宗陵墓，将理宗的颅骨割下，制成盛酒的饮器。这种将敌方的头颅骨做成酒器的做法，是党项人的固有习俗。在挖掘了帝陵后，他还在其上建造了一个塔，以表示镇压。后来，他又率弟子在杭州的飞来峰上刻凿佛像，把他和两个弟子也雕刻其中。如今，在飞来峰上仍保存着杨琏真迦传教时期的68龛造像，其中藏传佛教造像就有33龛47尊。

散落在杭州城及其周围的西夏后裔并非只是杨琏真迦带去的大批工匠。元时，还有一些西夏归降的官员南下，在江南出仕于元政权。南下的西夏人中，就有一位家在灵武的李姓官员，他带着西夏亡国之痛和对西夏故土的难舍之情来到钱塘江边，在杭州城做官长达30多年。为了纪念西夏故土，他在钱塘江边买地建了一院住宅，取名贺兰堂，当地官员前去他那儿喝茶品茗、下棋饮乐时，看见贺兰堂常常不解其意，他便告诉人家：自己的家族世居贺兰山下，祖上乃西夏皇室，曾经在西夏王朝为官。西夏亡国后，被元朝看中才华，任命到江南为官，每每看见钱塘潮涨，便思念滔滔黄河边的故乡，将住所取名贺兰堂，一则解自己思念故土之情，二则是希望贺兰山的草木和江南的一样丰美碧绿。而那些和他交往的江南文人，大多得到了他用西夏文书写的书法作品，这位对西夏有着浓厚情感的官员，闲暇之时还常常挥毫泼墨，画出了一幅幅塞上江南的画卷，这些在元代文人袁桷的《清容居士集》中有具体记录。

西夏王朝灭亡后，新建的蒙古王朝亟须一种既适应当时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又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音乐，以满足行军鼓气、宫廷赏听等。这时，一位从贺兰山走出的西夏大儒被元太宗窝阔台召见，这位西夏大儒向他推介了西夏旧乐，元朝采用了西夏旧乐并使之成为元朝制乐的发端。这位西夏大儒就是出生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高智耀。

1328年，高智耀的孙子高纳麟出任杭州路总管，后来逐步升任江西廉访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南行台御史大夫。他从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位置上卸任时，特地向朝廷推荐党项人三旦八出任这个位置，元英宗亲自下诏书，启用西夏人三旦八带领哈赤、贵赤和兀鲁三卫军前往杭州镇压起义军。身上流着善战的西夏人血液的三旦八，南下后，江南成了他镇压起义军的战场。

1352年，江淮起义军在江南点燃抗击元朝暴政的战火时，72岁的高纳麟再次被任命为南台御史大夫兼太尉，总制江浙、江西、湖广三省军马。当他集结大批援军到南京时，杭州城已被起义军攻破，纳麟急忙命救援杭州的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门去救宣城。处在南京城中的纳麟被起义军包围，三旦八带兵从杭州前来救援，保住了南京城。

杭州城及其周围的绍兴等地，留下了高纳麟的政治活动身影，也留下了三旦八这样的党项人身影。1353年，三旦八又奉命带领大批党项军人前往徽州和饶州，和那里的起义军对峙两年多。后来，三旦八又被抽调往江浙前线，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这是元代末期西夏后裔升任地方大员中的唯一一位，虽然在这个位置上仅仅几年时间。

纳麟可谓党项人在元末政坛中的常青树。1359年，79岁的纳麟被朝廷任命为南台御史大夫，他将江南行台移往绍兴，此时，他又调用了一个叫迈里古思的党项人来保卫江南行台。迈里古思于1354年中进士，担任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在江南一带有着很高威望的迈里古思很快募兵招马，聚集到绍兴。一次次战功，使迈里古思升任行枢密院判官。

和迈里古思同时代活跃在江南军事和政治浪尖的还有一个党项奇才福寿，这位党项贵族在15岁时就出入皇帝周围，深得皇帝信任，22岁就出任饶州路达鲁花赤，连续五次升迁至同知枢密院事。1351年，因为带兵镇压刘福通起义出任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并于1355年升迁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成为当时南京城最高的行政官员。1356年，朱元璋带领的起义军攻克南京，福寿被杀死，他的后人从此隐姓埋名，消失在南京城众多的民众之中。

探寻西夏后裔的工作是艰辛的，江南的烟雨一次次将我的背影隐去，走进一场烟雨后，活着走出一场烟雨后，我日渐看见那些越来越多的西夏人在元代依然活跃于政治或军事的平台上。1335年，党项人星吉曾经因为弹劾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帖木迭尔而从监察御史调任大都路达鲁花赤。1350年，星吉升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出任江西省平章政事。这时，江南的农民起义军已成燎原之势，星吉积极募兵、组织地方武装力量，终被起义军破城后俘虏，他在拒不归降的同时，绝食七日而死。星吉不仅赢得了末元颓朝的高度褒奖，就连起义军也深深敬佩这个党项后裔。

星吉死后，另一位于1352年被派到江西和农民义军作战的西夏皇族后裔卜颜铁木尔，收集星吉手下的溃众以图解南京之围。后来，他继续在池州、望江、小孤山、彭泽、江州等地和起义军作战，成了维持元末败局的主力干将。

在挽救大元王朝颓势的江西战场上，还有一位于1352年从甘肃平章政事调到江西的党项人，他就是曾在元大都担任过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的亦怜真班。他和其他奉命到江南挽救大元危机的党项高级官员一样，积极募兵守城。两年后，这位党项人也将生命最后一点时光留在了江西。

隔海招魂：客死异域的党项人

2004年夏天，我出现在广西北海，这让我的朋友们大为吃惊：广西难道有党项后裔么？我回答他们：越南大地上，有。

当西夏即将亡国时，一些皇室贵族选择了归顺蒙古军队，李恒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位。1209年，蒙古铁骑第三次攻打西夏，李恒的祖父以皇子身份守兀纳剌城，城破不屈而死。李恒的父亲李惟忠当时只有7岁，被蒙古兵抓到。李惟忠毫不惊慌，反而要求与父亲一起死。蒙古军官对这个孩子的行为感到惊异，救下他的性命，并将他献给了宗王合撒儿（成吉思汗的同母弟）。合撒儿的儿子移相哥继承王位后，李惟忠追随他进征中原，被任命为淄川路达鲁花赤，从此成为山东人。李恒弟兄十三人，他排行第四，因从小气质不凡，深得王妃喜爱，被认作义子。

忽必烈即位不久，山东实力派人物造反，李恒和他父亲不顾家人安危，到京城告发，致使留在山东的家人都被抓进了监狱。此事深深感动了忽必烈，李恒这种与蒙古人有亡国灭族之仇的西夏遗民，一直是他防范的对象，从不敢委以重任。但关键时刻，李恒却能不顾身家性命挺身而出，这让忽必烈不能不对西夏遗民刮目相看。1270年，李恒登上了元军攻伐江南的战车。8年后，他被任命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进兵广东境内，迫使南宋名将张世杰退走崖山。当时，察罕的孙子、木花里的儿子塔出也跟随李恒出征，将足迹送到广东境内。

站在淼阔的大海边，李恒接到了要和皇子镇南王一起出征越南的命令，就这样，西夏后裔的足迹开始出现在越南大地上。在征服越南的过程中，有一次，一支来自丛林深处的毒箭射中李恒，李恒就此将生命留在了越南的思明州。

和李恒一道出征越南的党项将领中，还有出生于兴庆府的来阿八赤

（也叫做阿八赤、阿八失）。他的父亲术速忽里曾经是西夏的战将，在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的战争中归附，列入成吉思汗的皇家护卫军中，后来负责成吉思汗的饮食工作。蒙古军南下攻宋，术速忽里和儿子来阿八赤一并随蒙古军队南下。

1258年二月，蒙哥汗亲自统领大军围攻重庆钓鱼城，大臣们纷纷献计。术速忽里建议在重庆和合州之间筑城，选拔5万精锐士兵，命令得力将领守卫，以牵制合州的援兵；然后集结作战能力强的士兵，用俘虏的宋朝士兵做向导，向东征伐，攻下东边的一些小城，俘虏那里的兵民，等到冬天水小了，沿着瞿塘三峡段而出，抵达河北境内，和早已到那里的蒙古军队形成合围之势。这样一来，合州东南一带的局势就定了，上游的重庆和合州就孤立无援，宋朝军队要么投降要么弃城而去。但当时，许多蒙古将领认为攻打钓鱼城是“攻城功在顷刻”，嫌术速忽里的计策太费时间。

蒙古军队围攻钓鱼城的这段时间，来阿八赤奉命在重庆下游的铜锣峡做监军。他提前命人在据点里堆积柴草，当宋朝的都统甘顺带领援军从今天的四川奉节一带逆江而上，打算乘夜黑潜行之时，两岸堆积的柴火突然燃起，长江两岸如同白昼，守候在江边的蒙古军队登船迎战，加上是顺流而下，宋军被迫逃离。第二天，双方再次发生激战，终以宋军失败而告终。

来阿八赤后来和李恒一道进入越南。李恒命丧思明州后，他带兵继续前行，一直打到交州。不久，他遭到了和李恒一样的命运——被毒箭射中并将生命最后的那点时光留在了越南。

元代进攻越南的路线还有一条，那就是从云南进入，这支军队中也有不少西夏后裔，党项人爱鲁昔里钤部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父亲就是早年归顺成吉思汗的昔里钤部。爱鲁随忽必烈于1253年进入云南。1276年，爱鲁负责开通了云南交通史上重要的乌蒙道。1287年，元朝朝廷特

意下令爱鲁带领6 000人出征越南。他带的兵士中有不少是跟随他从西夏故土南下的党项人，这支军队一直打到越南的王城。1288年，爱鲁也因生病命丧越南。和他一道征战的不少党项人同样或战死、或病死于那片陌生的疆土。

保定经幢和居庸关过街塔："突醒"的西夏记忆

1962年秋天，华北平原上的庄稼已经收割了，歇息的大地一览无余。当地农民开始了每年这个时候都要进行的平田整地工作，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北郊两公里处的韩庄同样如此，村里的农民在整修庄口路南的一个废弃的寺庙。突然，一个农民惊叫起来："看，这是什么东西？上面有字呀！"这一幕改写了这里和西夏没有任何关系的历史。

周围的农民围了上来，慢慢清除掉上面的土，两个分别为263厘米和228厘米高的经幢出现了：两个幢身的形制相同，都由顶盖、幢身、基座三部分组成，平面均呈八角形，八个面上都刻有楷书的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整个幢文的开始和结尾处，还刻有汉字年号和刻工的姓名。

两个经幢上记载了近百个人名，其中有不少党项人名，这无疑说明保定一带曾经有党项人生活。

从《瑞芝堂记》中我发现了一个叫张侯族的党项人在亡国100多年后在这里生活的记载。1338年，在元朝为官的张侯族在保定府居住下来。定居保定后，他立志在保定兴办学校，并声言："不能弃官，则不可行志；不能行志，则不可兴学"，对保定一带的教育事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张侯族仅仅是生活在保定众多党项人中的一位，当时的保定府不仅有张侯族这样的党项文人，也有不少僧人、工匠来这里定居。巴答那征

就是这样一位党项僧人，他在这里传播藏传佛教，建立了保定府当时著名的稀什寺。1501年四月二十四日，这位在当地有着很高声誉的高僧圆寂。1502年十月，寺院住持党项高僧平尚吒失领占[①]召集保定的大批党项工匠和汉族工匠集体为巴答那征铸造了经幢，这就是韩庄出土的两个经幢中的第一个经幢。

这一年二月六日，另一个比丘师圆寂，九月二十日，设立了第二个经幢。

当年出土经幢的地方，是村庄西口路南的一个寺院的废弃地。清朝末年时，寺院的遗址还在，寺里有喇嘛教宝瓶式白塔一座，当地人称为“塔寺”。那两个石经幢原来是立于寺里的，经幢上的题记显示，这座经幢是1502年刻制的，说明在明代中原保定一带仍有党项人居住，明代万历时期，这里仍有人使用西夏文字。同时，从这里曾经保留的喇嘛塔形制和寺里的西夏僧人住持来看，和西夏佛教一脉相传的藏传佛教，在这里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保定还出土了一个元代的碑碣，碑名为《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这块立于1350年的石碑，距离西夏亡国已经123年了。从碑文来看，其内容是元惠宗时，集贤侍读学士纳怀为其曾祖父老索立的。老索就是一个西夏人，西夏末期，面对蒙古强大的攻势，曾经劝说西夏国王归降成吉思汗，被元政府看好。元政权确立后，老索出任顺天路的达鲁花赤，顺天路就是今天的保定市一带。

居庸关，留给中国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八大名关之一，几乎没人把这里和西夏联系在一起，因为这里在1895年之前，没有人知道，1345年，这里修建的一座古塔，里面就刻上了西夏文字，这是我国目前发现

①史金波在其《西夏社会》一书中认为：平尚为党项姓氏，吒失领占为藏语吉祥宝的译音。

的神秘的西夏文字出现的最东北端。

西夏亡国100多年后，西夏文字怎么会出现在距离王都1 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关口处呢？在元政权对西夏实行了灭绝政策后，党项人已经从历史的视野里消失很久了，而这些他们创造的西夏文字却傲立在灭绝他们的元朝心脏附近，是党项人的挑衅？还是蒙古政权的默许？

居庸关两旁，山势雄奇，中间有长达18公里的溪谷，俗称“关沟”。修建于山谷中的公路从一座大理石券洞下穿过。村民们传承了祖辈留下的说法，更喜欢叫它“过街塔”。

1688年，有几个欧洲人经过这里，其中一位叫格尔比龙（Gerbillon）的神父在描述旅行生活时谈到了这个券洞，“这个村庄可以认为是一个小城镇。入口处的大门很像一座凯旋门。门全用大理石建成，厚约30英尺，向上直到起券处都带有浮雕的文饰”。这是外国人发现此地的最早记录。

1720年12月15日，赴北京的俄国使团随员也来到这里，在这里停留了一夜，随行中一位叫别尔的俄国人留下简单的记录。率领俄国1820年使团的基姆科夫斯基，在他后来出版的《穿蒙古至北京之旅》一文中这样描述这个地方：“路在这里开始非常难走，坐马车尤为艰难，直到大约五俄里远的首要防御工事居庸关都是如此。中间那座门的内壁饰有浮雕的人物造像。”

显然，外国人更早地关注着这里的浮雕和建筑，他们对券洞内的铭文，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而对村里甚至周围的村民来说，那些奇怪的浮雕和文字，与他们的生活更是没一点关系。这些奇怪的文字就这样一直默默地躺在居庸关里，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匆匆地一观而过。

居庸关里的这些奇怪文字，成了欧洲西夏文献研究的一个开口，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伟烈（A.Wylie）是最早关注这些奇怪文字的欧洲人。1863年9月，伟烈亚力作为大英圣书公会在华代理人，由伦敦

出发，经法国、比利时、德国、俄国、蒙古，越中国的长城，最后到达北京，历时68天，其中就经过了居庸关。当时，19世纪来华传教士、英国著名汉学家艾约瑟打算从北京出发去蒙古迎接伟烈，可惜早去了两个星期，没接到人。他在张家口留言(伟烈后来并未见到)，告诉伟烈亚力过居庸关时留意一下拱门上的铭文。其实，对中国金石研究产生兴趣的伟烈，早在1858年就读过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从中知道居庸关拱门上有含6种文字的佛教铭文，心向往之。他这次来到居庸关发现铭文在拱门两侧，其中梵文和藏文是横刻的，在最上面；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和一种伟烈根本不认识的文字则是竖刻的。由于当时条件不好，伟烈只能在拱门西侧拓印一部分。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召开的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上首次展出了这张拓片，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铭文作了说明。不过他错误地把这些奇怪的文字当成了女真文。

12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Deveria)判定此种文字不是女真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宴台碑的女真文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又过了13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难决断。为考证这种未知文字是何文种，英、法学者竟打了近二十多年的笔墨官司。

这些奇怪的文字就是西夏文，对能够认识汉字、藏文、蒙古文和回鹘文的伟烈来说，他的意识里已经有了一个概念：这些奇怪的文字是很重要的。他这样说："尽管这种文字的名称并非不为东方学者所知，但除名称之外人们所搜集的事实很少，我相信这个铭文是件珍品，这不仅在于铭文提供了这种文字的准确样品，而且在于这是已经发现的能够提供文字线索的唯一实物。"

据伟烈撰文可知，在铭文原文右边靠近顶部的地方有一则用汉文小写成的题记，大意是说这座建筑在1445年五月十五日由功德主信官林普贤发愿重新修建。而原铭文是写于1345年的，正是元代最末的一个皇

帝元顺帝统治时期，这时距离西夏亡国已经118年了。从1036年创立到此时，西夏文字的使用历史至少有410年了。让人深思的是，这位叫林普贤的人撰写的铭文，怎么能出现在居庸关这样重要的军事要塞上？如果是有人授意将西夏文和蒙古文、汉文等文字刻在一起，那么，这个人至少是对西夏怀着浓厚民族情感的人，或者是西夏遗民中已经手握相当兵权的人；如果是普通的工匠，他们怎能出现在远离故国上千公里的地方？如果是他们自愿刻上的，那么，他们抱着怎样的民族心理和动机？

1345年，西夏大儒高智耀的孙子高纳麟奏请修建居庸关云台门洞，在石壁上刻有六体文碑，其中的西夏文陀尼经共有77行。这位党项后裔带着浓郁的民族情感，在六种文体的书写中，他命令将西夏文字刻在上面。1315年，高纳麟得罪元仁宗，时任侍御史的党项人杨朵儿只为了救高纳麟，曾一天内上奏八九次，仁宗还是没有听他的，而是将高纳麟贬为昌平令。高纳麟带着自己的党项随从，就这样走进了北京城郊，这也是北京城郊西夏后裔的由来。

那么，谁刻的这些西夏文字呢？著名的西夏学专家罗福成认为是党项人智妙弥逋。

居庸关的这一段发愿文中的西夏文字，告诉我们这样几条信息，一是西夏宗教的影响力已经贯穿了西夏、元、明三朝而魅力依旧，从发愿文中出现的“观世音”、“菩萨”、“常修梵行”等字眼能看出西夏宗教的影子，党项僧人的活动范围也在此地。二是西夏文字到这个时候依然存在，并没有消失。三是无论是手握相当权力者还是手刻这些西夏文字的匠人都表明，这里一定有不少西夏遗民。

探秘中原：小村庄里的西夏后裔

2005年2月19日，从河南濮阳县传出了这样的讯息：一部由当地的

西夏后裔在元代所编制并珍藏了600余年的《述善集》揭开了古代西夏移民中原的冰山一角。生活在濮阳县杨什八郎、西什八郎、南什八郎等15个村庄的4 000余人系西夏党项族后裔，是迄今为止内地发现的国内西夏党项族最大的移民族群。

这些人是西夏后裔么？怎么能有如此大规模的西夏移民出现在元代？对西夏心存警惕的元政权能允许这么多人集聚在一起么？《述善集》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它能充分证明这里的人是西夏后裔么？带着这些疑问，我将自己的西夏人追寻，放在了河南濮阳。

《述善集》是西夏后裔唐兀崇喜于元末所编的一部诗文集，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书中共分“善俗”、“育才”、“行实”三卷，卷后附有“伯颜宗道传”。全书4万余字，主要是赞颂杨氏先人的祖德懿行，保存了西夏后裔迁居濮阳前后的完整历史资料。该书一直作为家传藏书由濮阳县柳屯镇杨氏一家保存并在宗族内传阅，1999年方为外界所知，引起了国内史学专家的广泛关注，经反复核校，2004年年底该书正式出版。

西夏人的去向一直是困扰西夏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河南濮阳的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河南省社科院和宁夏社科院的重视，两方面都组织史学专家对该书记载内容和濮阳县金堤河畔遗存的唐兀公碑等实物进行研究，确认了唐兀公碑附近15个村庄的杨氏族人正是元初被赐姓“唐兀氏”的西夏遗民后裔。

经过对《述善集》的考证，证实河南濮阳杨氏至今已传28世，仅在杨什八郎、西什八郎等15个村庄，就有800余户、4 000多人。作为我国历史上元朝以前一个民族政权的遗民，一个分支就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家族史资料，实属罕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任崇岳说：“杨氏族人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除了可以追溯到元昊建立大夏王国时，首先在文化上全面向汉族学习外，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姓名的汉化，二是婚

姻的汉化，三是生活习俗的汉化。”

最初来这里定居的西夏人是怎样的情形呢？《述善集》的《自序》里这样写道“（闾马）来开州濮阳县东，官与草地，偕民错居，卜祖茔置于草地之西北，俗呼什八郎寨者，迄今百年，逾六世矣”。闾马带领17位西夏人一起居住这里，在面向西夏国的方向（西北方）通过占卜立下祖茔，将这里取名为什八郎寨。杨氏二世祖闾马后的三世祖达海，进一步将坟地由1亩扩为10亩，再扩为200余亩，收入专供祭祀之用。可见他们对祖先的那份至深情感。这支西夏党项人到落居濮阳第四代时，已经是元末了，其中一位叫唐兀崇喜的放弃功名，守丧葬母，秉承着西夏人尊崇女性尤其是母亲的惯例，出于对其族源的认识和情感，完成了这部《述善集》。

到《述善集》成书时，这支西夏党项人在濮阳已经居住了100多年。生活在这里的西夏人是重教育的，唐兀崇喜就是该家族中第一个“贵族人物”。据《述善集》记载，早在1348年，一个叫刘让的西夏人给唐兀崇喜的赠诗序文：“象贤杨君伯仲，好义能下士。”此后，1364年和1367年，著名学者危素和张以宁也分别撰文将唐兀崇喜称为杨崇喜。从此开始，唐兀家族的姓氏逐渐被杨氏取代了。

村里人依据《唐兀公碑》、《杨氏家谱》所记，坚持说他们的祖先（西夏人）到第三世时，多数仍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女子婚配；而在前六世的女子中，竟无一人与汉族男子结婚。至少证明，他们的西夏祖先在这时仍尽量保持着自己身份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在生活习俗、教育观念上早已学习着内地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朱绍侯先生如是说：“这说明血缘交流晚于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乌桓、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融入汉族，走的都是这条道路，而濮阳唐兀氏则最具典型意义。唐兀氏在六世以后，婚姻关系逐渐打破这种隔阂，与汉人通婚则习以为常，而唐兀氏作为少数民族终于在历史上消失，而融入汉族

之中。”

或许是杨什八郎村地处中原地带的缘故，在村里，已经见不到当年尚武的西夏人影子了，这和我在陕北太平村里依然能看见尚武、重酒的党项人决然不一样。而在解放前，这里还广为流传着一句民谣：“喝了什八郎的水，大人小孩都会跷腿。”意思是人人都会武功。村里的老人杨存藻说：“我爷爷杨平川就是有名的大力士。一次，从内蒙古地区来了个拉骆驼的人找他比武，我爷爷先让骆驼走开，让出场子。接着他一抬腿，骆驼翻了个跟头，就滚到田地那边去了。还有一次，一辆路过的盐车陷到泥里，几头骡子都拉不出来。人们请来我爷爷，他钻到车下当‘千斤顶’，用肩膀支起下陷的车轮，让人将车赶了出来。我爷爷80多岁时，饭量仍然很大，跟人打赌，一次就吃下八大碗煎饼。”杨存藻讲述的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能探究到一点历史的痕迹。

河南本地的记者比我幸运，他在杨什八郎村看到了杨氏先祖尚武的实物凭证——前清武状元张三甲的师傅杨盛朝习武的器械。张三甲很感激恩师的教诲，曾刻石立了《杨盛朝先生教泽序》碑。碑文曰：“濮阳杨盛朝先生，精于骑射，膂力过人。”杨盛朝习武用过的器械，现在还有刀、弓箭和掷石。掷石长0.5米、宽0.25米、高0.29米，因被家人埋入土中，人们无法称其重量。试想，当年杨盛朝既然能将这么重的一对掷石玩于股掌之间，可见“膂力过人”并非虚语。据村里人说，杨盛朝有三口刀，分别重120公斤、90公斤、60公斤，两口大刀于1958年被抛进高炉，炼了钢铁，一口小刀因被家人埋藏，幸免于难，现存于濮阳县文化馆。锋刃虽锈，但刀身修长，刀背厚约寸许。

十甲里，这是一个躲藏在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南李村乡的小山村。2006年之前，这里和西夏的关系曾经被学术界小范围地探讨过，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2006年春天，当地媒体爆出了这里生活着西夏皇族后裔的话题，引发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此前，河南的有关媒体曾经报道

了西夏党项遗民后裔在濮阳县柳屯镇杨什八郎村落户并逐渐融入汉族的故事。这就在河南境内出现了两个版本的西夏后裔，究竟哪个是“正版”的？2010年的国庆期间，我再次走进这里。

出新安县城往十甲里方向一直是山路，山川丘陵交错，地形复杂多样。沿着乡间柏油路走了有10余里后，转而向南，沿着一条狭窄坎坷的土路，一路下坡，到山谷的谷底就到了十甲里村。村子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小山谷，只有一个出口通向外界。蓝天白云下，四周的山头静默而安详，远处隐约有哗哗的水声。和濮阳“西夏村”那样完整的家族史料不同的是，十甲里村的李春光证明自己家族身份的是家族祖坟的墓碑或墓志铭。

1968年进行的平整耕地运动中，当时，村里20多岁的李尽强、李尽新等人都是平地专业队员，他们在平整柳树沟茔（由于小河谷地方狭小，人口增加时就有族人外迁，其中有一支迁往宜阳柳树沟，其祖茔被称为柳树沟茔）时，发现了一方墓志铭，当时大家都拥过来看，那上面是繁体字，又没标点，看不出多少名堂。

到20世纪80年代，在外当教师的李春光回家时发现了这块墓志铭。仔细解读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家族是西夏人的后裔，并且他们的祖先是西夏皇帝！“孤远祖讳恒，为元太祖总管，至世祖升副元帅，赐以宝剑，与宋合兴讨金人。”墓志铭开篇即从一个叫李恒的人写起，然后交代李恒子孙在元代仍为显贵，居住在洛阳西三十里拓元城，元朝灭亡时，他的孙子李钦为了避祸，携家人离开拓元城，隐居到了这个远离尘世恩怨的小河谷。

李春光认为拓元城和西夏有关系，主要依据是拓元城是北魏时王族或朝廷官员眷属的聚居地。而墓志铭上记载李恒的父亲是忠于蒙古军队的一名军官，在元代征战中原的战争中有功，而李恒的祖父则是西夏王朝中西夏军队的元帅，在1209年夏蒙大战兀纳剌城中，城陷而不屈致

死。李恒的曾祖父是西夏国的第七任皇帝襄宗安全。

报道这件事的河南《大河报》的文章说："在灭掉西夏后的30多年中，蒙古贵族仍保持着对西夏遗民的敌忾情绪和戒备心理，绝不让他们掌握实权。两个民族之间的'坚冰'，被李恒一次果敢的行动打破。在他之前，几乎没有西夏遗民得到重用，在他之后，大批西夏人成为元朝的军政要员。"

蒙古军队南下征服南宋，大批西夏人被编入战争行列，组成"探马赤军"，成了战争最前沿的主力进攻者。元朝建立后，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大批西夏工匠被政府重用，成了居于元代四等人中的色目人，在元政府的巩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忽必烈任命李恒为淄莱路奥鲁总管，后又提拔他为管军总管、副万户、益都淄莱新军万户，这位西夏人就这样来到中原腹地了，他的后人就自然落户于十甲里了。

传奇中的传奇：一把神秘的西夏古琴

目前，没有任何资料显示重庆和西夏人有直接关联。但文献记载，蒙古军队在南下攻打重庆的钓鱼城时，携带了不少西夏军士，并且有西夏人在重要的军事岗位上。

2006年10月初，踩着西南大地的一地烟雨，在漫天漫地的浓雾里，我孤身走进钓鱼城。我所面临的不只是遮天漫地的大雾里难以辨认的方向和目标，还要拨开相隔700多年的历史迷雾，找寻西夏军裔是否参加了这场中国中古时期最长的攻城与守城的战役的证据。

这个改变世界军事格局的西南小城，曾经让当时几乎没有任何阻拦的"蒙古战车"的指挥者、蒙古帝国的第五任大汗、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葬身城下。这个离西夏旧地上千公里的地方，和西夏又有着怎样的隐秘联系？

蒙哥的攻宋大军中有西夏军队，这些西夏军人的构成主要有三支，一支是原六盘山地区的俘虏；一支是从西夏国都兴庆府陪同西夏末主前往六盘山地区投降的，后来成了蒙军攻打陕西、进军四川的前卫与主力；一支是早期的几次战争中归顺的西夏军队。

在这场改变世界军事格局的战争中，不仅有来阿八赤这样的党项将领，还有一支特种部队——西夏音乐。

距离钓鱼城50多公里的缙云山上，住着一位年逾古稀的木尘道长。道人除了道行高深外，还有一身出神入化的琴艺。就在蒙古军队到来的前一年冬天，很少下雪的重庆地区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整天纷纷扬扬，整个南宋的居民都陷了巨大的恐慌之中，他们纷纷到缙云山上求签问卦，祈神保佑免遭铁骑之苦。可他们冒着大雪来到山上时，却发现了另一番景象：木尘道长整天弹琴，弹的是自谱的曲子“云谢花落”。每次弹到一半时，院落里的漫天飞雪就不见了踪影，就连地上堆积着的厚雪也迅速融化，头天夜里被雪掩去的小草，又开始露出翠绿。而且，每当道长弹完一曲，琴台周围的树就生出新芽，那些苍绿和远处群山上的一片凋谢之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蒙哥入蜀，蜀中郡县大半落入蒙古军手中，只有钓鱼城成了蒙古军队入川来首次遇到的顽垒。蒙古大军虽然形成铁桶合围之势，但钓鱼城城高墙厚，城内粮草充足，蒙古军久攻不下，只好打算长期围城。

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城外数万大军无所事事，倍感无聊。一天，蒙哥别出心裁，想出了大摆斗琴擂台的主意。他说：“我蒙古兵士自出征以来，一向是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今天在这里受阻，军中没有任何娱乐，蒙古军士又没有自己的歌舞，而西夏在进入汉地后，就一直学习汉人技艺，绘画、歌舞、书法皆自成一体，我曾在河西一带的佛寺里看到过西夏人的壁画，在西夏的大臣和蒙古帐中的往来文书里看到过西夏文字，二者确实精美无比，而西夏人的武器更是厉害，他们锻造的剑连

宋朝皇帝也佩带，爷爷（指成吉思汗）也亡于西夏人的毒弩之下，唯独西夏的歌舞未曾见过，把我们出发时从西夏故地带来的西夏琴师叫来，让他演奏西夏乐曲，并贴出告示，如果前来应擂的南人（指南宋人）能够胜了西夏琴师，不但赏他黄金千两、绫罗百匹，我军还可以撤出四川。如果他们输了，打擂者便要被斩首示众。我也好乘机听听西夏人的音乐。”

于是，从西夏故地被带来的党项琴师莫已佑男走到了蒙哥的帐前，蒙哥命令他弹奏一曲西夏古乐。莫已佑男，这个从塞上来的党项人，离开西夏后的身份就是一名俘虏，一个失去国家的人，一个随时在战争间隙被蒙古士兵取笑的琴师。在这支南征的“蒙古联军”中，有几千党项人，他们的身份是军士，也有工匠和厨师。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里，他们的命运一直在战争的刀尖上悬着，要么为自己的国家西夏战死，要么被俘虏，他说不清楚这支联军阵营里有多少他这样的党项人。

那个黄昏里，外面一片烟雨，帐内是一片暗涌的杀机，莫已佑男从容淡定地拿起了相伴自己多年的西夏“人面奚琴”。整个军营里一片寂然，沉郁顿挫的奚琴声，传遍嘉陵江，随即像眼前的这场黄昏雨，洒满渠江和涪江，并隐隐传到了对面的宋军阵营。在这个三江并流的地方，宋朝军人从没听过这种陌生乐器演奏出的如此曼妙的音乐，而习惯了征战、喝酒、屠戮的蒙古人也从没听过如此让他们的心灵在异乡产生震颤的声音，于是两边的士兵都在黄昏里忘了自己的身份，都沉醉在音乐里了。连一辈子在马上征杀的蒙哥也被音乐征服了，那颗粗糙、野性、不羁的草原之心，被音乐和眼前的烟雨浇软了。在一曲曲亡国者的心曲里，他无法明白党项人的音乐真髓，无法明白一个亡国者的心境，但他明白，他的心灵刹那间变得软了，这种变化不是因为江南的气候，而是眼前的音乐。这种变化，为他葬身异乡埋下了伏笔，也为他葬身于离统一中国并不遥远的日子种下了前奏。

演奏完后，蒙哥问："你是不是在西夏国的宫廷里做过演奏，你是最好的琴师么？"莫已佑男冷冷地回答："我只是个战俘，在我的国家，有很多这样的农人或兵士，他们演奏的比我都要好。"蒙哥接着问："这是什么琴？"莫已佑男回答："这不是琴，是一滴亡国者的眼泪，请原谅我说不出，也不能说出它的名字。"

蒙哥当场决定，让莫已佑男第二天在军营前支琴迎接来挑战的宋朝乐人，并悬赏谁要是能说出这把琴的名称和来历，就能得到很高的赏赐。然而，那些前来打擂的宋朝琴师虽然琴艺高超，却没人能胜过莫已佑男。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琴艺不高，而是草原上长大的蒙哥欣赏不了这些汉族音乐，更关键的是那些宋朝的琴师，确实不知道这支古怪的琴叫什么。他们演奏的汉族曲子，这个党项人同样能演奏，而莫已佑男演奏的那些琴律怪异的异族曲子，他们却演奏不出来，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死亡。

一天早晨，木尘道长正要给弟子们讲琴，却发现他最喜爱的弟子孜桐不在，问其他弟子孜桐去向，他们都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再三追问之下，才知道孜桐为了周围百姓免于蒙哥的屠杀和内地前来应擂的越来越多的琴师的无辜死亡，已悄然下山，于昨夜就前往蒙古大营打擂去了。木尘道长长叹道："这一去凶多吉少，那个西夏琴师是蒙古人用以戏弄我宋朝琴师的招数，即便宋朝琴师的琴艺胜出一筹，蒙古人能撤军么？"他立即命人装好自己的那把桐木古琴，给陪同的一个徒弟说："你把西夏琴师弹奏的琴音，暗中谱记下来，我估计这一次蒙古人也会终结他的性命，恐怕此曲要失传了。"

木尘道长于第二天正午就赶到了合川蒙古军营外，合川城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市井凋敝，人烟稀少，倒是能看见城西的钓鱼山上战旗摇曳，战争时期的军营比城市显得更热闹。

道长赶到钓鱼城，宋军立即禀报了当时的兴元都统兼知合州王坚，

王坚马上召见了木尘道长，劝说道长别去，并告知他的弟子孜桐已经被蒙古人杀了。截至此时，被蒙古人杀掉的宋朝琴师已有上百人。这些琴师从各地赶来，以为凭借琴艺就能让蒙古人退兵，可等来的是越来越多悬挂在军营前的人头。王坚说："蒙古人以这个名义，一则取乐，二则为自己攻城找到了更充实的理由，三则是想借此打击宋朝的琴艺。蒙古人习惯了在草原上争杀奔袭，并没什么琴师音乐，我也曾多次在城墙上听，对面蒙古军营里的琴师确实琴艺很高。我问军中的琴师和钓鱼城里的琴师，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用什么琴演奏的，而且总是一个琴师，每天弹奏的曲子也不一样，难道蒙古人的琴艺真那么高么？"

木尘道长说："蒙古人刚贴出告示时，我就让人去打听了这件事，并把对方的琴的模样和琴谱记了下来，我发现，这是个西夏琴师，他拿的西夏琴应该是从西域传来的奚琴，这种古琴被重视音乐的西夏人改造并发扬，内地很少有人知道。西夏琴师每天演奏的也大多是西夏音乐，前来应擂的宋朝琴师，一听对方演奏西域音乐，便想以西域音乐赢得对方，岂知这是以己之短攻对方之长；再说，草原上生长的蒙古人对那些北地音乐比对汉地音乐容易接受，所以蒙古人认为是他们取胜了，这毕竟是一场只有他们做裁判的比赛。"说完，道长作别王坚，走出钓鱼城，前往江对面的蒙古军营。

来到江北面，木尘道长更清楚地看见蒙古军营。江边一个个蒙古包像河滩上的卵石，剽悍的蒙古兵列在帐篷前，面向钓鱼城方向的蒙古包中间，立着一根高约十丈的旗杆，挂着一面旗帜，上面用蒙文和汉文写着"琴挑南朝"！旁边一溜儿挂着百余颗头颅，在蒙蒙细雨里，更加显得瘆人。而最靠近钓鱼城方向的那颗，就是他的得意弟子孜桐，血迹还未全干，眼睛仍然没闭上，仿佛心有不甘。悬挂着孜桐头颅的那棵旗杆下面，是一个阔大的琴台，琴师果然留着党项人特有的秃发，前面摆着一把宋朝很少见的琴。之前，蒙哥看见挑战的宋朝琴师前来，便问是否

知道这个琴的名称，说不上者有时连挑战的机会都没有。

道长由蒙古兵丁引着，走近琴台，只见琴台旁边坐着一个神情倨傲、正端着酒杯的蒙古人，蒙古兵士大声呵斥："还不拜见大汗？"

道长不卑不亢地说："贫道是来学习琴艺的，其他礼仪无暇顾及。我乃大宋臣民，拜也只拜我大宋皇帝。"蒙哥问："你可知道这把琴么？说不上来历者，杀！"道长淡然回答："蒙古人善骑马征杀，何来琴艺之说，这不过是一把亡国之琴，还用得着细说么？"蒙哥一愣，这不和莫已佑男说的一样么？便命令莫已佑男："你先弹一曲，这个道人说不上曲名，照样得死！"

就在道长回答蒙哥时，莫已佑男心里一惊，心里暗暗赞叹这位道长的音乐功底与气度，想到这些天来死在蒙古人手里的那些琴师，个个琴艺高超，他从那些琴声里学到了不少南宋音乐的真髓。那些琴师却死在蒙古人的手下，而自己和这把奚琴却被蒙古人作为杀手。眼前的这位道长，命运会如何？南宋朝廷在蒙古军队前，是不是很快就和西夏一样成为灭寂之邦？想到这里，他开始弹奏一曲自己在被俘后谱写的一曲《去国吟》。

一时，一股悲怆的琴声飘满江上，远处的钓鱼城和近处的蒙古大营都是一片死寂，寂静得连江面上细细洒落的雨声似乎都能听见。宋营里已经知道今天来的是得道高人和一代琴师，似乎将蒙古军队和宋朝军队的对垒命运寄托在他身上。蒙古大营里也逐渐传开，今天来的道人是这些天来第一个说出琴名而没有被大汗杀掉的人，那些蒙古士兵也开始关注起这场不仅关系两个琴师还关联到是否退兵的特殊对垒。

蒙哥等莫已佑男演奏完毕，问道长："老道，你能说出这个曲子么？"因为连他也没听过这个曲子。孰料道长端坐在自己已经摆好的琴前，说："唐朝，我汉地有诗人曾在一首诗里写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位演奏者想必该是前不久被蒙古军队消灭掉

的西夏人吧，这是一首亡国者的声音，怎能成为大汗骄傲的资本呢？”蒙哥大怒道：“你胡说！臭老道，当心我立即会杀掉你。”道长说：“这把琴虽然南地少见，但应该是造在西夏仁孝皇帝时，从河西一带引进的人面奚琴，因音色上乘、演奏难度大而走进西夏皇室。如果贫道没有猜错的话，这位演奏者想必来自西夏皇室演奏奚琴的莫已家族。你们的成吉思汗在远征西域时就是尊道的，陛下想必知道成吉思汗曾邀请过我道中的丘处机道长到蒙古军营之事吧，如果成吉思汗在此，想必不会用陛下的礼数对待道家人士吧。”

一席话说得蒙哥无法回应。还未等蒙哥反应过来，只听见莫已佑男凄然地声音响起：“唐朝时汉地诗人杜牧曾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想我大夏国亡国17年了，在如此遥远之地却能有人知道我家族和这把琴在西夏之来历，道长如此博学，佩服。如今只能是‘一江烟雨两岸花，奚琴不知万里家；十七年后亡国音，哭唱故国在西夏’。”

蒙哥看见这种情形，打断莫已佑男的吟唱，对道长说：“看来你们南朝真是气数尽了。不但打仗是我手下败将，就连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琴艺也不堪一击!”道长冷冷一笑，不卑不亢地说道：“贫道倒是记得，前些年有一个北方流族，被金人追击，奔窜于草原与戈壁间，后来低声下气恳请我朝出兵，击溃了金人，才有立脚之地。西夏国攻打此族，更是我大宋数万将士从东西两面实行夹击，才得以保全，大汗可知道是哪族?”

道长说的正是蒙古崛起之初，蒙古在金的追击下被宋朝出兵相救的历史，以及因宋朝攻打西夏才化解了蒙古被西夏进攻的危势。蒙哥脸色一沉，正要大发雷霆，这时，他旁边的随军元帅汪德臣悄悄劝他：让西夏琴师击败道长，就能从根本上摧毁南方音乐，就能让那些对蒙古音乐心存怀疑的南宋人有新的认识，且为蒙古大军继续攻打钓鱼城甚至四川

和整个南宋残余势力找到更合适的理由。

随着汪德臣一声“开始比试”，只见莫已佑男修长的手指立刻落到了琴弦上，琴声激扬，音律艰涩厚重，抑扬顿挫，起伏跌宕，弹奏的是一曲西夏古乐《素古笃》。这曲西夏皇家音乐因为融合了西域和中原古乐的成分，里面有刀枪破空的啸响、马蹄疾叩的闷响、鸾铃摇晃的脆响、成千上万人的山呼海啸……

一曲终了，蒙哥傲慢地问道长：“如何？能听懂这曲么？敢迎战么？”只见道长凝神静气，挥指徐徐撩拨琴弦，弹的却是一曲南方很平常的《空山》。琴声不急不躁，舒缓平和，如九曲蜿流之水悄然划过千山。莫已佑男一听大惊，心想我拿西夏皇家音乐演奏，里面不乏皇家气势与暗含的草原民族征伐之气，他却演奏的是具有草根气息的民间音乐，西夏皇家音乐里有着南方传去的民间音乐因素，而且此曲心境平和，旨在缓解这里遍布的杀气。

《空山》演奏完毕，莫已佑男弹奏起了西夏民间音乐《灵州辞》，并高声吟唱：“北国雪似衣，覆我西夏地，灵州有佳人，夜渡黄河去，黄河十重水，河东不见送行者，空留阿妹在河西，河西不见接引者，路上只闻征人叹息声……”接着，道长弹奏起《乌衣吟》，莫已佑男弹奏起《黑水谣》……不知什么时候，双方一来一往，弹奏各自的曲子，旁听的将士感觉时而在戈壁上奔驰，时而在沙漠里行军，时而在峻岭间前行，时而在河畔散步。时间慢慢地消逝，不知不觉中已经是黄昏时分，一抹夕阳照在三江汇流处。突然，莫已佑男弹奏起《夏吟》，并大声吟唱：

七十二面湖水照见家国，家国改了模样，

七十二朵莲花带走狼烟，莲花卸了旧妆。

万家灯火寂灭，空对四面墙，

远征儿男，空守一城冷霜。

月光里的凉州更凉，《凉州词》呵，谁来弹唱?

清水里的刀锋，失去光芒，锋尖泛黄。

八千里大夏疆域，东枕黄河长又长，

三百万党项健儿，远征祁连长又长。

城头三更月儿醒，麦苗变黄，

麦苗黄时，没了新娘，

没了亲娘，没了家乡。

……

蒙哥和汪德臣等人，虽然对琴艺一窍不通，却完全被莫已佑男凄楚的琴声和歌声震慑住了。这时，天色越来越暗，雨声愈来愈疾，风声愈来愈厉。突然，嘣嘣嘣……一连几声脆响，道长嘴角上挂着血丝，一头栽倒在断了弦的古琴上，气绝身亡。

一个下午，外人知道他们比的是琴艺，只有他们知道，彼此比的是心力，是亡国前后对家国的体认与感知。显然，道长从莫已佑男的《夏吟》里看到了比西夏更辽阔的大宋疆域丧失大半的心痛，从《去国吟》里已经看到大宋即将亡国的影子及臣民的命运与心境。加上连夜的赶路，一天滴水未进，一个下午的比赛，已令他心力耗尽。

陪同的宋朝官员秦雾旗向蒙哥祝贺："按斗琴规矩，弄断琴弦，便算是输。这一场，是你们的琴师赢了。"蒙哥看见道长血溅古琴，一则惋惜，二则觉得今天如果不是这个西夏琴师，场面真不好对付，虽然心里很难受，仍强打精神说："西夏乃我蒙古骑下亡国，他就是我大蒙古的琴师。过不了多久，大宋所有的琴师也是我蒙古大汗帐下的臣民，这个道长实在可惜，我要厚葬他，从今天开始，不比琴了，我就不信攻不下这座小小的城池。"

那夜，蒙哥为了庆贺这场胜利，在军中大摆筵席，就在蒙古士兵放松警惕时，莫已佑男连夜逃走。他听说西夏皇裔沿着川西的峻山急流南下逃亡，便带着那把“人面奚琴”和军中部分西夏军人以及对西夏有着深厚感情的其他部族的士兵一起南下。后来，他们在云南和四川交界一带，找到了一支逃亡的西夏后裔，便隐居在那里，将西夏古琴艺带到了那里。

至今，漓江纳西古乐的乐器中仍有“人面竹胡琴”。2006年10月，我到云南丽江，见到纳西音乐人宣科先生在纳西古乐会的宣传单中这样写道：“中国古代奚琴之变种，纳西族人称‘人面竹胡琴’。”宣科说：“人面竹胡琴绝对不是南方的乐器，是明显的西域乐器，如果西夏乐器中有它的话，那么，它应该是西夏的乐器了。”宣科还介绍纳西族古老的乐器苏古笃也是从北方的西夏传来的。

西夏前期，西亚音乐逐渐东渐，对西域及东亚文化产生了明显影响。此前的中国传统音乐，多是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先秦时的70多种乐器中，弦鸣乐器就极少，西亚音乐的传入打破了这个局面，胡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古人将西域统称为胡地，将他们的琴也就称为“胡琴”。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就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中写道“中军置酒饮客归，胡琴琵琶与羌笛”。另一位诗人刘禹锡也在他的《和杨师皋给事伤小姬英英》中写道：“见学胡琴见艺成，今朝追思几伤情”。一个值得音乐人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胡琴泛指弹拨乐器，并不是西夏时期的拉弦乐器。

拉弦乐器发源于阿拉伯半岛。公元前3000年时，希伯来人就在使用阿拉伯人发明的一根弦的“拉巴卜”。后来，波斯人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二弦的“拉巴卜”，称为“卡曼恰”。卡曼恰通过丝绸之路传进西夏境，且成为皇家乐器。西夏灭亡后，它被蒙古高层看好，马可•波罗到中国时，恰好是这种乐器在元政府中开始盛行的时候。《马可•波罗游

记》中记载的蒙古人当时使用的一种二弦乐器，与《元史》中记载的二弦“胡琴”是同一种乐器。

其实，中国古代的《乐书》记载的“奚琴”也和这种琴相似，不过古时的中国“奚琴”是“以竹片轧之”，而从西域经过西夏传入中原王朝的琴被笼统地称为“胡琴”。

周菁葆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①]一书中，这样说道：“由此说明，蒙古人的‘胡琴’并不是波斯人所发明，……这种乐器共鸣体为圆形，两根弦，用弓拉奏，传入中原称之为‘胡琴’。之后又得到发展，演变成二胡、京胡、板胡、四胡等不同类型的乐器。而蒙古人从阿拉伯学到的‘拉巴卜’，以‘马头琴’为名，长期只在蒙古族中流传。”可见，由于西夏在建国前，就占领了河西走廊一带，切断了中原王朝和西域的联系，许多西域的都要通过西夏东传。西域的许多乐器、演奏方法就是经过西夏中转，然后传入中原。而真正的奚琴却随着西夏乐人的南下，被带进了神秘的云南西北部一带。

①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后　记

有个帝国，有段传奇

如果我的才情和青春是一盏蜡烛，那么，接到本书写作任务的那天，就是一支点燃在蜡尖的火苗，我看见写作行进途中自己生命的燃烧。这是一本焚燃我生命的书！

2008年，中国内地所有的省城、二线城市甚至县级新华书店都摆出了诸如《匈奴帝国传奇》、《契丹帝国传奇》等北方游牧部族建立的、对中原王朝而言是异族政权的“西向天狼”系列丛书，《西夏帝国传奇》的书写者在哪里呢？这本书什么时候才能出版呢？我和许多读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等待着！

2010年4月底，成都的全国书展上，我有幸见到了“西向天狼”丛书的责任编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刘微老师。4月的蓉城是美丽的，那场淅淅沥沥的细雨中飘荡着我们的谈话，短暂而美好的谈话终结处，是一个意向性合作的落地：刘微老师委托我来完成这本书！从蓉城归来后，因为《青海之书》的最后写作及修改，只能看着《西夏帝国传奇》像个影子飘在键盘上空，终是无法动笔。

2000年年初，我落居贺兰山下昔日西夏王朝的旧都，一个个夕阳下的张望，一个个月夜深处的研读后，这个王朝的神秘越来越吸引我走近。

我自此开始持续10年间在中国大地上的行走，主要方向是为了寻找中国大地上的西夏后裔，为此，我在没有任何赞助的条件下，只身上路，将足迹置放在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河南、北京、河北、云南、四川、广西、安徽、浙江、陕西、宁夏等18个省份，完成了《神的过错》、《王朝湮灭》、《王族的背影》、《西夏史》等专著。

著名作家、“宁夏三棵树”之一的李金鸥曾经笑说我是800年一遇的一个人，他指的大概是西夏未亡国前至今的800多年间我对西夏文化的如此痴迷者吧。如今，看着那副陪伴我10年风餐露宿的背囊日渐衰老在我的注目里，当我几个月不出门时，它就像一个备受冷落的老朋友，满面灰尘地待在角落里，默默地提醒着我：该动身时，就要身负使命而走。想起诸多媒体赠予我“中国第一行走记者”的赞誉，我只有一次次将自己放在那条孤寂的路上，为了一个前定。

2008年秋天，寻找西夏宗教之源的漫长追寻，使我走到了青海和西藏交界的澜沧江上游的藏地，和上师丹求达瓦仁波切从玉树结古镇出发，绕道西藏昌都，寻找西夏亡国后从西夏去的大批工匠修建的昂欠王朝的根蚌寺遗址。站在那片似曾相识的废墟上，上师轻声问我：“不觉得这里熟悉么？是否感觉来过这里？”那一声问询中，我的内心被震惊了，我猛然惊觉——恍然自己到过那里。上师的话语随之飘荡在耳际：这是前定，这里有着命定的功课。

800多年前，藏地高僧热巴受西夏国王邀请前往西夏传教，并被国王敬奉为帝师。780多年前，热巴再次回到藏地深处，在澜沧江边修建觉扎古寺以及他的弟子修建根蚌寺时，他们是否知晓隔着那么长的岁月之河，我驭风而行，走进40多座海拔4 000米以上的雪山和4 000里之途隔着的那方神秘？站在那里我东望西夏，亲身体悟：几百年的轮回中，人的生命显得那么轻！

那一刻，让我立时也想起自己在2004年4月末为了探寻西夏后裔和

生活在喜马拉雅山下的夏尔巴的关系，孤身背着帐篷和睡袋，穿越喜马拉雅山抵达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地方，千方百计地出了海关抵达雪布岗。在那个满树长满杜鹃花和玫瑰的村子里，97岁的白玛活佛见到我就说：这是佛的旨意。

我一直讨厌将自己出于个人爱好和兴趣去探寻西夏的举止看成什么使命、任务、课题，但一次次传奇般的经历中，遇到的人和事，不由得使我常常觉得这些经历，是自己为西夏做着力所能及的事。亦如这本书，它不是贩卖一种常识或争得个人的荣誉，它是在为那个创造了灿烂文化的、谜一般的王朝发言，为一个在二十四史中缺席和哑声的、中华历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王朝说话。

站在2010年秋天的腹地，我身后是10年零碎地堆在记忆角落的岁月，是黄土、沟壑、高原、雪山、草场组构出的地理图景，也是塞北、西域、江南、边关、塞上抟造出的人文画卷。在这些岁月、图景和画卷中，我的努力仅仅是为了逼近这个王朝的神秘内核或精彩传奇，这些逼近显得多么浅薄甚至乏力——我只有更加努力。

精彩的王朝落魄地谢幕于仓促之中，谢幕于铁血和强力之下，也谢幕于来不及祭奠的神性之上，但谢幕时那仓皇的面孔定格出的惶恐眼神，那些凄惨地将逃亡写于遁隐之中的背影，吸引着我在21世纪初缓缓出场。一个青灯之下细读的苍白面孔，一个抬头张望后无助的眼神，一个思考日久后衰弱的大脑，一个身负行囊徒步在有关这个王朝的各个角落途中的身影。这些就是我在这个传奇王朝的书写后，再次以传奇的方式去寻找那些传奇后裔的原因，——诚如我在《西夏史》中写道的："充满未知的探寻有时比解开谜底的结论更有意味。这不是我为自己10年间横跨中国18个省区探寻西夏后裔一地模糊的背影后没有确切答案的辩解，只是对自己艰苦的行踪有一个简单的交代。"

西夏帝国充满传奇，对我而言，对这个王朝的书写和走进也充满了

传奇。西夏让我挣脱了学府和学科的约束，呼吸着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踏上了一条游牧西夏之路，竖埋着自己在这条路上的碑石或路标。在完成工作的基础上，那些丈量王朝的脚步后，是艰辛和努力，是没有任何经济外援下孤身上路且坚守10年的拮据与困窘：有为了进入高原藏地而切除的胆囊；有零下27度走进腾格里沙漠的冬日苍凉，也有夏日炎炎中穿行在黄土高原上的酷热；有行进高原遇见狼时在酷冷中的相峙，也有在川西高原的羌族寨落中几乎被毁容的古寨探秘；有为寻找党项羌的另一个族源鲜卑人而穿越大兴安岭的孤独，也有为探寻西夏宗教之源而几次前往澜沧江上游青海藏区的坎坷；有为找寻杭州飞来峰造像和西夏造像关系而自费前往留下的屈辱，也有准备到越南探秘西夏军裔葬身之地却只能隔着一水淼远而无法走进的遗憾……一个经济时代里，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坚守和出场注定是孤单的，一个人对西夏发起的战争和无法收场的行进，注定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我要感谢我在西夏探寻途中所有给予我帮助的朋友，感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领导的策划和刘微老师的编辑工作，感谢《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图制作者高飞先生、西夏影视城、内蒙古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园等的图片支持，更是感谢那些为西夏研究作出努力和贡献的西夏学前辈，本书的完成同样离不开他们的研究成果之助。同样，我要感谢那些阻挠我行进在西夏之路上的人，他们的伤害同样培育了我的力量。最后感谢的是我的爱人杜兆红女士，十多年如一日地支持着我，在一个功利的年代，一个正义、知识、良知和尊严都不应该被忽视的年代里，默默地支持我，让我在西夏之路的探寻和写作中，维护着我的尊严，体现着我的价值！

2010年10月中旬　贺兰山下

西夏旧都　银川载水岗